

思想的分斷

사상의 부분단

陳映真與朴玄採

치영치과 박현채

延光錫

著

연광석

延光錫(1977-)

1977 ———— 南韓中部農村出生

2004 ———— 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學士

2004-2007 —— 從事國際海運物流

2007-2009 —— 台灣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2009-2016 —— 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

曾任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兼講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訪問學者、韓國北韓研究大學研究教授，現為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思想的分斷

사상의 분단

陳映真與朴玄採

진영진과 박현채

연광석

延光錫——著

目次

「推薦序」 回望一個相信新世界的年代／陳信行

7

韓文版序

13

敘說

思想性巫祭

19

戲台

走進區域性參照

31

歷史掛帥與區域性參照研究

32

- 知識的矛盾
- 殖民之後的知識
- 知識與去殖民的困境
- 東亞區域參照點與歷史掛帥

反思當代的殖民性：以朴玄埰為線索

40

- 第一線索：一九八〇年五・八與民眾主體性的困惑
- 第二線索：一九六〇年四・九與「民主」的悖論
- 「奴隸的特色」：殖民性的持續和演變

奉請

當代歷史中間物——陳映真（一九三七—二〇一六）與朴玄塚（一九三四—一九九五）

57

作為參照點的台灣：陳映真

- 歷史意識：早期文學
- 如何克服愛的不可能性？——早期和中期的文學
- 分斷、內戰、民眾
- 相互參照所呈現的歷史特定性

作為歷史中間物的朴玄塚

- 戰後實踐型知識分子的困惑
 - 歷史中間物的原型體驗：以「未完成的回憶錄」為中心
- 如何歷史化一九八〇年代？

114

灌浴

一九八〇年代與後冷戰轉型的悖論——「社會性質論戰」

119

為何反思南韓社會性質論戰？

光州五·一八與「民眾論」的悖論

- 一九八〇年「光州慘案」與思想運動的主體性問題
- 「主體」的「民眾」之興起與去歷史化

126 120

民眾論的再歷史化與朴玄採的民眾論

陳映真的南韓情結與社會性質論

• 第三世界認識下的韓國情

• 台灣社會性質論

• 「思想的貧困」與「思想的斷裂」

朴玄採的社會形態論和社會性質論

• 一九八〇年代思想課題與朴玄採的位置

• 「目的性的論戰／意外的波瀾」

• 朴玄採的孤獨：短暫的「開放」與「斷裂」的深化

反思「貧困」和「斷裂」的相互內在化

• 相互參照的認識與後冷戰的悖論

• 「貧困」和「斷裂」

奉送

新殖民／分斷體制下思想繼承

殖民主義現代性與知識的所有

新殖民性認識與思想繼承的矛盾：朴玄採與白樂晴的爭論

• 文學與經濟的關係

• 分斷體制與第三世界

• 「新殖民／分斷體制」與去殖民的困境

被忘卻的遺產：《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與新殖民／分斷體制

• 歷史與理論

• 結構與諸範疇

「民族經濟論」與新殖民／分斷體制

283

拆台

重新開啟思想解放空間

287

朴玄採的困惑：具有開放性的可能性

288

東亞去殖民主義：亞洲作為方法

290

回顧《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採》

293

後記

299

「讀後」延光錫的工作意味著什麼？／陳光興

306

附錄

313

朴玄採與陳映真年譜

314

參考書目

322

「推薦序」回望一個相信新世界的年代

陳信行

在過去二十餘年間，我有許多機會和南韓的眾多師友、學生、社運工作者交流乃至進一步共事，光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這些經驗給我更豐富的材料來思考台灣與南韓這兩個在過去七十年的當代史裡「形同實異」的社會中，人們試圖理解現實、並進而改造現實的種種雄心與挫折。

《思想的分斷》是第一本有系統地嘗試分析、比較台韓左翼經驗的著作。光錫用來討論的雖然是兩位具體的「形同實異」的運動中的知識分子：陳映真與朴玄埰，一位是逼自己學習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台灣文學家，一位則是掛心著想寫小說的南韓經濟學家。但是，光錫的分析容許我們以這兩位人物為切入點，不僅僅理解他們的世代與時代，更能夠進一步思索更抽象一點的大問題：改造社會的知識與行動之間存在著什麼關係？應該是什麼關係？

十九世紀末進入東亞文化圈的西方知識體系，把試圖理解人與社會的知識工作分為看似截然不同兩種：歷史、文學與其他藝術創作在一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社會分析在另一邊，而不像傳統「文人」基本上既作詩詞書畫、又寫治國方略、還會讀史修史。在現代大學裡，

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多半如理工醫農學院一樣，分成了一個個不同的科系、專長、「領域」。「領域」這個說法尤其耐人尋味：原本是個指涉房地產所有權的詞彙，當代學界人士以之來稱呼知識的形態、課題與方法，卻彷彿再自然不過。

人文與社會科學知識，至少到了二十世紀，的確也幾乎無可逆轉地成了兩種探究世界的途徑。對照陳映真所身處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與朴玄採所參與的韓國社會性質論戰，這兩個時代與歷史脈絡相似的知識事件，可以看得出兩者的關鍵差異：

文藝垂直地繼承歷史所給予我們這個特定時空中的人們共享的感情結構來說故事，有影響力的作品也會成為後人所承繼的感情結構的一部分。因此，鄉土文學論戰的核心追問的是「誰的歷史？誰的感情？」——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是庶民百姓的歷史？而社會科學試圖捕捉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常以橫向比較作為方法，因此社會性質論戰追問的是「南韓是不是個第三世界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文學，尤其是小說與戲劇，談問題的工具是人物角色與情節。好的文學裡，人物固然可以有典型性、但絕不能平板，往往必須身負各種集體與個人的歷史所帶來的矛盾糾結的情感。

社會科學的工具是概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性質」、「依賴」等等理論概念，或許歷史上是在研究十九世紀的英國、二十世紀中期的巴西或埃及等不同時空中的事物而發展出來，但必須對於理解另一個時空中的事物有用。從而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總是必須爭論哪些歷史特定性是在抽象過程中擱置、哪些又是不能忽略的。若不能擱置十九世紀的英國社會與二十

世紀的南韓社會的種種具體差異，我們就不可能用「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分析概念了。

從知識的性質來看，一位習於打造生動而矛盾的立體人物來反映現實的文藝工作者，和一位習於操作抽象而力求準確捕捉現實的概念工具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互相羨慕彼此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更重要的或許是這種對自己的不足的認識所反映出的，二十世紀中期左翼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這也同時是那個時代的左翼運動對自己的要求。

投身運動中的左派沒有那種奢侈的餘地，來強分文藝與社會科學、垂直繼承與橫向比較。現實永遠在對反抗者毫不留情地追問：你想要動員的「我們」是誰？「我們」在乎什麼？「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值得「我們」追求的道路往何處去？中間有哪些曲折是必要的？哪些則是背叛理想？感性與理性、歷史與理論，在反抗運動中是既矛盾又合一的。忽略了其中任何一個面向，運動就會失敗；或許是韓戰或台灣白色恐怖中那種大量血腥犧牲的失敗，也可以是理想主義者紛紛去當官發財、群眾們變得絕望犬儒的那種失敗。

在二十世紀中後期分別在南韓與台灣成長、思索、奮鬥的朴玄採與陳映真繼承的運動，是在之前全球各地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發展出來的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民族解放運動。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或許是這個運動的全球性最高潮——一九六〇年南韓「四·一九革命」推翻李承晚政權、日本百萬人上街頭反對《日美安保協定》(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一九六八年越南戰場上「新春攻勢」(Tet Offensive)重挫了美軍的士氣、全美國各地反戰聲音日益高漲，法國、墨西哥、日本，似乎到處都有反資反

帝的學生運動在大規模抗議；而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看似正在把一九一七年在俄國開始的共產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推向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朴、陳二人固然當時都身處嚴酷冷竣的獨裁政府壓制下，但是可以想像他們與同代反抗者的思想與情感火焰是如何在「黎明將屆」的情境中熾熱燃燒。

那種熱切相信新世界即將到來的火焰是何時被澆熄，對於不同社會不同個人或許都有差異。確定的是：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中期，還相信革命的知識分子可以與勞苦大眾結合、組織一個先鋒黨、畫出一條正確路線、通過民族解放與社會主義革命走向世界大同，這樣的人已經越來越少、越常被視為食古不化。台灣與南韓也就是在那段時間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之後的政治民主化。進入後冷戰時代、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又繼續被冷戰格局籠罩著的台、韓兩個社會中反抗既存秩序的人們，面對的是與二十世紀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所面對的非常不同的情境。兩地一代代的年輕人中都有人不放棄挑戰現存的權威與秩序——在二〇一四年台灣的「太陽花」抗爭之後，南韓的二〇一六—二〇一七年十二次浩大的燭光示威把保守派政府趕下台，並間接促進了二〇一八年開始的兩韓和平進程。

在從「太陽花」到燭光示威的這些年間，我看到台、韓兩地的抗爭青年非常類似的精神面貌與社會處境：不同於陳映真與朴玄塚所見證的經濟高速增長年代，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南韓與台灣年輕人面對的經濟前景是幾近絕望的。各行各業絕大多數工作職位低薪又無保障。沒關係沒背景的，就幾乎注定一輩子辛苦。「社會不公平」無需太多政治經濟理論與分析、幾乎伸出手就摸得

到。抗議者依循的是民主化過程中逐漸成為大家共享的價值觀與感情：公平、正義、民主、人權、尊嚴……。很多人知道這些理想受到威脅，也願意站出來以行動捍衛這些價值。但是，朴玄採與陳映真那代人如此認真辯論的社會形態分析以及理論分析所應該能指導的路線與口號，在我們這個時代嚴重地蕭條貧瘠，完全無法負擔抗爭者的行動熱情，以至於大量對自己真誠的青年行動者一面頑強組織著抗爭、一面哀嘆著「運動傷害」。至於什麼是「運動傷害」？除了跟挫折有關這點是確定的之外，這個說法的方方面面都曖昧得難以穿透，自然也難以討論有什麼解決之道。這不僅是台、韓兩地的特色，同時代的歐洲、南北美洲、乃至鄰近的香港，都有類似的現象。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回頭看陳映真與朴玄採，像他們那樣的那一代各國左翼運動者固然為理想付出了鮮血的代價，但是至少在他們年輕時、決定步入運動的那個時刻，什麼理想值得為之犧牲生命？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清晰得讓我們後代豔羨。但是他們在工作生涯的晚期，也紛紛見證了我們這個尷尬的年代的到來。

光錫的《思想的分斷》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課題拉起了一個十字座標型的連結：橫向比較兩個歷史人物與他們的學思、實踐與時代，縱向地聯繫他們曾經走過、而我們現在繼承下來的歷史。我想，光錫與朴、陳二人一樣，花了這麼多力氣去探究台、韓兩地這段錯綜複雜的思想與社會、政治歷史，並不是要思古之幽情，而是希望他們的經歷能夠有助於思索、理解當下我們所面對的課題。

韓文版序*

邁入二十一世紀已有十八年。此時回顧二十世紀一九八〇年代東亞和南韓思想狀況，而進行重新歷史化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自從今年（二〇一八年）二月起，朝鮮半島和東亞的局勢進入了動盪時期。經過朝鮮戰爭而鞏固化的分斷體制也似乎動搖著，尤其體現在朝鮮半島南方和北方的最高領導在板門店的會晤上。有些人更預測終戰宣言或停戰協定將轉換成和平協定。¹ 如果局勢的轉變朝向真正的和平，

* 編註：本文為【韓】延光錫（연광석）（二〇一八）《思想的分斷——以亞洲作為方法，重讀朴玄採》（사상의 분단——아 시아를 방법으로 박현채를 다시 읽다）（首爾：Narambooks 出版）一書韓文版自序，中譯後收入本書，作者並為台灣讀者理解序文脈絡增訂註腳說明。

1 後殖民／分斷體制下，因為冷戰這麼一個外部條件的制約，包括南韓在內的、屬於資本主義陣營的東亞區域，無法充分認識東亞社會主義陣營所具有的去殖民主義／第三世界屬性，反而一向深化了從西方現代性和反共主義視角的其他者化認識，即便進入了後冷戰時期。自從二〇一八年一月凸顯的朝鮮半島南方和北方關係、北朝鮮和美國的關係以及北朝鮮和中國的關係之轉換，更是要求我們在認識論層次展開去殖民、去冷戰和去分斷的實踐。

我們應該都要歡迎它。不過，作為知識工作者，我面對如此轉變，首先感到慚愧。因為，雖然知識不決定政治，但不參照知識的政治也不存在。

我面對如此局勢的變化，回想起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和一九九〇年代初中期我們的知識狀況。我們如何經歷了東歐社會主義的動搖與崩潰，那一個口耳相傳的「歷史的終結」的年代呢？那個年代正是藉由西方現代性的標準，如資本主義發展（加入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自由主義政治體制（所謂民主化）、國際法上國家性質（作為聯合國的成員）等，而讓被賦予的正常性在假想上得以充足的時期。但是，隨即於一九九七年發生的危機暴露了此「正常性」的虛構性。而後，我們的二〇〇〇年代到底又意味著什麼？²再一次的，我們假想地克服一九九七年以後的危機，但二〇〇〇年代實際上是「危機的日常化」為代價而得到的。結果，當下的危機已經成為在地生活的人們之日常感覺。然而，我們仍在暗中摸索解決危機的答案。

我在此書以「思想的斷裂」概括了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思想史轉型。因為斷裂，我們的知識思想處於下述狀態：尚存的沒有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後殖民，與尚未去冷戰（de-Cold Warization）的後冷戰，兩相重疊一起，而分斷體制貫穿了如此歷史過程。如果說，後殖民政治社會體制是反共主義／威權主義的分斷體制，那麼後冷戰政治社會體制則是反共主義／自由主義的分斷體制。我們內部的反共主義繼續演變且從未消失。自上而下的強迫性反共主義，以假想的正常性為媒介，滲透到個別主體內部而發展成主體的反共主義。結果，當下對於反共主義的批判資

源，悖論地從過去共產主義所批判過的自由主義取得。

究竟帶來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後冷戰轉型的動力是什麼呢？過去我們從冷戰——尤其是歐洲冷戰體制，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格局——觀看如此歷史轉型。以「歷史的終結」描述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崩潰的原因就在這裡。有些人沿用這個同樣的脈絡，來推測中國以及北朝鮮的終結。這樣的歐美中心世界觀，將世界區分為中心和邊陲並且以中心的標準來界定邊陲地區，從自閉的世界圖象尋找推動後冷戰轉型的動力。而即便殖民／帝國主義透過殖民地經營或新殖民國民國家，做出了以資本主義打穿世界的時間／空間均質化實踐，但是對此歷史過程的抵抗和克服，同時透過區域性國際主義，做出了跨越國民國家疆界的多樣國際主義／民族主義實踐。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是其成果，同時也是另一個起點。其後的歷史，雖然經歷許多曲折和浮沉，但從全球視角來看，具備歷史的民族主體的區域性實

2 一九九七年南韓的外債危機是新殖民經濟體制所深化的非自立性和非自主性的戲劇性表現。尤其，藉由外部條件的變化(三低好況：低利息、低油價和低美元匯率)而出現的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至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經濟增長，與所謂「民主化」的政治轉型同步形成了南韓經濟的正常化這麼一個假想。但是，例外時期過去以後，假想中形成的泡沫快速崩解，大規模壟斷資本也破產，結果造成了國家破產的危機。南韓政府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申請救濟基金。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當選的新總統金大中積極接受和貫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南韓經濟的結構調整要求。雖然於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南韓政府完成一百九十五億美金的償還，但南韓經濟變成對外更開放，對內社會經濟兩極化更嚴重並鞏固的體制。

踐從未停斷。但我們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認一個事實：在新殖民／分斷體制下，經歷過思想斷裂的南韓的知識，無法提供閱讀如此歷史的視野。

對南韓來說，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冷戰的動搖仍然被認為是外部世界的事情。不過，透過作為此書區域參照點的台灣角度來看，世界性轉型在一九七〇年代或者更早之前，已被表現成冷戰的動搖。認識論上的遲滯如此明顯。不過，經歷了一九八〇年代轉型的一九九〇年代知識思想界，卻遺忘這個遲滯，反而更沉溺於歐洲現代性之後。也就是說，在現代性標準下，透過假想獲得的主體性，進一步走出了全面和主動挪用後現代性論述的一步。而面對著終於到來的一九九七年的危機，我們的知識思想簡直無能為力。在歷史遺忘已經日常化的狀況下，思想史的反思無從找到出路。結果，在二〇〇〇年代，當人們都處於日常危機的狀況下，思想界進入了簡直是「思想的終結」狀況。基於假想的正常性而成立的大學體制及其分科學問體系，吸收了民間學術思想的自發性空間，而學術思想界面對歷史和社會的需求，保持了沉默。

而當下的世界史似乎再度進入巨變時期，也給朝鮮半島和東亞局勢賦予能動力量。我認為，知識思想界對此狀況的應對是緊迫的；不過，緊迫也容易產生著急。我們必須先承認「思想的貧困」，深吸幾口氣，調整好我們的呼吸，展開一場思想運動，以便省思根本原因的所在。

此書的寫成，正是面對上述知識思想史的危機狀況，試圖摸索答案的反思。在此過程中，我多虧了南韓的朴玄塚先生和台灣的陳映真先生。不過，此書並不將兩位先生的思想實踐當作理論性私有對象且進一步系統化，他們的思想實踐不能被化約於此書的論點，而必須被視為一個媒

介，揭開主體性地討論過去被帝國／殖民主義知識體制所掩蓋的問題之空間。

衷心感謝 Narumbooks 出版社的編輯友人。我希望此書有助於苦惱思想究竟有何用處的人們。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九老區港洞



延光錫(2018)《思想的分斷》
(首爾：Narumbooks)韓文版書封

叙説

思想性巫祭

因著歷史地理的制約性差異，台灣有別於朝鮮，以「割讓」的方式成為日本殖民地，從而具有了殖民／分斷重疊的特定性。如此特定性也決定了冷戰之後台灣和南韓不同的歷史處境，即便兩者都處於分斷狀態。而這樣的不同，讓冷戰時期的台灣，比起南韓，更為直接地體會了「冷戰的動搖」。尤其是台灣的知識思想界，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就從保釣運動得到有關於歷史主體性的啟發，¹接著也經歷了「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²而形成了凸顯與外部的關係性之關於「主體性」的思想論述空間。在一九八〇年代這樣的時代條件下，陳映真（一九三七—二〇一六）面對著以對抗國民黨的「黨外運動」的成長，與「現代」和「自由民主」相互共謀為特徵之政治環境的大轉型，提出「思想的貧困」此問題，進而超越文學領域，走出了更積極的社會實踐道路，包括創辦《人間》雜誌（一九八五年）以及創立「中國統一聯盟」（一九八八年）。

在一九八〇年代苦惱於「思想的貧困」的陳映真，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三日，以《人間》雜誌記者的身分，對南韓民族民眾運動各領域和議題進行了採訪，相關報導刊載於當年的《人間》雜誌六月號。³當時，陳映真訪問「全國民族民主運動聯合」後所撰寫的報導，傳達了當時他所接觸到的氛圍。

在大漢城的一個小巷裡的全民聯（全國民族民主運動聯合）中央辦公室，桌椅簡陋，看得出物質上的拮据。但在整個訪問過程中，記者看見它的忙碌、興旺和一股堅毅不拔、勤勞奉獻的氣氛。正是這偏僻的辦公室，在指揮著不時在國際媒介上轟然出現的韓國重工業同盟罷工、

1 參見戴國輝、松永正義、陳映真在一九八七年的對談文章〈台灣變革的底流〉（鄭莊譯）一文的註一，「保釣運動：一九七〇年九月美國決定將沖繩島歸還日本。依美方所公布的範圍，它包括釣魚台群島在內。這遂引起保護領土所有權的運動。這個反美、反日的運動乃轉化為面對問題提不出對策的國民黨的批判。繼而促成了民族主義的覺醒，以及對政治、社會的批判運動，而成為七〇年代反體制運動的引火線與出發點」，引自《陳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二〇一—二〇二。

2 參見〈台灣變革的底流〉一文的註二，「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前者是對偏離現實社會，一味模倣西歐的現代詩的批判，以及對現代主義的批判為主題的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的論爭。這個論爭終於形成為七〇年代台灣寫實主義文學的契機。這樣形成的文學潮流，因為是以描寫台灣社會為主，所以被稱為『鄉土文學』。對於這個情勢，國民黨周邊的文學家，乃批判其為共產主義文學，而引發七七—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爭。透過這個論爭，現實主義文學潮流乃廣為社會認同，同時也顯出了擁護鄉土文學者之間的文學觀的分歧」（同前引註，頁二〇二）。鄉土文學論的代表性人物之陳映真早於一九六七年發表短篇小說〈唐倩的喜劇〉，即是針對殖民主義的現代主義知識文化提出嚴厲的批評。

3 參見陳光興（二〇一〇）〈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七十八期（二〇一〇年六月），頁二一五—二六八；陳光興（二〇一一）〈陳映真的第三世界——五〇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四期（二〇一一年九月），頁一三七—二四二。《人間》雜誌相關報導文章的標題如下：〈民族的報紙為民眾發言——《韓民族報》的精神與工作〉、〈我們有韓國民族·民主運動的傳統——「全民聯」：韓國民眾民主化運動的司令部〉、〈年輕又熱烈地無窮花——八〇年代韓國學生運動〉、〈尊嚴·幸福和希望的權利——韓國工人運動與「漢城工聯」〉、〈因為在民眾中有真理……——韓國社會構成體性質的論戰和韓國社科界的英姿〉、〈韓國文學的戰後——在「不斷革命」中豐富和發展的韓國現代文學〉、〈耶穌在窮人中興起新教會——訪問韓國民眾神學的創始者安炳茂博士〉、〈我來……乃是要叫人紛爭——新的韓國天主教會的「紛爭」中胎動〉、〈在戰鬥中成長的韓國民眾劇場〉、〈為一切人的平等與自由的美術——韓國民族美術運動的理論與實踐〉、〈韓國民族電影運動的起步〉、〈為教育民主挺進〉、〈韓國公害運動的視野〉，參見《人間》第四十四期（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九八—一五五。接著，陳映真在《人間》一九八九年七月號上，繼續撰文〈金文豪，加油！〉、〈母親的臉孔〉、〈結果遠比原因重要——從權寧彬先生看韓國當前中間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報導了以金文豪、金明植和權寧彬為對象的採訪內容，參見《人間》第四十五期（一九八九年七月），頁一三二—一三七、一四〇—一四一、一四二—一四三。

學生悍獷的示威……。沒有「進步」知識分子的「理論的倨傲」，沒有「革命英雄」炫人的傳奇和風采，留給我的是一種民眾的樸質、誠懇、親切、不時露齒而笑……。和全民聯具體推動著激盪的運動和實踐的事實。我終於切實地感受了韓國民眾三十年嚴酷鍛鍊下成長的厚實而堅強的力量……。⁴

陳映真所撰寫的報導，採訪了媒體、民主化運動、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社會形態論戰、民眾神學、天主教、民眾戲劇、美術、電影、教育和環境等十二個領域的有關團體及人物，透過文學性的描述，他的報導呈現了他所觀察到的台灣與南韓的類似性和差異性。陳映真應該是藉由此報導，試圖提出台灣思想界自我反思的課題，以下列描述為例：

引自關於全民聯的報導：

他的個子瘦高，皮膚暗黑，笑起來會露出一排抽重菸的人慣有的淡黃卻結實的牙齒，看來就像台北縣新莊、板橋一帶的年輕工人。⁵

引自關於學生運動領袖的報導：

這樣的男孩，在台北大學校園裡到處可以撞見。只是他們多半可能忙著彈吉他、跳舞、「把馬子」……但眼前這個任鍾哲不但是等一個禮拜後真除「漢城大聯合」的主席，也是「全國

大學生代表者協議會」的主席。一年多來風雲翻騰的全韓國學運，就是他——以及跟他一樣的、看來只是「鄰家少年」(the boy next door)的大學生幹部們策動和指揮的。⁶

引自關於主導漢城地鐵工人罷工的女工之報導：

正是眼前這位看來和台灣新莊、板橋地區到處可以遇見的結實、純樸、勤勉、農村出身的女工一模一樣的全英美⁷，她進入一個教會辦的工人夜校學習而覺。一九八四年，她在曉星資本的一個廠裡搞領導和組織了三月間的漢城地下鐵工人罷工事件。⁸

陳映真顯然是透過南韓反思台灣，這個過程一方面對南韓民族民主運動(尤其是思想運動)抱著很大的期望，另一方面也具體反思台灣的狀況。⁹

4 參見陳映真的〈我們有韓國民族·民主運動的傳統——「全民聯」：韓國民眾民主化運動的司令部〉，引自《人間》第四十四期(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一〇九。

5 同前引註，頁一〇七。

6 參見陳映真的〈年輕又熱烈地無窮花——八〇年代韓國學生運動〉，引自《人間》第四十四期(同前引註4)，頁一一一。此處為「金英美」的誤植。

7 參見陳映真的〈尊嚴·幸福和希望的權利——韓國工人運動與「漢城工聯」〉，引自《人間》第四十四期(同前引註4)，頁一二一。

8 不過，陳映真當時對於南韓論戰的理解，稍微局限於表面層次。這樣的狀況，與其說是陳映真的誤解，不如說，是因

韓國的社會構成體性質的論戰，讓人想起三〇年代中國的「社會史論戰」；而韓國民族文學論戰也讓人想起當時中國的「文藝自由論戰」。中國的這些論戰，是在社會解體、國事凋唐的時代，而韓國的論戰卻是在韓國資本主義頑強挺進，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文化「革命」，已經完全崩潰煙散的時代。在資本主義基本上還在發展的韓國，這廣泛涉及學生、知識分子、作家、社會、社會運動和工人的強勁的實踐，究竟代表著什麼意義？這難道不是全球革命思想和運動大退潮、大虛無時代令人深思的問題嗎？¹⁰

我聽著小全的口譯，在筆記本上奮力疾書，但心思卻不時飄回台灣的社會學界。有誰能在這採訪的過程中，不為自己感到羞慚和悲傷呢？¹¹

此時的陳映真，似乎看到了二十世紀前半期在東亞和第三世界成為思想解放空間的中國，而其積累豐富的傳統，在南韓的一九八〇年代重新復活起來，因此他抱著莫大的期待，同時面對台灣的思想狀況，陳映真感到絕望。不過，到了二十一世紀初葉的今日，以主體的「去殖民」和「去冷戰」作為目標的進程來看，我們不能否認他的期待與現實的展開並不一致。恰恰相反：我們通過歷史的斷裂，進入了以虛假的自立為基礎的後冷戰時期。我們是否應該認真思考，如此的錯開是怎麼一回事？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於南韓中部農村出生，並在一九九〇年代南韓學運影響之下形成世界觀

的我，經過一連串的曲折，遇見了如此關切南韓一九八〇年代思想和運動狀況的陳映真。陳映真對於第三世界和南韓的關注，不只是因為他關切的對象為南韓而吸引我，更是因為他的思想實踐本身，早就體現了克服殖民之後我們知識狀況的「區域性參照視野」。因此，對我而言，陳映真就成了終於能夠使我回到南韓當代知識思想史，同時進行反思性思想工作的區域性切入點。事實上，二十一世紀南韓的知識思想狀況，遠遠不及陳映真當年對南韓的期待。不過，在二十一世紀

為他直接引用了當時經過二度詮釋的內容。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陳映真在報導中提到「朴玄採是PD派的代表人物」，「以朴玄採為代表的一派，認為當前韓國社會是『國家獨占資本主義』的社會。南北對立下的緊張形勢，為反共防共而『富國強兵』的發展，使國家在財政、金融、勞資關係、公共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開展……等廣泛的範圍內做強悍有力的介入。因此，社會矛盾的焦點，在內外獨占資本對廣泛被壓迫民眾的支配；運動的主導力量是工人階級、農民與貧民；運動的性質是打倒獨占資本主義的反帝、反（軍部）法西斯的『人民民主革命』（People's Democratic Revolution，簡稱PDR）」，參見陳映真的〈因為在民眾中有真理……——韓國社會構成體性質的論戰和韓國社科界的英姿〉，引自《人間》第四十四期（同前引註4），頁一二五。但事實上，朴玄採不能被視為PD派，且NL（National Liberation，簡稱NL）／PD（People's Democracy，簡稱PD）的對立格局恰恰是朴玄採所批判的對象。從朴玄採的立場來看，當時NL／PD的分裂對立是新一代知識分子沒有正確把握矛盾複雜性所導致的狀況。而對於論戰的這些表面性認識影響了陳映真對南韓論戰和朴玄採的理解。

10 參見陳映真的〈韓國文學的戰後——在「不斷革命」中豐富和發展的韓國現代文學〉，引自《人間》第四十四期（同前引註4），頁一二一。

11 參見陳映真的〈因為在民眾中有真理……——韓國社會構成體性質的論戰和韓國社科界的英姿〉，引自《人間》第四十四期（同前引註4），頁一二七。

思想匱乏的狀況下，以陳映真為切入點而進入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知識思想界，可能是重新歷史化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知識思想狀況的難得路徑之一。

因此，本書以陳映真的思想實踐作為反思南韓當代思想史的區域性參照點。然而，若參照點能夠扮演打開重新進入歷史之門的角色，那麼，歷史被開放起來的時刻，參照點的角色就到此為止。把參照點包裝成某種理論成就或體系並非本書的意圖；而南韓重要思想家朴玄採（박헌채，一九三四—一九九五），也是以同樣的角色作為本書的核心論述對象。亦即，若本書藉由重新闡釋朴玄採的思想實踐，而達成了打開一九八〇年代思想狀況的目標，那麼，書中朴玄採思想實踐所扮演的角色，也到此為止。本書沒有任何意圖把朴玄採的思想實踐包裝成理論體系。換句話說，陳映真與朴玄採的思想實踐，都是墊腳石，而本書試圖在思想實踐相互對看的過程中，嘗試找出不同的認識，開啟新的問題討論空間。

思想性巫祭

當我的思想困惑到了某個時段，我開始設想，思想工作是否應該採取更開放的傳達媒介？——因為殖民過程不只扭曲了物質和精神條件，也剝奪了溝通工具，所以當我們進行去殖民主義的思想工作之時，我們必須發展超越理性論述的情感呼應機制。我甚至考慮過，思想工作能否引進「巫祭」的方式，讓被遺忘的鬼魂重新出場以進行解怨？

如此思考的原因，是我認為「知識思想工作」的意義應當如下：在歷史中，通過知識的倫理性實踐，打造那貢獻於共同體同時也奠基於愛的美好生活模式。知識思想工作「在歷史中」的意思，是它透過「死亡」眺望「生活」。其中的「死亡」，不是從「生活」演繹出來的「死亡」，而是能夠重新照明「生活」的歷史性「死亡」。換句話說，是被「去歷史化的『生活』邏輯」所邊緣化、扭曲和忘卻的「死亡」。從如此脈絡來看，「思想性巫祭」不只可以成立，更需要被視為知識思想工作的重要實踐形式之一。

過去，「去歷史化的生活邏輯」以「民主」此種政治意識形態所表現出來。如此一來，「民主」只不過是為活人服務的政治，因而剝奪了歷史綿綿地傳承下來的政治傳統。我暫時把這樣的傳統命名為「歷史共產主義」。¹² 殖民主義現代性所賦予的「民主」，尤其強迫我們接受一種去歷史且讓個體趨向原子化的觀念性政治。

相對而言，原本具備多元主體性的個別民族在其具有生命力的歷史過程中，持續召喚不被記錄或被扭曲的「死者」，而不斷進行解怨，並從中取得未來走向和實踐指針。因此，為了恢復歷史共產主義的「政治」，我們勢必得恢復支撐著「政治」的「歷史」和「思想」。為此目的，本書的

12 去殖民主義基本上肯定世界的多元構成和歷史的動態性，從此脈絡來看，我們可以提出「歷史共產主義」立論。這可視為多元主義歷史觀和世界觀所賦予的本體論「應然」，而在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中，經過「民族生活模式論」的提出，得以具體化，而且在陳映真「歷史的整合」和「愛的不可能性」等主題也呈現類似問題意識。請參見本書〈奉請〉一章和〈奉送〉一章的相關內容。

基本構想是試圖進行一場「思想巫祭」。事實上，知識工作者也理當要成為聽取「死者」聲音的巫者。我們需要恢復知識者原有的而被殖民主義現代化所剝奪的聽力。

故本書的結構將援引朝鮮民間傳統中廣泛流傳的「巫祭」（鎮魂祭）程序：奉請—灌浴—奉送，前後分別安排了〈戲台〉和〈拆台〉兩章。

〈戲台〉一章便是為了進行思想性巫祭，必須首先著手的設台工作。

〈奉請〉一章的主要目的，在於邀請南韓朴玄採這麼一個歷史中間物進到此書。而台灣的陳映真則設為參照點，扮演鋪陳重新照明朴玄採的思想實踐的區域性脈絡之角色。也就是說，〈奉請〉是為了在區域性參照體系中（特別是透過作為二十世紀東亞區域參照點的台灣），以台灣的「當代歷史中間物—陳映真」的文學實踐當作參照視角，重新闡釋「當代歷史中間物—朴玄採」的思想實踐。從中，我尋找到反思南韓知識思想史的路徑：「雙重分斷」、「內戰的外在性」和「民眾構成的複雜性」，並將之當作隨後的區域性參照範疇。

另外，〈奉請〉一章所介紹的朴玄採「未完成的回憶錄」，顯示了他作為殖民地和內戰當事人而形成的思想實踐的原型動機。而他的原型動機則成為他對於新殖民性的歷史性和主體性認識之基礎和背景。尤其在一九八〇年代社會形態論戰的過程中，他雖然是促發該論戰的當事人，但在論戰劇烈化的過程中卻被邊緣化了。不過，在此過程中，他的表現恰恰正呈現了他對待理論的主體性態度。

〈灌浴〉一章的主要目的，在於重新照明歷史中間物朴玄採的困惑和苦惱。通過「灌浴」，將

過去被貼在他身上的許多標籤和侮辱清除掉，他此前沒有被傳達的話語，終於可以重新獲得新的語言和解釋。此部分主要以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知識思想界既規模龐大又爭議劇烈的「社會形態／社會性質論戰」為線索，考察了朴玄採思想實踐所遭遇的困惑。恰恰剛好的，陳映真正是從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的社會性質論戰中，獲得啟發並努力深化對於台灣社會性質的思考。本章以如此考察為基礎，確認了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與陳映真的思想實踐互相形成對比的不同問題意識。陳映真苦惱於「思想的貧困」，而朴玄採作為「倖存者」，則苦惱於「思想的斷裂」。

〈奉送〉，原本是在「灌浴」後將鬼魂送回的儀式，不過在本書裡，此章將更積極地被解釋為歷史的「繼承」。因此，我一方面尋找著讓朴先生以及他所代表的被遺忘的歷史能夠安眠的方法，另一方面，則求索讓我們重啟思想實踐的方向和立足點。本章以一九八〇年代在社會形態／社會性質論戰外邊進行的，朴玄採和白樂晴的爭議性對話為線索，考察了朴玄採以「分斷」為媒介，將「新殖民性」認識加以具體化的過程。朴玄採認為，分斷將「民族內部矛盾」外化為「國家間矛盾」，結果，「現代」的「國家」認識論取代了歷史性的民族認識論，而如此去歷史化的普遍主義認識論，必定會脫離「實踐論」；再者，透過對於「文學」的現代性形成之批判，朴玄採試圖克服包括經濟學的社會科學局限。我認為，比起將這樣的批判視為文學批判，不如視為「點出思想形式局限問題的提醒」。尤其，對於「文學」的現代性形成之批判，就如同他對於依賴理論等理論思潮的批判，都可視為他對於知識思想界的整體批判，特別是批判了知識思想界的存有根基，如何將「批判理論」看作知識分子的「所有」或「私有」。本章並揭示了重讀《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

(一九八九)之必要性，因為該著作是朴玄採在生前已經被邊緣化的狀態下，為了未來所留下的唯一具有「體系」的著作。

最後，〈拆台〉一章則是以「新殖民／分斷體制」總結朴玄採的思想實踐，並試圖確認在東亞區域的去殖民主義思想軌跡中，以陳映真為參照點，重新闡釋朴玄採思想實踐的終究內涵。

戲台

走進區域性參照

歷史掛帥與區域性參照研究

面對著南韓思想狀況中「去殖民」的持續被延遲，我思考了歷史—知識—實踐—倫理等思想工作諸範疇之間的複雜結合關係。此書可視為有關思索的階段性成果。作為引路的關於研究取向的闡釋，雖然看來過於偏向規範性論述，但我希望它能被理解為思想性巫祭所需的、最起碼的設台工作。

知識的矛盾

人類作為一個具有個別語言和文化的集體，根據其被賦予的有限知識，在面對其被賦予的自／然／人文環境時，加以實踐性作用，因而在歷史中成為主體——這是人類的基本特徵。然而，當歷史要求人類對它做出知識性回應，也就是對歷史變化做出詮釋，人類卻在參與知識工作的能力和權限上展現出分配的不平等——這樣的「知識階級」，是人類存有的矛盾。

而且，在缺乏歷史思想作用的狀況下，現代的知識結構當中，菁英主義和民粹主義互為前提和原因，具體地呈現了知識生產和實踐主體的困境。於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內在構成部分。不過，歷史過程中。這意味著克服知識的矛盾，必然成為克服歷史社會矛盾的內在構成部分。不過，歷史過程中所進行的，欲克服知識矛盾的集體性企圖，雖然調整了知識的性質和定位，但知識仍然不會被消

滅，而是或隱或顯地保持作用。因此，知識的不平等也不會被消滅。¹所以，人類或許首先需要承認知識的不平等這麼一個現實，同時透過持續生產新的歷史性知識，進而調整知識體系（即「思想」性的努力），才能夠確保藉由知識打造未來的可能性。因此，我們需要抱著如此的矛盾，思考如何在歷史和現實裡，產生正面作用的知識倫理模式。²

殖民之後的知識

在此我提出一個命題：人處於世界裡，同時處於歷史中的社會裡。

看起來，這個命題似乎很簡單。若依照我們的習慣，大體上我們將得出二元對立的單一結構：第一，從世界掌握社會，然後再掌握個體；第二，從抽象的人得出人類學本質，進而掌握社

1 中國從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持續反覆出現反知識和反文化的運動，以最激進的方式凸顯了此矛盾。錢理群認為，毛澤東的「毛皮論」，在存有論上否定知識（人）的獨立主體性。所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可視為「現代化／國家化」的時期，在政治和文化（知識）領域消除「右派」，結果，知識思想領域的糾錯作用被極度限縮。引自錢理群（二〇一二年）《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一九四九—二〇〇九）——另一種歷史書寫（上）》（台北：聯經），頁九五。

2 因此在知識體系轉型的過渡期，當前的知識工作者需要認識自己在個別學科知識空間本身的矛盾，經過反省和批判，進一步調整個別學科知識的性質和地位，努力獲得整體知識實踐與民眾間的倫理關係。尤其，支撐當下知識矛盾的現代／殖民主義大眾教育體系，必須通過民間的學術思想機制重構，才能完成朝向歷史多元性的轉型。

會和世界。事實上，這兩種理解世界和人類的的方法，基本上互為前提，構成了以「普遍人和普遍世界」為核心的西方普遍主義思維的基本存有論和認識論。此種關於人、社會和世界的認識，在歷史當中的表現，就是殖民／帝國主義。而且，在對其歷史尚未進行充分反思的狀況之下，透過「國民」主體的形成，如此思維發展成新殖民主義，並某種程度在我們內部「普遍化」了。當前我們的知識狀況如實地證明此事實。

我們所熟悉的西方普遍主義之認識方式，忽略了上述命題中「同時」的「動態性」意義。在知識的場域中，對於這個動態性的認識，似乎要等到殖民之後才會成為課題。對殖民性的省思提供了重新認識相互關聯著的各個社會特定性之契機，因此多元的歷史和文化終於成為唯物論的構成部分。³

換句話說吧。歷史是進行中的，現實是其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而作為群眾的人是歷史和現實的主體。我們不能區分歷史和現實，應要把兩者看成統一的關係，同時需要注入動力。如果從作為被賦予的普遍之世界史，認識個別民族史，那麼無法認識在民間中打造歷史的群眾主體，正因為歷史的基本，即是構成世界史的個別民族史的綜合。我們在此目睹了不同於「社會」的「民族」概念。我將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所提示的「民族」，視為個體和世界之間的媒介；因此，「民族」作為核心概念，是闡明了人同時處於世界和社會裡的「雙重性」和「動態性」。在這樣的格局中，社會便成為提示個別民族內部的人群關係構成的理論範疇。

一般來說，既定的存有論和認識論，從世界往下看社會，再往下看個體，例如廣義的「世界

體系」(world system)取向；或者，如「世界公民主義」(cosmopolitanism)，把透過普遍人類學掌握的個體，直接推到世界前面。相反地，基於民族個別史的歷史認識，不僅拒絕此種普遍主義的世界認識以及世界史書寫，更警惕著無法捕捉實踐動力的此種靜態「哲學」論述。我認為，調整歷史認識的終究目的，在於落實生活在現實中且具有自我歷史的民眾主體性。

若把討論聚焦於東亞，問題就更清楚了。殖民之後的東亞在尚未清理和克服殖民的後果，直接經過內戰且進入冷戰體系，分割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而缺乏對於個別民族史認識的資本主義陣營中思想界主流，扮演著把殖民主義現代性加以普遍化的角色。但是近年來，我們發掘了思想界的邊緣，已從新殖民下的新知識條件和問題意識出發，以不同的方式面對現實，進行重新認識歷史的思想實踐。⁴ 本書試圖繼承如此去殖民主義思想實踐的脈絡，以東亞區域內部的相互參照，反思南韓的戰後思想史。

知識與去殖民的困境

從毛澤東的「矛盾論」立場來看，在(半)殖民地社會內，殖民主義現代性暴力(也就是殖民

3 這首先是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思想所提示的，而後擴展成第三世界論。關於引進殖民問題之後所出現的認識論調整，參見陳光興(二〇〇六)《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的〈第二章：去殖民〉。

4 參見陳光興、張頌仁、高士明主編(二〇一二)《後／殖民知識狀況——亞洲當代思想讀本》(上海：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者和代理人的「帝國／殖民」的暴力）與民間的民眾和思想界之間，產生衝突且改變了內部矛盾的性質，從而使得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而且，在面對帝國主義所進行的民族解放抗爭中，東亞的「民族」嘗試過另類體制的建設。當我們不以結果論面對歷史，那麼我們可以說，當時的思想和主體都處於異質性和矛盾性的狀態——換句話說，也就是在歷史面前開放著的狀態。但是，經過「內戰」那殘酷相待的暴力且隨即進入冷戰／分斷體制，在繼承了殖民主義的國民國家現代化以及緊接著的暴力後，歷史的複雜性也就片面地單一化了。而且，此過程中單一化的主體，不同於殖民時期，經歷了「當代」的歷史，當代的矛盾又促發了對抗國民國家體制的、具有局限的政治性和主體性的形成。

既定的認識論框架裡，東亞的冷戰被再現為「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體制的二元對立。但是，基於歷史個別性，經歷了（半）殖民／冷戰歷史而形成的當代歷史的軌跡，是不能簡單地用未經過去殖民的知識如「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等概念或其他理論思潮識別出來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東亞內部「對於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批判」或「對於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批判」論述，都具有一定的認識論局限。

因此，我們更可以這麼說：在片面地現代化的當代社會裡，當前知識無法提供一套語言和方方法，以便有效地操作「殖民／帝國」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和民族問題。這就是分斷／冷戰的核心後果之一。所以，當我們探討內在於歷史的「民族」問題（例如內在於南韓的北朝鮮，或內在於台灣的中國等分斷體制議題）時，首先必須加以問題化我們知識工作中的普遍／特殊的語言和論述。

因為既定的普遍主義認識和分析，是根據下述假想而成立的：關於人或世界的普遍圖象，無需透過任何媒介便能適用於具有自己歷史的個別民眾生活空間。依照這種假想，那麼東亞的民眾便與歷史脫離開來，被視作「普遍且無差別的」現代對象和主體。

唯有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且透過重新發掘被遺忘的「內部」，我們才能夠建立批判性的主體性，進而可以思考平等存有之依據（即多元「民族性」），以及主體自由之根據（即關係性「個體性」），探求這兩者都不會被「世界」和「社會」所異化的存有形式。也就是說，在這裡，「民族」與「個體」成為一組概念，讓歷史得以運動起來。民族的多元平等是個體在社會裡成為自由主體的前提，同時，個體的自由也讓民族帶著豐富性和創造性，能夠參與世界史的過程。相對來說，普遍主義的自由話語依賴的是普遍的人權話語，如此話語的背後存在著原子化的個人這麼一個哲學存有論（亦是個體直接面對世界的存有論）。所以，普遍主義現代社會論的個體自由不是動態，而是靜態的。處在如此的現代主義知識轉型的基礎之上，原子化的個人構成普遍社會，也進而成為世界公民，於是更奠定了以無差別的個體和社會為存有根基的封閉性世界圖象。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去殖民主義首先成為重要的思想基礎，終究讓自由個體的實質存有形式之「民眾」，得以能動地參與歷史。換句話說，在當下知識的思想困境中，我們所朝向的去殖民主義知識工作，並不是藉由既定的理論——知識框架而演繹出形成當下格局的歷史原因；相反的，我們的工作是重新發掘被既定知識體系所壓迫和邊緣化的思想實踐，加以復原其系譜，進而豐富歷史轉換時期的思想狀況，終究確保具備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另類觀點，以便解釋二十世紀我

們走過來的歷史和當下的現實。這是承擔歷史責任並進行「自我歷史化」的知識工作。重新打開歷史，克服普遍／特殊的認識框架，能動地立足於歷史內部的知識工作——這才是確保主體性實踐可能性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當代的歷史中，因分斷／冷戰體制在思想方面造成的扭曲，使得被遺忘的思想資源無法直接被發掘和復原，所以，發掘思想資源需要一定方法上的迂迴之路。冷戰體制不只造成歷史的忘卻，也剝奪了識別歷史遺產的視野和語言能力。這兩者基本上是同時發生的。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我們不知不覺成為後冷戰的主體。而且，我們所經歷的後冷戰轉型，亦是像冷戰一樣的被動過程，因此，去冷戰仍然是一個課題；同時，後冷戰也帶來另一種假想，也就是沒有去冷戰的後冷戰主體性，也需要被問題化。這其實就是「漂泊」的主體性，正是知識作用缺席而民粹主義蓬勃發展的二十一世紀東亞狀況之主要背景因素。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即使被遺忘的歷史能夠重新找回來，但在當前的語言論述空間裡，仍然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

東亞區域參照點與歷史掛帥

「迂迴」的第一個方向是「東亞」：⁵透過「東亞」，將既定片面的認識框架加以多元化的問題意識，並同時注意東亞內部個別單位之間的不均等狀態。雖然東亞的歷史經驗由殖民、內戰和冷戰等歷史重疊構成的，但是個別單位的歷史組合與具體經驗依然相異，個別單位內之群眾的意

識形態條件也互相不同。因此，互為參照點的可能性也是多層次的，尤其如南韓和台灣（以及香港），就形構了關於內戰／冷戰／分斷等多層次的互為參照對象。⁶

「迂迴」的第二個方向是「歷史」視野掛帥。當我們思考知識和群眾的關係之際，站在歷史掛帥的知識立場意味著，只有由群眾創造的歷史所給予的知識才能夠與群眾結合，使得群眾成為歷史中的主體，而群眾的實踐將打開被鎖住的歷史之門，也終將避免民粹主義所包含的相互暴力（即因歷史知識作用的缺乏，菁英主義／民粹主義機制得以一般化的狀況下，暴力往往被認識為某種結構性的效果），如此狀況可視為「暴力」的去歷史化和去主體化，也就是對於暴力的認識是不正常的個人／集體的「威權主義」國家暴力，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結構的效果。如此這般無法認識暴力的「歷史物質性」之思想局限，十足地表現在如下狀況：共同體無法通過正確處理矛盾、真正的「和解」而重構，卻反而一再地重覆著「司法」性懲罰和報仇。

5 選擇「東亞」，是因為南韓和東亞各國、各地在同時期面對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並共享著歷史和區域的「國際主義」實踐和運動脈絡，因此思想研究上已經存在著相互參照的可能性。

6 以殖民經驗為中心進行的台灣和南韓的比較，似乎帶有可能本質化的危險。因為台灣的「殖民」同時是中國的「半殖民」，因此將台灣作為朝鮮的對稱這麼一個設定本身，有可能透過台灣殖民的本質化，最後排除中國／台灣所經歷的殖民／分斷的重疊問題。

反思當代的殖民性：以朴玄採為線索

南韓著名社會學者金晉均(김진균, 一九三七—二〇〇四)從一九八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甚至二〇〇〇四年過世前), 扮演著批判性理論和學術運動的核心角色。他在一九八五年撰寫的〈八〇年代韓國社會科學的課題〉一文中, 提出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問題:

一直到七〇年代, 除了一定程度具有知識傳統的部分經濟學之外, 社會科學面對「什麼是韓國社會的歷史課題?」這麼一個問題, 只不過以普遍科學回答。學問被看作跨越國家單位且具有普遍性質的, 而在被收編進由美國主導的政治經濟秩序的韓國, 甚至有這麼一個傾向: 全面接受美國的知識系統, 進而在最短時間內將其引介進韓國, 這個過程被看作是知識的發展。雖然不能說知識的意識形態性質完全不被考慮, 但是因為學術力量的不成熟, 無法進行本質上對此問題的反思。⁷ (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金晉均在此提出的「部分經濟學」指的是朴玄採等人的經濟學成果。接下來, 金晉均提及了認識「分斷時代」的重要性。他說, 這個問題意識, 首先在文學的想像力裡出現, 且認為「至少目前為止, 文學的想像力比起社會學的想像力, 更接近時代的現實, 從時期來看, 也在前面」⁸。有趣的是, 在他的問題意識中, 存在著從部分經濟學的「民族經濟論」以及從文學想像力認識到分斷

矛盾的「民族文學論」，積極地吸收反思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之企圖。

從反思社會科學的殖民性之視角來看，朴玄採的經濟學不同於當時的主流社會科學，反而繼承了知識傳統，並在與民族文學論相互分工的格局下，形成了一九八〇年代思想和理論運動的基礎和背景。朴玄採思想中的複雜思維，尤其呈現在他如何思考一九八〇年的五·一八（光州事件）和一九六〇年的四·一九（革命），明顯地表現出其思想在當代歷史內繼承傳統的性質。

第一線索：一九八〇年五·一八與民眾主體性的困惑

事實上，一九八〇年在南韓西南部大城市光州出現的「抗爭」，所謂「光州民眾抗爭」或「光州民主化運動」，事件之後的詮釋導致了歷史的雙重斷裂的契機，並形成了二元對立之下的某種「漂泊的主體性」⁹。作為「民主化運動」的光州抗爭，成為「獨裁」的反題；再者，作為「民眾」抗

7 參見【韓】金晉均的〈八〇年代韓國社會科學的課題〉，引自《產業社會研究·第一集》（金晉均等著，首爾：Hanul，一九八六），頁一五。

8 同前引註，頁一六。

9 關於此論點，參見延光錫的〈二·二八、五·一八與六·四——冷戰與失語〉，引自《人間思想》第五期（二〇一三年冬季號），頁二二四—二三一。

爭的光州抗爭詮釋，則是把作為主體的民眾加以抽象化，並以歷史性的去除為代價而得到的。¹⁰其實「民主化」以後的知識地景，就顯示了民主—獨裁的格局。特別是進步論述在繼承如此民主論述的前提下，更激進地將「民眾」設定為民主的主體。這樣的「民眾民主」事實上排除了作為歷史範疇的「民族」，即便在修辭上，「民族」尚未消失。我抱著這樣的問題意識，遇到了朴玄埰孤獨的呼籲：

但是，解放後的歷史中，五·一八的一九八〇年位於哪一個點？歷史不是一向走上進步之路的，是反覆地嘗試錯誤的。誰說一九八〇年優先於一九五〇年？但是在場的人都在說一九八〇年優先於一九五〇年和一九四〇年。請想一想一九四五年和一九五〇年吧。它們不亞於一九八〇年的光州。為什麼在我們活著的歷史中，把那些都省略掉而偏要強調一九八〇年呢？這也是錯誤的。而且，大家都在高度評價歷史中的潛在力量。但是，哪有沒有潛在力量的歷史？潛在力量是在被轉換成現實可能性的時候，其可能性才可以被討論。雖然如此，拿著只不過是名義上的潛在力量，造成今天現實評價上的錯誤，是不對的。¹¹

這是在一九九〇年五月「光州民眾抗爭十周年紀念全國學術大會」的綜合討論場合上，朴玄埰所做的發言。當時所謂南韓進步傾向的學者們所舉辦的這場大會中，朴玄埰的話語完全不被傳達。他甚至成為被嘲笑的對象。從逐字稿來看，他被看作沒有好好認識現實的進步和變化，而仍然被

過去歷史所約束，甚至也被看作具有「不民主」性格和態度的舊知識分子。

如果人類的認識行為在歷史展開的過程中，扮演著一定作用的有機構成部分，那麼我們可以提出，思想作用缺席的問題是共同體危機的原因。與其說這是關於內容的問題，不如說是一種思想實踐失去了根據歷史、介入現實之獨特模式的狀況。換句話說，我們因思想的斷裂，而無法認識我們的共同體走過來的歷史，因此也不能提出未來要往何處去。這不只是簡單地彌補「內容」的問題。因為，雖然我們在認識層次上，能夠分析共同體危機的原因，但是要克服危機，不可或缺的工作是重新發現並重構將思想和實踐互相結合的「模式」。

一九九〇年，朴玄採所呼籲的內容是思想的歷史斷裂和忘卻。然而經歷了一九九〇年代，他提出的呼籲，事實上卻被遺忘了。在二十一世紀重新反思知識的殖民性和思想作用缺席問題之際，此書把朴玄採的呼籲視為重要的線索和癥候。不過，他僅僅是讓我們看到了斷裂的所在，而

10 目前「五·一八」的官方名稱是「五·一八光州民主化運動」。當時通過軍事政變獲得實質政權的戒嚴軍，鎮壓了對抗軍事政權的學生運動，後來如此戒嚴暴力擴大成對於光州地區公民的大屠殺。據統計，死亡人數為一百六十五人，受傷人數為三千一百三十九人。因為當時南韓軍事作戰權在美軍手上，因此左翼進步運動視五·一八為重新認識美國的契機，不過這似乎越來越沒有與理論結合。因此，從運動的角度來看，理論缺席的反美運動，大體上走向衰落之路：二〇一四年，「統合進步黨」被判定為違憲政黨而強迫被解散，這可視為在思想缺乏的狀況之下，無法與理論結合的反美統一運動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存空間的消滅。

11 參見【韓】朴玄採等〈重訪光州五月抗爭〉一文，引自《朴玄採全集·第一卷》（朴玄採全集發刊委員會編，首爾：Haemil·11006），頁三〇四。

非直接提示二十一世紀當下克服斷裂的方向。因此，我們的課題不是透過朴玄採彌補某種內容，而是透過他所遺留的線索和癥候，首先接近斷裂之處，再確認克服斷裂的知識思想課題。

第二線索：一九六〇年四·一九與「民主」的悖論

如前所述，在我們重新關注一九八〇年代轉型的時候，朴玄採最精闢的批判就是針對時間均質化的「光州起源論」所蘊含的進步主義：從「光州」抗爭抽出作為歷史主體的「民眾」，而且把光州事件視為新的歷史起點——但是，正如朴玄採所說，歷史具有曲折。一九四〇年和一九五〇年不能被放在與一九八〇年的同一條線上加以討論；根據內在邏輯，前面的歷史恰恰重疊於一九八〇年，從而把一九八〇年的意義加以複雜化了。不過，有趣的是，在這樣的思想斷裂所造成的溝通不可能之前（或同時），語言文化模式的斷裂也發生了。在二〇〇一年「四·一九革命四十一周年座談會」¹²上，我們從著名文學評論家金炳翼（김병익，一九三八—）所做的回顧，可以找到一個線索：

我個人認為四·一九世代具有的文化史上的意義，如同金承鈺（김승욱）所講，他們是韓文世代，且從小受到民主主義教育，也就是說，是一個韓文和民主主義這兩者奇妙地結合在一起的世代。接受以韓文，也就是能指和所指得以一致的語言之教育，而且透過韓文強化民

族認同，透過民主主義接受現代性教育，這可能意味著四·一九世代形成了現代化和現代史的實質性起點。¹³（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最佳呈現出四·一九氛圍的就是《創批》（창작과비평，創作與批評，簡稱「創批」）。《創批》第一次採取了橫向排版，也盡量少用漢字，並且引進了編輯委員體制，因而大家認為它是自己世代的知識表現機構，也是時代的知識表現機構。¹⁴（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此段引文的重點是盡量「少用漢字」、採取「橫向排版」、引進「編輯委員體制」。一般來說，引進編輯委員體制意味著比起文學的純粹性，更強調對外開放性以及與群眾的溝通，因此某種程度上呈現文學領域的「民主」性質。不過，除了引進「民主」的組織運作方式之外，《創批》還率先採

12 四·一九革命是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五日南韓總統選舉後，由高中和大學學生所主導的對於選舉舞弊問題的批判抗議行動，最後導致李承晚總統宣布下台。根據官方統計，抗議達到頂峰的四·一九當日抗爭中，一百八十三人遭受戒嚴暴力而死亡。

13 參見【韓】金炳翼、金承鈺、廉武雄、李盛夫、任軒永、崔元植的〈座談：重新思考四月革命與六〇年代〉一文，引自《四月革命與韓國文學》（崔元植、林奎燦主編，首爾：創作與批評，二〇〇二），頁三八。

14 同前引註，頁五五。隨著金炳翼的發言，崔元植（최원식）立刻提出異見，他說，參考當時參與者的年齡，「不是四·一九世代」，「雖然跟四·一九革命有關，但似乎不只是世代性的表現」。

取了「去漢字化」的語音中心主義¹⁵和橫排的排版改革。以這樣的變化為線索，我們可以思考「思想斷裂」和「語言文化模式的轉型」之間的關係。這就暗示著，在南韓的歷史中，一九六〇年四·一九革命所提示的「民主」價值變成並作為一九八〇年五·一八的前提和根據，而且是在思想和實踐互相結合的模式上所推動的轉型。雖然《創批》的走向，在創刊之後，經歷了極為複雜的過程，但是在語言文化模式方面，仍持續積極地採取了如此的韓文專用和橫向排版。而且，韓文專用也擴大到翻譯實踐，自從一九八六年起，在書面翻譯制度上，排除漢字、採取「原音」的方式得以普遍化。¹⁶這是以現代性為標準而進行的首先對於自己的「純化」，擴張到對於他者的「純化」，於是就標誌了在語言文化體制中，自我認識、他者認識和世界認識的去歷史化實現。日後參與《創批》但批判《創批》創刊時的西方中心審美主義傾向的任軒永（임현영，一九四一—），於一九六九年主導《狀況》雜誌創刊。根據他的回憶，從思想的脈絡來看，對上述《創批》傾向的批判性觀點，成為了《狀況》雜誌創刊的動力。¹⁷

當時，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前後，說起來很像在一九二〇年代回頭看開化期¹⁸。也就是文學的考古學和文學理論的考古學時代。當時文壇由「文人協會」¹⁹這麼強大的組織主導，還有「自由文協」²⁰，但是不管看哪一邊，保守的力量是支配性的。但是，他們絕不因為人家搞參與文學，加以排斥和厭惡。從今天的狀況來想，可能都會想，他們分成兩派，形成敵對關係。其實根本不是。我也在內，金宇鍾（김우중）、尹柄魯（윤병로）、金炳傑（김병걸）、崔一秀

- 15 概括地講，語音對應於現實，文字則對應於歷史。語言文化的斷裂實踐把文字和語音分開來，而將文字還原於語音，結果造成「現實主義」的去歷史性問題。內在於歷史的知識，應該採取符合知識的文字—語音模式，而且這樣的歷史知識才能成為群眾主體性的基礎，也才能成為實踐的前提。日本思想家竹內好（一九一〇—一九七七）曾經提醒過脫離歷史的現實主義，有淪落為理論主義的危險。「理想主義者說到底不過是要追逐現實（這個觀念），他們將不斷地拋棄不適應現實的觀念，而現實主義者實在追不上現實便死心斷念，回過頭去尋找可以說明追不上之理由的學說。無論兩者的哪一方都不想把現實拉回來。哪一方也不想通過把現實拉回來使現實與觀念之間的失調調和起來。（……）他們認為現實這個實體性的東西存在著，不斷地接近這個實體便是科學、理性主義的。不假，這的確是科學的、也是理性主義的吧。只不過，這是奴隸的科學、奴隸的理性主義，如此而已」，參見竹內好的〈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一文，引自《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五），頁一九九—二〇〇。
- 16 南韓政府於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制定的「文教部告示第八五一—一號」，確定了全面貫徹語音中心主義的「外來語標記法」。
- 17 《狀況》(상황)雜誌創刊於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春季發行了第五號後被停刊。當時它批判了文藝界盲目地追求西方現代性的非主體性態度，而試圖確立主體的歷史意識和現實主義文學觀，而在停刊之後，部分人士參與《創作與批評》雜誌。近來，文學批評界有過對《狀況》雜誌的如下評價：「《狀況》基於對一九六〇年代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的觀念性和歷史意識局限的批判性反思，提出了根據民族的歷史性質和具體現實認識之主體性批評論述。因此《狀況》雖然具有與《創批》同樣的傾向，但是在實踐方法上提出了對它的批判性態度」，引自【韓】河相一（二〇〇八）《一九六〇年代現實主義文學批評與媒體的批評戰略》（首爾：召命出版），頁一九〇—一九一。
- 18 一般來說，「開化期」指的是以一八七六年日本強迫朝鮮開港的事件，即《江華島條約》（又稱《日朝修好條規》）為起點，到一九〇〇年前後，朝鮮開始接觸西方文化而進行改革的時期。
- 19 全稱為「韓國文人協會」，於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韓國文學家協會」為母胎，於一九六一年成立，一般被視為代表南韓文學界保守主義勢力，亦屬於一九六〇年代與「參與文學派」競爭的「純粹文學派」陣營。
- 20 全稱為「自由文學者協會」，一九五五年成立，並於一九五六年創刊《自由文學》(자유문학)，亦屬於與「純粹文學派」競爭的「參與文學派」陣營，一九六一年軍事政變後被停刊。

〔최일수〕先生等人都是與《現代文學》²¹有密切的關係，但他們的傾向都是參與文學。完全沒有任何隔閡。我估計，《現代文學》出身的大部分評論家都是參與文學論者，同時是傳統認同論者。所以這些人進入文壇中央的過程，都沒有太大的困難。

不過，《創作與批評》創刊於一九六六年，是又小又薄的。我看了，就覺得又有一批留學西方的人們出了一個最強烈的純粹文學。確實它也收錄了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的《現代》〔*Les Temps modernes*〕創刊詞的譯文。但是這與白樂晴〔백낙청〕先生的理論有些偏離，而且它收錄的當時在韓國文壇活動的作家們的作品，多半是審美主義作家的。〔……〕所以我就覺得「這很有問題」。當時雖然「文人協會」有很多問題，但是他們還是接受〔我們的問題意識〕。也就是說，以傳統文學為基礎，例如尋找《洪吉童傳》和《春香傳》²²的正當性，再進入參與文學，是可以的。但是，〔創批〕不是這樣的，例如「感覺」、「四·一九世代」或者「新感覺派文學」這些東西出現，我就覺得，「這有問題」、「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應該要找些出路」，就這樣不得不開始摸索。²³

這一段回憶呈現了文學界在經歷一九六〇年四·一九革命之後的氛圍。²⁴在我看來，關鍵似乎在於「傳統」。雖然四·一九革命打開了歷史開放的空間，同時培養出了新一代的文學家和知識分子，並孕育了之後他們與大眾的現代性關係。因此，在主流文壇的主導之下，原本以傳統為基礎而形成了「參與」和「純粹」互相競爭的文學格局，出現了轉型的徵兆。轉型的核心，便是接受西

方先進文學理論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競爭格局（所謂《創作與批評》和《文學與知性》〔문학과 지성〕），取代了以傳統為基礎的（或者不會單向否定傳統的）參與和純粹的競爭格局。一般的文學史往往忽略的，就是在這個轉型中，被否定的「傳統」的價值。²⁵

朴玄採對於四·一九認識的核心，在於將它看作「民族性」的重現。²⁶ 因此，他的取向不同

21 《現代文學》(현대문학)在內戰後反共體制下，於一九五五年創刊，為與「自由文學者協會」形成競爭關係的「韓國文學家協會」之主要活動陣地。一九六〇年代，此刊物包容參與文學派，後來也成為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主要活動空間。

22 《洪吉童傳》(홍길동전)是朝鮮王朝中期的著名文人許筠(허균)於一六一二年寫的第一部韓文小說。《春香傳》(춘향전)則是朝鮮半島著名的愛情故事。

23 參見【韓】任軒永、蔡昊錫的〈維新體制與民族文學〉一文，引自《作為證言的文學史》(姜珍浩、李相甲、蔡昊錫編，首爾：深泉，二〇〇三)，頁二九五—二九六。

24 一九五〇年代南韓文學的意識形態主要是反共自由主義，而一九六〇年代則加上否定傳統的現代主義，亦指四·一九革命之後出現的文學界轉型。

25 有關傳統的問題，可以參考竹內好的論述：「要實現斷絕，需要斷絕本身無法斷絕掉的傳統。傳統是革新實現自身的場域，亦是實現國民文學的場域」；「光把個人抽離出來的文學，是迴避與身分制度的鬥爭而成立的，因此它本來就是特權意識的產物」；「我們從一個現實：沒被民族媒介的世界文學表象多麼橫行，竟然看出文學的殖民性。今日其表象完完全全地滲透了〔日本文學〕，這就表示我們簡直處於殖民地」，參見【韓】竹內好(一九五一)〈國民文學的問題〉一文，引自《竹內好選集·I》(丸川哲史、鈴木將久編，尹汝一譯，首爾：Humanist，二〇一三)，頁二五〇—二五三。

26 在當時的文藝界，《漢陽》(한양)雜誌，從同樣的脈絡，呈現了強調「主體性」和「傳統」的傾向。《漢陽》雜誌，是創刊於一九六二年三月的月刊，在日本出版和印刷，而在韓國大量流通。到一九七四年，它因「文人間諜事件」，而無法在南韓流通。尤其在一九六〇年代，當時強調傳統和主體性的《漢陽》雜誌的核心評論家張一宇(장일우)，批判過韓國

於以歷史斷裂為核心的所謂四·一九世代的「民主」論述。朴玄採的認識也包含「民主」，但他是透過「民族」進而賦予了「民主」的具體性。如此的歷史認識，延續到朴玄採對於一九八〇年五·一八的主體性認識。在四·一九所打開的開放空間中，文學界迅速地形成「參與文學和純粹文學」與「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競爭格局和轉型，而此轉型中的核心前提，就是基於某種現代性的「反傳統」和「國粹主義批判」。但直至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的四·一九認識仍然保持一貫的立場。朴玄採曾經概述過四·一九：

但是，一個民族的歷史當中，民族性需求和自主民族國家形成的需求，雖然因內外的條件而暫時屏息，但是不會消失。因為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中，民族性要求和自主民族國家形成的需求，是根基於民族成員在廣泛的生活上的需求。也就是說，因為廣泛民眾的生活以及願意民族化而把自己纏繞在民族利益的所有民族成員的自豪和生活，在自主的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貫徹中，更能得到充足。並且，我們歷史中的四·一九民主革命，實證此事實。

在動亂後持續被賦予的援助，被民眾意識視為施惠，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後半期，漸漸因著生活矛盾，理解了作為資本運動變形的援助性質，雖然稍嫌渺茫。尤其農民階層中，面對美國剩餘農產品的利害對立，成為民族自覺的重要契機。但是民眾的民族意識，因為不是高層次的概念性，所以沒有立刻把社會實踐加以具體化。學生們才基於民眾在生活上的內在性需求，同時以小市民意識為媒介，提出了如此的民族性需求。透過作為未完成的代理革命之

四·一九民主革命，韓國的民族主義成為大潮流，重新出現在歷史的表面。它所提出的民族國家形成的要求，包含自立經濟、民族統一和民族自決的確立以及排除外部干涉。但是四·一九民主革命，從結果看來雖然具有變革性，但是沒有克服小市民性的局限，也沒有擁有對於民族國家的具體設想。但即使是未完成的，四·一九仍然成為一個重要契機，透過歷史變革讓民眾再一次出現在歷史前面，而打開了韓國民族主義的新篇章。²⁷

從這一段落內容，我們可以知道，朴玄採藉由以民眾為主體的民族運動的脈絡，試圖闡明四·一九的歷史意義。因此，他以對一九五〇年代後期美國新殖民援助經濟的分析為基礎，探討四·一

作家的現代主義問題：「戰後出現的現代作家大部分習慣於自卑和殖民地性質的知性，而他們的夢想也在於西方都市文化，因此熱烈期望將自身約束於狹窄的都市之籠子裡。所以韓國作家大部分追求的抽象美學，即在驅逐現實和具體人間像的過程中，放棄了占有百分之八十人口的農民像和農村現實。換句話說，他們借來西方的『現代』，是以放棄自己腳下無法迴避的『土地』倫理為代價的」，參見【韓】張一宇的〈農村與文學〉，引自《漢陽》第一七七期（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號），頁一四七。對於《漢陽》的文學評論傾向，可以參看晚進的研究成果：「對於傳統的理解中，關鍵在於主體性」這麼一個觀點是《漢陽》堅持的一貫的批評意識。不具有自我的文學，不是真正的文學，從這樣的基本前提出發，引導出了『傳統』主體『民族性』等式，從此試圖把傳統論認識為民族文學精神史的基礎」，引自【韓】河相一（二〇〇八）〈一九六〇年代現實主義文學批評與媒體的批評戰略〉（同前引註17），頁七四。

27 參見【韓】朴玄採的〈分斷時代韓國民族主義的課題〉，引自《韓國資本主義與民族運動》（首爾：韓吉社，一九八四），頁六六—六七。

九在克服當代矛盾上的實踐性意義，並提出內在於此運動的包辦代替和小市民性的局限，同時也指出它所包含的另類方向：自立經濟、民族統一、民族自決和排除外部干涉等原則。正因為他站在民族運動的延續性脈絡上，所以朴玄採對於四·一九的認識不是斷裂性的，既不是簡單否定，也不是簡單肯定，而是提出實踐性的認識。

換句話說，在朴玄採關於四·一九革命的認識中，即便使用「民主」這個詞，這個「民主」卻不是由斷裂性認識衍生的諸如「現代」和「韓文」等因素的構成物，而是「民族」和「民眾」等歷史的多元性和現實的具體性所支撐的「民主」。

「奴隸的特色」：殖民性的持續和演變

在內戰／分斷之後，南韓知識思想界從四·一九得到「民主」，而從五·一八得到「民眾」。不過，如此獲得的資源，恰好成為朴玄採自省地覺察到知識思想內部歷史斷裂的契機。而事實上，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的孤獨和困惑，不只是內容或立場的問題，也起因於包括形式上某種實踐模式的斷裂和轉型。其中，斷裂和轉型也包含著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溝通方式的語言文化問題。²⁸身為朴玄採的學弟和論戰對象之一的經濟學者李大根(이대근, 一九三九—)，在紀念朴玄採逝去十周年的共同回憶錄《啊！朴玄採》中，介紹過朴玄採對於語言文化問題的看法：

朴先生非常肯定漢字教育和使用。筆者在一九九〇年代初，反對我們社會中的「韓文專用主義」，與人文系統的學者一起進行漢字教育和使用運動的時候，朴先生舉自己老鄉吳之湖畫伯的例子（吳畫伯作為畫家徹底反對了韓文專用，尤其其他撰寫的〈對於國語的重大誤解〉很有名），與筆者同樣認為韓國人放棄漢字，走向韓文專用，絕對是錯誤的。²⁹

朴玄採堅決反對放棄作為區域性文字體系之漢字，並批判走向國民主義韓文專用的語言文化的轉型，但實際上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他一定程度地接受韓文專用。事實上，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國漢並用的書寫方式首先在媒體上開始消失，緊接著，學術界和出版界也採取韓文專

28 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當代語言，基本上是殖民／帝國主義所移植過來的。相對來說，東亞的狀況經歷的不盡然是移植，而是分割和再創造。在遭遇殖民／帝國主義的衝擊之前，朝鮮／南韓的語言狀況，在區域內分享了共同文字的語言文化。但是在受到殖民／帝國主義的影響後，經過徹底的斷裂和再創造，它形成了殖民主義的語言體制。換句話說，朝鮮／南韓的語言狀況，顯示朝鮮／南韓在第三世界中的特定性：相對於歷史被否定，更突出歷史的斷裂和扭曲。因此，當我們面對朝鮮／南韓語言文化問題時，更要強調的一點，不是單向和強迫性移植，而是相對「能動」和「主體」的斷裂和扭曲。

29 參見【韓】李大根的〈與朴玄採先生相遇〉一文，引自《啊！朴玄採》（朴玄採全集發刊委員會編，首爾：Haeumil，二〇〇六），頁一九六。此文所介紹的吳之湖畫伯（오지호，一九〇五—一九八二）其實是朴玄採的表舅父，他比朴玄採更早參與游擊隊，而在山上照顧了後來入山的少年朴玄採。

用。³⁰ 朴玄採雖然認識到國漢並用才是符合繼承歷史思想的語言文化形式，但是在現實中，他的表現形式經過妥協，接受了韓文專用，因此朴玄採的書寫出現了內容和形式脫節的問題。結果，不管與學術界內部或是與群眾的溝通上，他的思想之分享與傳達都極為困難。這也可以說是朴玄採作為歷史中間物的矛盾表現之一。雖然朴玄採並沒有直接積極指出此問題，但是作為一種癥候，這個問題具有重要意義。本書所關注的他對文學的介入，正是如此癥候的所在。

朴玄採在批判韓文專用時所介紹的吳之湖，也於一九七九年回顧過韓文專用與具體國家暴力之間的關係：

正是一九七〇年，反對韓文專用的人被判定為反政府行為者，並且為情報機構所處理。大學教授因籌備反對韓文專用集會的緣由，被逐出於講台之外。而且，中學老師也因為在黑板上寫漢字而遭遇罷免。一股恐怖氣氛籠罩了教育界。³¹

事實上，如此語言文化的轉型，可視為內容轉型（亦即，知識和思想與歷史間的斷裂）的前提。當時以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民族文學，沒有認識到這樣的問題，甚至採取積極接受和推廣斷裂和轉型的態度。在此過程中，朴玄採的語言雖然在內容上繼承歷史和傳統，但它的形式，卻與內容產生矛盾，或說處於尚未找到自己的形式的匱乏狀態。這在實踐方面意味著，共同體歷史認識的整體輕浮化、群眾以知識為媒介成為主體的條件本身，需要成為思想課題。

我將此視為語言文化形式的新殖民主義轉型所造成的矛盾。事實上，日本殖民地時期，就已經有語言文化的殖民性問題，但在當時「封建」所遺留的制度仍然存續的狀況下，並不存在新殖民時期的大眾教育，因此，日本殖民地時期的語言文化殖民性問題，基本上是知識階級內部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殖民時期對於文化的殖民性問題的批判。尤其民族史學家申采浩(신채호, 一八八〇—一九三六)³²如下的批評具有代表性：

我們朝鮮(……)，若釋迦引進來，它不成為朝鮮的釋迦，反而成為釋迦的朝鮮，若孔子引進來，它不成為朝鮮的孔子，反而成為孔子的朝鮮，不只如此。什麼主義引進來，都不成為朝鮮的主義，而成為主義的朝鮮。因此，只有為道德和主義的朝鮮，並沒有為朝鮮的道德和主義。啊！這就是朝鮮的特色嗎？如果這是特色，那麼就是奴隸的特色。我為朝鮮的道德和朝鮮的主義，哀號了。³³

30 不過，有趣的是在進入後冷戰時期，面對作為重新認識對象之中國，媒體和學界大體上都採取了去漢字的音譯方式，這恰恰是韓文專用在翻譯上的具體實踐之一。

31 參見【韓】吳之湖的〈有志就行〉，引自《語言研究》第十一卷第一期(一九八三年二月)，頁一三。

32 申采浩為朝鮮半島歷史學家、獨立運動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主要著作有《歷史新讀》(역사신독)和《朝鮮上古史》(조선상고사)。他參與了一九一九年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但因為立場不同，退出臨時政府，而後召集國民代表者會議，並參加無政府主義團體。他亦從事長時間的史書研究。於一九二八年，他作為東方無政府主義者聯盟的成員被捕，一九三〇年在大连被判刑十年，關押在旅順監獄，一九三六年服刑期間因腦溢血病死於監獄。

33 引自【韓】申采浩(一九九五)《丹齋申采浩全集(下)》(首爾：螢雪出版社)，頁二六。

申采浩的批判，讓我們想起竹內好對日本的科學和合理主義的批判。我認為，申的批判可視為對於當時「殖民主義」的知識文化方式的問題意識之表現。而我們從之後的歷史，也證明了如此狀況在新殖民時期的延續和演變。不過，相較於殖民主義，新殖民時期更為突出的是語言文化的「假想自立」，這也是對於殖民主義現代性的「假想克服」的表現。也就是說，「新殖民」下，與歷史產生斷裂的「純粹韓文」被創造和發明，並被認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表現。而讓它得以成立的關鍵背景，就是以知識的私人「所有」為中心、且與歷史思想斷裂的新殖民知識體制的形成；它的具體效果，是識字大眾的普遍化和菁英主義—民粹主義體制的形成。如同後文即將探討的，這造就了分析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所遭遇之困惑的核心線索。

奉請

當代歷史中間物——

陳映真（一九三七—二〇一六）與朴玄埰（一九三四—一九九五）

為了在區域性參照體系中，重新闡釋作為「當代歷史中間物」朴玄採的思想實踐，〈奉請〉將二十世紀東亞區域參照點台灣之當代歷史中間物，也就是陳映真的文學實踐，當作參照視角，並試圖從中尋找反思南韓知識思想史的路徑。為此，本章首先重新詮釋陳映真文學實踐的思想性內涵，以取得其對於南韓的參照意義。接著，本章初步介紹朴玄採作為當代歷史中間物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困境，並從他留下的「未完成的回憶錄」——《朴玄採全集》所收錄的〈親筆回憶錄〉¹——確認其思想實踐的原型動機。最後，本章提出一個基於相互參照視角的思想課題。

作為參照點的台灣：陳映真

眾所周知，陳映真是台灣的小說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積極參與中國統一聯盟等各種政治組織活動的政治家。尤其自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因為他毫不掩飾自己政治路線上的鮮明（所謂「左統」），所以他的文學作品承受了相互矛盾的解釋。文學界內部透過稍微「去政治化」的視角，把作品限於文學的框架，加以部分的肯定；而政治和思想界則透過「政治化」的視角，積極地接受或排斥他的文學。我們可以用「文學的陳映真」和「社會或政治的陳映真」之間的矛盾，來概括「陳映真」的特徵。但是在思想作用必須更受到重視的歷史轉型時期，此書更關注陳映真這麼一位向來不把文學與政治分開來，同時又要保持文學的自主性並且進行充實的文學實踐的思想家。²

本章試圖重新詮釋的對象，即是以思想的透徹超克文學和政治的矛盾之陳映真的實踐。其

中，陳映真的文學實踐又比政治實踐更能保持他長期堅持的一貫的思想性課題，所以本研究採取「以文學包容政治」的方式，重現二十世紀中後期陳映真作為歷史中間物的思想面貌。

我首先簡短地概括本章的問題意識和敘述策略。二十世紀後半期以來，我們經歷了現代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斷裂。為了反思脫離思想的文學和政治這麼一個現實，我們需要重新面對陳映真這樣的「思想家」。從此脈絡，本研究以「當代的歷史中間物」把陳映真這樣的思想家加以概念化。³ 援用當代歷史中間物概念的目的，基本上在於提示延續著「殖民」，也體現「冷戰」和「後冷戰」的複雜性之東亞「當代」時間性。在這樣的脈絡下，像陳映真這樣的歷史中間物是一定地承擔殖民矛盾所賦予的思想課題，同時面對冷戰和後冷戰時期，堅持奮鬥且經歷曲折的思想家。而且，雖然本研究清楚知道他的思想實踐與政治活動保持緊密的關係，不過相對於容易被政治情勢所規定的政治話語，他的文學作品更能體現他一貫思考的思想課題，因此本章對他的整體文學作品，進行綜合性閱讀並展開相關論述。

1 朴玄塚的「未完成的回憶錄」在他去世後始被發現，由朴玄塚全集發刊委員會推估寫自一九九二年底，並代擬名為〈親筆回憶錄〉，收入《朴玄塚全集·第一卷》（朴玄塚全集發刊委員會編，首爾：Haeinil，二〇〇六），頁二四一—六五。

2 從此脈絡來看，傳承陳映真《人間》雜誌（一九八五—一九八九）的《人間思想》（台灣版二〇一—；大陸版二〇一四—）期刊的創刊和發展值得注意。

3 「中間物」概念援引自魯迅。魯迅的問題意識基本上處於現代和前現代之間，本書的問題意識則在於殖民—冷戰和後冷戰之間。參見魯迅的〈墳·寫在「墳」後面〉，引自《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二八二。

那麼，陳映真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中間物呢？為了討論此問題，首先需要探討奠定文學家認同的早期作品。⁴ 以下先討論早期作品呈現出的歷史認識格局，而後針對因民主台灣聯盟事件而坐牢的一九六八—一九七五年之後的文學補充進行梳理，以試圖認識歷史中間物陳映真所提出的問題。

下面引用的段落，呈現陳映真作為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抱持的使命感以及相關的自我批判。

在一個歷史底轉型期，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訣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但陳映真世界裡的市鎮小知識分子，卻沒有一個在實踐中挺立於風雨之中、優遊於浪濤之間的人物。這也許是客觀上並不存在著這樣的人物罷，而其實也是陳映真自己和一般的悶局中的市鎮小知識分子的無氣力的本質在藝術上的表現。⁵

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負有批判的評估自己的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進行再認識的責任。⁶

〈試論陳映真〉一文，是陳映真對自己的文學世界進行自我批判的文章。他在此文表現出作為後革命時代知識分子的困境。雖然他自責說，如此困境起因於市鎮知識分子的無力氣，但同時提出一個知識課題：作為「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需要重新認識傳統文化。

陳映真在早期文學作品中，尤其是一九六三年的〈文書〉，已經確立了貫穿傳統、殖民和冷戰的歷史認識格局。而且早期作品基本上是在冷戰時期，即後革命時期這麼一個歷史轉型期創作的，因此他在當時的條件之下，不能把文學看作服務於革命的實踐。

魯迅的文學實踐，則是在變革的時代與革命的關係非常密切的條件下進行。相比之下，陳映真則是在後革命時代，為了準備未來的另一個變革，進行了文學實踐。因此兩者分別表現出對「傳統」的不同問題意識。

魯迅對傳統的內在批判，在革命的時代產生了讓革命往前推進一步的「啟蒙」作用，但對於在變革的運動本身不存在的條件之下，以變革的挫折為教訓以準備未來的變革之陳映真，傳統首先是一個重新認識的對象。至少在白色恐怖以後，遭受到變革挫折的「台灣的中國人」之陳映真，不能簡單否定傳統，而要重新進入歷史，不得不在傳統中掙扎。如此回歸到傳統的時候，殖

4 本研究將陳映真文學的「早期」視為大約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八年被捕坐牢之前時期，而此時期他創作的問題意識包括具有延續性的歷史認識、知識文化的殖民性以及分斷和愛的不可能性等。而中期為出獄後到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一九九〇年代表面上看來是陳映真文學的空白期，不過，空白期的思索也有蓄積並反映在晚期創作，即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一年的《忠孝公園》系列。

5 參見許南村（陳映真筆名）（一九七五）〈試論陳映真〉，引自《陳映真作品集9·鞭子與提燈》（台北：人間，一九八八），頁九。

6 參見琳達·傑文（Linda Javin）一九八二年對陳映真的訪談〈論強權、人民和輕重〉（禾心譯），引自《陳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台北：人間，一九八八），頁五。

民也成為無法外在否定的對象，而且新殖民也如此。他在革命遭受挫折之後，在殖民（「扭曲的傳統」）和新殖民（「後革命時代的困境」）之間，作為當代歷史中間物，一貫地把這兩者的連續性和斷裂看作文學和思想的課題，從而進行了思想性文學實踐。這就提供我們一個脈絡，使得我們理解陳映真為什麼在早期和中期文學帶有現代主義（非現實主義）的傾向，而中期以後在「歷史的整合」問題意識之下，漸漸形成了將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趨勢。

歷史意識：早期文學

陳映真在早期作品中，已經表現出對「後革命」時代的認識。在〈我的弟弟康雄〉（一九六〇），以「我」（文中第一人稱為「康雄的姐姐」）嫁給有錢人的家，來訴說這是一種「殉道者的亢奮」，而並非抗辯。

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後才四個月，我舉行了婚禮；一個非虔信者站在神壇和神父的祝福之前……這些都使我感到一種反叛的快感。固然這快感仍是伴著死滅的沉沉的悲哀——向處女時代、向我所沒有好好弄清楚過的那些社會思想和現代藝術的流派告別的悲哀。然而這最後的反叛，卻使我嚐到一絲絲革命的、破壞的、屠殺的和殉道者的亢奮。這對我這樣一個簡單的女子已經夠偉大的了。⁷

白色恐怖以後，在被壓抑的社會氛圍之下，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台灣民眾的一般人生選擇，也與康雄的姐姐類似。人在成長過程中，自然而然面對現實的矛盾，但後革命時代新殖民威權政權之下，堅持「理想主義」是不容易的。如同描述新殖民／分斷下無路可走之絕望狀況的小說〈第一件差事〉（一九六七）中的儲亦龍所說：「大凡路走絕了，就得認了」。此時，革命或理想都是知識分子的幼稚的熱情。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現實中的矛盾，首先是殖民產生的「被扭曲的傳統（或現代化）」。「家」（一九六〇）裡，「我」在父親死亡後，因為作為家中唯一男子同時又是長子的責任感而感到苦惱。村里的人都期待這個長子能藉由考上大學，成為「美談」的主人公。但，「我」在補習班經歷了競爭下的人性的破壞，不想成為「善心的村人們」的「美談」的主人公。而且，他甚至批評這些村人們是「毛蟲們」。但最後，他還是接受父親的角色。

在對惡無可如何的時候，惡就甚或成了一種必須。而況我隨後在日記中記下這樣一句英雄式的話；即欲對惡如何，必須介入於那惡之中。⁸

7 參見陳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引自《陳映真小說集1·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二〇〇一），頁一六。

8 參見陳映真的〈家〉，引自《陳映真小說集1·我的弟弟康雄》（同前引註7），頁三〇。

〈我的弟弟康雄〉的康雄（後革命時代困境中自殺的無政府主義青年）、〈鄉村的教師〉（一九六〇）的吳錦翔（戰後去殖民困境中自殺的教師），以及〈故鄉〉（一九六〇）的哥哥（殖民主義現代性的困境中從「天使」淪落為「魔鬼」的理想主義者），都是「大的理想崩潰」的時代之標誌。陳映真後來在〈試論陳映真〉（一九七五）一文中，對這些理想主義者初步地提出倫理性批判。

由於市鎮小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中間的地位，對於力欲維持既有秩序的上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面對於希望改進既有社會的下層，又不能完全地認同，於是他們的改革主義就不能不帶有不徹底的、空想的性格了。⁹

如此一來，陳映真確認了變革時代的終結，而開始重新思考曾經作為變革的對象的傳統。〈死者〉（一九六〇）和〈貓牠們的祖母〉（一九六一）成為這樣思考的一組文學實踐，透過外祖父和祖母的聲音，再現了內在於台灣的歷史。在〈死者〉裡，林鐘雄的大舅、二舅和母親都死於同樣的老病，而臨死的外祖父也確認這個「傳統」。外祖母在日據時代自殺，外祖父曾經離開過敗德的故鄉，但終於還是回到故鄉。當外公重複了外曾祖父的遺言，就表示這個「敗德的莊頭」的歷史，已頑固地持續了四代。而這唯有從內部才能得到克服。

尤其作品中照顧外公的二姪與後生農夫的關係，依照傳統的標準來看，也是「敗德」的連續；不過，作家同時也從民間開放的角度，思考著敗德的歷史社會脈絡，正因為對傳統的簡單否

定或逃避不能成為答案。

而且一直十分懷疑這種關係會出自純粹邪淫的需要；許是一種陳年的不可思議的風俗罷；或許是由於經濟條件的結果罷；或許由於封建婚姻所帶來的反抗罷。但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們是一群好淫的族類。因為他們也勞苦，也苦楚，也是赤貧如他們的先祖。¹⁰

在此，陳映真似乎藉著重新認識作為歷史中現實的民間，超越了被賦予的「政治正確」標準，思考如何重建社會的倫理生活模式？

而作為螟蛉子的林鐘雄認為自己與傳統無關，反而把外公的死亡看作新的開始。因此他想要「籌好娶妻的本錢」。林鐘雄可以自由地從敗德擺脫出來嗎？作家透過螟蛉子所想像的「自由」，似乎暗示著經過殖民和光復，認為自己已經「現代化」了的一九五〇年代台灣人的錯覺。

〈貓牠們的祖母〉裡，娟子透過與外省軍人張毅的愛情，試圖「遺棄一切既有的價值和意義，包括伊的祖母在內」。但這是可能的嗎？如同張毅所說，他也有自己的祖母，也就是說，他也有歷史，而且「伊們竟會長得那麼相像」。這就暗示著他們兩個人的愛情，不容易擺脫歷史傳統的

9 引自許南村〈陳映真筆名〉（一九七五）〈試論陳映真〉（同前引註5），頁五。

10 參見陳映真的〈死者〉，引自《陳映真小說集1：我的弟弟康雄》（同前引註7），頁七五。

制約。不管國民黨或大陸的中國，都與台灣具有同樣的根，因此，內在的改革只能透過對根的批判性再認識，才可能達成。

陳映真的文學作品所採取的歷史格局，大約到了〈文書〉（一九六三）左右即得到初步的完成。〈文書〉是陳映真在服完兵役之後，在《現代文學》發表的第一部作品。此作品以文書為形式，記錄一個外省軍人出身的企業家的殺人事件，而透過精神病患者的敘述，呈現了重疊的歷史矛盾。這個矛盾透過三個人的死亡來表現，即小時候在軍閥家族遭受侮辱且自殺而反映出清朝崩解後混亂狀況的馮忻嫂，過去被安氏家欺負並在抗戰中與主角認識而死掉的關胖子，以及在台灣白色恐怖中被犧牲的自己老婆的哥哥。這些死者分別代表了封建、帝國主義、冷戰（新殖民）的歷史環節。

如何克服愛的不可能性？——早期和中期的文學

1. 歷史地理的斷裂和愛的不可能性

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在歷史地理的斷裂下，「男性」無能於愛，「女性」則漂泊；男性遭受挫折而自殺或發瘋，女性還是懷了孩子，留下希望。¹¹ 如果說男性是來自歷史的知識分子，那麼女性則是立基於知識，參與現實矛盾而打造未來的實踐者。歷史地理的斷裂去勢了男性，而女

性則是不斷漂泊直至勉強找到對象，但是在沒有真正的愛之下，「孩子」要麼被拿掉、要麼被保護，即便被保護的這孩子的未來，仍然缺乏自主成長的基礎。因此，真正的愛都是悲劇，例如〈將軍族〉（一九六四）的無名下層外省人和本省人，或者〈一綠色之候鳥〉（一九六四）的外省人季叔城教授和本省老婆。

陳映真在〈那麼衰老的眼淚〉（一九六一）裡，第一次描述了這些關於「愛」的主題，而這背後的問題意識，就是歷史的分斷矛盾和愛的不可能性。外省人「上層」（教授、軍人或企業家）和本省人「下層」的結合，也是陳映真作品中常出現的一個組合。外省人在這些作品裡，被描述為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台灣人的存在，可以說這些外省人是超越分斷的「歷史性中國人」。由此可見，外省人男性是「歷史」的象徵，而本省人女性則是「現實」的象徵。這兩者間「愛的不可能」的原因就在於歷史，而若要突破這些矛盾，還是要從現實的民眾中尋找力量。陳映真作品中常常出現的墮胎或懷孕等題材，也揭示那些女性的「現實」所具有的潛在可能性。

延續〈那麼衰老的眼淚〉的下一篇是〈加略人猶大的故事〉（一九六一）。這是二十四歲的陳映真大學剛畢業時寫出來的。在這篇小說裡，陳映真試圖藉由「愛」來突破政治的矛盾。其中，群眾成為重要的主題，進而間接地批判革命浪漫主義或理想主義。

11 陳映真的作品當中，精神病和自殺是從早期到晚期一貫常用的意象裝置，尤以男性為主，但在早期作品中，也出現女性的瘋子和自殺，例如〈蘋果樹〉廖生財的妻子是精神病患者，〈死者〉林鐘雄的外祖母，〈文書〉的馮忻嫂，〈將軍族〉的「小瘦丫頭兒」，都死於自殺。或許，〈一綠色之候鳥〉中，第一人稱敘事者陳某的妻子也死於自殺。

猶大感覺到人民的崛起和革命的勝利就在眼前，興奮得在人眾中來回奔跑吶喊著。

但是過不多久，喧騰的聲音漸漸零落，而至於完全寂寥下去。城裡的居民歡喜而且滿足地回到他們的日常生活裡去了，彷彿他們在一起過完了一個愉快的節日一般。¹²（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此作品中，猶大不從政治，而從「社會」的觀點出發，堅持反國家主義、世界主義和社會革命的信念。他可被視為透過組織群眾、達成變革的典型革命知識分子，期待透過耶穌的死亡來組織群眾的熱望，進而完成革命。但是他所期待的革命並沒有發生。而猶大經歷了失敗，才開始思考「愛」和「日常」的重要性。也就是說，革命必須有兩個前提：人與人之相愛，以及奠基於歷史性的群眾日常生活。

如前所述，「愛的不可能」主要以女性的漂泊和男性的挫折來呈現。一九六〇年代中後期，陳映真連續發表〈哦！蘇珊娜〉（一九六六）、〈最後的夏日〉（一九六六）和〈唐倩的喜劇〉（一九六七），這些作品都描述女性的漂泊。¹³她們的男性對象大部分是知識分子，但這些男性的知識是沒有歷史的、強迫被移植的，因此是無能於愛的「去勢」的知識。即使女性想要結束漂泊而定居，但能讓自己自由的選項並不多。尤其，〈唐倩的喜劇〉透過追求自由解放的女性與殖民主義知識買辦的男性之間的戀愛故事，強烈地諷刺從美國引進的知識所形成的新殖民主義知識文化。¹⁴

早期作品中，傳統、殖民和新殖民的歷史格局確立之後，陳映真接著提出漂泊和愛的不可能性的問題。〈淒慘的無言的嘴〉（一九六四）從一個大學生精神病患的角度，第一次直接提出從日本到美國的殖民主義的繼承性，而描述了根被拔掉的一九六〇年代台灣青年的無奈的精神狀態，同時透過下述對比：「根」的現實表象之讓人感動的「工人」身體之美與被殺娼妓的「淒慘無言的嘴」，進一步指出，找回「根」才是恢復「語言」的條件。如此日美殖民主義下「漂泊」的問題意識，在〈一綠色之候鳥〉（一九六四）此延續之作中，發展成「分斷」與愛的不可能性。

而改編自希臘神話的作品〈獵人之死〉（一九六五），透過仍然存在的神的世界和尚未到來的人類世界的對比，將愛的問題意識發展成倫理問題。

這自然是一個那麼放縱著生命，又那麼熱切地愛著生底感覺的我們的愛之女神所不能了解的罷。雖然終伊底一生，伊一直都像一隻不能停棲的鳥那樣地尋找著愛情底真實，而且每

12 參見陳映真的〈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引自《陳映真小說集 1·我的弟弟康雄》（同前引註 7），頁一二七。

13 女性的漂泊延續到〈第一件差事〉的林碧珍和〈六月裡的玫瑰花〉的艾蜜麗·黃。

14 另外〈兀自照耀著的太陽〉（一九六五）在陳映真作品中，是極其異味的作品。雖然沒有直接表現，但它可能被解釋為後來展開的諷刺小說的前兆。而且，此作品的台詞都具有戲劇性，透過「戰前和戰後的中產者的生活」描述殖民與新殖民的連續性。生病的孩子成為讓他們反省和懺悔的契機，但這設定本身是非常非現實的，因此此設定似乎揭露那些中產者的懺悔和反省的虛構性。尤其，作品中一貫地沉默的陳哲似乎在觀眾的立場，觀看這些中產者所演出的戲劇。

一次都在折翼失鳴底痛苦中失望了。但伊從來不曾像這個年輕的獵師那樣地說是無能於戀愛的。一次又一次新的戀愛的感覺，給予伊一次又一次新的幸福底希望和幻滅。然而伊卻一刻也沒有想過，一如這個痴呆的大男人那樣：

——我是無能於戀愛了。¹⁵

獵人阿都尼斯在愛外面漂泊，而愛之神維納斯在愛中流浪。結果，阿都尼斯以自殺終結神的世界，同時打開人類的世界，並說道：「流離的年代將要終結。〔……〕那時辰男人與女人將無恐怕地、自由地、獨立地、誠實地相愛」。¹⁶ 接著，新殖民主義的知識和愛的不可能性，透過分斷和外省人題材更加具體化。〈第一件差事〉（一九六七）、〈永恒的大地〉（一九七〇）（一九六六）、〈某一個日午〉（一九七三）（一九六六）和〈纍纍〉（一九七二）（一九七九）（一九六六）（一九六七）等作品，都透過外省人來描述歷史地理的斷裂和愛的不可能性的問題。

2. 歷史的補充與階級的連帶

陳映真在一九六八年因「民主台灣聯盟」案而坐牢，一九七五年出獄。在他坐牢期間，發生了保釣運動和現代詩論戰。一九七〇年代冷戰的動搖在台灣也慢慢形成了重要的契機。相較於南韓，如此冷戰的動搖局面更清楚地反映在台灣的局勢變化。

如上所述，陳映真在坐牢之前，已經確立了歷史認識的格局，然後以「愛」的問題意識發表了系列作品。他的文學作品在出獄之後，成就了兩方面的新發展。首先，他透過在坐牢期間認識和了解的白色恐怖犧牲者之經驗，復原了光復後左翼的歷史和挫折。而且，他描述了新殖民地依賴性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民眾生活的扭曲，並試圖以階級連帶突破歷史斷裂所帶來的矛盾。

在此，我們需要注意白色恐怖系列和華盛頓大樓系列的相互補充性關係。〈鈴璫花〉（一九八三）裡，阿順那因白色恐怖失去老師的眼淚，〈山路〉（一九八三）裡，為了同志愛而犧牲自己一生的蔡千惠的實踐，都是冷戰／新殖民之下歷史共產主義運動中，友情和愛情的可能性以及實現。但陳映真不會不知道這些歷史力量的局限。在〈山路〉此作品中，蔡千惠的戀人在左翼運動中遭受白色恐怖，而於一九五二年被判無期徒刑，同時，其戀人的同志因此被犧牲致死。之後，蔡千惠為了被犧牲的同志，偽裝成為死去同志的戀人，一生為他的家屬服務。如此犧牲自己地生活三十年後，她在報紙上看到原本被判無期徒刑的戀人因特赦而出獄的消息。蔡千惠在未寄出去的信裡，如下表述：

15 參見陳映真的〈獵人之死〉，引自《陳映真小說集2·唐情的喜劇》（台北：洪範，二〇〇一），頁三二。

16 引自陳映真的〈獵人之死〉（同前引註），頁四九。

* 編註：陳映真的三篇小說〈永恒的大地〉、〈某一個日午〉、〈纍纍〉寫作年代不明。據二〇〇一年洪範書店出版的《陳映真小說集》初刊年代分別於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九年，並推估此三篇寫作年代分別為一九六六年、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而據二〇一七年人間出版社出版的《陳映真全集》，則〈纍纍〉一文初刊改為一九七二年，並推估此三篇小說的寫作年代均為一九六六年。

睽別了漫長的三十年，回去的故里，諒必也有天翻地覆的變化罷。對於曾經為了「人應該有的活法而鬥爭」的您，出獄，恐怕也是另一場艱難崎嶇的開端罷。只是，面對廣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鬥爭，怕是要比往時更為艱苦罷？我這樣地為您憂愁著。¹⁷

但是，對於這些新殖民下的變化，陳映真又不曾只有負面的認識。陳映真走入文學空白期前的最後作品〈趙南棟〉（一九八七），藉著反映時代氛圍，更為直接談到白色恐怖的歷史以及新殖民主義現代化的矛盾。類似蔡千惠，葉春美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且基於同志愛照顧死去的同志之家屬。趙南棟是其同志的小孩，在獄中出生後與母親離別。被照顧的這些家屬，難免成為承擔新殖民矛盾的民眾。不過，葉春美仍然以「愛」迎接趙南棟。

她緩緩地走向前去。她站在趙南棟的跟前，看著他那一頭垢汙的長髮，蒼白而瘦削的臉。她的眼中發散著溫暖的光采，像是母親看見了自己的骨血。（……）

「小芭樂，我的孩子，」〔……〕¹⁸

華盛頓大樓系列之三的〈雲〉（一九八〇）與白色恐怖系列中〈鈴璫花〉（一九八三），提供我們對照閱讀的可能。其中，〈雲〉中的女工文秀英和同情工人的白領職員張維傑的關係，可視為〈鈴璫花〉中學生阿順和老師高東茂之關係的再現。但隨著作品所座落之現實的改變，陳映真賦予作品

的能量也有所變化。〈雲〉的故鄉和家族已經成為支撐文秀英的純潔和溫暖的力量。在陳映真作品中，文秀英是少見的具有力量的人物，就像剛出生的嬰兒一樣，純潔而充滿可能性。其實，文秀英的故鄉也有悲劇，例如二哥的死亡，而這就是台灣基層民眾的現實。即便如此，「家」仍可以成為支撐文秀英的溫暖力量。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的農村和家族雖然已經遺忘了歷史，但民眾的生活以自己固有的、民間的方式，慢慢療癒了歷史的傷口，最終成為了文秀英的力量之所在。這個力量不被知識分子所代言，而是透過女工的聲音發出。重組工會的投票前一日，文秀英在日記寫著：

現在，我不知道為什麼，心中有一股想向誰說：「謝謝」的心。

使我能認真地為了關心別人而生活的人和事，我要說：謝謝。

對於那些為了使公司、工廠裡的人和生活，變得更溫暖、更友愛而忘我地生活的人，我要說：謝謝。

對於那些關心著工人、扶持他們、幫助他們為了自己的權利起來說話的公司，我想說：謝謝。

17 參見陳映真的〈山路〉，引自《陳映真小說集5·鈴璫花》（台北：洪範，二〇〇一），頁九〇。

18 參見陳映真的〈趙南棟〉，引自《陳映真小說集5·鈴璫花》（同前引註17），頁二〇一。

對於能夠使這麼好的公司、這麼好的工人，一起生活和工作的自己的國家和社會，別人的國家和外國的人，我要說：謝謝。

能有對他人懷著感謝的心，是多麼幸福啊！¹⁹

雖然重組工會的事情因遭受資方的阻礙而挫折，但其過程本身帶來了莫大的幸福和可能性。雖然依照當時台灣的現實來看，此作品表現的是稍微「非現實」的希望和期待，但是，對陳映真來說，文學實踐的對象不只是歷史。也就是說，透過歷史復原而克服歷史的斷裂，也包含著現實，而那就是斷裂之後走過來的變化。愛的基礎是歷史的整合，但藉由華盛頓大樓系列，陳映真似乎呼籲著，愛的主體必須是現實中活著的歷史的民眾——同樣如白色恐怖系列作品所顯示的。²⁰ 華盛頓大樓系列雖然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巨變中停了下來，但從中呈現出的陳映真的民眾主義，一直延續到《人間》（一九八五—一九八九）雜誌。

「實在說，我方才一直在看著那些白雲。看著他們那麼快樂、那麼和平、那麼友愛地，一起在天上慢慢地漂流、互相輕輕地挽著、抱著。想著如果他們俯視著地上的我們，多麼難為情。」〔……〕

「像這樣的天、這樣的雲，和這樣的心，如何去寫呢？」〔……〕「不，我寫不來的。」²¹

試圖在民眾生活中尋找新語言的《人間》雜誌實踐，可能是陳映真以他的方式回應了文秀英靦腆的否定。

如此一來，陳映真作為歷史中間物，在他的早期文學作品中，已經認識了作為去殖民課題之「傳統」、「殖民」和「冷戰」的複雜關係；在冷戰中新殖民狀況的展開之際，他的問題意識發展成「分斷與愛的不可能性」，並經過七年的牢獄生活後，把克服歷史斷裂和解決階級矛盾視為核心主題。至一九八〇年代，雖然他的文學因「思想的貧困」此一問題而停頓，並且在現實論述空間中遭到相互矛盾的各種評價，但忠實於歷史與現實的他的文學成就，在歷史斷裂和社會矛盾越來越深化的狀況下，仍然扮演思想性座標的角色。

分斷、內戰、民眾

如前所述，陳映真的人生和文學創作生涯都涵蓋了傳統、殖民、冷戰和後冷戰的歷史和現

19 參見陳映真的〈雲〉，引自《陳映真小說集 4·萬商帝君》（台北：洪範，二〇〇一），頁一〇四。

20 「好好站在歷史的整合上，在台灣創造出自主性的革新勢力，我想這是當前台灣最緊急的課題吧」，參見戴國輝、松永正義、陳映真在一九八七年的對談文章〈台灣變革的底流〉（鄭莊譯），引自《陳映真作品集 6·思想的貧困》（同前引註 6），頁二〇一。

21 引自陳映真的〈雲〉（同前引註 19），頁一一七。

實。大約在他服完兵役之後的一九六三年前後，他確立了他的思想和文學的歷史格局。坐了七年的牢，於一九七五年出獄以後，他早期確立起來的歷史格局，開始與具體現實變化結合起來，產生了獨特的文學風格和成就。

陳映真的文學之所以能夠取得卓越的成就，似乎是因為他不只基於他對台灣歷史軌跡的批判性認識，同時一貫地堅持以文學家的身分站在民眾的現實中，採取對於民眾生活條件變化的敏銳態度。因此陳映真的文學在台灣首先能提供批判性的歷史視角，指出現代化了的學術體制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去歷史性問題。而對於與台灣具有類似歷史軌跡並同樣具有知識的殖民性和去歷史性問題的「南韓」，陳映真的文學以及其所提供的批判性歷史視角，能成為變革知識和學問體制所需的重要區域性參照點。

陳映真在一九八〇年代提出了「思想的貧困」問題，從而回到歷史當中，寫下了白色恐怖系列的的作品，此後即進入長期的文學空白期。到了一九九九年，他開始發表他的文學生涯中最後三篇「忠孝公園」系列，以回應當年他提出的「思想的貧困」問題。下面以陳映真早中期的文學實踐成果為基礎，並以他中後期作品包括白色恐怖／華盛頓大樓系列和忠孝公園系列為中心，探討台灣之於南韓的參照意義。此章初步提出的概括性內涵包括「雙重分斷的特殊性」、「內戰的外在性」，以及「民眾構成的複雜性」。

1. 「雙重分斷」的特殊性

〈忠孝公園〉(二〇〇一)是陳映真最後一篇小說。此作品的設定，是具有典型性的兩個人物所構成的交叉格局。馬正濤是中國東北人，過去在東北與日本帝國主義協作，經過幾度變節，最後跟著國民黨來到台灣，成為在情報系統找位置的外省人。林標是台灣本省人，在日據時代作為日本兵參與南洋群島的戰鬥，後來因日本敗戰而台灣光復，成為勝利國的兵士回來台灣。此作品寫於二〇〇〇年的時間點上，藉著交叉這兩個人物的晚年，試圖呈現中國／台灣的殖民性與新殖民性之間的連續性。在作品的結尾，馬正濤面對著民進黨透過選舉勝利即將掌權，失去了作為自己精神和現實上的後盾之國民黨政權的庇護，而感到恐懼以致自殺。林標則在日本或中國之間認同上的錯亂中，得了痴呆症。而且，身為外省人第二代的祝景對國民黨的失望和對馬正濤的批判，以及林標的兒子欣木成為遊民，暗示著後冷戰時期國民黨的合法性危機，以及表現在階級階層矛盾益發深化、民進黨所主導的民主化之虛構性。

這似乎提示著一個新課題：日本的台灣殖民是「中國」的被殖民經驗，但台灣的新殖民，也必須視作其延長才能得到解釋。這不同於透過外部因素——即美國的新帝國主義介入——來解釋新殖民，而更要包括此外部因素但也歷史性地闡明其內在淵源。因此，光復之後台灣去殖民的挫折和失敗，不只是台灣的問題，更是中國的問題和課題。如果把中國大陸抽離開來，那麼中共在內戰的勝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似乎代表著民族解放問題已得到解決；然而，如果把台灣放進來，台灣的新殖民在在顯示中國的去殖民課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這樣的狀況要求我們

回到國共對立之前的歷史時間點，重新內在性地探討原因所在。因此，陳映真提出作為傳統的「根」，也可以說這不只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更暗示著清末民初的中國狀況；如果積極解釋陳映真的這一面向，我們把他所提出來的根看作必須被重新解釋的「文化」中國。²² 在這樣的意義之下，「忠孝公園」便成為在歷史的扭曲和主體性的錯亂當中，不可迴避的「殖民主義」的歷史性象徵空間。

也就是說，〈忠孝公園〉在歷史的內在連續脈絡上，把台灣／中國的殖民和新殖民的關係連接起來，而從中提出作為去殖民課題之去日本化和再中國化的課題。「去日本化」的內容，即是把日本殖民過程中所發生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扭曲矯正過來，而「再中國化」的內容，則是在批判性地繼承傳統之下，變革兩岸的分斷體制。在與南韓的互相參照之下，我們發現，一八九五年和一九四九年兩次兩岸分斷，似乎賦予了台灣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此的雙重任務。但是，台灣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容易把課題有機地反映在整個中國的革命過程。雖然第一次分斷比起第二次分斷，強度微弱，但中國大陸和台灣各自所經歷的物質和精神的變化之差異，似乎超越了當時認識的能力範圍。而且，日本的殖民主義所要克服和否定的對象，是以清朝為代表的中華體制的「傳統」和「封建性」，而這也直接反映在台灣和朝鮮的殖民統治，因此日本帝國一貫地試圖把朝鮮和台灣從中華體制分離開來。而南韓經由一九四八年形式上分斷和隨之的內戰，進入了分斷鞏固化的過程，但南韓並沒有經歷過像台灣那樣的分斷和殖民的重疊。因此在南韓的去殖民過程中，雖然去日本化成為主要的課題，但「傳統」的問題一向不受關注。對於傳統認識不足而推動的去日

本化，事實上簡直是空中樓閣。

陳映真在文學生涯早期所積極學習和接受的中國新文學，就成為他作為文學基礎的語言。²³大學生的陳映真雖然是外文系學生，但他也選修了楚辭、詞選、詩選等課程。正如論者評價，陳映真透過「古文學裡去打底子，去研究辭彙，而奠定了今天他文句的千錘百煉和詩質的美」。²⁴

同陳映真般的去殖民的問題意識在南韓的當代文學裡，似乎不存在。南韓的民族文學論雖然在理念上把殖民、分斷、冷戰當作主要題材，理論上積極接受現實主義，但作為文學基礎的語言文化以及這方面的殖民性問題，不曾成為核心課題。事實上，從朝鮮（一三九二—一八九七）的歷史來看，國漢並用的方式是朝鮮所開發出來，符合朝鮮式的「現代性」的語言文化體系；然

22 陳映真呼籲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對傳統好好進行重新認識。參見琳達·傑文在一九八二年對陳映真的訪談〈論強權、人民和輕重〉（同前引註6），頁五。而且，陳映真對於「文化」的問題意識，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已經出現過：「而況近二十年來的在台灣的中國文化，是歷史上最受外來文化摧殘的時代，這大約是『古已有之』論的評論家所不能否認的。一種文化原初的形態，總是在它流布的末稍較完整地保存著」，參見陳映真（一九七八）〈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引自《陳映真作品集11·中國結》（台北：人間，一九八八），頁五二。

23 如同陳映真自己所講，「魯迅給我的影響是命運性的」。他認為：「至今，我仍然認為魯迅在藝術和思想上的成就，至今還沒有一位中國作家趕得上他。魯迅的另一個影響是我對中國的認同。從魯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現代的、苦難的中國」，參見韋名在一九八三年對陳映真的訪談〈陳映真的自白——文學思想及政治觀〉，引自《陳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同前引註6），頁三五。

24 參見邱勝男（一九八〇）〈我的老友陳映真〉，引自《陳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同前引註6），頁一三八。

而，日本殖民支配所進行的「去中國化」，讓朝鮮人排斥作為自己語言文化體系內有機構成要素的漢字。這是不分左右、經由殖民支配而接受的「反傳統、西化」的產物。雖然近年來慢慢出現相關的反省，²⁵但仍然不成為共同的問題意識。

陳映真的文學和思想實踐，同時也指出在台灣思想界內部（甚至包括中國大陸思想界）相關問題意識的缺乏。把兩岸分開來思考問題的去歷史化認識論，產生了被動認識分斷和殖民的問題，而陳映真以對傳統的再認識，有著主動認識分斷和殖民問題的企圖。在認識層面來看，比起台灣的「被動性」，南韓的問題則在於「否定傳統」的西化已成為不被質疑的規範，而這又隱藏著殖民性不被檢討的「斷裂」和「扭曲」等問題。

2. 內戰的外在性

陳映真的文學在早期已經確立了歷史格局，但生產一定數量的批判性諷刺作品後，他積極尋找另類的突破口。這個突破口，大約可說是兩個走向：作為「歷史」批判的白色恐怖系列以及作為「現實」批判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其中白色恐怖系列復原了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而被復原的歷史又成為克服「愛」的不可能性的一個資源。²⁶白色恐怖系列在內戰的扭曲的連續性問題意識之下，以台灣與大陸的革命知識分子為主，重現歷史場景，相較之下，一九九九年發表的〈歸鄉〉，則在民眾的層次繼續討論內戰的扭曲的連續性。作品中，作為外省人的老朱在上海強迫被

國民黨徵兵而參與國共內戰，最後跟著國民黨來到台灣。而作為台灣人的楊斌則是光復後，在台灣被國民黨欺騙而參與大陸的國共內戰，結果被共產黨打敗且成為俘虜，最後在中國大陸定居。後冷戰轉型讓這兩個人在台灣相遇。而這兩個人物的對話和交叉，描述著兩岸在民眾層次上的國共內戰之共同經驗，因此形成對白色恐怖系列具有民眾層次的補充性關係。

在一九四五年光復之後，朝鮮半島在美國和蘇聯的管轄之下，被賦予形式上的朝鮮分斷，緊接而來的是隨著內部理念對立，擴大成內戰，但在美國的介入之下，已無法得到主體性的方式總結戰爭，以休戰的方式鞏固了分斷。特別是，因理念對立而分裂的民族內部成員，成了極端暴力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導致內戰暴力的傷痕極為深重。尤其，我們可以想見那與暴力的傷痕結合在一起的南韓反共主義，有多麼穩固的基礎。不過，我們可能要注意，從區域的角度看，朝鮮的內戰繼承了不完全結束的中國國共內戰，即便戰爭的形式和內涵與國共內戰不同。中國的國共內戰

25 崔元植的反思值得注意，「說東與西的對面中，漢文體是東排斥西的，國文體則是西吞沒東的，那麼我們可以說，在東與西之間保持緊張並堅持認真對話的就是國漢體。（……）不過全球化的波浪之下，在國漢文體周邊空轉的國文體或韓文體終於勝利，這已經確定了」，引自【韓】崔元植（二〇〇九）《帝國之後的東亞》（坡州：創作與批評），頁二一三—二一四。

26 〈鄉村的教師〉是陳映真第一部以隱晦的方式指出白色恐怖和國共內戰的相關性之作品。「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甚至伸到這樣一個寂寞的山村裡來了」，參見陳映真（一九六〇）〈鄉村的教師〉，引自《陳映真小說集1：我的弟弟康雄》（同前引註7），頁三七。

中，共產黨以根據地的民眾解放為主要原則，但朝鮮戰爭似乎終究無法或沒有繼承根據地解放的原則。歷史地來看，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兩岸海峽被封鎖，中國的內戰也被斷裂和扭曲，結果在台灣出現了白色恐怖。順著此脈絡，我試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去殖民運動、冷戰間的關係提問：是否在一九五〇年前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付冷戰的過程中，沒有充分且適切地認識殖民地解放的主體、對象和方法等，內含於去殖民運動的複雜性？

在這樣的狀況下，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灣民眾，大體上沒有經歷過作為國共內戰原因的理念對立之爭，因此也沒有直接體會內戰的傷痕。而從當下的觀點回溯歷史，一九四五年以後，比較透明地顯現出來的，是壓迫性統治集團之國民黨和台灣民眾的對立格局。正因為如此的歷史特定性，相較於南韓，在台灣發生的白色恐怖就相對容易得到平反，似乎也沒有產生民眾在歷史認識上的矯正效果。在南韓，雖然「國家暴力」的犧牲者或「民主化」運動有功者等，都得到平反了，但「左翼」的平反仍然不可能，與台灣的狀況形成明顯的對比。事實上，南韓也出現過一種狀況：部分「左翼」否定自己的左翼活動，反而藉由「民主化」包裝自己以得到「平反」——這正表現了反共主義的厚實物質性以及對歷史的另一種遺忘。

作為白色恐怖對象的台灣左翼，似乎根據他們所認識到的內戰連續性，試圖克服殖民和分斷造成的內戰的外在性；然而，剛從日本殖民解放的台灣民眾，不容易分享正在大陸進行的國共內戰中意識形態對立，因此，依照大陸的經驗，民眾力量和主體性的形成，必得要求他們的思想 and 政治能力，也就是說，克服台灣的殖民和分斷之特定性的課題，必須與「內戰」的課題互

相結合。

3. 民眾構成的複雜性

在陳映真早期作品中，省籍矛盾已經成為重要題材。第一個出現的外省人角色是〈貓牠們的祖母〉（一九六一）中的外省軍人張毅。接著，在〈那麼衰老的眼淚〉（一九六一）、〈文書〉（一九六三）、〈將軍族〉（一九六四）、〈綠色之候鳥〉（一九六四）、〈第一件差事〉（一九六七）、〈永恒的大地〉（一九七〇）（一九六六）和〈纍纍〉（一九七二／一九七九）（一九六六／一九六七）等坐牢之前的作品中，外省人都是重要的題材。這些作品中，陳映真描述了歷史的斷裂和民族的分裂如何讓人們不能相愛，而他所找到的答案似乎是「階級」。其實，〈將軍族〉的悲劇結局就已經暗示了之後的走向，而陳映真也在一個訪談裡，表示過「政治經濟學」的意義。

有些台灣作家是以外省人壓迫本省人理解這個政治事件（美麗島事件），而不是用更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學知識去了解；所以心中就產生了悲憤。於是提出「台灣文學」的概念，探討「台灣人」是什麼？²⁷

27 參見《海峽》編輯部在一九八七年對陳映真的訪談〈鄉土文學「論戰」十周年的回顧——訪陳映真〉，引自《陳映真作品集

因此陳映真以他的歷史認識格局當作基礎，創作了華盛頓大樓系列，描述了新殖民下台灣現代化所導致的扭曲和矛盾。〈上班族的一日〉（一九七八）以華盛頓大樓九樓為背景，描述白領上班族勞動的異化。而〈萬商帝君〉（一九八二）以華盛頓大樓七樓為背景，暴露了殖民主義現代化所造成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扭曲。有趣的是，〈上班族的一日〉的本省人黃靜雄（Olive黃），最後還是與掌握權力的國民黨軍官出身的榮將軍在一起，而〈萬商帝君〉的本省人劉福金也與他的留美外省人競爭者（陳家齊）形成階級利益上的合作關係。但Olive黃的情婦Rose卻寫信批評「中國的男子」：

中國的男子比較聰明，但都是三流的lover。他們不敢愛。愛起來條件又多。你也一樣……。

28

此時，「不敢愛」的中國男子涵蓋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且超越省籍之分，成了具有一致的階級利益關係的中產群體，而這未嘗不是暗示著之後「現代化」的台灣政黨政治中，兩大勢力的共生關係？

另外〈萬商帝君〉中，林德旺作為農村出身的下層上班族，因著向上爬的慾望，原有的精神病又發作，但透過林德旺，陳映真似乎批判了這些省籍矛盾的虛構性。

「這懦弱、不敢說的人間，」〔……〕「這懦弱、不敢說真話的世界！」²⁹

結果Rose跟著美軍離開台灣，到美國去，而林德旺如同姐姐所說，過著「若離了土，就要枯黃」的花草命運。女性漂泊，而男性自殺或發瘋，是在陳映真的作品中持續反復的架構，這似乎強調著，唯有基於歷史的穩固的傳統認識，才能保有打造未來的希望。

台灣在一九四五年以後，在民眾的構成上增加了外省人這樣一個移民群體。從小說內容來看，外省人具有雙重性，即以外省人為中心、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成了「與台灣人對立的外省人」的邏輯根據，但同時，國民黨外部的大多數外省人，在階級上又與台灣人具有同樣的地位。因此，外省人在這個意義上也能成為以階級為媒介去克服分斷矛盾的環節。在冷戰脈絡中，這是台灣所特有的、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的原因。也就是說，在冷戰之下，作為遷移政權的國民黨，需要與台灣的上層階級結合起來的過程，因為日據時代殖民地經濟結構所遺留的基礎，還是需要經過台灣人的大範圍移轉。³⁰

6. 思想的貧困》，（同前引註6），頁一〇七。

28 參見陳映真（一九七八）〈上班族的一日〉，引自《陳映真小說集3·上班族的一日》（台北：洪範，二〇〇一），頁二一一。

29 參見陳映真（一九八二）〈萬商帝君〉，引自《陳映真小說集4·萬商帝君》（同前引註19），頁二〇四。

30 陳映真也思考過如此透過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相互融合，使得日本舊殖民和美國新殖民連續的過程：「五〇年代大概是台灣的地主階級與過去親日資本家在整個國民黨的政治結構上爭取到發言權，再加上國際勢力要使台灣徹底親美反共，才產生所謂的『台灣分離主義』」，引自《海峽》編輯部在一九八七年對陳映真的訪談〈「鄉土文學」論戰十周年的回顧——訪陳映真〉（同前引註27），頁一〇七。

相對來說，一九四五年以後，南韓經歷了分斷和內戰，而進入了冷戰下新殖民地階段，民眾的社會主義走向因此遭受壓抑。隨後，根據理念的分界線，南邊和北邊分別成立各自的政權，地主和資本家以及知識分子也跟著理念，選擇朝北或南移動。但是，生活的物質條件鑲嵌於土地的韓半島民眾，大體上留在自己的生活空間。相反的，南韓的支配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確保了延續和強化日據時期買辦性質的反共主義階級認同。

相互參照所呈現的歷史特定性

本書將透過關於陳映真文學實踐的分析，試圖初步地闡明台灣對南韓的參照性意義。

首先，透過台灣的「雙重分斷」的特定性，確認了從未經歷過殖民與分斷相互重疊的南韓特定性。台灣向來具有無法把殖民和分斷分開來的條件，因此，克服殖民問題總是與克服分斷問題連在一起。從陳映真的具體文學實踐看來，此問題的解決方案大約可概括為藉由作為「根」的「中國」以克服殖民所造成的「扭曲」和「缺乏」。不過，對當代的台灣來說，陳映真所提示的此方案也在「歷史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之間擺盪中，產生了在「主體性」層面的被動性問題。而陳映真以「思想的貧困」思考如此困惑，並從「政治經濟學」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向。

相較之下，對南韓來說，殖民在先、分斷在後，不存在自身外部的非殖民的「根」，因此只能從自身內部，尋找克服殖民性的展望。這樣的課題所提示的核心問題是：參與「內部」的殖民

主義扭曲之當事者，透過什麼樣的路徑能夠反思性地認識自身上的扭曲？

第二，台灣雖然沒有完全脫離「國共內戰」，但不成為現場，因此可以說在民間或日常的場域，內戰還是稍微外在的。事實上，經過一九四〇年代後期和五〇年代，台灣左翼遭受白色恐怖而走上潰滅之路。若究其原因，一方面台灣在群眾層次上沒有充分地分享國共內戰中意識形態的對立和矛盾，另一方面，在一九五〇年代前後的全球冷戰轉型中，東亞左翼的理念——至少在思想方面——不夠充分地認識被殖民民眾的解放和主體性問題。

相較之下，南韓大部分的國土都成為內戰和熱戰（即所謂「韓戰」）的現場，而人民內部的互相暴力也極端，進而形成了與台灣全然不同的、具有厚實的反共主義物質性的群眾情緒條件。南韓思想界仍迫切地需要認識此情緒條件的根源性。而此認識的出發點，也可能是認識極端暴力的內在原因，也就是作為殖民後果的歷史斷裂和主體性扭曲。

最後，台灣內部有著作為獨特的移民之「外省人」。而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上，國民黨權力上層的外省人與繼承殖民經濟的本省人出現了歷史性的結合過程，在此歷史過程中，新殖民社會的支配階級獲得了自主性。但同時，在民眾的層次上，國民黨外部的多數外省人和多數本省人，擁有的的是相同的階級地位。因此，「外省人」的存在，構成了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的複雜性，和獨特的歷史軌跡。作為持續提醒台灣的地方性和區域性的因素，「外省人」尤其制約了台灣的假想國家化和現代化。

相對來說，南韓經歷了內戰和分斷，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形成了相對同質的權力集團。如此的

同質性，讓南韓的假想全國性和國家性獲得實體化的基礎，而在對稱性分斷條件下，比起台灣的政權性質，南韓的政權更具備了暴力性的物質條件。

作為歷史中間物的朴玄採

戰後實踐型知識分子的困惑

在我們的狀況之下，民族性必然地等同於民眾性，民眾性必然地等同於民族性。³¹

朴玄採是繼承了根據歷史介入現實的獨特模式且不斷實踐的南韓戰後代表性思想家之一。一般來說，他的名氣在於作為一位經濟學者出版了被視為一九七〇年代南韓進步陣營的教科書之一：《民族經濟論——朴玄採評論選》。³²而他在一九八〇年代，批判了接受「依賴理論」的學者所提出的論述中的知識殖民性，而觸發了社會形態和社會性質論戰，因此更為出名。

雖然如此，他對待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南韓的理論論戰，是更為批判的。對此，與朴玄採一起統整、編輯和出版社會形態論戰的社會學者曹喜昞(조희연，一九五六—)回顧如下：³³

所以，在朴玄採先生看來，N L (National Liberation) 和 P D (People's Democracy) 是一致

的，也就是說NL||PD。不過在現實當中，雖然朴先生打造了非常重要的契機，讓新世代年輕人擁有NL導向或PD導向的激進思想，但他只能看著自己身上的NL面向和PD面向被分開來，甚至形成兩個群體互相矛盾和對立的狀況。

31 引自朴玄採墓碑的碑文。

32 一般來說，一九七〇年代南韓進步運動圈的社會科學領域有三大教科書，包含趙容範的《後進國經濟論》(조용범, 《후진국경제론》, 一九七三)(朴玄採的借名著作)、李泳禧的《轉換時代的邏輯》(리영희, 《전환시대의 논리》, 一九七四)和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朴玄採評論選》(박현채, 《민족경제론——박현채평론선》, 一九七八)。目前罹患了帕金森病的林東圭(임동규, 一九三九—)，似乎最了解朴玄採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的活動。他是一九七九年「林東圭間諜事件」(統一革命黨重建委員會事件)的當事人之一。他說，「他(朴玄採)十多年來不斷地進行那樣的(匿名書寫)工作，我們開玩笑地說，如果去查出這個社會的報紙、雜誌中他的文章，其分量會非常多，以書本來算，他的文章加起來會超過數十本，甚至可能達到一百本的分量。他進行了這麼多(匿名)書寫」，參見【韓】林東圭受訪的〈KBS人物現代史：為民眾的經濟學——朴玄採〉，引自《朴玄採全集·第七卷》(朴玄採全集發刊委員會編，首爾：Haemil, 二〇〇六)，頁五一四。包括借名著作《後進國經濟論》，朴玄採的借名或筆名書寫主要是因為他曾經在韓戰時參與游擊隊，而於一九六四年在「人民革命黨」事件發生時被捕坐牢，因此他對於公開實名出版採取極為謹慎的態度。關於《後進國經濟論》實際作者，參見【韓】林東圭的〈啊！朴玄採〉，引自《啊！朴玄採》(朴玄採全集發刊委員會編，首爾：Haemil, 二〇〇六)，頁二六五。

33 朴玄採和曹喜昞兩人從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選編從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到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進行的社會形態／社會性質論戰的相關文章，出版【韓】《韓國社會形態論戰·I—IV》(朴玄採、曹喜昞主編，首爾：竹山，一九八九—一九九二)共四卷。

我認為，朴玄埰先生對此狀況感到惋惜。所以NL和PD是同一個，這就很清楚地反映在一個簡明的語句：民眾性等同於民族性，民族性等同於民眾性。³⁴

當人們在描述南韓的左翼社會運動和理論狀況時，NL和PD這麼一個區分法仍然常常被使用。但是，大多數人忽略了一個背景事實：NL和PD事實上都從朴玄埰的整體思想體系中加以簡化了他所提出的NLPDR (National Liberation — People's Democracy Revolution，所謂「民族解放民眾民主革命」)之實踐方案，從而各自抽出自己的強調點，後稱為NL和PD。事實上，讓朴玄埰感到惋惜的原因，正是當年輕激進世代面對著朴玄埰所提出的思想體系中性質和層次不同的「社會形態論」和「社會性質論」，簡便且各自片面地選取某一個面向。換句話說，在朴玄埰看來，在社會形態論層次上，把南韓社會定性為「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及在社會性質論層次上，把南韓社會定性為「新殖民地—半封建」——這兩者是不相矛盾的。但是，年輕一代中PD導向的群體，以社會形態論的要素(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取代了社會性質論，而NL導向的年輕群體則以社會性質論的要素(半封建)取代了社會形態論。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和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朴玄埰反覆批判了如此脫離現實的理論主義論戰。但從現實的發展來看，實際上新的「民眾」運動和「民族」運動，以及現成的「民主化」世代，構成了二元或三元的競爭格局。

於一九八九年一月進行的座談中，朴玄埰以「社會實踐中的思想問題」為主題，提出理論脫離現實的問題，並且呼籲，思想鬥爭需要轉型，必須透過忠實於民眾的生活，解決民族問題。

其間有關於思想鬥爭或理論鬥爭的範疇，我們浪費了許多精力。我們考慮著這樣的現實，如同《社會與思想》上「朴玄採的〈變革時代的知識人與歷史意識〉一文」所提出，以一九八九年為轉機，需要終結非生產性的理論鬥爭。而且我認為，透過忠實於民眾的生活，與他們一起，根據他們的要求——換句話說，進入具體的社會實踐，努力發展理論，才有益於今日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³⁵

八〇年代末期，朴玄採從「思想」的角度，提出了理論脫離現實的問題，現在看仍然是正確的批判。但是，當時他的批判無力矯正現實論戰趨勢的發展。在八〇年代的動盪已經平息的九〇年代中後期，也就是正上著大學的我們這一代，很難在面對過去的痕跡和沉澱時，形成與歷史的連結。對我們這一代來說，正是朴玄採搭起一座橋樑，讓我們重新回到歷史的走向。

朴玄採對我們這一代而言，之所以成為歷史的中間物，是由於他具備某種特殊條件。與朴玄採生前一向保持密切關係的南韓經濟學者鄭泰仁（정태인，一九六〇—）的所做回顧，就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朴玄採的非學院派知識分子條件，反而讓朴玄採做出範圍極廣的寫作：

34 引自【韓】曹喜暎受訪的〈KBS 人物現代史：為民眾的經濟學——朴玄採〉（同前引註32），頁五五二。

35 參見【韓】朴玄採、法性（法號）、金昌鎬的〈座談：社會實踐中思想的問題〉，引自《朴玄採全集·第一卷》（同前註1），頁八六四。

我常常被朴玄採先生批評的一點，就是我跟他說，因為我不懂，所以不能寫出來。被提問的時候，我就像在長輩面前一樣，謙虛地說，「我不懂」，那就被朴先生批評。

意思就是說，若這個問題當下需要被回答，那就在自己了解的範圍之內，盡量回答，這就是朴玄採先生的想法。所以他的寫作非常廣泛，他也寫過文化論，文章的主題非常多樣。也就是說，若必須回答，就要回答。而且，教授們面對現實問題，往往猶豫不決地迴避回答。因為當時他們考慮的事情很多。講錯了就有很多麻煩。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可以說，他一個人回答了所有的問題。³⁶

朴玄採似乎積極利用「在野評論家」這麼一個看似局限的特殊位置，將自己置於新殖民大學體制外，進行了內在於歷史和現實的思想實踐以便克服這個體制。因此他面對大學教授們慣於迴避回答的許多問題，一邊自己學習、一邊寫作，結果，他對今日的我們，成了一個歷史中間物，讓我們認識思想的歷史斷裂，並使得我們可以把這個斷裂加以問題化。

朴玄採的思想內容和態度都證實了他作為歷史中間物的面貌。例如，他基於歷史延續性，內在認識「分斷」，這尤其明顯地呈現在他對於歷史的主體觀點。

戰後分斷國家中，德國或韓國的狀況是軍事占領先行，而後再與社會內部矛盾結合的類型。相比之下，中國和越南的狀況是，一個社會的內部矛盾引起的內戰在民族解放戰爭的過程

中，變得更為激烈，而如此的狀況因外部壓力而無法貫徹到底，以分斷狀況為終結。但是，不管哪一種類型，都有意識形態的介入。一個社會內部矛盾的表現之階級對立，以意識形態對立得以現象化，但因為這個意識形態對立被外化，而出現一種誤解：對立似乎來自外部條件。³⁷（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將分斷的責任轉嫁給外部壓力，把意識形態加以外化，便成為在這些國家中把分斷其中一方設定為符合民族要求的正統，同時把另一方設定為迎合外勢的非正統的重要根據。

不把意識形態基礎視為一個社會的社會形態中的矛盾關係之表現，反而把它視為外部強加、或者被輸入的觀點，讓分斷的一方以民族史的正統自居，因而把同一民族的兩個國家都加以正當化。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權力以民族史的正統之名義，把自己合法化。但是，這只不過就是在民族和國民的名義之下，否定了構成一個社會的多元性階級階層的要求，呈現單向的階級偏向。³⁸（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從歷史內在繼承的觀點，朴玄採認為，分斷下國民國家的形成與隨後的外在性分斷認識，造成了

36 引自【韓】鄭泰仁受訪的〈KBS 人物現代史：為民眾的經濟學——朴玄採〉（同前引註32），頁三八七—三八八。

37 參見【韓】朴玄採的〈分斷時代的國家和民族問題〉，引自《創作與批評》第五十九期（一九八八年春季號），頁二四五。

38 引自【韓】朴玄採的〈分斷時代的國家和民族問題〉（同前引註），頁二四六。

否定階級階層要求的「多元性」此一錯誤。這不只是批判南韓國國民國家的實體化，也對南韓內部知識思想界和反美民族主義運動在認識社會矛盾的方法上，發出質疑。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於受限在現代國家／政黨關係下被民族矛盾所單向規定的「人民」概念，朴玄採的「民眾」概念，反而是內在於歷史，而且包含著現實中多樣性（以及個體性）的多元性範疇。³⁹

就如同南韓著名小說家趙廷來（조정래，一九四三—）在其長篇小說《太白山脈》（태백산맥）中所描寫的少年游擊隊員，朴玄採屬於在韓國戰爭中戲劇性地經歷過內戰的世代。⁴⁰ 他的歷史體驗相當程度地決定了他對待「理論」的態度，而這就反映出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倫理意識：

站在過於高的位置提出與社會實踐無關的論述，不具有正當性。我們從各國的社會實踐來看，初期因應內生需求的運動以樸素的形態展開。先以樸素的形態進行運動，進而與自己爭取的實踐成果關聯起來，漸漸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也就是說，基於內生需求的社會實踐，不是先提出高層次的要求，然後在其要求之下，立刻擁有所有的理論和社會實踐，而是從極為樸素的生活需求出發，漸漸地與社會實踐的成果結合起來，得以上升。不過，外部決定性較多的理論，不是因著內生需求而產生，反而是從外部引進來的，那麼理論本身就會過於抽象化而脫離社會實踐，甚至成為制約社會實踐的因素。⁴¹（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這是朴玄採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的座談上的發言。他提出了從外部引進來的抽象理論如何脫

離思想，並造成制約社會實踐的問題。在此，我們能看到令朴玄採苦惱的知識倫理問題。此一關於倫理的問題意識，基本上來自於他身為歷史中間物而掌握到的「殖民—內戰—冷戰」認識與現實的理論情勢兩者之間的偏離。

歷史中間物的原型體驗：以「未完成的回憶錄」為中心

與陳映真不同，朴玄採是在自己的批判行為在現實中被忽略的時候，才開始用「文學」的方式記錄自己的人生經歷。首先，在一九八七年，他提供了他自身的歷史經驗給當時正在連載一部長篇小說《太白山脈》（共十卷，一九八六—一九八九）的趙廷來。朴玄採的歷史經驗，就成了小說中敘述南韓左翼游擊隊「少年戰士趙元濟」在韓戰中的故事。⁴²

39 可參考錢理群對於「五七體制」的解釋：在中國共產黨建國過程中，尤其一九五七年前後的「人民」概念，如何被「黨」單向地所規定而抽象化，使得人民的多樣性和從中的個體性被否定的狀況。參見錢理群（二〇一二）《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一九四九—二〇〇九）——另一種歷史書寫（上）》（台北：聯經）的〈第三講，反右運動前後（下）〉。

40 值得一提的是，朴玄採在一九四六年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在歷史尚且開放的空間中，讀過埃德加·斯诺（Edgard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日文版（參見《朴玄採全集·第七卷》，頁七〇—七二）。一九四五年解放後，日本人留下的世界文學全集和聖經等，都成為朴玄採小時候的讀物（參見【韓】金喜種（김희종，音譯，小學和中學同學）受訪的〈KBS 人物現代史：為民眾的經濟學——朴玄採〉（同前引註32），頁五二二—五二三）。

41 引自【韓】朴玄採、法性（法號）、金昌鎬的〈座談：社會實踐中思想的問題〉（同前引註35），頁八三八。

42 「《太白山脈》中，趙元濟出現的部分，完全是朴玄採先生自己經歷過的，而只不過是我把它改編成小說而已。換句話

接著，一九九二年底，當時五十八歲的朴玄埰接受友人的建議，開始撰寫回憶錄。一九九一年起在健康上出問題的他，可能直覺到剩下的時間不多了。雖然他曾經發表過許多著作，但朴玄埰似乎仍感到一種遺憾和無力感。這可能形成了他對於「文學」的某種執著。或許這也就意味著，朴玄埰了解到了，反映出「歷史」蓄積的他的思想，無法用社會科學的語言傳達出去，反而需要與文學語言結合在一起。身為他的光州西中同屆同學且後來成為南韓媒體運動核心人物的金重培(김중배, 一九三四—)的回顧如下：

事實上，他心裡一向抱著這樣的想法。他要寫小說，死前要寫一部小說。我們因為是朋友，所以我們說，看過你書裡面的文章，就完全不符合小說，以那樣的文筆，怎麼能寫出小說呢？那麼他就說，我為什麼不能寫？這可能是他情感豐富的表現，或可能他心裡真的想著寫小說。後來據說，這樣的想法，不只是我一個人聽到的。他對很多人講過寫小說的心情。很多人說曾聽到這樣的話。⁴³ (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另外，在一九七八年《民族經濟論》出版不久後，在野社會運動家白基玩(백기완, 一九三一—)與朴玄埰偶然會面並進行非正式的紀念出版活動。我們從他們的對話中，能看到朴玄埰對小說的思考：

「朴教授，你要帶著《民族經濟論》的立場，進一步走進群眾裡面，然後寫一本小說如何？一邊帶著邏輯接近群眾，另一邊帶著情感接近群眾，用這樣的方法。」

我這麼講，朴教授的反應是這樣的。

「不就是嗎。我也在想要寫小說。你完全看穿我的心裡。不過寫小說需要才華，而且看事物的時候，需要帶著情感接近的才藝。但我沒有這些，怎麼寫呢？」⁴⁴

由此推演，我認為，朴玄採從七〇年代直到晚年仍然抱著透過小說所表現的某些內容，而這些部分內容，就呈現在他死後才被發現的「回憶錄」中。

朴玄採在一九九三年的夏季，中風病倒，病情越來越嚴重，最後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過

說，我幫朴玄採先生寫了自傳。不過，這只有反映他游擊隊時候的經歷。而且，他讀完《太白山脈》之後，說「比起我講的，你寫得更好，我自己無法這麼寫」，看來很滿足」，引自【韓】趙廷來受訪的〈KBS人物現代史：為民眾的經濟學——朴玄採〉（同前引註32），頁三七四。【韓】《太白山脈》從一九八三年九月開始，連載於月刊《現代文學》，而透過韓吉社出版社，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第一部共三卷，一九八七年出版第二部共二卷，一九八八年出版第三部共二卷，一九八九年出版第四部共三卷。《太白山脈》有法文版 *La Chaîne des Monts Taebaek Tome 1-10*，和日文版《太白山脈》全十卷（ホーム社、集英社，一九九一—二〇〇〇）。據說，中文版、英文版和俄文版都即將出版。這部小說在南韓曾經被拍成一部電影《太白山脈》（一九九四，林權澤導演）。

43 引自【韓】金重培受訪的〈KBS人物現代史：為民眾的經濟學——朴玄採〉（同前引註32），頁四三三。

44 引自【韓】白基玩的〈啊！朴玄採教授〉，引自《啊！朴玄採》（同前引註32），頁一四五。

世。在他死後，他沒有完成的、篇幅只有二十三頁的回憶錄被發現，但是回憶錄所涉及的主要內容，只涵蓋他作為游擊隊參與韓戰的大約兩年活動而已。於是，戰後他直接或間接參與的許多事情，就這樣與他的身體一起被遺失了。據說他中風後，因為腦問題無法調整感情，朴玄採便不如往復強健，流淚得許多。或許，他的眼淚是為了游擊隊活動中死去的戰友和冷戰過程中被犧牲的同志們而流，是因為某種責任感和歉意而落下。

隨著病情惡化，朴玄採的「回憶錄」無法完成，只能留下極少的一部分。但是「回憶錄」中所記錄的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後，身為游擊隊成員活動的那兩年多的經驗，就可以讓我們猜想他後來社會實踐的原型動機究竟為何。回憶錄從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開始。此日是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八日的翌日——九月二十八日正是美國全面介入戰爭，逆轉了朝鮮人民軍幾乎「解放」南朝鮮的戰情，美國和國軍（南韓軍隊）為首的聯合軍因而收復了首爾，同時人民軍宣布全面撤退。回憶錄的開頭如下：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還有二十三名的同學們集合在盧嶺山脈⁴⁵邊緣的街頭上。他們把各自擁有的各種證明和文件，集中在一方，並且也放了國旗（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等旗幟。然後點火了。不知誰先開始，我們用低聲合唱了國歌（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歌聲慢慢大起來，漸漸變成哽咽。⁴⁶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戰爭開始以後，南韓社會內部隨即捲入了動盪，接著，南韓左翼們迎接「解放」，但積極迎接這個解放的左翼們，在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內，又被敵人們包圍起來。而朴玄採於十月入山，成為游擊隊，並是為全羅南道光州地區的隊員。當時十六歲的朴玄採只不過是中學四年級（高中一年級）的學生，但是他從小在左翼家族成員的熏陶下成長，因而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已經親身經歷了關於民族未來左右之分的對立。透過回憶錄所提供的一些豐富線索，我們得以了解他在入山成為游擊隊之前，小學和中學時期的經驗。首先，我們透過他的家族關係，能夠了解到在幼年和少年時期，形塑朴玄採價值觀的成分之性質。⁴⁷回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時，朴玄採敘述了自己所經歷的狀況：

我們全家人，都在朴京民堂叔家五燈收音機前面，與吳主順（오주순，音譯）、朴京民（박경민，音譯）、父親和我等人，一起迎了解放。當時吳主順舅舅為了與朴憲永⁴⁸同志接線，

45 盧嶺山脈：形成南韓西南部湖南地區的全羅南道和全羅北道之間界線、具有西南方向的山脈。

46 引自【韓】朴玄採的〈親筆回憶錄〉（同前引註1），頁二四。

47 就朴玄採的家譜來看，不管本家還是外家，都偏向於左翼。朝鮮出身的著名音樂家鄭律成（정률성，一九一八—一九七六），也是光州出身，幼年時期在朴玄採故鄉之和順成長。據說，鄭律成的大嫂是朴玄採的姑婆。

48 朴憲永（박헌영，一九〇〇—一九五五？）是日據下朝鮮的獨立運動家、工人運動家、革命家和政治家，亦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家。朝鮮共產黨因遭受多次日本殖民當局的鎮壓而被解體。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起，朴憲永成

常常趁黑夜隨時進出我家，不過自從八月十五日的兩天前起，已經離開和順地區，寄食於我家。⁴⁹

一起迎接解放的這些人們，從政治運動方向來看，都是左翼，不過都屬於不同政黨。據說，主順舅舅擔任共產黨的全羅南道共青委員長，其他人包括京民堂叔，都成了呂運亨⁵⁰先生的人民黨黨員。主順舅舅與朴憲永先生一起去首爾幾天後回來，我們各自都忙著謀生，也忙著政治運動。⁵¹

此時，朴玄採的周邊環境與當時左翼政治運動的核心人物，已經都有了直接的聯繫。這可稱得上是一個特殊的背景；然而，這在相當的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民眾的政治傾向，因為當時南韓的輿論基本上支持左翼。⁵² 朴玄採身處於這樣的周邊環境，參與了社會勞動黨系小學老師崔忠根(최충근, 音譯)指導的讀書會，以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為契機，開始大量閱讀左翼書籍。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一件事情，也間接地反映當時朴玄採的狀況。當時參與公務員罷工的父親被抄家，朴玄採的筆記本和書籍也被沒收，其中《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出版資訊不詳)一書以及朴玄採辱罵李承晚和金九的字條被發現，而遭受毆打。⁵³ 朴玄採經歷著如此的學習過程，漸漸摸索著自己人生的方向。

我在這時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間）針對人生的方向，捲入深刻的苦惱。我遭遇到動盪的歷史時期，如何尋求對歷史和自身不愧疚的人生，就成為我的苦惱。我自己認為，我在民族參與的時期要堅決參與現實，但是從哪個方向參與，成了問題。影響我選擇的關鍵就是

奉請

為朝共重建運動的領袖，遭受多次的通緝、逮捕和拷問等苦難，一九四五年八月解放後，朴憲永立刻著手重建朝鮮共產黨。但，由於金日成獲得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並在北朝鮮設立了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結果朴憲永所組織的朝鮮共產黨被瓦解。一九四八年，他越過分界線到北朝鮮去（所謂「越北」），擔任了副首相兼外務部長。他於一九五二年以間諜嫌疑被捕，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被處決。一說其死亡年代是一九五三年或一九五五年，具體死亡日期不明。

49 引自【韓】朴玄採的〈親筆回憶錄〉，（同前引註1），頁三三。

50 呂運亨（여운형，一八八六一—一九四七）是日據下朝鮮的獨立運動家，曾任一九四五年八月建國準備委員長，同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二月擔任朝鮮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一九四六年起，他與其他民族運動家一起展開了左右合作運動，不過也因此遭受了來自左右雙方十多次的恐怖行為，同時他與朴憲永為了掌握左翼領導權而互相競爭。最後呂運亨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遭受右翼恐怖主義團體白衣社的攻擊而被暗殺。

51 引自【韓】朴玄採的〈親筆回憶錄〉（同前引註1），頁三四。

52 參見【韓】《東亞日報》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第三頁，報導美國軍政廳的民調結果。從中，有關於政治理念的第三題民調結果如下：問三、「貴下贊成哪一個？」一、資本主義：1,189名（14%）；二、社會主義：6,037名（70%）；三、共產主義：574名（7%）；四、不知道：653名（8%）。另外，參見【韓】《朝鮮日報》一九四七年七月六日第二頁，也報導了朝鮮新聞記者會所進行的民調結果。其中，「贊成哪一個國號？」這一問題的結果顯示「朝鮮人民共和國」取得超過半數的支持（朝鮮人民共和國：69.5%；大韓民國：24.6%；無回答：6.0%）。

53 紙條內容似乎是朴玄採對於當時屬於右翼的李承晚和金九等人反對信託統治路線的批判。

和順煤礦工人參與現實的活動。光州與和順煤礦的距離大約為七·五公里，但是和順煤礦的工人都以徒步方式，參與了每次的活動。比起右翼「獨立促成會」⁵⁴中老人家的參與實踐，他們強健地參與現實的實踐，足夠讓所有人激動起來。我不從理論來打量，就知覺了，我們不應該把民族的命運給脆弱的老人家承擔；我們應該依靠年輕的生產者階級。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腰帶上掛著的飯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就是說，承擔民族新未來的力量只有他們。歷史中，我寄望於不斷參與生產活動的階級，這也就意味著，我站在歷史進步的一方。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選擇勞動者那一方，是過去以觀念性方式閱讀「英雄傳」的結論。而且，我開始閱讀左傾的書籍，並開始介入主順舅舅和在玉妹夫的移動式文庫，參與閱讀馬克思主義文獻運動。這個選擇後來也聯繫到小學的讀書會活動。⁵⁵

朴玄採的敘述呈現了自小學六年級開始的苦惱，也是從那時起，他下定了決心，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此，在他進入中學之前，雖然父親強力推薦他選讀光州西中，但朴玄採為了成為工人，報考了光州工業學校。但很巧的是，在身體檢查時，才發現他有紅綠色盲。因此，於一九四七年九月開始，朴玄採不得不選擇光州西中就讀。事實上，當時的光州西中是培養光州地區菁英的核心學校。因著這個偶然因素，朴玄採脫離了他所嚮往的勞動者的人生。但是這個偶然反而成為另一個契機，讓他成為更具實踐性的知識分子。停戰之後，他在學習經濟學的同時，投身參與進步思想的實踐，也應該與如此背景有關。

結果，在朴玄採進入中學的那一刻，就正式捲入了當時南韓內部的左右對立。尤其是一九四八年四月在濟州島發生的所謂「四·三抗爭」⁵⁶。此事件的起因，是由於美軍政權和南韓右翼政權企圖以武力貫徹南韓單邊分裂政權，進而引起的濟州島民眾的抵抗和犧牲。同年十月十九日，當面對著上層命令武力鎮壓濟州島民眾抗爭時，軍隊內部分左翼勢力抗拒命令，並進行武裝起義和紅色恐怖行為——這就是「麗順十四聯隊叛亂事件」⁵⁷。此事件也影響了附近的城市包括光州。當時是中學一年級學生的朴玄採，回顧了當時的狀況：

在此過程中，一九四八年的麗順叛亂，給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打擊。麗順叛亂雖然與我無關，但是具體化了右翼大規模的反動。我們的A組織被學聯（當時中學右翼組織）所暴露，因此朴正在（박정재，音譯）和崔恩珠（최은주，音譯）服刑了兩年。我在此時期，逃學兩個月，在木浦的父親家生活。這時期，我帶著極左的傾向。雖然我在學，但是一直認為有機會就要拋

54 「大韓獨立促成國民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成立，以李承晚（이승만，一八七五—一九六五）和金九（김구，一八七六—一九四九）為核心領導。

55 引自【韓】朴玄採的〈親筆回憶錄〉（同前引註1），頁三四—三五。

56 「四·三抗爭」是指一九四八年南韓南邊濟州島的南朝鮮勞動黨，因反對透過選舉成立南韓單邊政府，於四月三日突擊屬於美軍政府的警察局，進而促發去殖民族主義統一運動，此運動一直持續到朝鮮戰爭時期。

57 「麗順」指位於南韓南海的港口城市麗水和順天。

棄學業，走上無產階級的生活才是更好的選擇。不過，我一直猶豫不決，而且我打算首先盡量滿足父親的期待，然後再走上我自己的路。〔……〕父親說，西中內的政治風暴平息了，可以再去上學。我當時不太了解父親做了什麼樣的安排，只好再回到學校去。其間學聯小子們密告了我，所以我也被警察局逮捕了幾次，也直接被學聯逮捕過。⁵⁸

一九四八年後，南韓美軍政權與右翼對南韓左翼的鎮壓，已達到極為嚴重的程度，朴玄埰也因此而經歷了幾次風雨。但是，他自己說，雖然他跟右翼在校園裡衝突，但是透過論辯說服了對方，於是才能夠自我保護直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之際。事實上，在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南韓的左翼已經面臨絕滅的危機。就在此時發生了朝鮮戰爭。朴玄埰對六月二十五日的回憶也非常具體：

六·二五事變要求我們巨大的決斷。六月二十五日當日我們是無奈的。我們跟著他們〔右翼群眾〕一起參與了往兵士局前面的遊行。但是，隨著時間過去，我們明白了全面戰爭的發生。我召集同志們並宣告，因為祖國解放戰爭爆發，我們需要離開學校而保護自己，準備迎接解放的那一天。我於六月二十六日宣布拋棄學業，當日下午就離開學校。〔……〕雖然城市裡人民軍到了，但是空中仍然出現美軍的轟炸機，爆炸仍持續著。我在避難處暫時猶豫，七月二十三日以後再過一個星期，八月一日才能回到學校去。⁵⁹

朴玄塚在此過程中，重建了中學內的校委（學校委員會的簡稱），並擔任聯絡員，後來也擔任了校委講師。他迎接了以戰爭形式到來的解放，並回顧說：「我在解放空間中，感到解放的喜悅，但我以不迫害任何人為原則」。⁶⁰但是，時至秋季，朴玄塚所參與的解放空間，在美軍和聯合國軍隊的全面介入下，再度被右翼所占領。結果他又回到他的故鄉和順地區。接著，九月二十八日，人民軍宣布全面撤退後，他開始準備入山之前，與母親商量他的未來走向。⁶¹

我與母親商量了我以後的走向。其實母親為了我偷渡光州，在做了多方面的安排後，過

58 引自【韓】朴玄塚的〈親筆回憶錄〉（同前引註1），頁三九—四〇。

59 同前引註，頁四〇—四一。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國戰爭爆發之後，北朝鮮人民軍尚未到達的南韓地區，開始出現了右翼對左翼的大屠殺，不過等到七月二十三日前後，光州地區也被「解放」了。

60 同前引註，頁四一。

61 朴玄塚的小學和中學同學金喜種回顧如下：「問：他（朴玄塚）入山成為游擊隊的情景如何？答：一九五〇年九月，人民軍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們都散開了。不久後，他母親跟他見面說，不管在這裡也好，入山也好，都會死。當時五〇年十月，這一帶的狀況是，誰是紅色分子，就槍斃。尤其在這麼偏僻的地方更是這樣。所以他母親也說，不管怎樣都免不了死亡，那麼就照你的想法做。然後他說，媽媽我就去了。他說，他成熟了，跟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向母親跪拜，說這樣一句話。我聽他這麼說」，引自【韓】金喜種受訪的〈KBS人物現代史：為民眾的經濟學——朴玄塚〉（同前引註32），頁五二—六。

來找我了。但是我有我的立場，並以此拒絕母親的提案，我清楚表明，入山戰鬥就是我的立場。首先我需要堅持我的立場。我向母親說明在這期間我所處的狀況和我的立場，同時強調唯有堅持這個立場，才是謀求正確生活的一個人的立場。雖然死亡是必然的，但這才是作為正經人應該堅持的重要立場。我說，在這期間我的態度不是盲目性的，而是基於面對歷史的自我信念，同時是為了從歷史中走出自己的生活而要堅持的正確的路。人活著，若不能走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路，那麼人生就沒意義，這反而需要透過死亡來保持。母親理解我的主張，並接受我的選擇。⁶²

結果，朴玄採入山了。於一九五〇年冬季，在光州地區組織了以二十歲以下少年為成員的「突擊」中隊，朴玄採被任命為該中隊文化部的中隊長。後來他的組織活動被高度評價，地區組織於是將他的年齡多算兩歲，讓他得以加入朝鮮勞動黨。也就是說，一九三四年出生的他，變成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出生，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成為朝鮮勞動黨員。⁶³此前不久的一九五一年一月，恰好是中共介入戰爭的時期。朴玄採等南韓左翼聽到這個訊息，重新開始準備迎接「解放」。而黨組織也為朴玄採安排了他的未來。

我通過審查了。黨為我安排了解放後的任務，即升學金日成大學經濟系。我強調了我只是高中一年級，即中學四年級。但是他們說，這不成問題。升學金日成大學，學校會安排個別的

指導員為我指導，因此在黨指導的層次，學歷差距所帶來的困難能得到克服，讓我可以充實修習金日成大學的課程。在這時期，我們所有的活動都是準備迎接解放的。⁶⁴

奉請

但是，隨後的戰爭狀況，卻沒有具體的進展。因此，朴玄採之後的游擊隊生活，成了十多歲年輕少年無法承擔的暴力和死亡體驗。有一次，他參與後勤鬥爭，卻被斷線落隊，就在此刻，他發現了許多鬥爭人民的屍體。他回顧：

我怕我一個人落隊，所以在深夜中，我往還看得到的方向走去。此時，我聽到有人在壟溝帶牛耕地的聲音，但是慌忙的我來不及確認狀況。跑了半天，就發現周邊滿地都是屍體。屍體都腐爛了，但衣服仍然保持原貌，因此人的形體還很明顯。這些確實是鬥爭人民的屍體。我知道我走錯了，但是已經來不及停止或回頭。

62 引自【韓】朴玄採的〈親筆回憶錄〉（同前引註1），頁二八—二九。朴玄採的母親，對朴玄採的兄弟姐妹說過多次：「乾脆我們當作把你們大哥獻給國家，就當作大哥不在了，我們自己謀生吧」；日後，朴玄採的夫人也對朴玄採的兒女說過：「你們就當作父親不在，這麼生活吧」。參見【韓】朴勝採（弟弟）受訪錄，引自《朴玄採全集·第七卷》（同前引註32），頁五二九；參見【韓】朴淳貞（女兒）受訪錄，引自《朴玄採全集·第七卷》（同前引註32），頁五二九；參見【韓】朴淳貞（女兒）受訪錄，引自《朴玄採全集·第七卷》（同前引註32），頁四三九。

63 引自【韓】朴玄採的〈親筆回憶錄〉（同前引註1），頁四四。

64 同前引註，頁五六—五七。

天慢慢亮了。數百名死亡人民的狀況更清楚了。我只好一直跑，凌晨時到了和順的大嶺溝。我為了確認我所處的位置，爬上更高的地方。⁶⁵

朴玄採所體驗的暴力和死亡不是單一的。在他的回憶錄中，他描述了各式各樣的死亡：直接、間接鬥爭中，遭受敵人暴力而死的同志的死亡；被敵人屠殺的民眾的死亡；組織內部整肅過程中的死亡；理念對立所造成的家族內的殺害；戰略戰術錯誤所造成的同志和民眾的犧牲等。經歷如此複雜死亡的過程後，朴玄採確立了關於自身死亡的原則。朴玄採所屬的游擊隊，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組織了進攻光州的鬥爭，也是在此時，朴玄採確立了自己死亡上的方針：

參與光州鬥爭意味著增加我在光州死亡的可能性。因此，我考慮到兩個可能：（1）在光州死亡，公開我的屍體之可能性；（2）若屍體公開在政治鬥爭中，關心我的學校同志們將遭致負面效果。因此，選擇死亡場所得先把光州排除在外，這便成為現實要求和主要課題，並成為我參與鬥爭的原則。我在游擊鬥爭激化的過程中，堅持了這個原則。同時，我堅持不向我的父母公開我的屍體，因為我希望他們仍然可以放棄對我的生存的期待。⁶⁶

但是，朴玄採接受指揮部的決定，因而無法把此原則堅持到底。不過，恰好是因為他不能堅持原則，他反而能夠保全自己的性命。

此時期，對我的命令和選擇左右了我的生死。我原本願意參與的部隊，走到壟溝時卻全被殲滅了。我反而因為部隊安排，成為光州突擊小組的政治負責人，而才能保全我的性命。⁶⁷

他回憶說，在出生入死的游擊隊活動中，自己克服了對於「死亡」的觀念性理解。「開槍打死父母的人」和投降的游擊隊遭受槍斃處決等故事，就是理解朴玄採如此回憶的重要背景。

這時期，在那個村落，我們和谷城郡三岐面地區的面黨（「面」為行政單位）在一起。他們當中，副委員長因為是開槍打死父母的人物，所以受到我們的關注。我原本也以為他是一個很壞的人。為了確認事實，我想見他。有一次，我為了認識他，就不參加串連活動，反而去見他了。結果，我發現，他只能否定父母，是因為他對父母有深厚的愛。我透過與他的對話，了解到他們的真情，同時我認為，他們不得不這麼做的狀況是需要被理解的，並自覺了過去我對他們的理解是觀念性的。⁶⁸

65 同前引註，頁四五。

66 同前引註，頁五八。

67 同前引註，頁五九。

68 同前引註，頁四七。

我們政治部的設想是，雖然讓他〔投降的游擊隊員〕成為群眾討論的對象，但是希望最後結論是饒他一命。但是，投降本身刺激了隊員們的尊嚴，而在討論過程中一味保全自己性命的態度，也挑釁了我們隊員們的尊嚴，這就讓隊員們激憤起來，結果隊員們主張和實行槍斃。狀況變成誰都不能主張救命。司令官金鎔吉〔김용길，音譯〕同志在他被處決之後，哭泣著說，他的死亡不是因為他本人的罪狀，而是因為我們困難的狀況和力量的不足，這句話也讓我們哭泣起來。⁶⁹

之後，朴玄採們等待的解放，並沒有擴張到南方，反而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六日，首爾再度被韓國國軍所「收復」了。接下來，南韓右翼對左翼的圍剿，越來越強烈。朴玄採將此時期命名為「過渡期狀況」。組織內部也已經感覺到不久後將面臨潰滅。但是，朴玄採在此過程中，卻得到某種問題的「解決」：

日落時，許多同志們散開，在角落流眼淚，嗚咽起來。這已經變成日常生活了。雖然我不迴避如此狀況，但互相明確知道彼此的狀況，並讓開位置，就成為一般的慣例。此時，我認為，這樣的態度是因為迴避命運性死亡而悲哀起來的。但是我不以正式的方式提出問題，而是以私人方式，提出討論。當時我的態度是：我們對祖國的義務，以死亡的方式被賦予我們，那麼，現在我們應該接受它，完成我們對祖國的義務，並且以欣悅來果斷地把

自己獻身於祖國。從今日的角度來看，因為他們也有家人，因此可以被理解，但是欣悅果斷地獻身祖國才是為祖國而戰鬥的，也是我們生活的走向，這個事實並沒有改變的。這時期，我遭遇許多同僚們的苦惱，很難撐得住自己。而這些問題在許多同僚們的死亡和轉變中，得到解決了。⁷⁰

有趣的是，朴玄採在游擊隊活動中，一方面克服了對於死亡的觀念性理解，另一方面獲得了對於官僚主義作風的問題意識。這兩者往往成為矛盾關係，因為對於死亡的觀念性理解，也牽涉到對於暴力的觀念性理解。不過，朴玄採面對著現實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所發生的暴力，理解到在一定程度上暴力的不可避免性，但是此時期，他同時也開始思考，如何盡量防止那些暴力，成為官僚主義的產物？對朴玄採來說，官僚主義是一種「個人私有」和「世俗化」的東西。尤其，朴玄採在介紹他與北朝鮮出身政治委員之間，產生的爭議時，他的表述格外模糊。

政治委員姜學求（강학수，音譯）同志與我之間的矛盾，起因於我過度原則性而不成熟的作風。作為政治工作人員的我，從初期開始就一直在部隊裡成長。但是，政治委員與我的關係

69 同前引註，頁五二—五三。

70 同前引註，頁五三—五四。

並不是那麼圓滿的，正因為在北朝鮮曾任面黨副委員長的政治委員具有官僚作風，但我一向不被影響，反而從早期開始就企圖克服此作風。這兩者互相抵觸並形成矛盾了。⁷¹

朴玄採一方面批評自己的「過度原則性而不成熟的作風」，但同時又提出官僚作風與欲克服官僚作風的自己的作風，揭示了兩個作風之間的矛盾。朴玄採提出這樣的問題，似乎批判著當時北朝鮮在合法狀況下出現的官僚作風，但是他同時批判自己的過於「原則性」的問題。他提出的問題之所以這麼模糊和複雜，是為了什麼呢？我認為，朴玄採的目的不在於提出北朝鮮的官僚作風，而是提出一個新課題。也就是說，朝鮮於一九四五年在形式上獨立之後，北邊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與南邊產生落差，在此狀況下，他再提出一個新問題：南邊和北邊在南韓社會變革問題上，出現的認識差異和兩者關係上的問題，要如何得到解決？接著，朴玄採的回憶錄這麼說道：

我在我們部隊編制中占有重要位置，所以我認為，我需要打造新作風。因此我企圖以我的作風，形成相互關係。當時我在事業的執行過程中，不要擁有個人主義式的，同時也不讓人擁有與自己職位有關的那種關係。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我努力不擁有任何個人的私有。〔……〕即便我是上級指揮官，有關於我自己事業的執行，我完全沒有形成任何私人間的交易關係。在合法時期世俗化的人們中生活，並在被官僚作風所沾染的政治委員眼中，我這樣的

態度只能被看作是不禮貌的。因此政治委員公開表現出對我的不滿，並在所有方面提出對我的批判。〔……〕這些狀況反映在當我擔任二大隊政治指導員時，在政治部離任待命的時候，他們對我的態度上。⁷²（粗體字強調為本文作者所加）

在此，我們可以知道，朴玄採在少年游擊隊時期，已經抱著對於「私人所有」的強烈問題意識。朴玄採這樣的問題意識，似乎延續到內戰結束後革命不可能的時期，形成了知識分子朴玄採的獨特實踐方式。

朴玄採於一九五一年八月的戰鬥中，腹部被子彈打穿，但幸好後來恢復良好，持續參加游擊活動。據說，他最後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下山時被捕，但由於父母的安排和努力，讓他得以釋放出來。⁷³之後，朴玄採心中抱著一九五〇年九月至一九五二年八月這兩年的游擊隊體驗，再度變回高中生，比起同年齡的同學，晚兩年考入首爾大學經濟系。他於一九六一年於同校碩士畢業之後，成為南韓少數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兼評論家。而朴玄採的回憶錄，因為病情惡化而至此結束。回憶錄的最後一段是對於一九五一年冬季的困難之描述：

71 同前引註，頁六二—六三。

72 同前引註，頁六三。

73 參見【韓】〈朴玄採年譜〉，引自《朴玄採全集·第七卷》（同前引註32），頁七一。一般對此狀況的說明，是朴玄採家譜屬於偏向左翼的地主，而在戰後南韓軍警系統仍然腐敗的狀況下，他的父母可以用金錢方式拯救朴玄採的性命。

一九五一年冬季，我們遭遇敵人的冬季攻勢，常常得在路邊睡覺。有一次，我們走在無等山後邊，後來就在路邊松樹下荒地上露營。此時我們各自有一張毛毯，所以幾個人成為一組，下面鋪了一張，然後幾個人一起蓋上幾張毛毯。我們就這樣睡覺了。因為此時下起雪，夜晚醒過來才發現，周圍都被雪覆蓋了，站著的只有一個哨兵。這樣睡覺的時候，中間醒來再入睡，是極為痛苦的。後來有些人無法再忍受痛苦並投降，不過對現在的我來說，那樣的苦痛還是可以理解的。⁷⁴

日後以朴玄採的這些體驗為主要題材而撰寫小說《太白山脈》的趙廷來，回憶了他與朴玄採一起進行實地調查的過程：

到了現場，該不是就會想起當時經歷的事情嗎？記憶就是這樣。那時候，他邊講話，邊含淚，也會哽咽。他到了智異山，大聲痛哭了。不就是嗎。他親眼目睹了許多人在那裡死去。歲月這麼無情地過去，過了四、五十年後的今日，他再回到那個地方，應該感慨萬千，也有傷感或悔恨，這些感情就這樣湧了出來。⁷⁵

如何歷史化一九八〇年代？

朴玄採在一九四〇年代末動盪的情勢之下，以獨特的人際關係網絡為契機，長成了早熟的少年。尤其是作為左翼少年，他積極參與「內戰」，因此形成了他後來思想實踐的原型動機。從中值得關注的是朴玄採提出的一種「主體性矛盾」：在形式性分斷下，準備迎接「解放」的南邊左翼所遭遇的問題，正是朴玄採所屬於的「南朝鮮勞動黨」的主體性問題。結果，大多數的朴玄採們都越過分界線而到北朝鮮去（所謂「越北」），而少數留下來成為游擊隊，在山上戰鬥到死。

朴玄採雖然經歷了「解放」，但因為外部勢力的介入，內戰開始複雜化而以停戰／分斷方式結束，結果，他在「南韓」只能接受了作為「倖存者」的命運。他的回憶錄最突出的一點是暴力和死亡，而這些文字，雖然沒有完成，但正是他在面臨自己的死亡之際寫出來的。朴玄採自己認為，透過游擊隊經驗，克服了對於「死亡」的觀念性理解，同時藉由他自己與「已解放」的北朝鮮的關係，提出了官僚主義作風問題。如此一來，他超越了「左翼」而發展出去殖民／去現代的、針對「所有」的問題意識。

對台灣的陳映真來說，從殖民地（一八九五年）到半殖民地（一九四五年）再到新殖民地（一九四九年），雖然因國共內戰而有若干地理範圍的調整，但台灣的「新殖民」大體上意味著「台灣」作為同一地理單位的新轉型，因此「去新殖民」成為原本的「去殖民」之延續性課題。在如此脈絡

74 引自【韓】朴玄採的〈親筆回憶錄〉（同前引註1），頁六四。

75 引自【韓】趙廷來受訪的〈KBS 人物現代史：為民眾的經濟學——朴玄採〉（同前引註32），頁三七五。

下，陳映真認識到且提出「回歸中國」這麼一個復原「主體性」的持續性課題。相對來說，朝鮮的分斷之於南韓，是先有日本戰敗而經由形式分斷和內戰，進而得以鞏固化的。對朴玄埰這麼一位在南韓積極參與「內戰」的人，就有了原有的「主體性」被剝奪的意味。

朴玄埰事實上傳承了「南朝鮮勞動黨」的主體性。不過，他在南韓的「倖存」，就意味著，在分斷和新殖民的現實條件下，作為知識階級的他站在尚未「解放」的南韓民眾一邊，一起努力參與歷史課題的實現。因此，南韓的民眾對朴玄埰而言，成為歷史性和現實性的基礎。而且，延續著的殖民地歷史和現實，成為知識分子朴玄埰的研究對象，因此他能夠超越冷戰結構性的左右認識，掌握「新殖民性」而深化批判性認識。

再者，群眾層次進行的內戰引發的極端暴力，在「新殖民體制」下，以不同形式持續下來。尤其，在南韓的內戰過程與結果，一方面形成了買辦地主和資本家與新殖民菁英互相結合而成的、反共主義同質性極為強烈的支配階級，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更為擴大的同質性民眾構成。兩者之間的矛盾將會越來越激化。從此脈絡，我們可以解釋朝鮮戰爭停戰後，新殖民體制在南韓社會中的持續性和動態性。

如前所述，朴玄埰認識到知識／思想的新殖民性和去歷史性問題，而展開論戰，同時關注文學的角色——這恰好發生在一九八〇年代。事實上，經過內戰形成的新殖民／分斷體制，既是朴玄埰思想實踐的背景，也是制約他的條件。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思想解放空間中，雖然朴玄埰堅持長遠的歷史繼承性，但是他的思想實踐處於困境當中，主要是因為新殖民體制培養出的新知識主

體與朴玄採不和所形成的緊張關係。⁷⁶因此，我們為了加以問題化「思想斷裂」，首先需要確認的是，圍繞著「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困境」的具體緊張和矛盾。同時，我們透過對於一九八〇年代思想運動的歷史化，將重新考察朴玄採如何基於陳映真所講的「歷史的整合」觀點，試圖認識「新殖民性」，並進行有關的思想實踐。

奉請

76 與朴玄採關係密切的民族經濟論陣營的經濟學者鄭允炯(정윤형, 一九三七—一九九九)回顧：「朴玄採回顧，從青少年時期的組織活動體會到了，在尚未冷靜評估客觀條件或變革主體的能力之前，若走上冒險主義或極左活動，將對運動產生多麼惡劣的後果」，參見【韓】鄭允炯的〈民族經濟論的歷史性展開〉，引自《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鄭允炯、全哲煥、金錦守等著，首爾：創作與批評，一九九五)，頁三。

灌浴

一九八〇年代與後冷戰轉型的悖論——

「社會性質論戰」

前一章〈奉請〉中，初步介紹了分別位居台灣和南韓的當代歷史中間物之陳映真和朴玄採的思想特徵，並探討陳映真的文學實踐對於南韓的參照意義。本章〈灌浴〉進一步以陳映真在一九八〇年代「思想的貧困」問題意識為參照視野，並以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知識思想界內，既規模龐大又爭議劇烈的「社會形態／社會性質論戰」為線索，試圖考察朴玄採思想實踐所遭遇的困惑。尤其在面對冷戰動搖的局勢和後冷戰的到來之際，一九八〇年代的南韓知識思想界該當如何應付，便成為探討的核心問題。而相對於南韓，台灣經歷了保釣運動、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二年與日本斷交，以及一九七九年與美國斷交等事件，相對直接地處於冷戰體系的動搖之中。當台灣的一九七〇年代已經形成了彰顯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等關於歷史主體性的有關論述空間，南韓卻延續了自一九六〇年代起否定傳統而與歷史斷裂的思想趨勢，到一九八〇年代甚至以更激進的方式日益深化下去。這也就成為陳映真和朴玄採形成不同問題意識的背景。我對此章的期待，在於它能夠處理並跨越加諸於朴玄採的許多扭曲和誤解。亦即，〈灌浴〉試圖重新呈現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真正想要提出的「思想的斷裂」此一問題，更清楚地揭示南韓當代思想史中所需要省思的核心問題所在。

為何反思南韓社會性質論戰？

韓半島因日本戰敗而於一九四五年獲得「解放」；緊接著，韓半島處於美國和蘇聯的軍事管

理下，而圍繞去殖民的主體和方法所出現的內部矛盾激烈化並引發內戰；又因為反映冷戰體制矛盾的外部勢力的介入，韓半島的形式分斷轉變為實質分斷。雖然本研究將一九四八年南邊和北邊分別成立單邊政府視為「形式分斷」，但是就如一九四八年濟州島發生的「四·三抗爭」明確證明的，支配階級動用武力鎮壓自下而上的去殖民運動，讓形式分斷得以成立。不過，經由暴力性過程而成立的南邊和北邊的政權，經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的內戰，分別在南邊和北邊形成了既互相異質、但各自內部又具有同質性意識形態構成的國家和社會體制，而這就是所謂「分斷體制」¹形成的基礎。歷史就這麼進入了「實質分斷」的時期。此時期的特徵在於，藉由分斷體制的運作，體制間形成敵對性共生的關係，進而確保雙方的某種結構自主性。然而，歷史性地傳承下來的經濟、文化、地理和感性方面，從未分斷成南邊和北邊。因此，被強迫的分斷，與被強迫的殖民一樣，只不過是自上而下的被賦予而已，這樣的「被賦予」不被民眾所直接吸收，反而成為民眾所抵制和抵抗的對象。於是，雖然因時勢變化而有所起伏，但南韓社會一向存在著民族主義式的統一要求，至今仍是如此。

在二十世紀中期左右，也就是分斷體制形成的過程中，南韓單邊政權的第一屆總統李承晚，用選舉作弊的方式，試圖克服政權正當性的局限。一九六〇年「四·一九革命」就是對此行為的

1 參見白永瑞、陳光興編(二〇一〇)《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台北:聯經)。Paik, Nak-chung. (2011). *Division*

抵抗。雖然一九六一年的「五·一六軍事政變」讓四·一九革命成為「未完成的革命」，但一九六〇年的抵抗和犧牲，證明了去殖民的民族主義需求仍然健在。而這就是四·一九革命的歷史意義所在。

但是，隨之而來的以朴正熙(박정희)為中心的軍事政變勢力，統治南韓長達十九年，並在二十世紀後半的韓半島南邊的歷史上，刻印著「軍事獨裁」的陰影。不過，此時期也包含著不能簡單用「十九年的軍事獨裁」來概括朴正熙統治的種種重要變化。首先，「發展主義」現代化路線深化了經濟的對外依賴和物質生活的結構性變化，並且形成了被高度經濟成長排除在外的廣大民眾。²另一方面，起源於且移植自美國的新殖民學術和知識積累機制得以建制化；同時，隨著資本主義化的擴張，大眾消費文化也開始形成，而這又可視為「新殖民」文化形成的基礎。這些方面都具體顯示南韓的依賴性，而依賴性的國家和社會構成本身，必然包含去歷史性且缺乏正當性。結果，在冷戰體系動搖的狀況之下，南韓在其局限和矛盾與區域和國際局勢的變化相結合的情況下，首先孕育了一九七九年暗殺位居權力上層的總統朴正熙之事件，然後是在民間主體性抗爭力量湧現中發生的一九七九年釜馬抗爭³以及一九八〇年光州抗爭。

若說一九六〇年「四·一九革命」這麼一個未完成的「革命」打開了一九六〇年代，那麼，一九八〇年「五·一八光州抗爭」這麼一個「悲劇」，打開了一九八〇年代的歷史。一九六〇年的「革命」帶來了親美和新殖民政權的崩解，因此我們可以說，透過犧牲而表現出來的民族要求，獲得了部分成果。但，如同一九六一年的「五·一六軍事政變」所證明的，這些成果在新殖民／分斷

下仍然薄弱，因而隨時都可以被逆轉。而一九八〇年的「悲劇」事件則證明，在情勢認識力量和抗爭組織層次上，都無法期待一九六〇年的政權顛覆，也就是說，民間主體力量與上層權力之間，力量的差距非常顯著。因此，一九八〇年光州慘案對民眾民族勢力來說，意味著以「悲劇」為契機的「覺醒」。

另一方面，深受一九八〇年代南韓思想理論運動影響的陳映真，於一九九二年撰寫了《台灣政治經濟學叢刊》的〈出版贅言〉。在此文中，他參考一九八〇年代的南韓經驗，提出台灣「社會性質論」的必要性。

生活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中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責任之一，應該是透過正確掌握該社會所以構成和發展的一般原理、以及為該社會獨特的歷史和外在（國際）環境所規定的條件，從而解明該社會全體的性質和形態。社會科學家的這樣一種對自己所處的社會之自我認識或者

2 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面對工廠勞動的過度剝削問題，以自焚方式表示抗議的全泰壹（전태일）事件。而這個打開一九七〇年代的事件，引發了一九七〇年代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的覺醒以及社會參與。

3 釜馬抗爭是指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南韓東南部大城市釜山和馬山地區發生的反對朴正熙「維新」憲法體制的群眾抗爭。一九七〇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和南韓的外債危機，亦是此抗爭的經濟性背景。朴正熙政權以戒嚴令對付此抗爭。不過，因為十月二十六日朴正熙被暗殺，釜馬抗爭暫時平息，但是在根本矛盾尚未暴露和解決的狀況下，潛在化的矛盾進而孕育了一九八〇年五月的光州慘案。

再認識的營為——即經由對當面階級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獨特性質或水平的把握，去探討當面社會相應的生產關係的獨特性質，從而自一定生產關係中的下層建築與上層建築的性質、內容、特質和相互關係，科學地、全面地理解我們自己社會之整體的性質、形態和發展階段，並且明確地把握我們社會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中所存在的各種矛盾的核心和性質，從而進一步找到克服和揚棄這些矛盾，使我們的社會取得進一步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的方向與力量。

因此，現代各國家和民族的社會科學家以及革命·變革運動的理論家，都會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以比較廣泛的共同討論和爭論的方式，進行過或者正在進行著圍繞著上述諸問題之自我認識的理論與學術探索。一九三〇年代在中國北伐革命受挫後發生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分別在二〇年代末和六〇年代初先後兩次、日本學界與社會運動界進行過「日本資本主義（性質）論爭」；一九八〇年五月光州慘案後不久，從韓國民主化鬥爭運動圈展開，而向韓國社會科學界擴大，至今爭論的深度、廣度不斷深化、理論收穫豐碩的「韓國社會構造體論爭」，都是著名的例子。⁴

雖然陳映真在列舉了「中國社會史論戰」和日本「資本主義（性質）論戰」之後，才介紹南韓的所謂「社會構造體論戰」（後文皆譯為「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論戰」），不過，他之所以提出台灣社會性質論的必要性，直接的主要背景因素是由於南韓一九八〇年代動盪中出現的思想和理論工作的活躍，帶給陳映真的衝擊。⁵而且，如同陳映真所提及的，南韓社會形態論戰的深化，可

視為思想界對一九八〇年光州慘案所促發的民主化運動要求之回應。不過，「光州慘案」的歷史性沒有得到思想性闡明，反而經過許多曲折，結果得到「五·一八光州民主化運動」的名稱，並成為國家紀念日。這個命名過程顯示的是，光州抗爭一開始被貶低而命名為「光州事態」因而遭受民間運動的抵抗，造成最終以「民主化」和「運動」結合的方式，得以正名。如此「慘案」轉型為「民主化運動」，似乎暗示著圍繞著「平反」的複雜較量中，歷史性如何被犧牲。那麼，思想方面是否進行過類似的、犧牲「歷史」的「平反」？

一九八五年十月，《創作與批評》收錄朴玄採〈關於現代韓國社會的性質與發展階段的研究（I）〉和李大根〈關於韓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兩篇文章構成一組，將爭論焦點加以具體化，並直接促發了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社會形態論戰，⁶歷經複雜過程，此論戰大約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才

4 參見人間出版社編輯部編（一九九二）《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系列1：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的〈出版贅言〉。

5 在《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出版前，陳映真發行過《人間》雜誌（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九年九月）。此時期，他親自訪問過南韓，並在《人間》雜誌上發表不少他在南韓進行過的訪談，並寫了相關報導。參見《人間》第四十四期（一九八九年六月號），頁九八—一五五。

6 《創作與批評》（창작과 비평）原為季刊，於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五十六期後被強迫停刊，至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日，才出版不定期第一期（第五十七期）。朴玄採和李大根的兩篇文章即收錄在第五十七期的「韓國資本主義論爭」專題中，因此《創作與批評》於同年十二月九日遭受取消出版社註冊處分。對於此一企劃，朴玄採的回顧如下：「那篇文章以對依賴理論的具有意圖的批判為目的。其間我國因為有許多制約，所以政治經濟學研究不能活躍起來，而且依賴理論在如

結束。但是，與當初《創批》企劃意圖不同，論戰過程反而形成了階級矛盾中心論和民族矛盾中心論的二元對立格局，並且這仍然內在地銘刻著二十一世紀當今南韓進步左翼陣營。

雖然我們不能說一九九〇年代沒有理論的分化和發展，但事實上，知識思想界的潮流遭遇到「後冷戰」的衝擊，無法再形成與現實實踐的互動關係，反而走上脫離現實之路。因此，雖然是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之後展開，「社會形態論戰」的意義在於，它是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在南韓與現實運動仍保持密切關係的條件下，形成了歷史性復原契機的初次同時也是最後的論戰；然而，這個論戰卻不能承擔歷史的重負，因而失去重心並迷失方向。因此，對於這個論戰，我們需要抱著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態度。

光州五·一八與「民眾論」的悖論

延續本書〈戲台〉一章所提出的問題意識，此章試圖克服「光州起源論」式的斷裂性歷史認識，而將「五·一八光州慘案」放在殖民、新殖民、冷戰和分斷所構成的整體二十世紀脈絡上，並透過重新訪問一九八〇年代思想潮流中作為歷史中間物的朴玄採思想實踐，以揭示一九八〇年代思想狀況的矛盾和癥候。同時，為了掌握朴玄採思想實踐的意義和矛盾，本研究採取以陳映真作為參照視野的方法。不過，在我們正式進入討論之前，需要概括性地說明一九八〇年代南韓思想界的背景，包括「五·一八光州慘案」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歷史意義，以及民眾在理論和現實中

的興起之矛盾等。

一九八〇年「光州慘案」與思想運動的主體性問題

光州抗爭給社會批判勢力帶來了一個衝擊，因此，社會批判勢力擺脫過去既抽象又樸素的民眾論，而迫切感受到了關注具體資本主義發展，從而基於科學分析打造運動主體的變革理論的必要性。從此，「一九八〇年代」這麼一個社會運動的時空才開始開放了。韓國戰爭後，被消滅的馬克思主義也復活起來，而分析韓國社會形態的社會形態論戰也展開了。進而，基於如此分析結果，按照優先變革課題，形成了以北韓主體思想為先例的「民族解放」和以俄羅斯列寧主義為模式的「民眾民主」這兩個派別。事實上，強調以北韓中心的統一論之民族解放派，將現成的民眾論理解為民族論（作為民族核心的民眾），另一方面，提倡南

此空白期，乘機得以廣泛一般化了。也就是說，依賴理論在早期的過渡期正面因素被發現之後，此時出現了進一步重視依賴理論的風潮，最後甚至也形成了將依賴理論當成認識整體問題的架構之風潮。（……）那篇文章，不單純是我的單向理論展開，而是為了已設定好的，與李大根氏的論戰而寫的。當然李大根氏並沒有事前跟我說他要怎麼寫。我也沒有事前跟他說我要怎麼寫。但是，他站在擁護依賴理論的立場，我站在批判依賴理論的立場，是早就定好的，參見【韓】朴玄塚和鄭民對談的〈民族經濟論——闡明民族民主運動的經濟基礎〉，引自《現階段·第一集》（蔣尚煥等著，首爾：Hanul，一九八七），頁四一二。

韓單邊變革論的民眾民主派，則把民眾論與階級論接合起來，改變成以工人階級為中心的階級同盟論（作為民眾核心的工人階級）。⁷

這一段落的敘述基本上採取事後追溯的典型格局，也就是將民族解放派和民眾民主派這麼一個後來形成的格局，視為通過一個正常分化過程的結果，因此並沒有審視從中存在的斷裂或扭曲面向。不過這種敘述方式仍然是一個材料，讓我們知道後來的學術研究場域，如何透過社會形態論戰與光州抗爭的關係下，認識和記憶這場論戰的意義。換句話說，光州抗爭對南韓的知識思想界，是一個「衝擊」，同時也是一個覺醒的契機，從此形成了一九八〇年代大規模的思想和理論戰的格局。雖然局限難免，但在與現實社會運動空間的互動下，當時的南韓知識思想界還顯示了更激進化的趨勢。

不過，實際狀況的展開卻出乎意料地複雜。如同本書〈戲台〉一章所論及，作為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南韓學術運動核心組織者的社會學者金晉均，批判過當時社會科學界的缺乏主體性，因而試圖從「文學」和「經濟」領域尋找革新社會科學的契機。當然，主流文學和主流經濟學仍然沒有克服殖民主義的依賴性和冷戰局限，但是至少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成為批判思想的經濟學基礎之「民族（自立）經濟論」，以及於一九七〇年代積極思考「分斷」問題的「民族文學論」，對社會科學提供了重要的反思契機。

尤其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思想省思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社會科學方面曾經於一九六〇至一九

七〇年代，將「第三世界」當作一種迂迴的途徑，因為「第三世界」一方面成為批判現成「現代化理論」的理論工具，同時另一方面，「依賴理論」或「世界體系論」等某些第三世界理論所具有的局限，又成為另一個轉型的契機。如金晉均解釋，在一九八〇年代的轉型中，第三世界只不過是一個迂迴之路：

如此第三世界論的視角，成為一個知識工具，得以分析一九八〇年代韓國社會中全面化的負面面向，因而獲得了廣泛的共識。不過，我們接受第三世界論視角的過程，沒有具備深刻的認識，包括它與韓國社會現實的距離、韓國社會變動的歷史過程（尤其解放和分斷的性質）、韓國社會資本主義化的本質以及後果（尤其階級關係變化）。因此，當我們漸漸誠實地掌握了韓國社會各種問題的本質性認識，我們因此將我們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半期認識第三世界論的面貌，定位成我們都該經歷過的知識性迂迴。我們現在之所以說它是一個迂迴，是因為比起一九八〇年代前半期，我們更加深化了自己的認識，而且我們可以用更直接的語言來談我們的問題。⁸

7 參見【韓】金廷翰的〈五·一八光州抗爭以後，社會運動意識形態的變化〉，引自《民主主義與人權》第十卷第二期（二〇一〇年八月），頁一七五—一七六。

8 參見【韓】金晉均（一九八六）《第三世界和韓國的社會學——現代韓國社會論》（首爾：石枕）的〈寫在前面〉，引自頁七—八。

金晉均的概括就顯示了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南韓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在於克服一九八〇年代前半期將「第二世界論（包括依賴理論）」當成「迂迴之路」的初期狀態，進而走向更具「主體性」的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雖然如此，如我們後面所分析，實際的展開似乎是充滿矛盾的。

以一九八〇年「光州慘案」為契機，南韓社會科學掌握了作為歷史範疇的「殖民」和「分斷」。隨後的一九八〇年代出現龐大的理論思潮和論戰，因而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時代」。不過，雖然白樂晴等人積極提出民族文學論所關注的「分斷」矛盾，⁹但當時並未有效地介入論戰，反而等到一九九〇年代，經過白樂晴的理論化，「分斷體制論」得以成立。相反的，「民族經濟論」在一九八〇年代提出的「殖民性」和「資本主義」問題，超越了論戰促發者朴玄採的預料，引起了廣泛的反響，造成理論論戰與社會運動互相產生作用的結果，最後並出現了自我發展和擴大再生產的趨勢。論戰促發者朴玄採卻批判論戰過程本身的「理論主義」，¹⁰而論戰實際的展開過程，也把朴玄採排除在外，並將他孤立起來。正因為以「新」的歐美理論思潮武裝起來的年輕一代，也就是大約二十多歲或三十多歲的年輕研究者，在此時大規模的出現，形成了朴玄採們無法介入的複雜和激烈的論戰情形。¹¹

不過，一九九〇年前後「後冷戰」的具體展開，對當時迷戀革命論的南韓知識思想界來說，是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東歐社會主義的動搖和崩解作為後冷戰的一種表現，也給南韓思想界帶來衝擊，結果，許多自稱或他稱的左翼知識分子開始拋棄「社會主義」，踏上某種「轉向」之路，包括沉潛於純粹馬克思主義理論、朝向「後學」的逃走、投降於制度／形式民主主義（所謂

「議會主義」等。不過，嚴格來講，促發如此轉向的「後冷戰」，畢竟是「外部」因素，因此，這個衝擊所引起的「轉向」也是非主體性的。或許這是過於冷酷的批判，但是正確地講，南韓的「後冷戰」局面，並不是透過主體性努力而得到的，反而是藉著「外部」所賦予的，因此，如此的外部因素卻帶來這麼龐大的轉向，似乎就證明了那些「轉向主體」本身的歷史輕浮性。

歷史的輕浮性來自於歷史斷裂之因。與歷史斷裂的知識，就像暫時的「流行」一樣，經過短暫循環之後，只能留下某種無力感，而後在歷史中消失。即便知識分子試圖回應「光州」對他們的要求，但知識分子的努力是否封閉地將「光州」固定於一九八〇年這麼一個脫離歷史軸線的時點，因而最後背離了「光州」抗爭真正的歷史要求呢？如果是，我們不能把光州當成一個起源或目的，反而需要把它視為一個歷史性事件。

9 當時社會科學界回應分斷矛盾的代表性文獻，參見【韓】金晉均、曹喜昞的〈關於分斷與社會狀況的相關性——為了分斷的社會政治性範疇化之試論〉，收錄於《分斷時代與韓國社會》（邊衡尹等著，首爾：喜鵲，一九八五）。

10 朴玄採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座談中，說道：「我國理論的過度觀念化狀況之所以依賴於分派利益，是因為他們實際上並不參與社會實踐場域，即他們帶著某種知識分子的傲慢，而將理論性遊戲，視為參與社會實踐的行為（……）我認為，理論的觀念化以及如此更高層次理論所造成的派別化現象，是利己地投合民主化這麼一個現實狀況，且謀求自我安慰的部分知識分子的手段」，參見【韓】朴玄採、法性（法號）、金昌鎬的〈座談：社會實踐中思想的問題〉，引自《朴玄採全集·第一卷》（朴玄採全集發刊委員會編，首爾：Haemil，二〇〇六），頁八四二、八四八。

11 有趣的是，此論戰後來由論戰促發者朴玄採和觀察者曹喜昞，系統地整理成【韓】《韓國社會形態論戰·I-IV》（首爾：竹山，一九八九—一九九二）。

「主體」的「民眾」之興起與去歷史化

一九八〇年的光州事件所促發的知識思想界論戰，產生了各種「民眾論」互相競逐的狀況。一九八〇年代，有關於「民眾」的各種論述，基本上是以對主客觀條件的新認識為契機，提出變革主體形成的問題。因此，從客觀面向來講，分斷以後深化的「資本主義發展」需要被分析，而從主體面向來講，經過一九八〇年的光州慘案而確認的主體力量薄弱的狀況，則需要被問題化。面對這些課題，知識思想界同時思考著資本主義分析和主體形成路徑，因此，朴玄採戰後期間，在歷史繼承的脈絡下，他藉著其積累的相關研究成果而提出的思想課題，自然得到廣泛和公開的關注。因為於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期間，在南韓傳播批判性知識和思想的知识分子當中，直接繼承殖民時期和殖民之後的批判思想體系，進而對新殖民條件進行「科學」分析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幾乎只有朴玄採一人。

有趣的是，「民族經濟論」以「新殖民性」或「半殖民性」，闡明南韓的歷史性社會性質，進而以「社會形態」概念，提出「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麼一個資本主義階段的設定。此時，部分「社會學界」關注後者設定，努力實證符合「資本主義」的階級階層變化（即「資本—薪資勞動」關係的穩定化），以反駁依賴理論其中一種「邊陲資本主義論」的立論（即「龐大的非正式部分」）。¹²另外，部分「經濟學界」試圖克服朴玄採的「封建派因素」，而批判地傳承「資本主義批判」的朴玄採的馬克思主義思想。¹³而且，這些社會科學的企圖，後來成為「民眾

民主派」分立的重要理論資源。在此過程中，朴玄埰透過「新殖民性」或「半殖民性」所呈現的「民族性」（所謂「民族生活模式」）這麼一個歷史地理多元主義的取向，自然就消失了。「民族經濟論」如此的命運，確實很能說明歷史中間物朴玄埰的困惑。

事實上，這些社會科學界的努力，集中在證明南韓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同時提出了作為階級中心主體範疇的「民眾」。在此論述中，「新殖民」或「半殖民」就成為外部因素，或者甚至被設定為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因此透過原本「半封建」分析到的具體的內在、主體改革對象，突然間消失，而且整體理論被化約為「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同時，雖然仍舊使用「民眾」作為主體範疇，但「民眾」已經變成「階級中心」的抽象概念。相對來說，我們將不同於如此證明資本主義性質且強調民族矛盾的潮流，稱為「民族解放派」，不過，這一派的理論和視角基本上奠基於「北朝鮮」這麼一個歷史內部和現實外部，因此至少在理論思想層次，它與證明資本主義的潮流與派別，無法形成對稱的關係。如果把討論對象聚焦於民眾民主派，那麼如此民眾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格局，基本上可視為由民眾民主將理論上不能對稱的思想潮流從理論場域拉過來，並形

12 參見【韓】徐寬模（一九八四）《現代韓國社會的階級構成與階級分化》（首爾：Hanul）。

13 參見【韓】李炳天、尹邵榮的〈戰後韓國經濟學研究的動向和課題——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收錄於《八〇年代韓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現階段和展望》（首爾：歷史批評社，一九八八）。在論文發表後，尹邵榮（윤소영）對於弘益大學鄭允炯（정윤형）教授的提問，如下回答：「我認為，朴玄埰先生雖然把民族經濟論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結合起來，但是否沒有完全清理掉過去封建派的殘餘？」（頁七四）

成假想的對稱關係。從中，民族解放路線的思想，僅僅成了一個理論主義他者化和本質化的對象而已。¹⁴

事實上，一九八〇年代在南韓重新被關注的「光復」以及之後在北朝鮮發展起來的「民族解放」思想的意義，在於其能成為接近作為歷史內部的（北）朝鮮的迂迴之路；不過，因為它並不具備直接切入南韓現實的環節，我們只能視之為再發現或再詮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是當時仍然存在的「反共主義」體制，制約了此討論的公開性展開。若用朴玄塚的語言來講，當時「民眾民主」和「民族解放」的論戰格局，犯了將不同層次的議題放在平面上的錯誤。結果，以一九八〇年光州慘案為契機，努力回應社會運動需求的「社會形態論戰」，環繞著是否承認資本主義現實以及認識方法等問題而進行，論戰的主導權因此自然在於資本主義證明派。不過，這個潮流在尚未嫁接於歷史的狀況下，從資本主義、階級等理論論證，進而直接演繹出實踐和主體——這就是理論主義偏向，亦即主要透過基於理論製造假想論敵的方式，促進了論戰的擴大再生產，但實質上深化了與群眾和現實的脫離。

這一部分的社會科學論述，基本上可視為將「歷史性」和「民族性」排除在外的思想潮流。結果，經過了一九八〇年代後期，這些排除「民族」的理論取向，造成了理論脫離現實和運動的問題。不過，雖然出現這樣子的「脫離」，但是基於以「觀念性」和「激進性」為特徵的學生運動勢力和新世代理論家力量，此時的知識潮流造就了更為激烈的學術論戰和分化，最終獲得了某種「過度的代表性」。歷經此過程，不具有「民族」的「民眾民主」，背離了真正的「民眾」，在現實中完成

了以普遍範疇的階級為中心的歷史平面化。而在此一歷史性特定條件被消滅的「後冷戰」時期，一九八〇年代因民眾的興起而暫時潛伏的「市民」概念，重新在主體理論的某個角落浮現出來。¹⁵

早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民眾」一向與「民族」和「民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但這些範疇之間的關係，僅只是透過與實踐結合的形式表現出來。等到一九八〇年代，當「民族」被外在化或否定之後，「民眾」雖然被看作主體，但是其內涵在資本主義的階級認識下被抽象化。這個抽象概念基本上是藉由社會學或經濟學理論演繹出來的民眾，因此成了無法參與「歷史開放性」（實踐的場域）的抽象化的民眾。也就是說，雖然社會學或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都具有馬克思主義這麼一個理論走向，但是因為它們的知識生產都以歷史斷裂為前提，終究不能確保理論的主體性，同時，它的實踐性也自然而然地變得極為薄弱。結果，缺乏歷史「民族」的民眾範疇，只能依據理論而存在，無法與實踐相結合，因此不能成為真正「民主」的主體。

14 「民族解放」和「民眾民主」的不對稱，其實也反映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學術界的發展。事實上，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民族解放」思想在學術體制內的影響力幾乎消失，而受到各種各樣「後學」影響的，廣義的「民眾民主」則在學術話語場域的持續演變和分化，變得非常突出。

15 我認為，如此市民概念復原的背景有二：第一，隨著現實社會主義的崩解，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理論重新被引進來；第二，在認識南韓社會方面，批判知識思想界開始強調「韓國」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以及國家正常化（所謂加入聯合國）這麼一個「新」條件。

民眾論的再歷史化與朴玄塚的民眾論

以一九八〇年光州慘案為契機而重新興起的「民眾」主體範疇，經歷了上述的去歷史化過程，不過如果我們從再歷史化或者歷史整合性的角度看，在南韓思想史中形成一定傳統的「民眾」概念，也可以提供闡明南韓社會特定性的線索。若我們通過區域的相互參照方法，便能夠進而發現民眾概念的實踐性內涵。首先，我們可以關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韓國民眾論的現階段》所收錄的重要參考內容。

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我們社會的學界和民族民主運動圈，都埋頭於所謂社會形態論戰。其中，一九七〇年代社會運動的水平，被批評為僅是人權階級的資產階級浪漫主義階段。接著，一種論點浮現在最前面：之後的社會運動需要擺脫簡單的反政府鬥爭的局限，走向基於科學和歷史的變革運動。此過程中，一九七〇年代在野人士的活動也受到重新評估，也表面化了運動圈的世代間矛盾。不過這不只留在世代間矛盾，更擴大成關於變革運動展望的路線矛盾，簡直走上了思想鬥爭水準。¹⁶

這段內容的時間點是一九八九年，已經是社會形態論戰或社會性質論戰經歷複雜過程而達到瓶頸期的時候。如前所述，朴玄塚也大約在此時期積極針對論戰的理論主義傾向提出批評。大約在一

九八〇年代後期，在論戰過程中被邊緣化的上一代學者，在階級和民族二元的古典對立格局下，抱著「民眾的抽象化」這麼一個問題意識，試圖重新提出與歷史整合的民眾論。

如同前述，從民眾史的角度來看，南韓的一九七〇年代可以說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全泰壹的自焚為起點。此事件給南韓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因此，即使當時處於朴正熙的軍事獨裁政權下，知識分子和學生仍然提高了關於勞動問題的關心。但是，經過一九八〇年的光州慘案後，一九七〇年代的社會運動和工人運動，就被評價為具有時代性局限。而且，圍繞如此評價的論戰，雖然從量的指標來看，具備相當大的規模，但在「質」上缺乏主體性的理論論述，後來就遭受上一代知識分子的批評。

世代間和路線間的矛盾表面化之後，取代一九七〇年代「民眾」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之間的關係，如何被闡明，就成為一九八〇年代進步學界的中心主題。而且，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課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與現成學科的一定斷裂。而且，一九八〇年代進步學界的小將學者主導此過程，結果跳躍到宣布以學術運動參與社會變革運動這麼一個學術運動聯合的層次。

16 參見【韓】金聖在於《韓國民眾論的現階段》（韓神大學第三世界文化研究所編，首爾：石枕，一九八九）一書中的〈寫在前面〉，引自頁三。

審視這一系列進步學術運動的過程，我們只能沉痛地指出，晚近社會形態論戰，雖然應該具有主體性討論結構，但是與其說是我們學界自身的歷史性，不如說是日本式討論的直接反映以及活躍化。此點恰好具體地顯示了一個悲慘現實：在學術的普遍性名義下，將擁有傳統的自主學脈加以否定的第三世界國家學術的畸形性。

我們自問，面對我國進步學界如此學脈的斷裂圖象，從哪裡尋找展望社會變革的進步學風的萌芽？民眾論興起的背景就是，在殖民地和後殖民地條件下，自主地闡明民族和階級問題之努力。如果我們沒有對如此「民眾論」進行體系化的工作，那麼今日社會形態的討論，是否不能擁有內在於我們社會的歷史性呢？以「民眾」所呈現的人類解放的最終目標中，多方面地闡明民族和階級問題，是否應該成為進步學術運動的道德基礎呢？因此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一九八〇年代社會形態論戰，應該在一九七〇年代民眾論的延長線上進行。¹⁷（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這就是透過擁有歷史性的主體範疇之「民眾」論述，重構歷史整合性，並試圖克服我國學術與知識失去「主體性」和「歷史性」的殖民性狀況之言論。具體來講，主要克服的對象，就是脫離實踐的而僅僅是以民族和階級形成靜態的論戰格局。

鄭昌烈(정창렬, 一九三七—二〇一三)在南韓被視為奠基了民眾史學的學者。從他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他與朴玄塚分享的某種共同的歷史認識。這樣的歷史認識明確地提出了民族和

民眾的歷史關聯性。首先，鄭昌烈認為：「韓國歷史圖象的重構，不能說是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韓國現實中突然被提出的。〔……〕我們發現了主體民族意識確立的歷史中，基於現實需求而出現的民眾觀點的第一事例，就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東學農民軍對於政府軍和地方軍以及民眾的如下呼籲」。鄭昌烈接著引用了東學徒的呼籲：

今年〔一八九四年〕十月開化奸黨與倭國締結，乘夜入境逼迫君父，擅恣國權，並方伯和守令均屬開化黨，非對人民撫恤，卻進行殺戮，百姓生靈塗炭之際，我們東學徒起義，消滅倭敵，控制開化，清平朝廷，安穩社稷，每次義兵到達的地方，兵丁和軍校不顧義理，與我接戰，〔……〕其實不意圖朝鮮人相戰，卻如是骨肉相戰，豈不傷心。〔……〕朝鮮人之間，雖道不同，但斥倭和斥華之其義相同，因此我用兩個字解惑，各位流傳後，若有忠君和憂國之心，

17 同前引註，頁三一四。這一段是在一九八九年八月，韓神大學第三世界文化研究所所長金聖在(김성재)所講的內容。此書的基本內容，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舉辦的論壇「奠定作為學問的韓國民眾論之大討論會」為基礎。歷史學的鄭昌烈(一九三七—二〇一三)、經濟學的朴玄採(一九三四—一九九五)、社會學的金晉均(一九三七—二〇〇四)、哲學的李俊模(이준모, 一九三五—)、神學的金昌洛(김창락, 一九三六—)和教育學的金聖在(一九四八—)所發表的文章，經過修補而編成單行本《韓國民眾論的現階段》。雖然此書的問題意識在於重構歷史圖象，即追求歷史整合性，但是其構成仍然根據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現代知識體系的學科分類模式，這就反映著新殖民學術體制的現實局限。

就歸於義理，一起商議，進行斥倭和斥華，不讓朝鮮成為倭國，終究同心合力完成大事。¹⁸

接著鄭昌烈提出如下判斷：「如此對於韓國現實的掌握中，第一次成立了民眾觀點，其主要契機就是『作為承擔民族課題的主體之民眾』這樣的認識」。也就是說，他從東學農民運動，尋找民眾論的歷史淵源。¹⁹當時，朝鮮的內部矛盾引發了東學農民運動，而關係著對於朝鮮的主導權，區域內清朝和日本國於是介入朝鮮引發衝突，結果發展成清日戰爭。此時期，「民族」和「民眾」形成密切關係，結果我們可以發現，「關係論」意義上的民族概念，以及以此為前提的主體性範疇之「民眾」概念，獲得初步形成。

但是在這些後進地區，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尚未成熟，或者說資本主義關係尚未發生，因此作為人群的民眾形成過程中，比起民族因素的作用，階級因素的作用更微小。所以現代世界Ⅱ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中，發展落後的地區形成民眾的時候，民族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換句話說，發展落後的地區之民眾的形成，與民族主義和民族運動的展開，具有非常有機的關係。²⁰

鄭昌烈認為，日據時代的史學界有著實證史學和唯物史觀，但前者缺乏民族觀點，後者則是少數，加上當時民族自覺薄弱，因此兩者都以現代主義的歷史意識為基礎，而無法成立主體的歷史

學。而光復後的史學界經過分斷和內戰，延續了殖民主義史學，但是內容上有所差別。在冷戰體制下，占有主流學術地位的史學，就是基於「現代化論」的實證主義史學。而後，以四·一九革命為契機，民族意識重新被喚醒，史學界試圖克服以「停滯論」為核心的殖民主義史觀。在這發展過程中，史學界重新照明並借鑑於日據時代申采浩（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和白南雲（一八九四—一九七九）²¹的歷史和經濟思想。

申采浩提出了作為歷史發展主體的民眾意識、作為民眾形成契機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有關認識、以民族矛盾為主要矛盾的認識，以及具社會科學和現實意義的民族革命路線之奠基等，這些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²²

18 參見【韓】全瑋準的〈告示·京軍與營兵而教示民〉，引自《東學亂記錄（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首爾：探求堂，一九七四），頁三七九—三八〇。此文為國漢並用文，因此中文譯文保留了原文的漢字。

19 參見【韓】鄭昌烈的〈民眾史學在韓國成立和展開的過程〉，引自《韓國民眾論的現階段》（同前引註16），頁一三一—一四。

20 同前引註，頁一四—一五。

21 白南雲(백남운)是北朝鮮政治家，國內派，官至教育部部長、最高人民會議議長及祖國統一民主主義戰線委員長。同時，他也是一名專門研究朝鮮半島經濟史的學者。光復後，他參與南朝鮮新民黨和民族主義民主戰線，而後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參與南北協商後去北朝鮮。

22 引自【韓】鄭昌烈的〈民眾史學在韓國成立和展開的過程〉（同前引註19），頁二〇。

有關於民族認識，白南雲所揭示的意義如下：隨著社會形態的內在發展，民眾生活過程有所變化和變動，階級關係也隨之而有所變化和變動，因此韓國民族的解放之路，與基於如此變化和變動的階級鬥爭的動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²³

我認為，從社會和現實的生活過程來看，人群是民眾，而從民族立場和民族矛盾來看，它就是民族。也就是說，民眾等同於民族，民族等同於民眾。所以，我認為，白南雲的民眾概念，與申采浩的民眾概念，幾乎互為一致。²⁴

值得注意的是，鄭昌烈在此掌握的白南雲的民族和民眾概念的內涵，幾乎是與朴玄塚的認識一致的。不過，雖然史學界有過如此這般重新照明過去思想的努力，但戰後南韓史學界對於晚期朝鮮歷史和開港期的研究，僅是片面地強調「資產階級或現代市民階級的形成和成長」，因此呈現出某種「目的論」的歷史敘述，結果造成在其中的「民眾」不被視為「主體」。我們可以用「資本主義萌芽論」來概括這個戰後史學的動向。等到一九七〇年代後期，史學界開始反思此問題，進而提出了「民眾史學論」。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史學界以及思想界展開了關於民眾史學的討論。在此過程中，社會形態論並非簡單提出「民族||民眾」的立論，而是根據新殖民狀況下民眾生活條件再生產之物質基礎的理論性分析，提出了具有「階級」概念的「民族||民眾」此一複雜立論。

那麼朴玄塚怎麼認識民眾，又怎麼看待一九八〇年代呢？《實踐文學》(실천문학)雜誌於一

九八七年所收錄的朴玄採和小說家宋基淑(송기숙, 一九三五—)的對談, 較為清楚地呈現朴玄採在一九八〇年代對待民眾論的態度。

大家常常說, 民眾的時代到來了。我的意思是, 比起民眾問題, 大家首先思考一下民族問題。邏輯上來講, 在被賦予的此刻狀況下, 我們擁有民族主義的自我需求, 那麼在如此的需求下, 我們一起追問今日為何民族性就成為民眾性? 應該這樣追問吧。在此前提下, 我認為, 先提出民眾問題, 直接討論民眾的量的成長、民眾在社會的比例以及民眾的需求, 似乎是不太恰當的。至少先從民眾在韓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歷史中, 所擔任的角色以及承擔的課題等方面出發, 試圖解決問題, 這樣才是正確的吧?²⁵

朴玄採不只把「民族主義的自我需求」視為一個前提, 同時也將「民族性」與「民眾性」視為一個歷史過程的產物。而且, 他對於直接提出「民眾性」的論述取向發出警告, 因為在歷史範疇的「民族」概念不存在的狀況中, 提出「民眾」問題, 事實上就像「沒有民族的階級」, 將會產生某種「過度現

23 同前引註, 頁二六。

24 同前引註, 頁二七。

25 參見【韓】朴玄採、宋基淑對談的〈八〇年代在民族史上的意義〉, 引自《實踐文學》第八號(一九八七年一月), 頁二一—二二。

實主義」(亦為理論主義)的偏向。因此，朴玄採從民族主義觀點，提出作為「主體」的民眾，尤其是當「民族解放」課題尚未落實和完成之際，朴玄採認為這仍然是一個有效的課題。

嚴格來講，八·一五以後並不是「解放後」而只不過是「戰後」。換句話說，民族解放的需求，並沒有透過八·一五得以充足實現。而且，八·一五沒有帶來真正的民族解放，從這麼一個認識來看，今日的我們仍然抱著「統一自主民族國家建立」這麼一個民族主義課題。而且，在此課題中，構成我們民族的各階層中，能夠承擔此需求的階層或階級在哪兒？這就成為重要問題。²⁶ (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事實上，「八·一五解放」或「八·一五光復」這樣的名稱，仍然普遍流通且被使用著。但是，如同朴玄採所指出的，這些稱呼本身即產生遺忘歷史的效果，因此又反覆地成為正名的對象。朴玄採應該早就認識到此問題。因此，朴玄採從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之後到一九八〇年代，一向認為民族解放的課題仍然有效，而正因為如此的歷史認識，他才能夠把殖民和新殖民，看成具有連續性的歷史。

因此，今日具有轉型期意義的民眾的興起，之所以成為問題的核心，是因為它是作為民族主體的民眾的興起。也就是說，如果在今日狀況下存在著健全的民族資產階級勢力，那麼

因為他們擁有的經濟基礎，他們能成為最能期待的民族解放的主體性承擔者，但是今日我們的狀況，就不存在那樣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且當下存在的資產階級幾乎都是買辦本身。從對此事實的認識出發，我們提出了作為民族主體的民眾之重要性。因此我們在當下要思考的應該是，在一九八〇年代這麼一個轉型期，由民眾這麼一個主體力量來提出恢復民族自主性的民族主義課題。這就是反外勢的統一問題。我們在思考此問題的時候，不以觀念性的自我需求，而是基於工人、農民和都市貧民的實際生活的需求，提出了自主、自立和克服外勢支配的克服分斷等課題。²⁷（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民眾在此脈絡下，成為了歷史的現實主體——因為民眾被賦予了歷史性民族主義課題，同時民眾成為歷史性所造成的現實矛盾的承擔者，並成為擁有現實實際生活需求的主體。

《韓國民眾論的現階段》也收錄了朴玄採〈民族經濟論觀點的民眾論〉一文。²⁸ 朴玄採在此文中，比較系統性地提出民眾論。

首先，他介紹他提出民族經濟論的背景。

26 同前引註，頁二二。

27 同前引註，頁二二—二三。

28 此文小標題如下：（1）民族經濟論觀點與民眾論；（2）作為概念的民眾；（3）歷史中的民眾；（4）今日的民眾；（5）結語。

民族經濟論的提出，是面對著韓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課題之實現這麼一個社會實踐的需求，努力說明和回應殖民地依賴所造成的韓國資本主義過去殖民地狀況，以及今日新殖民地狀況。²⁹

我們首先發現，這一段落的內容之中心詞是「民族主義」。朴玄埰一向從民族主義的觀點提出理論、實踐和思想問題，而民眾論也是在同一個脈絡下提出的主體論述。再者，他把「過去殖民地狀況」和「今日新殖民地狀況」，當成一組說明對象，亦即首先強調「殖民」的連續性，同時又認知到當下「新殖民」狀況的差異。基於這個認識，他想要面對「社會實踐上的需求」，提出整合性說明。而在這一段敘述中，「資本主義」就成為該說明所運用的理論性範疇，朴玄埰更為具體地指出，韓國的資本主義類型是「殖民地依賴」型的。

接著，他說明了「民眾」在民族經濟論中的地位：

作為民族經濟論的主要構成部分，民眾論將民眾視為民族經濟論的主體，因為民眾基本上是歷史的主體、進步的主體以及歷史中人類解放的對象。民眾向來是人的原初存在模式，而後來過渡到階級社會後，它成為在階級關係下被異化和壓迫的直接生產者。今日，我們思考具體民族問題的時候，這些道理仍然有效。在我們今日的狀況下，民眾是民族自主獨立、統一和民主主義的主體。因此，從民族經濟論的立場來看，民眾是關係著社會中主要矛盾的

概念，而且因為民眾的自我再生產基礎，只能在於民族經濟，所以我們指出民眾性等同於民族性。³⁰

如此，民眾的內涵包含歷史主體、進步主體和人類解放的對象等多元層次。但是，在階級社會裡，民眾基本上是被壓迫和異化的直接生產者，而在朝鮮／南韓具體的民族矛盾下，民眾成為自主獨立、統一和民主主義的主體。成為「統一」的主體，就意味著成為克服「分斷」（以及「新殖民」）的主體。也就是說，借助於歷史性的照明，朴玄採提出的「民眾」反映了南韓社會的特殊性和具體性，也就是對應於「主要矛盾」的主體概念之民眾。而且，因為民族矛盾的歷史性，作為直接生產者的民眾所追求的目標，是恢復並重建被（新）殖民所破壞且扭曲的生活模式。在此狀況下，民眾更具有民族性。而且，在新殖民條件下，只有民眾民族主義能代表整體民族主義。不過朴玄採也說明，在朝鮮和南韓的歷史中，民眾民族主義又反覆經歷過挫折：

在我們社會中，國家權力的展開，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式的，但是即使美國民主主義被引

29 參見【韓】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觀點的民眾論〉，引自《韓國民眾論的現階段》（同前引註16），頁四一。

30 同前引註，頁四二—四三。從這個脈絡來看，「階級」對應於基本矛盾。對朴玄採來說，在（新）殖民地地下，主要矛盾終究還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則是闡明主要矛盾的「理論」範疇或形式邏輯。

進來，日帝殖民地統治下前現代遺制和總督府殘餘，卻仍然殘存了專制型警察國家的要素。在擴充自己一派的政治勢力和對付民眾勢力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作為意識形態性分斷邏輯的反共意識形態，以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藉由民族解放民族主義運動落隊的右派民族主義作為自身基礎，包括買辦的巨大資本、前現代商人資本、前地主勢力為主的買辦知識分子，以及殖民地官僚階級。如此反共主義的狀況，經由六·二五（朝鮮戰爭）得以強化，而即使出現過四·一九（推翻李承晚政權）那樣的民族傾向，但被五·一六（一九六一年朴正熙軍事政變）所重編，結果造成了與之相伴的高度炒作大眾的功能。一九六二年以來韓國資本主義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移，更強化了如此狀況，而雖然一九八〇年期間的「首爾之春」³¹和一九八七年的「六·二九宣言」³²（一九八七年執政黨總統候選人盧泰愚的宣言，以總統直選為核心），帶來了今日的民主化邏輯，但是此狀況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化。³²（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在此，朴玄採再次強調殖民和新殖民在南韓的延續性。以此為前提，他指出了作為「意識形態性分斷邏輯的反共意識形態」，而這具有高度炒作大眾的功能。這樣的反共意識形態，尤其在國家功能全面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更加受到強化並且持續到一九八〇年代。我認為，這可視為「分斷」的內在化。也就是說，經過內戰而鞏固化的分斷，借助反共意識形態的全面化，貫穿了整體南韓社會成員的意識以至情緒，包括從未經歷過如此歷史過程的世代。而且，朴玄採在「民主化」運動蓬勃的時期，就指出此狀況的持續性。由此看來，朴玄採似乎早已認知到了「民主

化」論述在理論或制度層次的局限。

但是，他同時明確地指出民眾論的局限。也就是說，他的民眾論雖然可以指出「民主化」的局限，但是這樣的民眾論也只不過是「邏輯性」的。他認為，民眾論與實踐的結合，是一個在歷史面前帶著不確定性而開放著的課題，因此也對「民眾」的浪漫主義取向發出警惕：

韓國資本主義的具體性、國家權力的偏向性以及基於這兩者的矛盾關係，讓韓國社會的民眾，在部分買辦巨大壟斷資本和部分政權參與者之外，成為了一個全民族構成。但是，這只不過是邏輯性的，不一定具有現實性。民眾透過民眾意識得以覺醒，而社會實踐才能讓民眾成為社會實體。民眾性只能等同於民族性。而且這點在今日的狀況下，只能是這樣的。³³

換句話說，作為新殖民性具體表現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層次產生了廣泛的民眾。但是在現實中，即使有「民主化」邏輯和運動，歷史地持續下來的反共意識形態仍然起著強大的作用；因此，分斷被整體社會成員內在化，導致了邏輯認識和現實實踐的結合可能性，充其量

31 首爾之春是指從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朴正熙總統被暗殺之後到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南韓社會出現活躍的民主運動的時期。

32 引自【韓】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觀點的民眾論〉（同前引註29），頁五五。

33 同前引註，頁五八。

只不過是可能性。以此判斷來說，朴玄採總是注意到邏輯和現實之間的距離，同時也提出了以實踐作為媒介來克服兩者間差距的方向與路徑。不過，針對「實踐」可能性的政治形式條件（尤其是「黨」問題），他似乎沒有提出明確的答案。

陳映真的南韓情結與社會性質論

在全球性後冷戰轉型過程中，一九八〇年代的南韓也經歷了開放性與不確定性並存的思想空間，尤其以一九八〇年「光州慘案」為起點的「民眾」主體性論述，席捲了整個知識思想界。此時作為當代歷史中間物的朴玄採，藉由觸發社會形態論戰，批判地介入知識思想的轉型。他的思想實踐似乎呈現出一個悖論：在冷戰體系動搖的狀況下，雖然一九八〇年代能夠開啟了思想的開放性空間，但是知識思想主體無法進行符合後冷戰的自我轉型，反而一邊脫離民眾，一邊背離了實踐。

在台灣的陳映真則透過台灣的後冷戰轉型脈絡，來關注同樣處於新殖民條件的南韓思想狀況。以下我們引介陳映真從文學轉向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軌跡，並試圖取得對南韓的參照視野。

第三世界認識下的韓國情

如本書〈奉請〉一章所分析，陳映真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已經提出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必要性。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他在「冷戰／新殖民」的持續狀況下，深刻地認識到「思想的貧困」，並以同樣處於「新殖民」的南韓、菲律賓和泰國等「第三世界」國家為參照點，試圖解決思想問題。一九八二年，陳映真在琳達·傑文(Linda Jaiwin, 1955-)對他的採訪中，提出了他對於傳統、第三世界、人民和思想問題的若干想法：

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負有批判的評估自己的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進行再認識的責任。〔……〕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應該回到人民中去，成為他們的一員。〔……〕我們真應該介紹南韓、菲律賓、泰國的作品。因為我們同他們對這同樣的情境，「通過彼此的文學作品」，我們可以相互學習。〔……〕我們這兒有不少作家，可能都是好作家，人也很好，但卻不一定都是敏銳的思想家。³⁴（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同時，此時期的陳映真，仍然堅持歷史的「中國性」，但同時也反思了過去他試圖透過中國大陸的現實而展開尋找解決台灣社會矛盾的方案。他認為，過去他的努力是「荒唐」的：³⁵

34 參見琳達·傑文(Linda Jaiwin)在一九八二年對陳映真的訪談〈論強權、人民和輕重〉(禾心譯)，引自《陳映真作品集

6·思想的貧困》(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五一八。

35 朴玄採好幾次強調了對於不同層次的認識。因此，關於「新殖民性」的認識，也必須包含修正對於分斷的平面性認識，

當時，我從中國大陸的各種發展中去尋找各種問題的答案。現在，我知道這是荒唐的。³⁶

陳映真認為，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應該到人民中去，成為他們的一員。從「台灣」的主體觀點來看，這個「人民」實際上是不具有現實的「黨」的人民。在新殖民和分斷條件下，不管是革命黨還是自由主義政黨，「黨」無法有效地成為「人民」的黨。由此脈絡來看，陳映真所說的「人民」，相當於朴玄採所說的「民眾」。結果，雖然「中國」社會主義和「北朝鮮」社會主義能成為歷史性參照點，但是若考慮到主體形成脈絡下的現實矛盾或主要矛盾，就不容易成為台灣或南韓的直接參照點。而這似乎成了陳映真認識「新殖民」的背景。

從此脈絡出發，陳映真擁有了自己獨特的「文學思想」。因為在後革命時期、新殖民條件下，人的存在本身沒辦法像社會主義中國那樣的新人，表現出「積極」和「光明」。恰恰相反，陳映真認為，透過文學而得以描述失敗、挫折和妥協，以認識和表現「撥弄現代人的命運的力」：

如果有人寫了一個「積極的」、「光明」的鬥爭，在台灣，那是騙人的。

如果掙扎的人失敗了、挫折了、妥協了，正好說明了撥弄著現代人的命運的力，是很大的。³⁷

在新殖民／分斷條件下，陳映真想要將「撥弄著現代人的命運的力」視為文學的對象。當對於

「力」的認識足夠明確的時候，對付它的反應或行動，也不會走上浪漫主義或敗北主義，而更能提出適切的介入點和策略。這讓我們想起朴玄採常常強調的「力的均衡」，即對於局勢的認識。陳映真如此這般對於歷史認識和情勢認識的強調，似乎讓他得到「概念先行」作家的這麼一個自我定位。我認為，這就呈現了陳映真那基於思想基礎而作為一名實踐型知識分子小說家的面貌。

我說過，寫作，對於我，是自我批評的過程。這就一定是「概念先行」了。（……）我的問題，其實不在「概念先行」、「技術犯規」，而在於一個更基本的東西——我的才華。我的才氣不夠，書讀得不夠通，那才是問題之所在。³⁸

但是，陳映真不想談到自己「幻滅和反省」的過程。這是因為他不想將之包裝成自我滿足式的「前進」。

而展開不對稱的認識。

36 引自琳達·傑文一九八二年對陳映真的訪談〈論強權、人民和輕重〉（同前引註34），頁八。

37 參見韋名在一九八三年對陳映真的訪談〈陳映真的自白——文學思想及政治觀〉，引自《陳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同前引註34），頁三六。

38 同前引註，頁四一。

我只是一個略有進步願望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知識、思想水平和生活實踐上不夠格稱為左翼知識分子，但也不能免於較小、較膚淺的水平上，經歷著幻滅和反省的過程。

詳細描寫這幻滅和反省，對我的政治處境是有利的。但恰好是因為這樣，我卻特別不願去談它。它是苦痛的，是對自己的嚴肅的批評。夸夸然議論著自己的幻滅和對於使自己幻滅的事物痛加責備，且洋洋然以為前進，其實是道德上的弱質吧。³⁹

陳映真在此表現出某種責任感。因為他認為，「批判」的意義不在於滿足自己。這也讓我們想起區分「邏輯性」和「現實性」的朴玄採，他的那份謙虛。如此，陳映真對於「思想貧困」的認識，已經超越了對於國民黨體制的「批判」和「否定」的層次。因此，陳映真能夠提出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對抗國民黨體制的黨外運動的局限：

在我看，台灣黨外運動在文化、思考上的深刻的、總的檢討，反省和批判，是一個重大課題。如果，自由化是國民黨經過縝密的分析、思考後的路線，黨外就該坐下來想一想。否則，如果一味不讀書，只是張口罵人，不要多久，黨外會矮小化到成為一個弄臣。⁴⁰

美國、國民黨和黨外，他們站在希望有更安定的台灣，以及維持目前台灣與大陸的分斷狀態這麼一個共同利害的微妙關係上，他們三方面是否正逐漸形成某一種協同關係呢？⁴¹

藉由現實黨外運動的局限，陳映真思考了「思想貧困」的問題。為了解決此問題，他以「第三世界新殖民」設定為參照點。在此思考過程中，他於一九八七年六月訪問了當時民主化運動非常活躍的南韓首爾。

在韓國，我看就不同，他們擁有悠久的學生運動的歷史。即運動裡的勝利的記憶以及傳統的累積，都會發生很大的作用。比起台灣來可真驚人。⁴²

陳映真對於南韓狀況的評價，雖然似乎採取一面倒稱讚的敘述，但從他主體性取向來看，這應該被視為反思台灣「思想貧困」問題的迂迴之路。如此一來，他在南韓的經驗關係著他對於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民主化」的評價。而面對著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松永正義正面評價台灣的民主化，陳映真顯示出了某種保留性立場：

39 同前引註，頁四二。

40 同前引註，頁四九。

41 參見戴國輝、松永正義、陳映真在一九八七年的對談文章〈台灣變革的底流〉（鄭莊譯），引自《陳映真作品集 6·思想的貧困》（同前引註 34），頁一九五。

42 同前引註，頁一九〇。

是的，從理論上來說是不錯，不過從我這次在韓國逗留的體驗來說，我想，民主化也有質的問題。⁴³

同時，陳映真以南韓為例，重新確認了長期堅持的「歷史整合性」課題：

有趣的是，在和韓國的文學家對談中，我發現他們也正在要重看他們的戰後史。我想留居日本的金石範先生以濟州島叛亂為題材寫成的小說也是其中之一。〔……〕

好好站在歷史的整合上，在台灣創造出自主性的革新勢力，我想這是當前台灣最緊急的課題吧。⁴⁴（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事實上，在一九八〇年代，陳映真已經基於歷史整合的問題意識，著手創作作為戰後史的白色恐怖系列。因此當他遇到南韓文學界類似的企圖，可能感到非常欣悅。「戰後史」基本上是在新殖民、分斷和冷戰的制約之下，被扭曲和忘卻的領域，而一向試圖重新認識戰後史的陳映真文學，從歷史遺忘對於現實認識產生了龐大制約作用的這麼一個問題意識出發，首先以「白色恐怖」為創作題材。與此同時，陳映真也開始著手「華盛頓大樓」的系列創作。如同〈奉請〉一章所探討的，透過文學嫁接了歷史和現實的陳映真自覺了「思想的貧困」之後，卻走進長期的文學空白期。為了克服如此空白，他走上另類的實踐方向。「社會性質論」的有關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首先，他試圖從政治經濟學尋找克服思想貧困的資源：

「政治小說」也罷！「政治詩」也罷！就目前的台灣文壇而言，這都是新銳、進步的聲音。問題倒在於，如果欠缺深刻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很難處理類似的題材。當然，意識形態的深刻化並不保證就能寫出好的政治文學。只有當文學素養與意識形態兩者皆臻上乘時，才是高水準政治文學出現的時刻。⁴⁵

陳映真作為文學創作者，首先承認了文學的自主性，但同時，他也強烈地認識到政治經濟學和意識形態引導文學的必要性。其中，採訪南韓民族民眾運動和社會性質論戰的經驗，對他成為一個強大的衝擊。

43 同前引註，頁一九八。

44 同前引註，頁二〇〇—二〇一。

45 參見鍾喬在一九八六年對陳映真的訪談〈文學、政治、意識形態〉，引自《陳映真作品集 6·思想的貧困》（同前引註 34），頁七二。

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以闡明二十世紀後半期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為目的。歷史地看，中國以及第三世界所提出的社會性質論以及「主要矛盾」，是為了闡明社會變革的條件和主體範疇，並以此論述為基礎，提示革命的途徑，也就是「實踐論」。如此的思想傳統，在民族解放革命遭受流產的南韓和台灣等「新殖民地」，因為各種制約因素，長時間遭受壓抑而沉潛，但是在冷戰動搖的一九八〇年代，又重新復活起來。

儘管如此，冷戰體制動搖本身的外在性質，讓南韓思想和運動主體無法主體地挪用冷戰動搖所帶來的思想解放空間，使得思想傳統的恢復又遭受流產。對於之後的具體社會運動和變革運動，一九八〇年代的有關論述終究無法成為直接的思想資源；事實上，它成為具有缺陷而必須重估與反思的對象。即便如此，因為這個論述在短暫的思想解放空間中，畢竟具有它進行思想重建企圖的意義，同時針對思想的傳承與斷裂，知識思想界因它而形成了複雜的論戰格局，所以一九八〇年代的思想運動，對我們而言仍然是首要審視的對象。

在南韓傳承了批判思想傳統的朴玄埰，對社會形態抱有如下基本認識：

當作為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的生產模式，具備了適合自己的上層建築的時候，根據支配性的生產模式，社會形態或經濟形態便會成立。因此，如下說明可以成立：

一定生產模式的存在所需要的社會意識部分，可稱為該生產模式的上層建築。而且，生產模式和上層建築，成為一體，被稱為社會形態或社會體制，而此社會形態特有的生產關係，就是經濟基礎。因此社會形態是其內部既均衡又調和的一個整體，同時是客觀存在的一個歷史事實。對應於歷史時期的社會形態，根據基本生產模式，分成亞洲式、古代式、封建式和資本主義式的社會形態，今日我們可以加上原始共同體和社會主義形態。⁴⁶

有趣的是，朴玄採基本上跟隨著此對於社會形態的古典理解，同時嚴格地區分社會形態和社會性質。這是由於他參照了「北朝鮮」的理論，而這基本上可視為他接受了北朝鮮對於中國有關論戰之評估：

《殖民地時代韓國社會與運動》的編者〔林永泰〕說，「北韓認為，從一九三〇年代以後的社會，雖然具有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性，但是從社會形態來看，確實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一九五〇年代末以來，成為定論）。此點與中國的見解有著非常明顯的差別。中國堅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不管是否設定社會形態層次），並沒有對中國史設定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概念

46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首爾：石枕）的（第三部：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第七章：關於韓國的社會性質與發展階段的問題之提出），引自頁三四二—三四三。

或階段」。⁴⁷〔……〕對此，我在〈解放前後民族經濟的性質和其展開〉⁴⁸一文中，探討殖民地下的韓國社會性質時，指出過如下立論：從社會形態來看，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推論出其形成時期為殖民地經濟確立期（一九一八年或一九二四年）以後。⁴⁹

朴玄埰在同文的另一個註腳中，對此論點表示同意：「無論編者的斷定意圖如何，此點需要被視為具有意義，也是耐人尋味的」。⁵⁰不過，在一九八〇年代參考南韓論戰和朴玄埰著作內容的陳映真，基本上把焦點放在闡明「社會性質」，並未嚴密區分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進而將兩者內容結合成某種「實踐論」的社會性質論。

近年審視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台灣歷史學者邱士杰（一九八二—），在其〈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一文中指出，因為陳映真當時的現實局限，無法認知到朴玄埰的如此區分：

《韓國資本主義論爭》所收論文還指出：為解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的挑戰，以朴玄埰為代表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進行了自我修正。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區分了「社會性格」與「社會構成體」(social formation)。用漢語來說，就是區分了「社會性質」與「社會形態」兩個概念。朴玄埰認為韓國的社會形態是「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性質則是「(新)殖民地(半封建)」。⁵¹但在陳映真與陳芳明⁵²論證的場合，陳映真卻始終把社會性質

定義為社會形態或生產方式，而且陳映真只看朴玄採是「主張殖民地中資本制生產居領導地位論的一個典型代表」，卻未能看到他意圖通過社會性質與社會形態的區分，而包容「半封建社會論」的意圖。⁵³

我認為，陳映真對南韓論戰的理解所呈現的局限，反映的是當時南韓內部思想界接受朴玄採的傾斜性態度；不過，這也反映陳映真本身「社會性質論」的傾向。因此，不同於南韓的傾斜性，陳映真的傾斜性，應該透過陳映真認識和解決「思想貧困」的脈絡來加以闡釋。

陳映真論述的展開方式和對象，基本上是闡明各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和「民族主義」的關係。民族主義是一種實踐，同時也是運動——從這麼一個角度來看，陳映真之所以提出「社會性

47 參見【韓】林永泰編（一九八五）《殖民地時代韓國社會與運動》（首爾：四季）。

48 此文收錄於【韓】朴玄採（一九八四）《韓國資本主義與民族運動》（首爾：韓吉社）。

49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第三部：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第七章：關於韓國的社會性質與發展階段的問題之提出》，引自頁三五二。

50 同前引註，頁三三三的註3。

51 參見【日】本多健吉編（一九九〇）《韓國資本主義論爭》（東京：世界書院），頁七一、一一九

52 陳芳明（一九四七—），「台獨」傾向的台灣文學理論家，曾與陳映真進行了幾場關於台灣文學史和台灣社會性質等議題的論戰。

53 參見邱士杰的〈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引自《現代中文學刊》第二十七期（二〇一三年第六期），頁六〇。

質論」，是為了提供有關於實踐的知識思想資源。而且，即使他援用「社會形態」概念，不過事實上仍然是為了建立社會性質論，主體地引進作為理論資源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形態」概念。換句話說，陳映真一開始就想要提出社會性質論，即便他往往談論到是關於社會形態的概念和論述。這是因為陳映真作為「實踐者」，站在歷史的民族主義運動立場，努力解決「思想貧困」問題。

不過，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也反映出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獨特的局勢，因而具有了某種爭議性。其實，陳映真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已經透過「華盛頓大樓系列」等文學創作，提出了缺乏歷史整合的運動之局限，並加以批判，特別是針對國民黨與黨外民主化運動的共謀關係。⁵⁴從這個脈絡來看，陳映真經過多次修正，提出了基於中國和台灣歷史的台灣社會性質的歷史變遷：殖民地半封建（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半殖民地半封建（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一九四九—一九六六）、新殖民地依附性資本主義（一九六六—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新殖民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二〇〇〇）、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二〇〇〇—）。⁵⁵

陳映真透過如此的歷史階段區分，試圖重構歷史上綿綿地傳承下來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系譜。這是為了填滿符合歷史整合性的內容。也就是說，陳映真透過這樣的歷史分析，試圖闡明現實矛盾的勢力關係，以及尋找實踐的方向和介入點。有趣的是，陳映真的社會性質階段論，沒有任何「空白」。從一八九五年台灣的割讓和殖民開始至今，陳映真沒有在台灣社會性質的變遷設定任何空白期或者過渡期。相對來說，朴玄採在社會形態的層次，區分了不同階段，但是在社會性質的

層次，卻沒有具體的階段區分。朴玄採的社會性質論，首先明確指出一種社會形態論：經由一八九四年半殖民地化和一九一〇年殖民地化，朝鮮社會於一九一八年或一九二四年成立了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之後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持續，並基於具體的實證資料，闡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具體類型演變：

概括地講，日本資本在殖民地韓國的運動，根據先進資本在殖民地的典型運動，大約進行了如下三個不同階段：（1）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一九〇五—一九一八）；（2）工業資本階段（一九一九—一九二九）；（3）金融資本階段（一九三〇—一九四五）。⁵⁶

54 陳映真早就在華盛頓大樓系列之一的單篇小說〈夜行貨車〉（一九七八）結局，就諷刺地描述了如此國民黨和黨外運動的共謀性。

55 參見邱士杰的〈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同前引註53）之表一（頁五九）。就有關早期設想，參見陳映真的〈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中華雜誌季刊》第三十一年總一期（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頁一二二。陳映真在此文中，引用了日文版朴玄採著作：【日】朴玄採的《韓國資本主義與民族運動》（瀧澤秀樹譯，東京：御茶の水書房，一九八五）；【日】朴玄採的〈作為統一論的自主性民族經濟之方向〉，收錄於《韓國資本主義論爭》（同前引註51）。文學有關論述被刪的另一版本，參見陳映真（一九九二）〈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各階段的民族主義〉，《海峽評論》第二十一期，頁二二—三七。

56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第三部：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第一章：解放前後民族經濟的性質與其展開〉，引自頁一三四。

韓國資本主義，在戰後經歷了如下的不同階段：（1）韓國資本主義的重组與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扎根（一九四五—一九四八）；（2）韓國資本主義的獨自性展開與國家資本主義（一九四八—一九五三）；（3）自發性民族工業的消滅與金融壟斷資本的形成（一九五四—一九六〇）；（4）外資廣泛引入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般化（一九六一—一九七二）；（5）民間領域的壟斷完成與產業結構的重组。⁵⁷

有趣的是，正如朴玄採自己多次反覆強調，即使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演變，殖民地朝鮮和新殖民地南韓的社會性質，仍然由於其具體性和特定性，被定性為「半封建」社會。換句話說，如此「半封建」的意旨在於，即使在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的狀況中出現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發展和演變，但是從主體和實踐的角度來看，社會的「半封建性質」仍然持續，甚至更深化。而社會性質論本身是實踐性論述，因此需要開放性，以便能夠包容超出理論分析層次的、諸場域之間的相互作用。

當我們獲得陳映真社會性質論與朴玄採取向的初步參照後，我們可以期待得出陳映真思想對於南韓更為深刻的參照意義。

1. 雙重分斷與民族經濟圈

陳映真關注了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所進行的經濟交流之擴大狀況，並為了闡明這個現實的歷史性意義，整理了以「經濟圈」概念為基礎的台灣戰後經濟史。

從台灣戰後經濟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構造性改變。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基本上被迫與中華民族經濟圈剝離，而納入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圈進行資本循環。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灣重又編入日趨崩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族經濟。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美帝國主義軍事干涉海峽，台灣經濟再度與中華民族經濟斷絕而依附在美日資本體系「單獨」發展。一九八八年以降，台灣與大陸重又在一個民族經濟下整合。而此一整合，勢必將在台灣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產生重大的變化。⁵⁸

在此，陳映真積極參照了朴玄採在民族經濟論中提出的「經濟圈」概念，而朴玄採本人的敘述如下：

57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第三部：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第二章：分斷時代韓國經濟的展開與自立經濟的道路〉，引自頁二〇七。

58 引自陳映真（一九九二）〈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同前引註55），頁一四三。

我們民族的近代史，就是殖民地壓迫以及抗拒它的民族抵抗的歷史。從殖民地支配，韓國經濟獲得近代化契機而資本主義化，這不是經由作為民族生存基礎的民族經濟的成長和發展過程，而是經由日本壟斷資本實現殖民地超額利潤的過程中，日本資本支配著韓國經濟此一過程的擴大和深化。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下，韓國經濟中，作為民族生存基礎的民族經濟與國民經濟的背離（這同時是外國壟斷資本之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間的矛盾本身），反映著外來壟斷資本的運動為主的資本主義化和工業化所引起的民族矛盾，而這個矛盾成了民族抵抗殖民地壓迫的主要經濟性根據。⁵⁹

民族自立經濟，是從拒絕依賴性殖民地經濟結構開始的。而且，因為這就否定了分斷的後果，因此是走向統一的。這都是以民族和民眾生活的改善為目的。消極地看，這是以對外自主作為目的，不過這也具有以恢復民族生活（這也就是民族共同體的恢復）為目的的積極性內容，因此在南北經濟的相互彌補和終究整合上，具有積極性內容。⁶⁰

滿足這個前提（通過民主主義將民族·民眾的需求貫徹到國家意志）後，我們可以得到更積極確立自立民族經濟的方向，即以民族共同體為基礎的再生產圈的實現，或整合這麼一個克服分斷祖國的體制局限之互補性關係的確立。這基本上意味著將分斷的南北之間的經濟利益重新歸屬於韓半島內部，而且意味著它在韓半島範圍內互補關係下，建立再生產圈。但是落實它不

像理論那麼容易。儘管如此，若缺乏它，南北之間的和平統一無法討論的。意思是，基於南北各自的比較優勢，擴大經濟交流，並進行結構化而深化相互依賴的關係，最後將南北經濟歸結於民族共同體，如此一來追求韓半島範圍內自立民族經濟的確立。此階段的自立民族經濟將成為對抗外部勢力的民族自決之經濟基礎，同時具有積極意義：將兩個體制之間的差異包容在內部，並在結構性互相纏繞的分工關係之下，進行整合。⁶¹

陳映真的「民族經濟圈」概念與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具有類似之處。但是，從具體運用的方式來看，兩者之間就出現分歧。主要的原因是，陳映真之所以援引且運用此概念，是為了解釋一八九五年殖民與分斷的重疊這麼一個具體狀況變化。也就是說，陳映真關於民族經濟圈的論述中，不存在「民族經濟」和「國民經濟」之間的背離。在這個意義上，陳映真所援引的「民族經濟圈」概念，比起克服殖民性（去日本化），更適合克服分斷（再中國化）。但是，相對來看，朴玄採在提出民族經濟論的早期，已經明確設定了掌握「再生產條件」的課題，⁶²也提出將去殖民主義

59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第三部：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第一章：解放前後民族經濟的性質與其展開〉，引自頁一三一。

60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第三部：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第九章：作為統一論的自立民族經濟的確立方向〉，引自頁三八八。

61 同前引註，頁三八四—三八五。

62 朴玄採提出了作為民族經濟確立的自立經濟諸指標，包括掌握再生產條件、自我完整的自主性再生產機制、全國擴散

的「民眾·民族」的需求加以具體化，進而成為國家意志的前提之「民主主義的實現」這麼一個政治條件。也就是說，朴玄採並非從分斷的結構和矛盾得出「民族經濟圈」概念，反而是為了矯正分斷之前，殖民時期就已發生的經濟結構之扭曲，從而提出了作為去殖民主義「經濟」概念之「民族經濟論」，同時朴玄採主張，如此民族經濟論的立場將順理成章地走向南北統一。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朴玄採看來，民族經濟和自立經濟，終究是在經濟層次上完成「去殖民」的課題。但是，如此的民族經濟，經由內戰，遭遇了南邊和北邊分斷的狀況，因而民族經濟和自立經濟的課題，也跟著分斷成南北兩邊。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也基本上提出一個課題：分斷後在南韓如何主體地形成民族資本和民族經濟。

另外，陳映真關注著並提出了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之主要特徵：「中國指向性」。而相對於此的殖民地朝鮮，「民族解放」不以「朝鮮指向性」為特徵，而以「獨立」和「自立」表現出來。

總而言之，日帝下的台灣，即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苛酷的民族與階級的矛盾，成為這一時期政治、社會、文化領域中的民族·民主運動的基礎。從中國割讓出去的殖民地台灣與其他殖民地如朝鮮的不同，在於如朝鮮之殖民地化，為全朝鮮之淪亡與殖民地化，而台灣之殖民地化，係台灣一地自中國被割讓予日本而殖民地化。而朝鮮之反帝民族解放，即全韓民族之民族解放運動，而台灣之抗日民族解放運動，自然具有強烈的以復歸中國、振興中國的「中國指向性」，以漢民族為自我認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從日本帝國主義之轄制與壓迫下求得

解放與獨立的精神與思想內涵。⁶³（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對台灣來說，經由回歸的民族經濟之恢復，成為一個具體的可能性。因為，台灣於一八九五年的第一次分斷時，被強迫脫離民族經濟，所以在邏輯上，克服分斷（「回歸」）就成為朝向民族經濟的回歸。也就是說，對於第一次分斷就重疊於割讓／殖民的台灣來說，回歸中國就等同於民族經濟的恢復。但是，對朝鮮／南韓來說，「脫離」民族經濟從未成為問題，而是先有日本殖民支配所進行的民族經濟的扭曲，而後經由分斷，使得在南韓克服扭曲和恢復民族經濟的展望遭受挫折，結果，恢復民族經濟的路徑格外複雜起來。因此，不同於台灣，在南韓克服分斷，不成為恢復民族經濟的必要充分條件。認識到這點，朴玄採指出民族經濟和國民經濟的背離，並設定了作為主體的「民眾」，進而提出了以民眾主體為前提的統一論。因此，對南韓來說，恢復民族經濟和確立自立經濟，同時具有民眾的主體性和民族的抽象性，但對台灣來說，民族經濟的恢復，雖然是稍微民眾非主體性，但也具有民族具體性。而因為分斷與殖民的重疊，在台灣，民族的具體性必須先於民眾主體性。

機制、國民經濟與民族經濟的整合等。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第二部：民族經濟論的諸範疇，第三章，自立經濟論與民族經濟論〉，引自頁七六一八五。

63 引自陳映真（一九九二）《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同前引註55），頁一二五。

2. 內戰的外在性與新殖民性：制約民族資本的形成與廣泛中小資本的新殖民性

陳映真認為，在內戰和冷戰重疊的雙戰結構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傳統滅絕了。但是在沒有直接經歷過內戰的台灣，一九五〇年代所形成的新殖民，只不過是在美國的冷戰戰略下，經歷過內戰的國民黨和沒有經歷過內戰的台灣地主和資本家互相結合的過程。也就是說，本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在「反共」前提下，不去追究台灣地主和資本家的親日買辦行為。隨後，國民黨參與由美國主導的反共主義勢力圈，並拋棄了反日。我們可以說，若國民黨的「反共」根據歷史經驗具有「主體性」，那麼，相對來說，台灣地主和資本家的「反共」，具有一定程度的「實用性」。因此，在與美國的關係下，國民黨的反日和反共所具有的主體性，同時具有相對的自主性。而台灣地主和資本家，並未與國民黨直接分享內戰的矛盾，且沒有遭受共產主義的直接打擊，因此他們的反共主義基礎與國民黨不同。如此脈絡下，美國一方面牽制國民黨，另一方面為了強化台灣反共主義的基礎，支援台灣中小地主和資本家，成為「反共主義」的自由改革派（所謂「黨外運動」），並且進一步被培養成國民黨之外而與國民黨相抗衡的台灣內部均衡勢力。

相對來說，南韓資本家和地主的「反共」和「親日」，基本上從頭到尾是同一主體的一致性。尤其經過內戰，直接遭受「共產主義」的鎮壓，因此他們的反共主義具有強烈的主體性，並且也可以透過炒作，滲透到經歷過殘酷暴力的南韓大眾的意識形態空間。因此，不同於台灣，南韓的反共主義，從上層到基層，都堅固扎根。因此美國對南韓的新殖民戰略，不太需要培養像台

灣那樣的中小地主和資本家以成為基層「反共主義」力量。結果，與台灣比較之下，南韓的中小企業所具有的條件較為脆弱，不過朴玄採認為，恰好因為如此條件，作為民眾自發性經濟活動成果的「中小企業」，總是具有轉型為民族資本的可能性。

3. 從半殖民地到新殖民地

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中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半殖民地」設定。在南韓的社會性質論或社會形態論，「半殖民地」很少出現。⁶⁴不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回歸」中國，帶來了「半殖民地」的狀況，雖然台灣回歸中國，但此時的中國仍然處於國共分裂的狀況，而之後實質地接收台灣的，則是國民黨。因此陳映真認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台灣社會是半殖民地社會。緊接而來的從半殖民地到新殖民地的轉型，可視為「中華民國」和「台灣」這兩者在外圍冷戰條件的制約下，融合在一起的過程。半殖民地時期，台灣所被賦予的課題，是克服以下的重疊狀況：日據時期殖民主義的殘餘所延續的層面，以及國民黨白區所具有的「半封建性」自上而下地在台灣的移植或重現。另外，美國對國民黨和台灣所進行的新殖民地化，就是在冷戰體制

64 雖然背景不同，朴玄採曾經將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〇年的過渡期稱為半殖民地，偶爾也將戰後新殖民地稱為半殖民地。不過前者沒有成為論戰所關注的對象，而後者似乎與新殖民地重複。

的勢力格局下，將如此重疊的狀況重組為單一的再生產結構。但是在新殖民化過程中主體之一的國民黨的「中國性」，對台灣的民眾構成添加了相當規模的「外省人」，因此台灣民眾構成的地方性和區域性得以強化，這就成了在新殖民條件下，台灣不容易淪落為去歷史化的實體之條件。

相對來說，就朝鮮和南韓的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而言（或是直至內戰停止的一九五三年），南韓的社會性質論或社會形態論，都沒有特別賦予某種階段設定。這似乎形成一種空白。此時期的朝鮮，在形式上，被賦予了「獨立」的主體性，但是事實上，在實現主體性所必須的內在單一力量不存在的狀況下，南韓既不是殖民地，又不是真正的獨立，處於一種曖昧的狀態。因此，當時在南韓贊同和反對託管之論戰中，出現過左翼的「贊託」和右翼的「反託」此一悖論。從中國被割讓和分斷出來的台灣，因為二次大戰後回歸中國，而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占有核心地位，因此，台灣沒有成為託管對象。相反的，二戰後的朝鮮和南韓，基本上需要重新建立國家，不過此時殖民地朝鮮的主體性相對脆弱，而且左右對立與地緣政治的矛盾結合在一起，讓託管成為爭議的對象。結果，「反託」成為右翼的虛構意識形態，正因為右翼的「反託」雖然表面上呼籲主體性，但是實際上依賴美國，並且是以分斷作為代價的。這可視為分斷意識形態的原型。

結果，在如此新殖民轉型的混亂中，南北分別成立了單邊政府；南韓的左翼同時處於絕滅的危機。這是內戰發生在韓半島內部的直接原因。此過程中，美國的積極介入，成了朝鮮分斷鞏固化的核心外部因素，於是「克服分斷」，就成了回歸或恢復「歷史性朝鮮」（並非現實性朝鮮）的一個創造性去殖民課題。如此，對於以「分斷」為具體表現的「新殖民性」的認識，可視為對如

此創造性課題的認識。而且，在去殖民主體（如「國民黨」）不存在的狀況下，經過分斷淪落為新殖民地的南韓，在反共主義體制下只剩下相對薄弱的區域性和地方性環節，能夠阻止去歷史化的實體化。

「思想的貧困」與「思想的斷裂」

陳映真在台灣似乎稍微「人為」地製造社會性質論戰，不過從實際展開過程來看，結果是失敗的。相對來說，朴玄採並非刻意製造社會性質論戰，可是理論性論戰卻擴大到預料之外的範圍，發展成整體社會運動的焦點。事實上，朴玄採提出社會性質論時非常小心，因此在論戰擴大的過程中，他只是被迫表明了自己的社會性質論。不過，他對於論戰的抽象性和理論主義傾向採取他一貫的警惕與批判。

若陳映真為「思想貧困」的課題苦惱，那麼朴玄採則為「思想斷裂和扭曲（去歷史化）」而苦惱。因為，在兩次分斷歷史地重疊在一起的狀況下，台灣的陳映真認識了第二次分斷和「新殖民」的重疊，因此他只能在被賦予的條件之歷史延續上，理解了「分斷」。再者，在台灣，內戰的外在性，與作為前提的分斷，一起制約了基於內戰的意識形態對立之主體力量的形成。相對來說，朴玄採作為被殖民和內戰的當事人，經歷過分斷和新殖民，因此一方面體現了繼承歷史進步的走向，另一方面在當下社會實踐中，提出了歷史進步走向遭受斷裂而扭曲的問題。

朴玄採的社會形態論和社會性質論

如同前述，二戰之後朝鮮雖然脫離帝國主義支配，但是主體地爭取獨立所面臨的挫折，卻激化了左右對立，結果，去殖民課題的歷史性認識遭到延遲，在此狀況中，左右對立與外部矛盾（冷戰體制）又互相結合，造成了「分斷」這麼一個扭曲。

在〈奉請〉一章裡，我以陳映真的「思想的貧困」為參照點，並以朴玄採的思想實踐為線索，探討了一九八〇年代「後冷戰轉型」中出現的「思想的斷裂」；而在此，我首先要正式討論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獨特的存在方式。一九八〇年代所打開的思想解放空間中，主要的知識思想潮流雖然帶有激進的色彩，但也具有以去歷史化為基礎的「脫民眾性」和「脫實踐性」特質。朴玄採不同於此趨勢，保持他的歷史傳承性，就如同他龐大的匿名或借名著述，呈現出「朴玄採≠無／多」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說，朴玄採是既非存在同時又無數存在的。我認為，因為他的思想從不採取私人所有的知識方式，因此從未淪落為理論主義。而他思想的根據，就是由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所代表的透徹的實踐思想，因此他清楚地認識到理論或概念的局限，並沒有走上針對思想問題的某種「哲學」性解決此種路徑；⁶⁵與此同時，他也沒有走上拋棄知識原本作用的浪漫的實踐主義之路。⁶⁶

朴玄採在一九八〇年代呈現出的倫理意識和實踐態度，成為進入他的困境的背景資料。接著我們會探討在一九八〇年代時，朴玄採與「社會形態論戰／社會性質論戰」發生關係時，作為實

踐型思想家朴玄採所遭遇的困境。

一九八〇年代思想課題與朴玄採的位置

1. 歷史與倫理

我們民族的近現代史，是以渾身的力量，對抗帝國主義支配的民族抗爭的歷史。其中，作為民族主義者貫徹自己的丹齋先生（申采浩）的人生，只能是慘烈的。我們的歷史，一方面記錄了如此有著作為民族解放運動者的慘烈人生之丹齋先生，同時另一方面擁有著許多沒有被記錄下來的內容，而且當下仍然再現著堅持絕不放棄的先進者的人生。

65 從朴玄採所留下的整體思想成果來看，「毛澤東思想」——尤其《實踐論》和《矛盾論》——對朴玄採的影響非常深刻，即便朴玄採沒有具體提及他對毛澤東思想的詮釋和挪用。本書在〈濯浴〉和〈奉送〉兩章中，揭示了朴玄採面對新殖民體制時運用毛澤東思想核心原理的成果，而間接地確認毛澤東思想的當下性和傳承方向。

66 因為朴玄採向來透過歷史的縱向，反思地照望當下的抗爭和運動，所以他的文章，從不將抗爭的象徵當作一種知識責任的「不在證明」。因此他的文章中，從未出現南韓戰後歷史中，具有抗爭或犧牲代表意義的人物，例如一九七〇年的全泰壹、一九八七年的朴鍾哲和李韓烈（박종철, 이한열，兩位大學生犧牲被視為一九八七年六月抗爭的導火線）。如同本書〈戲台〉一章所介紹，朴玄採如此態度也直接反映在他對一九八〇年光州慘案的分析。

今日這樣的歷史狀況下，忠實於歷史性應然的人生之路，就是堅持「今日不被補償，同時不願意今日得到補償的人生」。在這樣的意義下，我不認為今天的我的受獎，是對於我自己經濟學研究成果之評價，我反而要給使得此研究成果得以可能的歷史狀況的進展，賦予更大的意義。

我的經濟學研究成果，是一個原則，即堅持忠實於歷史的人生，參與歷史需求存在的現場之產物。因此，被稱為「民族經濟論」的理論體系，從頭到尾沒有任何體系化的目的性。它的提出，是為了回應多樣現象對社會實踐產生的更正確的認識需求而付出的持續性努力。也就是說，民族經濟論的提出，是面對韓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課題之實現這麼一個社會實踐的需求，努力說明和回應殖民地依賴所造成的韓國資本主義中，過去殖民地狀況以及今日半殖民地狀況。〔……〕

我曾經在《民族經濟論》（韓吉社，一九七八）的序文中指出過，「我把自己的角色，設定為非輕率創造者之誠實的解說者」。我努力堅持了如此立場。但是，現象的多樣性和實踐上各種需求，不允許我留在以彌補性作用為主的樸素狀態的停滯或固定化，反而要求我把民族經濟論，適用於過去沒有涉及過的領域。〔……〕

民族經濟論與我的關係之意義是如此。今天對於民族經濟論，贊同和反對的立場形成了對立。雖然民族經濟論是歷史產物，但是它的客觀實在，讓我們對它進行更嚴密的評價。在這個意義上，民族經濟論的社會角色，只能如實地被評估。而且，它在這個過程中，成為忠

實於歷史的。⁶⁷

以上是一九八七年朴玄採「丹齋獎受獎紀念演講」內容，這個演講如實地呈現他人生的倫理態度。主要特點是「民眾導向性」、「獻身性」和「非所有」：

第一，丹齋先生或當下受獎的朴玄採，是在歷史中被記錄下來的人，但是貢獻於歷史進步的許多人都沒被記錄下來。

第二，「今日不被補償，同時不願意今日得到補償的人生」。

第三，不願意輕率做出新的創造，反而努力忠實於古典，並不主張自己成果的獨創性。

以受獎演講來看，如此發言包含著相當大的緊張感。他所提出的不被記錄的民眾，正是讓此獎項得以成立的基礎，因此作為聽眾的頒獎單位和受獎人都緊張起來。而且，朴玄採不將自己的知識實踐，框限在個體人生或世代所有這種格局內，反而把它放在長遠的歷史過程中，試圖讓它成為民族和社會的公有思想資源。最後，他警惕一種追求個人所有而被歷史所斷裂的知識態度，反而

67 參見【韓】朴玄採的〈今日的歷史狀況與民族經濟論〉，引自《朴玄採全集·第二卷》（朴玄採全集發刊委員會編，首爾：

Haemil·10006），頁2121-2123。

採取忠實於經典的方式，這其實是對於當下容易被「新」的理論所捲走的短視和菁英主義的學術氛圍之警告。

如同前述，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的社會科學，將「民族經濟論」視為恢復學術主體性的重要資源，但是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的情況來看，朴玄埰的思想，恰好成為反思一九八〇年代社會科學和政治經濟學所經歷的去歷史化問題之根據。⁶⁸另外，雖然知識界也有繼承朴玄埰的學術實踐的潮流，但是不同於「民族經濟論」的存在方式，基本上那樣的「繼承」被局限於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或「社會科學」問題意識。⁶⁹

不過，朴玄埰在一九八七年與鄭民的訪談中，說道：「一九五九年前後，我主辦了『農業問題研究會』的『週三講座』，在那裡討論過幾乎所有最近在討論的問題，包括亞細亞式生產方式、援助經濟的本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下國民經濟的可否獨自存在等」。⁷⁰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八七年，過了大約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如此差距？「討論過幾乎所有最近在討論的問題」的朴玄埰所回顧的，與將朴玄埰視為「陳舊」的去歷史化潮流，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如果說，朴玄埰是繼承歷史以回應現實的實踐型知識分子，那麼，一九八〇年代缺乏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模式之下，朴玄埰指出了「一九五九年討論的問題」與「一九八七年討論的問題」之間，出現了歷史性斷裂；因此「一九八七年討論的問題」是一九五九年就討論過的了，卻被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視為「新」的問題。換句話說，一九五九年學習和接受理論的前一代的「主體性」，被年輕一代視為「陳舊」的；但弔詭的是，「一九五九年曾經討論過的問題」，在一九八七年被他們視為「新」

的問題。如此關於「新」的錯覺，可視為「新殖民性」在知識方面的主要表現。

如此，相對於一九八〇年代陳映真為「思想貧困」苦惱，朴玄採則為「思想斷裂」苦惱。有趣的是，陳映真所面對的思想貧困，畢竟是思想界共同的課題，因此無法通過幾場「論戰」得以解決。實際上，陳映真所期待的思想性辯論無法發生，反而只有他與所謂的「台獨」分離主義的「論戰」，在格外狹窄的範圍內出現而已。相對來說，朴玄採所面臨的「思想斷裂」似乎可以通過「論戰」得以解決，但是朴玄採的語言，同樣也無力於克服歷史「遺忘」所造成的斷裂。如此一來，雖

68 後來南韓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學者，大部分都透過「去歷史化」朴玄採而確保了自己「新」的政治經濟學根據。代表性著作包括：【韓】丁聲鎮的〈民族經濟論的諸問題〉，收於《產業社會研究·第一集》（金晉均等著，首爾：Hanul，一九八六）；【韓】尹邵榮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與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以國際運動史論戰為中心〉，收於《現實與科學·第二集》（首爾：新路，一九八八）；【韓】金秀行的〈韓國經濟學界的新動向〉，刊於《現象與認識》第十一卷第一期（一九八七年四月），頁一一六—一三三。

69 《動向與展望》（동향과 전망）期刊以專題方式，總共四次重新討論過朴玄採的社會科學成果。參見《動向與展望》第二十七號（一九九五年九月）、第四十八號（二〇〇一年三月）、第五十五號（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和第七十二號（二〇〇八年二月）。另外，朴玄採生前，經濟學方面出版了朴玄採花甲紀念論文集【韓】《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鄭允炯等著，首爾：創作與批評，一九九五）。而同時期，由當時已主張「中進資本主義論」的安秉直（안병직，一九三六—）主導出版另外一本朴玄採花甲紀念論文集【韓】《韓國經濟——爭論點與展望》（首爾：知識產業社，一九九五），但是此論文集所收錄的內容，基本上與朴玄採無關。

70 引自【韓】朴玄採和鄭民對談的〈民族經濟論——闡明民族民主運動的經濟基礎〉（同前引註6），頁三八二。

然陳映真和朴玄塚遭遇到的「新殖民性」制約情況稍微不同，但兩位思想家基本上無法擺脫它強大的作用。

朴玄塚認識到思想斷裂，基本上是歷史倫理的表現，而他也曾經提出「歷史」敘述的原則：

堅守民眾立場，便意味著將民眾假設為歷史中被異化而受壓迫的弱小群體。非科學的歷史敘述方式，是把歷史看成只有被記錄的歷史。但是，歷史不只是作為資料的被記錄的歷史。歷史中，力量弱小的被壓迫民眾，無法留下歷史。這首先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教育，因此不具備記錄的能力，再者，他們沒有足夠的成功，因而沒有餘裕留下紀錄。因此民眾運動的歷史，要不是口傳，就是有利於支配者的紀錄。埋頭於這些支配者的紀錄，不可能形成正確的歷史認識。再者，民眾運動史的一手資料，是在運動過程中被暴露而逮捕的人之法庭紀錄。援引搜查紀錄，將會造成嚴重的歷史扭曲。強者才留下紀錄，而歷史不只是被暴露的內容。這只不過是被暴露的冰山一角而已。因此，基於歷史觀，統整資料，並加以再詮釋和再生產，才能提示正確的歷史認識或者敘述方法。基本上，擺脫資料的約束，讓它成為只不過是歷史認識的線索而已的時候，歷史敘述才能站在民眾立場。⁷¹（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這些工人運動史研究，大體上都顯示了脫離應然或未達到應然。雖然可以把它視為過去

歷史性政治狀況制約的產物，但是如此制約已經成為了惰性。因此這些研究應該承認自我矛盾。而這些矛盾甚至來自過剩的自我忘卻。⁷²（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上述的歷史敘述原則，是朴玄採一貫的基本立場。他多次提出歷史學的歷史主義陷阱，並強調說，如果我們沒有克服此陷阱，那就無法站在民眾的立場。而且，他在一九八〇年代末，針對當時的歷史研究，提出了「過剩的自我忘卻」所造成的矛盾，即「去歷史化」問題。

雖然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等到一九八〇年代才可以成為公開和全面討論的對象，但是醞釀和發展過程本身，涵蓋了戰後整體新殖民化過程。也就是說，民族經濟論從未被停斷過，民族經濟論因此可以成為不只針對一九八〇年代，且同時針對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的歷史斷裂的立體性內部參照點。我們尤其可以期待，民族經濟論成為將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對我們的陌生感以及一九八〇年代的複雜性，加以批判性地嫁接的環節。

71 參見【韓】朴玄採的〈解放後勞動運動史研究現況與方法論〉，引自《韓國近現代史研究入門》（朴玄採等著，首爾：歷史批評社，一九八八），頁一五五。

72 同前引註，頁一五七。

2. 思想與實踐

日本經濟學者瀧澤秀樹（一九四三—）長時間關注了朴玄採思想與南韓民眾運動諸領域之間的密切關係，並認為朴玄採扮演了將一九七〇年代歷史學、文學、政治／社會運動互相串連起來的角色。⁷³而且，與朴玄採一起捲入了人民革命黨事件，也因為後來的林東圭間諜事件與他一起服刑的林東圭，回顧了朴玄採當時在南韓民族民眾運動中的地位：

我反而只滿足於在朴先生身邊，輔佐他所秘密執行的變革運動總指揮的角色。而且，具體地講，朴先生的日常生活就是在社會科學荒地上，照亮社會科學之光，因此我不能不給他予以絕對的信任。當時主管學生運動的朴某、主管工人運動的李某、籌備農民運動的李某，甚至女性運動，這些實質的領袖，都來找朴先生，請求諮商，而他也欣然接受並調整各種立場，安排了互相支援和分工角色。事實上，他扮演了變革運動的總指揮角色。因此我對他，不能不表示至高的敬意。⁷⁴

不過，朴玄採不只扮演了變革運動的總指揮角色。南韓重要政治人物金相賢（김상현，一九三五—二〇一八），於一九七〇年創刊月刊《橋》（월간《다리》），發行期間為一九七一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十月），並在停刊前邀請朴玄採擔任編輯委員，以便在政黨外部支援當時的總統候選人金

大中。

一九七一年，我擔任新民主黨政策審議委員會副議長，並兼任第七屆總統選舉候選人金大中的秘書長。當時每到關鍵時刻，朴玄埰前輩都給了我很好的建議。尤其他擔任編輯委員的時候，他帶頭大量動員了經濟專家。這對我們是很大的力量。

有眼力的人，大概看透了金大中前總統的「大眾經濟論」，其實是朴玄埰的「國民」或「民族」經濟的現實版本。他在月刊《橋》上，婉言撰寫了基於如此理論的文章。⁷⁵

朴玄埰這樣子的實踐型面貌，一直持續到一九八〇年代，而在社會形態／性質論戰中，他仍然堅持了主體性「理論」姿態。因此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朴玄埰遭遇到論戰的快速理論主義化，於是就以民族（歷史／理論）＝民眾（現實／實踐）這麼一個辯證統一的方式，試圖體現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實踐」模式。從中朴玄埰同時批判地思考經濟理論的「殖民性」和「派性」：

73 「民主恢復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他們共同分享的，換句話說，把它們串連起來的，就是『民主、民族和人權』，並且它具體存在方式或基礎，應該說是民族經濟。民族經濟在那些『運動』中被分享，並在現實中，活著的」，引自【韓】瀧澤秀樹（一九八五）《現代韓國民族主義論》（金容寬譯，首爾：未來社），頁一三五。

74 引自【韓】朴玄埰全集發刊委員會編（二〇〇六）《啊！朴玄埰》（首爾：Haeam），頁二六二。

75 同前引註，頁六三。

經濟理論具有自我發展的邏輯，反映社會狀況和特定歷史時代下一定利益群體的需求，因此極為具有派性。而且，這也反映在民族之間的關係。經濟理論的展開，也利用民族之間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凸顯了先進資本主義民族的理論壟斷以及該理論在自我體驗上的展開。如此狀況也反映在先進民族內部被異化的民眾構成。人類在被賦予的狀況下，將歷史體驗中作為先進民族的生產物之諸多理論，看作一般理論，並努力維持它所提示的普遍性。但是，作為理論的經濟理論所具有的上層建築性質，雖然是因著社會實踐不斷地要求而存在，卻讓它成為保守性的理論。⁷⁶

理論的派性，意味著理論無法以純粹理論自居，反而總是在與「實踐」的關係下有所作用。朴玄採從經濟理論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性質，認識到此點。他之所以不願貢獻於「理論的體系化」，也是因為他認為，即便理論的體系化能有對於現成理論的批判性，但是體系化後將被理論場域所封閉的可能性，仍然是朴玄採警惕的對象，因此他期待，理論作為一種實踐，也作為一個過程，能夠忠實於「歷史」以執行歷史所賦予的任務。⁷⁷

因此，朴玄採不把「理論的派性」視為簡單的對立，反而從矛盾論的角度，視之為統一的對立，並且透過介入情勢，提出克服矛盾的「建設」性方向。換句話說，朴玄採與陳映真一樣，將具有歷史性系譜的「民族主義」，看成自己思想實踐的根據。因此，他的思想超越了簡單的「抵抗」或「反題」，明確地擁有了「建設」和「恢復」的企圖，也就是以重構共同體生活模式為目標。

他之所以提出「思想」問題，也是因為理論性論述很容易留在簡單的否定或分歧，只能滿足知識工作者的觀念性。而朴玄採的「理論」總是在思想的照望下，關係到「具體的實踐」，這正是提出知識的「責任性」和「倫理性」。

76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第一部：民族經濟論的概念與構成，第一章：民族經濟論的提起與民族經濟概念），引自頁二三。

77 朴玄採除了本人的著作外，參與了相當龐大的日文和英文著作的翻譯和編譯工作。他的翻譯實踐表現出他對於「獨創性」理論主義的警惕，同時不斷努力學習、吸收和分享一般理論的資源。他的「非獨創」的思想實踐，讓它具有「非所有性質」，因此更具有「主體性」。朴玄採的主要翻譯工作包括：【日翻韓】《資本主義發達史研究序說》（자본주의 발달사 연구서설，首爾：韓吉社，一九八一，編譯）；【日翻韓】《現代經濟思想史》（현대경제사상사，首爾：Jeonyewon，一九八二，編譯）；【日／英翻韓】《重談戰後資本主義》（전후 자본주의의 재검토，首爾：學民社，一九八三，編譯）；【英翻韓】《解剖權力》（권력의 해부 / (The) Anatomy of Power，首爾：一友，一九八四）；【英翻韓】《革命的時代》（혁명의 시대 / 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首爾：韓吉社，一九八四）；【日翻韓】《資本主義的形成與農民階級分化——農業內部的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之形成過程》（자본주의의 형성과 농민층 분해론——농업내부의 자본주의적 계급구조의 형성과정）（首爾：Hanul，一九八五）；【英翻韓】《不確定的時代》（불확실성의 시대 / The Age of Uncertainty，首爾：汎友社，一九八八）；【日翻韓】《日本經濟史》（일본경제사）（首爾：知識產業社，一九九〇）。此外，他也參考日文版經濟學辭典，與趙容範一起，編纂了反映他的民族經濟論問題意識的【韓】《經濟學辭典》（首爾：草色，一九八八）。

「目的性的論戰／意外的波瀾」

朴玄採並沒有提出關於社會形態或社會性質的系統性一般理論。事實上，一九八五年他寫的論文，為的是批判當時南韓思想界「接受依賴理論的方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卻產生了意外的波瀾。尤其在論戰初期，朴玄採與依賴理論的對立格局，轉換為「民眾民主」和「民族解放」的對立，也就是說，從社會形態論戰轉換到社會性質論戰之後，朴玄採能夠介入的空間幾乎沒有了。因此，我們不能把朴玄採視為「社會性質論戰」的當事人。在此脈絡下，我要在此重構朴玄採批判「依賴理論」的脈絡，並透過分析「社會性質論戰」與朴玄採有關的論述，呈現朴玄採的困惑。

朴玄採的社會形態論，以具體的歷史和現實關係為基礎：他基於對殖民地朝鮮之歷史脈絡的厚實認識，結合了作為理論參照點的中國和日本的理論發展，以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當初引發論戰、於一九八五年刊登的〈關於現代韓國社會的性質與發展階段的研究（I）——圍繞韓國資本主義性質的依賴理論批判〉一文，⁷⁸也不是直接提出「社會性質論」，反而是要批判那些接受依賴理論的態度。雖然題目中的「韓國社會的性質」可能產生一種期待或誤解，但是此文主要批判的對象與內容，就是依賴理論（以及邊陲資本主義論和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論）在社會形態的層次如何否定資本主義性質的問題，或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論如何以社會性質取代社會形態的謬誤。由於社會性質是實踐層次與主要矛盾的範疇，但若是以社會性質（半封建）取代社會形態（資本主義）做出論述，那麼如此立論就成為主張以實踐取代理論的理論，如此一來的理

論，就放棄了理論本身的作用，而終究脫離實踐。總之，朴玄採提出問題的目的，在於強化理論的實踐性，而非造成理論和實踐內部的分化和分裂。

朴玄採首先關注「依賴理論中的邊陲資本主義論」，探討了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拉克勞(Ernesto Laclau, 1935-2014)、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以及阿拉維(Hamza Alavi, 1921-2003)等人的有關論述之後，提出如下結論：

整體來看，關於邊陲資本主義的結構或邊陲社會形態的許多討論，即使它們能夠更精密化，其意涵基本上也不超出我們常說的「社會生產的經濟剩餘外流機制扎根於殖民地的殖民地經濟結構」。何況，這些內容不具備作為社會形態的條件。⁷⁹

另一方面，朴玄採接受日本經濟學者本多健吉(一九三四—二〇〇七)的問題意識，展開自己的論述。

78 之後，此論文的題目改成為〈關於韓國的社會性質與發展階段之問題之提出〉，並收錄為《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第三部第七章。如同題目所顯示，此論文是第一篇，而且也有關於第二篇的企劃，但是在第一篇出刊之後，在意外波瀾中，後續的文章無法刊登。

79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第三部：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第七章：關於韓國的社會性質與發展階段之問題之提出〉，引自頁三四二。

他〔本多〕指出的內容中，吸引我們關注的是，（1）〔依賴理論〕缺乏闡明對於產生民族主體力量內在發展的動態過程；（2）低估了在低度發展世界的解放過程中，「民族國家」的形成所具有的意義。〔……〕戰後所賦予的不同狀況，需要被說明。而且這個說明，不能與各國民族主體的形成過程無關。雖然論者們之間存在著偏差，但是這些錯誤，是因為個別依賴論者的傾向，也就是帶著不從內部因素尋找歷史發展的動因，反而從外部〔中心地區〕尋找歷史發展動因。因此，他們表面上說要克服《帝國主義論》〔列寧，一九一七〕的缺陷，即將焦點放在闡明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運動規律，但是他們也犯了同樣的錯誤。結果，他們連帶低估了民族國家的形成。〔……〕他〔本多〕借用武藤一羊的論述，指出依賴理論「傾向於在一般相互關係下，消除其內部明確存在的大範疇——民族國家」，並認為，三個大陸的國家之間的類型差異，「被歸屬於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階段之類型差異問題，結果基於前者（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沒有具備普遍理論該具備的條件」。此外，依賴理論或邊陲社會形態論，雖然強調特殊性，終究淪落為對於一般性的強調。而且，依賴理論否定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均衡性，從而又淪落為歷史停滯論，進而否定了邊陲國家自立的可能性，也就是，雖然強調社會實踐，但是卻淪落為經濟決定論。它們難免於遭受這些批判。⁸⁰

（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朴玄採所批判的依賴理論的問題，主要在於它過於強調「外因」，因而忽略歷史性民族的現實主體性和可能性，因此依賴理論並不具備實踐性。接著，朴玄採在同樣的脈絡中，批判（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會(形態)論。批判的核心內容，是針對邊陲資本主義追溯歷史的企圖，也就是將適用於殖民地朝鮮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論」，改造成作為一種「社會形態論」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論」。為了具體討論此問題，朴玄採介紹了中國的討論狀況：

但是，我認為，這些問題，在中國內部，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已經得到結論。一九三七年，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出現，接著一九四〇年，《新民主主義論》也出來。這些著作上所敘述的論述，提供的是對應於主要矛盾，並非對應於社會形態論所規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理論基礎。〔……〕毛澤東於一九三七年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是為了矯正教條主義的偏向，並解明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以及事物矛盾原理問題等哲學的重要課題。⁸¹

(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換句話說，朴玄採從基於主體性脈絡的教條主義批判，接受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所提出的「主要矛盾」概念，並且警惕了以作為理論性範疇的社會形態，取代社會性質與主要矛盾的企圖。因此，朴玄採對於作為依賴理論變種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論」和「邊陲資本主義論」，提出如下結論：

80 同前引註，頁三四六—三四七。

81 同前引註，頁三五〇。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論試圖設定邊陲社會固有的繼起性歷史發展邏輯或階段，不具有作為社會形態論的理論根據。而且，從現實來看，第三世界的歷史發展無法證實那些論述的試圖。邊陲資本主義論和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缺乏理論的妥當性，並且依賴理論本身作為尚未完成的經濟理論，快速地走上衰退之路。雖然如此，在我們社會的社會科學研究中，諸如上述的社會形態理論仍被採用為闡明我們社會的性質和發展階段的理論標準。我們不能不擔憂如此狀況，因為這樣的狀況，造成了解決我們自身問題時，對於所需歷史和現象上的認識錯誤。⁸²

朴玄採對於「依賴理論」和「邊陲資本主義論」的批判，基本上是針對那無意識地以第一世界為中心的普遍設定，同時也針對對比於普遍主義所得到的經驗主義「特殊化」，從而脫離「實踐論」的問題。朴玄採不把理論當作個人的私有資產，而把它視為公共資源並追求實踐性學問，因此警惕了依賴理論的脫實踐性，也就是依賴理論如何傾向強調「外因」，而無法闡明歷史「內在的主體性和動力」，終究會在與「實踐」的關係下產生負面影響。如此特殊主義的核心內容，正是將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另一種社會形態，加以概念化。因此，在朴玄採看來，依賴理論其中一種版本的邊陲資本主義論，事實上是邊陲社會形態論，脫離了「資本主義論」的基本定論。在朴玄採的論證中，成為主要批判對象的，尤其是日本經濟學者梶村秀樹（一九三五—一九八九）。朴玄採引介了梶村關於依賴理論和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之關係的論述，接著提出了如下問題：

據〔梶村〕說，為了克服阿明邊陲社會形態論的類型學所具有的停滯論認識，需要奠定貫穿東西洋的一般理論，因此他認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或邊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都具有各國共通的一定特徵，並認為這些特徵不是透過個別特殊性一個一個掌握到的。而且，他主張，如此道理的根據如下：制定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的各國具體特殊性有兩個因素，其中之一是因為殖民地本國（宗主國）的需求，讓殖民地內部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狀態，遭受全面的重組，然後被打平，於是成為次要的因素，而掌握殖民地權力的本國資本主義的經濟需求，成為基本因素而得以貫徹。如此主張，不只是消除了本國資本主義經濟需求的多樣性，而且只不過是藉由透過具體性的強調而提出特殊性，接著創造出另一個一般性而已。而這也不是科學的方法。這是將個別本國資本主義的反覆性經濟需求所帶來的標準化，視為一般性，並不將先進資本的外在性管制和內生的因素結合起來，反而只以外部條件就得以一般化的。因此，這本身與邊陲的認識方法，即從第三世界主體立場看待第三世界或歷史的觀點，產生了矛盾。也就是說，這是拒絕從真正的一般性貫徹自己，反而犯了打造出虛假一般性並埋頭於它的錯誤。〔……〕雖然他說，「發展」總是矛盾的擴大，深化過程或「低度發展的發展」過程，但是社會形態過渡不是只有矛盾的深化，它是矛盾的生成、深化和消滅，以及新矛盾

的生成，這樣子的一個辯證性過程。而且，在他對於過渡的論述中，發展的動因和過渡的條件僅僅只有外生性國際分工面向。⁸³（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朴玄採一方面表示必須考慮中心地區本國資本主義經濟需求的多樣性，另一方面更重視殖民地「內生因素」所隱含的歷史縱向。這就間接地反映了以（半）殖民時期毛澤東思想為契機而發展出來的，朴玄採的歷史多元主義思想。因此，朴玄採甚至認為，那樣的依賴理論或邊陲資本主義論，脫離了中國革命過程中出現的資本派（勞農派）和封建派（講座派）對立的政治經濟學傳統。⁸⁴如果說，「勞農派」相對帶有去歷史性理論主義（實踐上的教條主義）的傾向，那麼，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加以問題化的邊陲資本主義論，可視為第二次理論主義的產物。如此的理論主義依靠「普遍—特殊」的邏輯，試圖「假想」自立化，而後在南韓形成了脫離現實的兩種偏向：首先是從邊陲資本主義論到中進資本主義論的轉變（以安秉直為代表），⁸⁵而另一邊的左翼版本是從邊陲資本主義論到托洛茨基主義的轉變（以丁聲鎮為代表）。⁸⁶

如此朴玄採所批判的對象的歷史軌跡，似乎一方面證明朴玄採批判的正確性，另一方面也呈現他批判力度的不足。事實上，朴玄採的困惑不只如此。不同於遭受如此批判的對象，此文發表後，即出現了主動繼承朴玄採理論、年輕一代的理論走向，不過這讓朴玄採更加不安。所謂「民眾民主派（PD）」試圖將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和「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規定）兩者互相分開來，甚至將民族經濟論的「封建派傾向」視為克服的對象。換句話說，他們試圖

從社會形態論中，直接演繹出社會性質論，因此實際上去除了在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新殖民性範疇。結果，後來在民眾民主派身上，只剩下對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批判，並淪落為階級中心主義，終究違背了自己的「民眾」民主原則。

但是對朴玄採來說，「壟斷」是「新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邏輯和理論表現，因此不與「半封建性」互相矛盾，進而設定了作為「壟斷資本」的對立項之「中小資本」和「民族資本」。

換句話說，民族經濟論的早期設想，就包含了「壟斷（財閥）」和「中小企業」的對立，不過，在社會形態論戰中，出現了一種誤解：「反壟斷」和「半封建」互相矛盾。換句話說，若在社會形態層次設定了「壟斷」資本主義，就無法同時在社會形態層次設定「半封建」。但是，在朴玄

83 同前引註，引自頁三五九—三六〇。

84 朴玄採被鄭民訪問的時候，比較清楚地表示自己立場：「鄭民：（……）我覺得，八〇年代以後的討論，對應了各種邊陲資本主義論的快速擴散，因而『論戰』的脈絡稍微不同。是否，邊陲資本主義論，既不是勞農派的，也不是講座派的？朴玄採：是的。更嚴密地講，邊陲資本主義論不在政治經濟學傳統裡面。（……）日據時代，作為社會形態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未被提及。殖民地半封建是對應於殖民地條件下韓國社會或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概念」，引自【韓】朴玄採和鄭民對談的〈民族經濟論——闡明民族民主運動的經濟基礎〉（同前引註6），頁四〇七—四〇八。

85 經過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作為首爾大學經濟系教授和榮譽教授的安秉直，於二〇〇六年起擔任「新右翼基金會」（今為「時代精神」）理事長，成為南韓所謂「新右翼」的代表性人物。

86 參見【韓】丁聲鎮的〈八〇年代韓國社會形態論戰與邊陲資本主義論〉，收於《韓國社會研究·5》（首爾：韓吉社，一九八七）的頁二四—二五和頁一五之註13。之後，丁聲鎮的研究，基本上採取了托洛茨基式的問題意識。

採看來，「反壟斷」資本主義，不能留於抽象的「反資本主義」，而必須要走向建設性實踐，因此他設定了以「中小企業論」為核心的民族經濟的自發性領域。也就是說，他在分析經濟現象的時候，雖然邏輯上根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是朴玄採同時從歷史能動性的角度，總是設定了民眾為了改善生活的努力所形成的自發性領域，進而提出了基於「局部市場圈」概念的「中小企業論」。因此，他的經濟思想，並不流於簡單抽象的「資本主義批判」。

在朴玄採看來，壟斷和依賴是不同層次的概念。「壟斷」對應於社會形態的發展階段，「依賴」或新殖民則對應於半封建社會性質。「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概念，是為了闡明半封建再生產結構和社會性質所引進的理論性範疇，因此，在歷史社會性質（「非經濟性強制」和「買辦性」等半封建範疇）的照望下，「壟斷」對應於作為主要矛盾範疇的「民眾」。承擔著民族主義運動的歷史課題之「民眾」，就對應於主要矛盾，因此「民眾」不能化約於「階級」。在同一層次，若將依賴和壟斷，視為並列性或因果性關係，那麼「民眾」就會被化約於階級，並且如此的階級化的民眾，就成了被理論約束的抽象化和平面化的主體，這麼一來，對依賴的認識也不能具有主體性，反而會淪落為抽象的反帝國主義論述。

朴玄採在運用理論的時候，非常忠實於「正統」和「古典」，但是在分析現象的時候，非常「具體」並具有「情勢性」。其實如同前面有關於依賴理論批判所提出，朴玄採對於社會實踐中理論的理論主義分歧有所警惕，正因為理論主義其實就從屬於「理性主義／經驗主義」的「普遍／特殊化」邏輯。也就是說，脫離實踐的「理論性成就」，反而服務於普遍／特殊的靜態性理論權威的再

生產。一九八五年朴玄採的論文之結語，系統性地論述了歷史認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問題。雖然篇幅有點長，但包含重要內容，所以以下引用該段落全部內容：

在經濟層次看歷史，意味著闡明人類的經濟活動和其發展過程。這不是關於世界各民族、各國的經濟生活過程的簡單概括，而是發現貫串個別具體的整體普遍發展規律。因此，這雖然是現實性的歷史，但不是真正的具體歷史的現實，而是一定的理論性抽象的產物。而因為科學中社會科學的目的在於對歷史性社會現象的規律性認識，所以如此狀況是必然性結果。

但是現實中人類的社會需求，需要更具體的內容。這應該是透過闡明自己具體的歷史性狀況，而提示未來，並且應該成為對實踐的指針。但是歷史認識和科學地追求抽象規律本身，無法提供立即性的和對當下有用的內容。再者，歷史中民族或地區之間經濟力量的不均等，在科學研究上也產生了單向偏重，因此造成先進諸民族的壟斷或地區間不均衡，結果在歷史認識或社會科學上，所獲成果的諸多規律，早就遭受質疑。並且，社會科學的派性更深化如此疑慮。在經濟學領域，甚至已經成為一般性的理論，也因為它來自西方而被排斥。

的確，過往期間將西方的東西視為一般性的傾向，不無存在。在經濟史領域，也一度把西歐經濟史內容，視為一般經濟史。而且，如此的思考背後，就存在十九世紀西歐人自我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從此立場來看，亞洲是永遠的「停滯的社會」，且被排除在認識對象範圍外。就許多經濟史範疇來講，也曾有如下傾向：將從西歐經濟史得到的概念內容，立刻當作

具有世界史和規律性意義的概念，因而以它為工具，進行對具體的一個國家的歷史認識。因此，在這樣的狀況下，理所當然地，具體的歷史認識就難免公式化，並無法真正認識特殊和具體的內容。關鍵問題是，如何努力地加以統一作為相互彌補的方法之歸納和演繹，透過社會實踐，確認一般性，而將此一般性，適用於具體性，使得現實認識得以透徹，同時透過確認具體性，豐富一般的歷史發展規律？我們應該認為，具體的一個國家的歷史是成為闡明一般規律的有力材料，並且透過這份材料去豐富和發展歷史規律的內容。而且，若要貫徹如此想法，我們不能滿足於利用現成概念或尺度，簡便公式性地說明具體的歷史性現實，而更要堅持一種態度：以一般性規律為媒介，始終追求歷史性現實的具體圖象。

在有關於戰後世界經濟的狀況認識來看，也是同樣的情況。為什麼深化了如此對立？這是因為在戰後世界經濟重組的過程中，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展開了擁護帝國主義利益的國際分工邏輯，並且為了此目的，援用了所有的理論。有關於狀況的認識對立，不只涉及到戰後狀況的認識，也得溯及關於戰前狀況的歷史認識。隨著第三世界論興起而被提出的依賴理論，即邊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論或者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也是圍繞經濟發展的戰後狀況之產物。但是，即便是如此狀況的產物，對於具體性的過度執著或強調新的一般性，仍然無法具有正當性。

我們可以採取兩種歷史認識方法：第一，盡量具體地、自覺地迴避理論化，著重於敘述歷史過程；另一種方法，則是利用已經一般確立的理論性和規律性認識方法和基礎性諸

範疇，例如經濟制度或社會形態等理論工具，闡明歷史發展規律，並正確地認識今日狀況（一個社會的性質和發展階段），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為具體歷史的過程和現象賦予理論性程序，從而發現具體國家的具體性。這兩種方法，並非直接互相正面矛盾或排斥。即便採取前者方法，但不以一定理論或概念為媒介的歷史認識，仍然不能存在。而且，這樣的歷史認識也終究不能不經過抽象化，因此也不能不經過一般化。即便如此，將個別認識為個別本身，而以狹窄的外延，任意創造和敘述新規律，與以普遍規律為媒介，認識個別並闡明個別的特殊性——這兩者之間有著基本的差異。應然的歷史認識方法，是以普遍性規律——雖然它是規律性，因而不完整——認識個別，並闡明個別的特殊性。

而且，歷史認識中，經濟認識在與其他歷史認識和整體歷史認識所形成的關係中，並非孤立地存在。在與整體歷史認識的關連下，它才成立。而現象是所有事物的互相交織。因此，不只在經濟方面，也在整體歷史認識方面，我們需要研製一個完整的體系，雖然它尚未完整，而因為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這個體系終究不可能具有完整性。而且，為了討論的創造性發展，我們首先做好關於概念和分析工具等基礎範疇的正確認識。

總之，作為闡明韓國社會性質和發展階段的分析理論之邊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論或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在正確歷史認識的努力過程中，不管其動機或背景如何，陷入了重大的預斷或謬誤。⁸⁷（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87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第三部：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第七章：

在此，朴玄採形成了雙重戰線。首先，他指出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認識將亞洲本質化的問題，並認為在那些歷史認識中，亞洲被置於認識對象範圍之外。但是，他同時警惕了「過度強調具體性或新的一般性」，這尤其與朴玄採的論述如何促發大規模論戰有關。在朴玄採看來，後者的批判對象就是依賴理論和邊陲資本主義論（以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論）。相對來說，朴玄採似乎不太覺得前者問題有多麼嚴重。因此他仍然具有信心，援用「普遍性」。⁸⁸這就關係到他對待理論的態度。對朴玄採來說，他親身體驗的二十世紀殖民和內戰歷史，使得他能夠「透過社會實踐，確認一般性」，並且持續「將一般性適用於具體性，使得現實認識得以透徹，並且透過確認具體性，豐富一般的歷史發展規律」，這也正是他在新殖民時期的知識工作。如同前述，朴玄採不同於陳映真苦惱於「思想的貧困」，反而著重於將「思想的斷裂」加以問題化。朴玄採所呈現的實踐性態度，之所以擁有主體性的姿態，是因為具有「派性」的思想位置基本上具有繼承性，而不是斷裂性，即便「歷史」總有曲折。儘管如此，事實上，在一九八〇年代思想論述的實際展開過程中，朴玄採的歷史繼承性反而被孤立起來。

朴玄採透過「新殖民性」認識，將「民族」問題視為具有第一意義的主要矛盾。但是，「新殖民性」認識已經包含了關於「內戰」和「分斷」的思維。朴玄採所面對的一九八〇年代語境，曾經經歷過長期現實制約所帶來的曲折，並且似乎處於嚴重的「自我忘卻」狀態。這就是「新殖民／分斷體制」的主要後果之一，也是讓朴玄採被孤立起來的原因。

朴玄採的孤獨：短暫的「開放」與「斷裂」的深化

我要再次引用前面介紹過的朴玄採於一九八九年受獎演講中的一段內容。

民族經濟論的目的在於站在作為確保民族生存權和發展之民族主義需求上，闡明在國民經濟內外所進行的民族經濟的主體性發展，以及隨之的它與外國資本和買辦資本的相互關係。因此它只不過是接受現成經濟理論，並對它加上民族主體性的現象認識所需要的補充性工具而已。

我曾經在《民族經濟論》的序文中指出過，「我把自己的角色，設定為非輕率創造者之誠實的解說者」。我努力堅持了如此立場。⁸⁹

朴玄採認為，民族經濟論的目的在於對現成經濟理論加上「補充性工具」，因此他摸索的不是「新」的一般理論，而是一般理論的「適用」與「發展」。

⁸⁸ 關於韓國的社會性質與發展階段的問題之提出，引自頁三六三—三六五。

⁸⁹ 如同前述，朴玄採提出批判說，依賴理論和其變種脫離了「政治經濟學傳統」。這就反過來意味著，朴玄採確信自己在思想實踐的層次，繼承了政治經濟學傳統。

⁸⁹ 引自【韓】朴玄採的〈今日的歷史狀況與民族經濟論〉（同前引註67），頁七二三。

理論的精密化或發展成體系的需求，並不緊密地扣連著理論在社會實踐上的角色。因此，這只不過是理論本身自我發展邏輯的實現而已。民族經濟論試圖將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應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下的殖民地依賴型資本主義發展國家，並摸索適用於這些國家的「一般理論」。因此這並不是那種以新的一般理論的莫立取代一般理論的意圖。⁹⁰

朴玄採所指出的「殖民地依賴型」，似乎包含著一種作為「理念型」的類型論。他偶爾以「形式邏輯」來指稱它。他認為，類型論不能被化約於具體性和個體性。也就是說，理念型（理論），不是從具體到抽象的上升而得到的。朴玄採以此觀點，提出了對於樸素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批判。因此，朴玄採警惕了以個別實體為根據，否定一般理論，進而莫立新的一般理論的特殊主義。而且，此批判的目的就是矯正脫離實踐和運動的理論傾向。從這樣的脈絡，我們可以理解，在社會形態論戰中，「邊陲資本主義論」之所以成為朴玄採所批判之對象的緣故。朴玄採認為，邊陲資本主義論或邊陲社會形態論，脫離了資本主義一般理論或政治經濟學傳統。不過，朴玄採同時也在社會實踐層次，試圖發展一般理論。朴玄採的思想實踐，以此種類型論（包括社會形態論）批判了以普遍—特殊的固定框架，認識「他者」和「自己」的方式。

朴玄採在社會形態層次，將南韓社會設定為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同時他認為，從社會性質來看，南韓社會是「半封建」社會。表面上看，這兩者似乎相互矛盾。但仔細看，他所

提出的「社會性質」，是為了提示「主要矛盾」。他認為，透過具有歷史性的「獨自性」和「特定性」（並非「固有性」），能夠表現「主要矛盾」的具體性。換句話說，「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形態層次的一般概念，因此具有抽象性，而不能直接表現主要矛盾，因此必須從社會性質來看，即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主要矛盾層次，南韓社會是「半封建社會」，而為了理論性表述，在現象認識層次，援用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在如此脈絡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成為理論性的表現，即在新殖民地條件下資本主義的特殊性之邏輯性範疇，並且他在社會性質層次，得出了以非經濟性強制和買辦性為核心內容的「官僚資本主義」設定。「半封建」性質可視為如此「官僚資本主義」的社會性質。但是，在現實論戰的格局中，朴玄採的論述卻成為理論激進化和分歧的催化劑。因此，他不再介入論戰，反而在論戰外邊提出了對「理論主義」的批判。不過，現實的論戰藉由其內在動力，得以擴大再生產。

90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第一部：民族經濟論的概念與構成，第二章：民族經濟論的構成），引自頁四六。

反思「貧困」和「斷裂」的相互內在化

相互參照的認識與後冷戰的悖論

如同〈奉請〉一章所提出的，陳映真在殖民—分斷重疊和雙重分斷這麼一個台灣的特定條件下，透過重新認識且照明作為傳統的「根」以及在內戰的延續上進行抗爭的台灣左翼和共產黨革命運動，試圖打開歷史，並加以重新歷史化。第一次分斷，可視為民族間對立所導致了割讓形式的產物，而第二次分斷便是民族內部左右對立與冷戰對立相結合的產物。對陳映真來說，有鑑於國共合作所成就的殖民之主體性總結，在台灣克服第一次分斷（以及殖民）的方式是「回歸」，即民族性的恢復，而克服第二次分斷（以及新殖民）的方式，是分享「內戰」，並走向社會主義中國統一。因此，陳映真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視為內戰和冷戰相結合的「雙戰結構」。如此複雜的歷史條件也成為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民眾複雜構成的原因，而作為政治權力和民眾構成的主要部分之「外省人」，同時也是另一個讓新殖民條件更加複雜的內部因素。

相對來說，朝鮮的殖民並沒有割讓性質，因此克服殖民性的方式，不能是「回歸」，而是「獨立」。不過，這就產生了在與中國相較之下，更為突出的「獨立」的非主體性條件。這就成了「去殖民」課題的不同背景。不過，朝鮮在「獨立」之後，同時面臨「左右」對立和隨之的「內戰」，去殖民課題因而遭遇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內部矛盾錯綜複雜化的情景。再者，內戰因為外部勢力的介

入，而以非正常方式停止，之後的停戰和分斷體制，在南韓以反共意識形態為媒介，將民族內部的矛盾置換成國家間的矛盾，同時，民族間的矛盾也被包裝成冷戰的陣營邏輯。這也可視為南韓版「雙戰結構」。

在台灣，克服第一次分斷成了克服第二次分斷的前提；不過在南韓，形式上克服了殖民的「獨立」，不具有主體性外表和實質內容，同時，圍繞著民族內部矛盾的左右之間的對立和競爭，與「獨立」重疊起來，結果產生了民族運動內部的分化和分裂。後來，如此左右之間激烈鬥爭所產生的精神上的創傷，也成為一個歷史斷裂的背景。亦即，在南韓，「意識形態」雖然具有歷史連續性，但內戰後全面被貶毀成負面詞語，而如此的意識形態無用論，成為反共主義的重要工具。事實上，缺乏主體性的獨立，造成了左右對立的激化。換句話說，在缺乏民族主體性的指揮下，左右對立得以形成，並且左右矛盾與外部矛盾（冷戰體制）結合起來，結果形成了「分斷」這麼一個被扭曲的體制。在此體制下，民眾遭受了以政治權力（反共主義右翼菁英）和經濟權力（反共主義地主和資本家）的同一性為核心特色的、強大法西斯體制的壓迫。法西斯主義的特質，尤其展現在由於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主體都直接體驗過「紅色恐怖」，因此強烈的「反共主義」便成為體制再生產的核心意識形態工具。總之，去意識形態化的「反共主義」，是南韓現代性的具體表現，同時將民族內部矛盾和民族間的矛盾，都轉型為「國家間」的矛盾。這事實上去除和扭曲了「民族性」這麼一個歷史性範疇。結果，我們繞著此種去除「民族性」的「反共主義」打轉，也就沒辦法基於歷史整合性，認識殖民、內戰、分斷和新殖民的歷史。

我認為，對於這些歷史過程的審視，有助於理解當朴玄塚提出「民眾論」時，特意保留以下觀點的脈絡：「這只不過是邏輯性的，不一定具有現實性」。這正是因為，在南韓，「反共主義」力量並非「邏輯」性的存在，而是以極端暴力所造成的集體創傷以及防衛性忘卻為基礎的情感炒作機制。

而且，後冷戰在南韓的展開卻與內部的論戰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也就是說，當後冷戰的影響力全面化的時候，南韓思想界根本無法展開主體性的應對行動。事實上，在後冷戰這麼一個全球性的轉型中，韓半島南邊的「大韓民國」，即使以一九八〇年光州慘案為契機，將歷史和現實認識以及主體形成作為課題，並且出現了關於新殖民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正式公開論戰；然而，經過幾番曲折，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民族」要不被「民族解放」外在化，要不被「民眾民主」所消除，而兩者形成了假想的二元對立，結果對應了「後冷戰」的主體性轉型，只能告以失敗。相對來說，冷戰動搖在台灣的反應相對明顯，因而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就促發了保釣運動、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等。如此的台灣經驗，可以成為對南韓的參照點。

無能於內在地思考新殖民／分斷體制的南韓社會性質論戰本身，某種程度上以「脫民眾性」和「脫實踐性」的外在性為特點。其中，民族性分斷關係被外化為「國家」間關係，同時，冷戰動搖的情勢也不被當成克服冷戰的契機，歷史反而走上了「冷戰性的後冷戰」，即殖民／分斷矛盾被抽象化成形式民主和國家整合的問題。尤其是「資本主義問題」成為純粹的理論問題，因此，有關資本主義的理論分析，也缺乏歷史性的照望，從而脫離了實踐。雖然理論的必要性仍然被承

認，但是在缺乏思想的基礎和照望的狀況下，理論論戰的責任性便成為知識倫理問題。實際上，從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以來，知識分子有責任於將理論和實踐加以嫁接的傳統，從歷史被斷裂開來，並持續到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以及二十一世紀的當下。⁹¹

「貧困」和「斷裂」

宋基淑：如果我們的社會處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那麼應該能夠闡明韓國的特殊性吧。

朴玄採：我們應該對照於一般指標，然後提示從中所發現的特殊性，並且要擁有對於今日韓國社會的實踐問題，或者韓國資本主義現象認識的自我標準。不過，我們的出發點，應該是否定今日理論展開中的形式邏輯。「他們」主張具體性，卻試圖以一句話表現所有內容。學問不能是這樣的。我們應該以思維提示，個別說明不同部門，然後試圖達到總體性認識的過程。因此以規定韓國資本主義的幾個詞語，試圖解決所有問題，是不正確的。⁹²（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91 如同本書〈奉送〉一章所談論，這似乎牽涉到以理論為私人「所有」對象的，所謂一九六〇年四·一九之後菁英和群眾的關係模式之時代局限。

92 引自【韓】朴玄採、宋基淑對談的〈八〇年代在民族史上的意義〉（同前引註25），頁二九。

我們在認識事物的時候，能力有所局限，因此我們動員了形式邏輯。以正確認識事物為目的的形式邏輯，把它們〔事物的不同面向〕互相加以分離。不過，如果認識過程變成只不過是分離本身，那麼，這樣的認識就成為觀念論。

關鍵問題是，在我們為了認識我們的生活而援用形式邏輯的時候，應該在援用如此工具的基礎下，努力再次進行整合，也就是說，我們在企圖總體性的對象認識時，為了彌補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引進形式邏輯，但是我們需要努力避免陷入一個觀念論謬誤：將形式邏輯所帶來的分離過程，直接適用事物本身，而認為事物本來就是分離的。⁹³（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否定形式邏輯，與前述的歷史認識原則，成為朴玄採的一組方法論。

因此，基於歷史觀，統整資料，並加以再詮釋而再生產，才能提示正確的歷史認識或者敘述方法。基本上，擺脫資料的約束，讓它成為只不過是歷史認識的線索而已的時候，歷史敘述才能站在民眾立場。⁹⁴（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否定在理論展開中的形式邏輯，以及從資料解放的歷史敘述，可視為朴玄採繼承了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思想史意義。而且，基於如此方法，朴玄採能夠在現實知識場域中，提出對於

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批判。面對著一九八〇年代所出現的「進步」的理論分析和歷史敘述，朴玄採只能提出如此「平凡」和「孤獨」的批判。

事實上，一九八〇年代的南韓知識思想界，引進了龐大的理論資源，但是那些理論並不立基於對於「他者」的認識努力，反而是那些脫離歷史和現實的普遍主義「理論」本身，成為被學習和接受的對象。缺乏關係中的「他者」認識，產生了自我認識的理論主義化，結果就造成了理論和實踐分離的矛盾。在如此潮流下，朴玄採的存在方式和實踐方式，具有獨特性。他認為，接受依賴理論的方式，即「邊陲社會形態論」是一種特殊主義。他的批判，就關係到將理論（形式邏輯）視為並非「所有」而更是「方法」的朴玄採思想實踐方式。因此，對於一般理論，朴玄採能夠採取主體性接受和適用的態度，同時沒有奠定另一個一般理論的企圖。

本人面對歷史，想要堅持謙虛的態度，因此迴避了綜合性體系的完成，但是因為歷史性要求和需求，民族經濟論，雖然不是完成的，卻成為了完成中或走向完成的理論。如同本人反覆表明，這並不是本人所企圖的，而且現在也沒有這樣的企圖。⁹⁵

93 引自【韓】朴玄採、法性（法號）、金昌鎬的〈座談：社會實踐中思想的問題〉（同前引註10），頁八四三—八四四。

94 引自【韓】朴玄採的〈解放後勞動運動史研究現況與方法論〉（同前引註71），頁一五五。

95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46）的〈寫在前面〉，引自頁五。

因為如此的態度，如同林東圭的證言，朴玄埰以借名或匿名留下了許多著作，而且以多種方式，實踐了「朴玄埰＝無／多」的存在方式，例如以趙容範的名義在南韓和日本公開出版的《後進國經濟論》⁹⁶，金大中的「大眾經濟論」⁹⁷也是如此。朴玄埰在實踐需求存在的時候，主動地把自己等同於趙容範，也等同於金大中，或其他無數的誰。

陳映真提出「思想的貧困」的問題，並呼籲「社會性質論戰」的開始，其主要目的應該在於形成一場解決「貧困」問題的思想運動。但結果是，陳映真在與分離主義的對立下無法展開「思想運動」，反而反映出他與「分離主義」相互對立的社會性質論得以具體化了。相對來說，朴玄埰提出「思想斷裂」的問題，並以「社會形態論」試圖克服斷裂問題。但是出乎朴玄埰的預料之外，原來「斷裂」的基礎非常厚實，因此，他的論述反而成為理論分歧以及理論脫離實踐的資源。

我試圖將陳映真和朴玄埰關於新殖民性的困惑，即「思想的貧困」和「思想的斷裂」對照起來，並賦予區域性的內涵。陳映真能夠自覺「思想的貧困」，表面上是因為他是文學創作展開實踐的知識分子，但從深層來看，起因是台灣所經歷的殖民和分斷重疊的歷史特定性。因此，他透過南韓等第三世界參照點反觀台灣狀況的時候，形成了某種「思想的貧困」此一情結。以分斷／割讓（「地方性」的保存）為特徵的被動殖民化過程，反而是構成以傳統為基礎的實質主體性之條件。因此，陳映真所提出的問題不是「斷裂」，而是「分斷」下「思想的貧困」。而陳映真的確為了解決思想貧困，翻譯出版了《台灣政治經濟學叢刊》，但是歷史的台灣之中國性和地方性，不允許對台灣的「政治經濟學」實體化，因此政治經濟分析對陳映真這麼一個「業餘作家」，成為

文學思想實踐所需要的補充性資源。⁹⁸

相對來說，朴玄採不把「思想的斷裂」此一問題關係到「貧困」，正因為他自身已顯現了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思想的歷史繼承性。因此，他也不太迫切地需要作為參照點的「第三世界」，更沒有如同陳映真般的情結。但是，以非「割讓」而是「條約」的方式經歷整體國家「殖民」的「全國性」（與地方性形成對比），一方面賦予南韓分斷之後去殖民統一的形式主體性，另一方面先殖民／後分斷以及全國性內戰這些特定性，成了以否定和扭曲傳統為前提進而形成假想之主體性的歷史條件。朴玄採的政治經濟學，通過「民族經濟論」試圖解決本來的全國性和分斷所造成的半國家性之間的矛盾，但是，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這樣的政治經濟學思想，承受了思想的斷裂而被視為「過時思想」。

原因正是新殖民性和分斷體制所造成的溝通「語言」的貧困。而且「新殖民教育文化體制」以

96 《後進國經濟論》(후진국경제론)於一九七三年出版，日文版書名為《韓國經濟論》於一九七四年出版。

97 此論述的最早版本為【韓】大眾經濟研究所編的《金大中氏的大眾經濟百問百答》(首爾：汎友社，一九七二)。自從此書出版以後，「大眾經濟論」便成為代表政治人物金大中(後來為南韓第十五任總統)的經濟政策之核心概念。

98 陳映真作為一個業餘作家，曾經表示一種遺憾：「我沒有辦法有一個長期創作，我為了生活花掉時間太多，我都是上班回來以後寫的，然後是請假一兩天寫的」，參見彥火一九八三年對陳映真的訪談〈陳映真的自剖和反省〉，引自《陳映真作品集 6·思想的貧困》(同前引註34)，頁八三。不過他如此條件，反而讓他能夠持續地作為一名實踐型文學創作者。

「所有／私有」性的知識為媒介，將批判思想和實踐倫理分開來了。朴玄採雖然對此提出問題，但是集體性忘卻所造成的歷史和現實認識的扭曲問題，並不是只要提醒了被忘卻的內容，就能得到解決。朴玄採關注「文學」，也許正是因為他認識了如此矛盾。然而他似乎也沒有明確地提出此問題的整體結構。

也就是說，朴玄採對於文學的關注就意味著他自覺了「語言」的貧困。而語言的貧困就是文學的貧困。雖然朴玄採繼承了作為歷史中區域性國際主義的知識思想實踐，即毛澤東思想和殖民地民族解放思想，但是在二十世紀中後期，新殖民／分斷體制不只在群眾層次上消滅了如此成果，並在溝通形式層次上也全面進行了「殖民化」（亦為「現代化」）。結果，如此矛盾讓朴玄採思想的歷史繼承性，在現實中被孤立了。

奉送

新殖民／分斷體制下思想繼承

前一章〈灌浴〉借助陳映真思想實踐中面對「思想的貧困」所展開的政治經濟學思考，概括地探討了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所面對的困惑，即「思想的斷裂」。從中我們看到朴玄採的倫理態度，包括「民眾導向性」、「獻身性」和「非所有」等，如何反映在一九八〇年代他的思想實踐中，並透過歷史繼承性的角度，確認了他的去殖民經濟思想的實踐性。

不過，正如〈戲台〉一章所指出的，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的困惑牽涉到他的思想實踐中形式脫節於內容的問題。實際上朴玄採自身也察覺到如此問題，並摸索一個透過文學來解決的途徑。從這個脈絡來看，一九八〇年代在社會形態／社會性質論戰外邊所進行的，朴玄採和著名文學評論家白樂晴的爭議性對話便是一個重要線索，得以讓我們考察朴玄採以「文學」和「分斷」為媒介，將「新殖民性」認識加以具體化的過程。其中，他透過批判「文學」的現代性形成試圖克服包括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局限，這一面向有助於我們思考朴玄採所認識的新殖民性的豐富內涵，同時也提示著克服思想的斷裂，進而走上超克現代（殖民）學術體制的道路之基本方向。

殖民主義現代性與知識的所有

隨著冷戰的動搖，南韓的一九八〇年代不同於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形成了某種「思想解放」的空間，其中朴玄採基於歷史繼承性，將「思想的斷裂」加以問題化，因此促發了社會性質／社會形態論戰。但是，論戰超越了他所預料的範圍，形成無法控制的擴大再生產此一趨

勢，結果朴玄採反而被孤立起來。朴玄採在如此理論分裂嚴重的狀況下，努力阻止進步理論陣營不必要的分歧和分裂，但最終仍告以失敗。

如果理論與現實產生背離，這就意味著理論在正確認識現實上的失敗。理論本身具有強大的一般性傾向，因此把理論應用於現實的時候，會出現所謂的實踐問題。因此，如果理論追求過度的本質性，因而與現實產生背離而發展，那麼，理論對於現實問題就無法起到應當的作
用，甚至會制約根據內在邏輯發展的運動。從這個意義來講，研究純粹理論的人，在建構觀念性邏輯上，不大具有負面性，但是從事實踐問題的人，若提出現實上不太必要的理論和命題，就會產生阻礙運動的效果。當反覆地提出激進或本質時，雖然我不曉得對未來會不會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但是我擔憂它對運動本身的發展，不會產生擴張效果，反而會造成運動的孤立。不管是什麼樣的理論，如果它具有與實踐的關聯，那麼這個理論就不是某些建構邏輯的人們之所有，我們反而需要深刻地認識它與整體運動的關聯，同時，在提出理論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的不只是民眾的客觀條件，還有民眾的主體性認識能力以及運動群體的大眾性。當然我並不否認，先鋒群體在奠立更正確的理論之過程中，出現了如此狀況。但是我認為，我們目前的狀況所需求的，不是那些具有高度的理論，而我們需要從低度出發，漸漸形成理論。¹（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1 參見【韓】朴玄採、宋基淑對談的〈八〇年代在民族史上的意義〉，引自《實踐文學》第八號（一九八七年一月），頁五

如前面所介紹的，朴玄埰的思想實踐具有「非所有」的知識生產之特徵。也就是說，朴玄埰從歷史繼承的不只是內容性思想，也包括歷史地、綿綿地傳承下來的實踐模式。趙容範與朴玄埰曾經分享過自己的名字，並形成分工關係。朴玄埰於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所寫的趙容範花甲祝辭，模糊地敘述了兩人之間的獨特關係。

先生和我相識的時間點，是一九六〇年代的歷史動盪期。此時期的社會動盪，給我們兩個人的處境強加了快速的變化。這不僅意味著，今日迎來花甲的趙容範先生經歷了歷史動盪期，而且意味著，比先生還年輕的我也仍在我人生的動盪期中，掙扎著。

但是，從我們的關係來講，趙先生早就以自己的智慧克服了歷史的考驗，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時已經走上了安定的路。相較之下，我的人生之路，預告了更多的考驗和障礙。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我所經歷的考驗是強大的。在這個考驗中，趙容範先生和我的關係開始了。趙容範先生當時利用若干自己的安定地位，盡心盡力幫了我。當然，如此努力最終無為而終，但這並不意味著趙先生在能力或努力上的局限，反而是因著跟我的政治社會性弱點有關的陰謀之有效性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在這期間，我們兩個人互相嘗試錯誤的過程，不斷反覆了。民主化的過程，終結了這些白費的辛苦，但是如此反覆嘗試錯誤的過程，卻讓別人覺得，我們兩個人的關係是奇異的。²

朴玄採和趙容範如此「奇異」的關係，除了林東圭對《後進國經濟論》實際作者的有關證言外，幾乎沒有被公開。兩人之間似乎存在某種默契，且持續地保守秘密。從當今的知識思想界的文化來看，如此這般的協助和分工，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是，他們兩人的「奇異」關係，似乎間接地顯示了具有歷史繼承性的進步左翼知識分子的實踐模式，在戰後新殖民條件下，仍然存續維持下來。也就是說，一旦有現實社會的需求存在，他們就要以可能的方式，扮演知識（人）在社會實踐上的角色，不管是歸於誰的「所有」或以誰的「名字」。

即便具體的時期仍待進一步調查和研究，不過大約在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以後，在美國新殖民影響下，南韓中那一個將「現代性」知識模式加以內在化的世代，不管在政治意識是傾向於左或右，根本地經歷了朴玄採和趙容範那樣的實踐模式的斷裂。我們可以稱之為「現代」知識主體的形成。也就是說，這就是對應於「新殖民主義」的知識生產機制之主體形成。

六一五七。

- 2 參見【韓】朴玄採的〈趙容範花甲祝辭〉，引自《退耕趙容範博士花甲紀念論叢》（朴玄採等編，首爾：草色，一九九一），頁五一六。趙容範（조용범，一九三一—二〇一七）作為南韓政治經濟學界的前輩，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已經在高麗大學經濟系任教。文中，「一九六〇年代動盪期」和「考驗」，指一九六四年人民革命黨事件，當時朴玄採因為涉嫌隱匿都禮鍾（도예중，一九二四—一九七五，後來處以死刑），服刑一年。而「政治社會性弱點」指的是，朴玄採在朝鮮戰爭時期經歷的游擊隊活動，因為如此經歷，他無法在大學或公務機關找到正職的工作，結果從一九六〇年代初到一九八九年（五十五歲時）成為朝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之前，都只能以從事經濟評論家和大學講師謀生。

從朴玄採所提出的「知識所有」的問題意識來看，一九八〇年代理論脫離實踐問題之根源，涉及新殖民主義知識生產主體的問題。具體來說，這種知識生產的基本特徵，是將知識當作自由主義意義下的私人「所有」和「著作權」對象，因此，若該機制被適用於批判理論的承擔者，他們就會走向「名士」或「理論家」，於是要麼在運動前面誤導運動方向，要麼在運動後面將運動加以正當化——就是這麼一個擔任錯誤或被動的角色。我們可以將如此狀況視為「所有」邏輯所導致的知識脫離運動的問題。當然，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歷史中，不是只有這一代知識分子，而這一代內部也存在著多樣性；但是，從批判理論的主流來看，「歷史性斷裂」似乎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如前所述，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南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朴玄採民族經濟論的斷裂，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線索。

其實，此問題關係到一個更大的課題：如何變革當下的知識生產體制？進入朴玄採和白樂晴的論戰前，我先介紹本書針對知識生產體制與文學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意識。

在我們思考思想和知識的「實踐模式」之斷裂的時候，之所以首先反思十九至二十世紀「文學」現代性的轉型和完成，是因為自人的幼年和少年時期起，現代性知識體制開始以文學為媒介，培養了對於「知識」的情感和態度，而這樣子的情感和態度，又進一步成為跨越「文學」此一知識領域的基本態度。因此，至少從南韓的脈絡來看，作家、評論家和讀者大眾的現代主義關係形成，本身就成為問題化的對象。尤其，評論家依照特定知識（所謂「現代性」文學知識和理論）的觀點，將作品和作家，加以「高尚化／商品化」，而讀者則在新殖民教育體制下，淪落為被

動的知識消費主體。我認為，即使我們不需要否定評論領域的必要性，但同時也必須提出現行評論和批評中文學主義的封閉性問題，以及把評論開放給「思想」領域的必要性。如此一來，「文學的開放」將有助於克服知識的「著作權／所有」之矛盾，並設想大眾和知識分子之間倫理性的關係模式。³

3 前一章〈灌浴〉介紹過陳映真的「業餘作家」面向。在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八日《深圳商報》採訪中，中國新現實主義作家曹征路也進一步提出過「業餘作家論」：「現在文藝界分化成小圈子的現象比較嚴重，文藝界從來都是一個名利場，是一個可以迅速成名的地方。因此我認為作家最好還是業餘的，出於愛好，腦子保持清醒去寫作，當你出於名利去寫作，怎麼還能真實地反映生活呢？」引自曹征路受訪的〈我只是個業餘作家〉，《深圳商報》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八日（http://szart.sznews.com/content/2014-01/24/content_9046226_3.htm，最後瀏覽日期：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事實上，「專業作家」的名利形成此一邏輯，與現代性「固有性」邏輯，也就是「著作權／所有」邏輯，是一致的。私人所有的文學和知識可視為新殖民知識體系的核心特徵。陳映真的文學實踐則反映了不同於新殖民文學體制的時代背景：「我們這一代的作家，從來沒有渴望得個什麼獎的念頭。我們從來沒有計算過自己的小說，能經由什麼途徑或標準換算成金錢。這不是因為什麼『品德』、『風格』的問題，而是我們成長在一個文學作品根本沒有市場價值的時代」，參見韋名一九八三年對陳映真的訪談〈陳映真的自白——文學思想及政治觀〉，引自《陳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台北：人間，一九八八），頁四八。另外，現代文學和現代政治分享著某種平行結構。如同以作品（商品）為媒介的作家和讀者（消費者個體）的關係機制，由現代文學理論（知識）來維持和管制，同樣的，政治人物和選民（原子化的公民）則以選舉為媒介，而如此機制由現代政治理論來維持和管制。

新殖民性認識與思想繼承的矛盾：朴玄採與白樂晴的爭論

一九七〇年代之前，南韓的言論和學術自由嚴重地被制約。因此除了部分文學界之外，南韓思想界大概沒有出現過整體思想界所關注的公開論戰。但是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南韓思想界進入了論戰過剩的時代。為數眾多的論戰中，朴玄採和白樂晴（백낙청，一九三八—）之間的爭議性對話和辯論，在內容上或態度上，似乎最具高度和深度。

朴玄採和白樂晴之間的爭議性對話，大約有三次。而可視為真正具有論戰形式的，是有關於「民眾文學」的論戰，過程簡述如下：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朴玄採在《實踐文學》刊物上，發表了〈文學與經濟：對於民眾文學的社會科學認識〉一文，白樂晴而後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的《韓國文學的現階段·III》中，發表〈一九八三年的M O O K⁴運動〉一文，提出了朴文的問題，朴玄採隨後在一九八四年十月的《實踐文學》中，發表〈文學與經濟：對於更根源的互相關係之認識〉，以補充和反駁。⁵其實，因為「民眾文學」論戰關係到文學的本質，兩者於是展開了以文學為媒介的知識（分子）的存有意義之相關討論。其中反映出一九八〇年前後氛圍的民眾文學的主體性導向，尤其讓兩位思想家展開關於「文」與「學」的關係性質此一討論。朴玄採和白樂晴還有另外兩次小小的爭議性對話，而這也可能成為癥候性閱讀的對象。在這兩次對話中，主要是由朴玄採提出了圍繞著「分斷體制」和「第三世界」概念的問題。有趣的是，白樂晴積極展開的「分斷體制」和「第三世界」論述，在朴玄採的思想實踐中，並不占據中心位置。但我認為，比起許多因為誤解

朴玄採論述而產生的其他論戰，這兩次朴玄採和白樂晴之間的對話反而更是掌握朴玄採思想特徵的線索。

奉送

文學與經濟的關係

針對朴玄採的「文學與經濟」論述，白樂晴在〈一九八三年的MOOK運動〉中，大約花四頁篇幅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評論。白樂晴所提出的問題，大約反映了當年他自己的文學觀：

我認為，最引起疑慮的部分，是他〔朴玄採〕在某種「規律」的層次，掌握了作為民眾文

- 4 MOOK，是將雜誌(magazine)與書籍(book)兩個單詞切開而合成的一九八〇年代新詞，顯示其性質介於書與雜誌間。
- 5 其實此論戰在背後的企劃者是著名文學評論家任軒永(임현영，一九四一)。他後來回顧了當時狀況：「但是，我也對〔朴〕先生有所功勞。我在引用許多他的經濟評論到文學評論的過程中，就讓他直接寫一篇關於文學和經濟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後來收錄於文學評論選集，這算是讓經濟評論家與文學評論『外遇』的」，參見〔韓〕任軒永的〈對於朴玄採先生——我的青壯年時期的老師〉，引自《啊！朴玄採》(朴玄採全集發刊委員會編，首爾：Haeinil，二〇〇六)，頁二七六。以此文章為契機，朴玄採受到思想界的關注，常常被邀請到文學理論批評領域，並且參與了《創作與批評》舉辦的座談，座談文章〈八〇年代的民族運動和韓國文學〉(朴玄採、崔元植、朴仁培、白樂晴與談)，後收於〔韓〕《韓國文學的現階段·IV》(白樂晴、廉武雄共編，首爾：創作與批評，一九八五)，與白樂晴進行了關於「第三世界」的討論。另，「創作與批評」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出版《韓國文學的現階段》系列(I-IV)共四卷。

學此一課題之「歷史真實」這麼一個態度。雖然民眾文學不能允許將文學的「具體性」放在前面，以迴避對於歷史性現實和社會現實的科學認識這樣的態度，但是我認為，不只是歷史性真實的「文學性表現」，「歷史性真實」本身（雖然可以允許一定的「規律化」或一般化），都是我們絕不能「規律」的層次認識的問題。這就成為如下道理的根據：文學工作不是科學所提示的「歷史真實」的挪用或表現，而是歷史真實本身的呈現。（……）

正因為這個對於歷史真實的前提，「文學原本的領域在於感性的日常性」這麼一個主張，也有著需要被重新討論的餘地。作者（朴玄塚）確實補充說這「不是否定（文學的）邏輯性或知識性」，以防止不必要的誤解，但是這就產生具有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立場的人之不滿，也就是不去承認核心的民眾文學課題：真正現實主義文學的核心，不在於動員知性和感性、反映或描寫現實，反而在於克服現實認識和現實變革的二元論的辯證性活動本身。作者在結論部分，提出「作為經濟和文學的相互補充關係」之「對立的統一」，也有同樣的問題。從中，作者沒有忘記提出一種警告：「在搞文學的人的腦中，經濟認識成了具體的、更正確的民眾認識的手段而已，卻不能規定文學的方法。換句話說，對於民眾以及民眾被異化的邏輯和真相的經濟學取向，需要以文學的方式得以重構，並且此時，文學才更能忠實於歷史所賦予的自我使命」。但是，這樣的說法，似乎忽略了文學的一個面向：文學本身就是將邏輯性認識和感性反應，加以統一的工作。因此可能會遭遇如下反駁：主張民眾文學需要回應民眾社會實踐的要求，是否來自文學外部的一種應然論，或者「民眾文學」這麼一個特殊概念

規定的同義反覆？(……)

同時，我抱著一個期待：能否開放一個可能性，讓文學更自然地貢獻於讓經濟學更為人性化？⁶（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對如此評論，朴玄採在第二篇回應文章，提出了一些補充。

雖然經濟現象本身是人類每一個人的運動和成果，但是經濟現象對立於人類每一個人，而且就像自然一樣，具有頑強貫徹的規律性，並以客觀性的運動出現。這就是人的異化。「異化」意味著，人類自己的力量或成果從人類自身獨立出來，反而轉變成像自然之於人類一樣，即對人類具有獨立規律而運動的客觀過程。也就是說，經濟現象對我們來說呈現為第二個自然，換句話說，就是自然史的過程。因此，如同看待自然的方式，經濟學領域的科學認識是以理論的方法而成立。⁷

6 參見【韓】白樂晴的〈一九八三年的MOOK運動〉，引自《韓國文學的現階段·III》（白樂晴、廉武雄共編，首爾：創作與批評，一九八四），頁四一—四三。

7 參見【韓】朴玄採的〈文學與經濟：對於更根源的互相關係之認識〉，引自《實踐文學》第五號（一九八四年十月），頁四二五。

在經濟學領域，人類雖然在觀念上得以平反，但是因為歷史以及其他所有科學的目的在於在偶然的積累之下，發現必然規律，所以經濟學只能像地圖一樣，是乾枯的。

在此，我們提出，文學對於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可以扮演的一種角色：

對於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平反人類的過程，文學讓這個過程更為豐饒，且提示了其中具體和現實的人像。這個道理之所以成立，是因為文學企圖表現人類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人類的解放和自由的實現。換句話說，歷史必然的規律，透過具有意識、觀念、感情和慾望的人類，得以表現出來，而且它不能被表現在那些具體偶然性的外邊，因此我們基於必然性的認識，描述出那作為將必然具體化，且具有意識、觀念、感情和慾望的作為個體的人類，以便闡明人類的異化，並提示恢復人性的道路。也就是說，經濟學是通過偶然提出必然的，而在此過程中，雖然是觀念性的範疇，但首先會爭取人的解放。相對來說，文學不是簡單的偶然，反而是以偶然此一媒介，表現和說明必然，並試圖達成人從異化的解放。而且，因為文學本身的上層建築性質，相對於經濟學把重點放在來自外部的人之異化，文學則藉由處理自外部世界的人之異化所產生的自我內部的異化，以便提示整體的人。⁸（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在此論戰中，兩人似乎確認了文學對經濟學（以及社會科學）的要求和經濟學對文學的要求。但是，仔細看，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兩人對於「文學」的定義是不同的。白樂晴基本上採用文學

包含文學外部之立場，即「文學」的完整性這種態度。所以對他來說，文學被定義為「歷史真實本身的呈現」、「克服現實認識和現實變革的二元論的辯證性活動」和「邏輯性認識和感性反應的統一」。相對來說，朴玄採認為，文學是一種「實踐」。因此，他認為，文學的角色是讓經濟學平反人類過程「更為豐饒，且提示了其中具體和現實的人像」，而且文學的目的在於「表現人類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人類的解放和自由的實現」。⁹結果，白樂晴試圖在「文學」領域內部，將理論（評論）和實踐（創作）結合起來，其中，評論家擔任著「理論」的角色，並透過抵抗「文學」外部對於文學的強制，努力保護「文學創作」的自主性；然而，朴玄採將如此態度，視為保護「既得利益」。¹⁰也就是說，朴玄採認為，如此保護文學自主性的立場，正是站在不符合社會實踐的既成文學理論和作品那一方。如果積極詮釋朴玄採的批判，我認為，這是對於「文學」領域的現代主義形成的歷史性批判。換句話說，朴玄採一方面承認了文學創作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也批判了

8 同前引註，頁四三二。

9 朴玄採的立場似乎與魯迅的立場相通。魯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語絲》第四卷第十一期《醉眼中的朦朧》裡，援用馬克思的「武器的批判」，曾經把文學置於「批判」。也就是說，魯迅也不把文藝當作作為批判的武器之「理論」，而視之為作為武器的批判之「實踐」。

10 「朴玄採：我總覺得，過去的文學概念或文化概念所帶來的一種觀念，就是藝術或文學最後都需要經過專家的整修。但是，這就來自支配性文學或文化的觀念。我不認為文學一定需要專家的整修，或符合某種文學形式」，引自【韓】朴玄採、崔元植、朴仁培、白樂晴的座談文章《八〇年代的民族運動和韓國文學》（同前註5），頁二一。在座談中，白樂晴認為這是一種誤解，但是座談討論沒有得以進展或深化，反而話題被轉移。

作為學問的現代主義「文學」所具有的封閉性，因為如此封閉的文學理論，將會外在於現實的社會實踐。

有趣的是，作為朴玄採思想實踐之參照點的陳映真文學，雖然其中的理論和實踐是結合在一起的，但是陳映真的評論和創作不採取評論家和創作者分工的模式，而且不把評論封閉於文學裡面，而這就讓陳映真把自己定義為「概念先行」的作家。而且，他透過實踐把「作為學問的文學（以及思想）」和「作為創作的文學」嫁接起來。簡單地說，陳映真是一個思想導向的實踐者。如同前面所探討的，陳映真不區分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並以社會性質來包含社會形態論。也可以說，陳映真認識到後革命（新殖民）時期的制約條件，並把它當作文學實踐的對象，但是他的文學實踐模式和社會分析方法仍然繼承了革命時期的傳統。這是他作為一個實踐者面貌的表現。

分斷體制與第三世界

有關於「分斷體制」和「第三世界」的爭議，基本上關係到如何以實踐倫理的角度，看待作為「殖民性」延續的「新殖民性」？就第三世界論來講，朴玄採基本上理解白樂晴的意思，但是仍然表現出警惕的態度。因為朴玄採認為，白樂晴的論述容易走上「依賴理論」的錯誤道路。首先，介紹一九八五年二月在「八〇年代的民族運動和韓國文學」題目下進行的座談內容的一部分。

白樂晴：「……」我認為，主張第三世界論的人們中，也有幾種流派。我個人反對先設定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然後再設定同質的第三世界，如此這般把世界分成三塊的設想。

我的立場是把世界看成一個，同時從民眾的立場看世界，但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理念，沒辦法充分符合從民眾的立場看世界的方法。因此我們需要摸索第三世界的嶄新視角。我是在如此脈絡下，運用第三世界概念。

朴玄埰：所以，實際上第三世界是理念性的，不是實在的。

白樂晴：雖然是理念性的，但它也不是與一般被稱為第三世界的亞洲、非洲和拉美地區的現實沒有關係的空虛概念……。

朴玄埰：「……」從實際來看，第一世界存在，第二世界存在，然後如此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投影在第三世界。因此從自我完整的地球世界來看，以那樣的多元性看待世界，那第三世界要解決的問題就變得不清楚了。

白樂晴：第三世界要解決的問題，根本是全世界要一起解決的共同課題吧。但是，就解決問題的方法來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是有自己的某種解決方案？那樣的意識形態是有的。現代化理論就是典型例子。自己在前面進行，然後他者們跟隨著，於是就擴散起來。對此的另類方案曾經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圈中形成。不過我們之所以提出第三世界的一個背景，就是因為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出了問題，問題終究沒有得到解決。

朴玄埰：我首先表示，我否定作為一個事實的第三世界之存在。我不懂文學方面，但是從第三世界立場提出來的、經濟方面的代表性理論，就是依賴理論，不過依賴理論所根據的基礎是非常薄弱的，而且依賴理論提出的問題，今日已經是別的理论可以解決的。依賴理論過於強調獨自的具體性，而目前只是在做玄學的拐彎抹角的理論行為，正因為他們把不存在的第三世界作為前提，從而展開論述。大體上，至今被提出來的一般性等同於西歐的、而西歐的等同於一般的，如此方式是西歐的立場，因此我們需要擁有獨自的東西，不過這其實是站在跟他們所批判的對象一樣的立場。而且，附帶一提的是，他們所批判的對象，並非像他們批判的內容那樣思考。

白樂晴：過度提出第三世界的特殊性之態度，我把它稱為「第三世界主義」並加以批判。〔……〕從這點來講，我同意朴先生的想法，但是我的主張是，不同於那樣的「第三世界主義」的某種第三世界認識，仍然是需要，那樣的概念也需要。〔……〕

朴玄埰：可能會有否定陳舊的並帶來新的設想轉換之效果，不過當我們在談第三世界的時候，白先生所講的第三世界論，並非與過度一般化的第三世界論是一致的。〔……〕不管是說明第三世界還是第三世界的經濟理論，或是站在文學理論的第三世界立場，如果它不拋棄文學理論或經濟理論的一般性，然後以此為基礎強調具體性，我們就不需要否定它們。¹¹（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事實上，兩人的對話缺乏對第三世界以及有關概念或前提的共識，因此以一種沒有效率的方式進行討論。在這一段對話中，作為社會科學家的朴玄採，和作為文學理論家的白樂晴，似乎呈現出關於「第三世界」的不同認識和脈絡。我們可以把如此差異，視為經濟學和文學的不同取向，不過這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思想界的知識狀況。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的思想界，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時代」，這就清楚地表示社會科學在當時知識思想界中的主導性，而作為經濟評論家的朴玄採，能夠參與「文學」座談，也是如此脈絡的反映。在如此狀況下，在當時關於「依賴理論」的爭議性語境中，朴玄採警惕了「第三世界論」，而白樂晴從不同視角，提出引進第三世界概念和認識的必要性。不過，我認為，這似乎也反映了朴玄採的某種獨特性。因為朴玄採歷史地繼承了朝鮮和南韓的左翼思想（包括毛澤東思想），因此體現了不同於白樂晴的「主體性姿態」。在同一個座談中，朴玄採和崔元植關於「民族形式」的對話，就是一個典型表現。

朴玄採：「……」所以這些年出現了過度強調具體性而否定一般性的傾向。因此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此時期，一方面需要尋找民族性的努力，但同時另一方面需要強調一般性。

崔元植：對的。我們談到民族形式問題，不是為了把形式脫離開來。其實中國的解決方式，

是折衷主義的。也就是說，他們總結論戰的方式是，「內容是社會主義，形式是民族的」。這並不是辯證性統一，而是折衷主義。我們一方面需要提高討論的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從實際現場經驗，嚴密檢驗適合性，並重新打造出民族形式。

朴玄採：我們不必重複中國或其他國家在過去進行的討論。群體之間畢竟存在認識水平之差異，而且他們的經歷已經成為我們的基礎，因此不必回頭去看。我們已經具備更好的條件。我們從以自發性為基礎所進行的各部門運動的過程，就可以知道，我們的理論已經比起過去的他們具有更高的水平。¹²（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白樂晴「之所以提出第三世界的一個背景」，就是「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出了問題，結果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在朴玄採來看，如此第三世界視角，正是對於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外在否定，即「雙向否定」。然而，因為朴玄採基於他的歷史繼承性，將第二世界視為對於第一世界的「主體性」否定和克服的歷史表現，並認為第二世界的成果就反映在中國和殖民地朝鮮的歷史經驗。尤其是殖民地時期的民眾民族主義經驗，就成為朴玄採在新殖民下，傳承歷史性民族主義運動的基礎。換句話說，朴玄採所擔憂的問題是，第三世界這麼一個對於第二世界的外在否定，是否將產生去歷史化的矛盾，並像依賴理論那樣，過度強調獨自性（具體性）而淪落為理論主義的玄學遊戲？

朴玄採和白樂晴對於第三世界的爭議性對話，就呈現了歷史繼承性所賦予朴玄採的主體性面

向。這也是因為與陳映真的「思想的貧困」不同，一九八〇年代的朴玄採將歷史性「扭曲」和「斷裂」，當作思想實踐的核心問題意識。陳映真為了思想貧困問題，關注了作為參照點的第三世界，但是在朴玄採看來，作為「雙向否定」的「第三世界」，就是否定（半）殖民地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歷史繼承性，即新殖民下的「去歷史化」所造成的思想扭曲的表現。

一九八〇年代轉型期間，處在「割讓／分斷」歷史下的台灣，陳映真首先確定兩岸統一的方向，同時努力以第三世界為參照點（所謂「方法」），繼續深化對於新殖民的認識。這與他對於「傳統」的再認識有關，因為陳映真藉由歷史縱向的「傳統」問題意識，能夠獲得將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以相對化的關於新殖民主義的認識。相對來說，「內戰／分斷」下一九八〇年代的南韓，內戰導致的極端相互暴力留下了全民的創傷，而且與此同時，強而有力的反共主義形成了，因此關於北朝鮮的問題無法被公開討論。所以，朴玄採首先抱著對於歷史斷裂的警惕意識，指出了第三世界論對於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雙向否定所隱藏的去歷史化危險。尤其是當朴玄採身處在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時代之一九八〇年代的氛圍中，他更敏感於分斷意識形態的去歷史化效果，因此不只指出第三世界論的危險性，更進一步藉由克服去歷史化的實踐脈絡，提出了「文學的現代性形成」問題。

另外，兩人關於「分斷體制論」的爭議是這麼展開的。白樂晴在一九九一年《創作與批評》創

刊二十五周年紀念研討會上，發表了〈九〇年代民族文學的課題〉一文。在他發表後的開放討論時間中，朴玄採提出一些問題。我們先概括白樂晴的見解。白樂晴首先點出九〇年代危機的新局面，並表現出對於分斷體制的情勢性認識。

九〇年代以後，他們慢慢從分斷固定論，轉移到西德式的吸收統一論。如果變革運動，連在分斷克服資歷和實踐力量方面都比他們落後，那麼這就容易成為不如公開主張改良主義的運動。¹³

接著，白樂晴比較了作為戰後分斷國家的越南和德國，而這個比較成了論戰的火種。藉由越南和德國，白樂晴強調了韓半島分斷體制的特殊性：

我想，就越南來講，他們表現了在前殖民地民族解放戰爭延長下的新殖民時代，而任何力量都不能以舊的方式支配越南民族這一事實，對帝國主義霸權帶來強大的打擊。相反，就德國來講，改良的先進資本主義和僵硬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競爭，表現了後者不能成為前者的對手這一事實，並給冷戰體制帶來決定性打擊。韓半島分斷體制的性質，與這兩種分斷都不一樣，因此越南式統一或德國式統一，都不是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幸福結局，並且實際上韓半島不會發生那樣的統一。¹⁴（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在白樂晴的發表結束以及與指定與談人的討論後，朴玄採在開放討論中作為第一個提問者，與白樂晴進行如下簡短的對話：

朴玄採：「……」白先生在發表中說，越南的統一方式和韓國的統一方式不同，那麼請清楚地說明一下，兩者的不同是什麼？

白樂晴：報告中，我說了越南的統一基本上是前殖民地民族解放戰爭的延長，如果如此判斷是對的，那麼若採取朴玄採先生自己的立場，也就是將南韓社會視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那統一方式也應該是不同的。¹⁵

朴玄採：稍微不同，但是大體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白樂晴：那樣說的話，西德式和韓國式的統一方案會有什麼差別呢？

13 參見【韓】白樂晴等的〈九〇年代民族文學的課題〉，引自《創作與批評》第七十一期（一九九一年二月），頁一〇〇。

14 同前引註，頁一〇六。

15 這就反映白樂晴對於朴玄採立場的理解。不過這種理解似乎有點片面，因為如同前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朴玄採思想中的地位，是部分性和局限性，即主要屬於理論性範疇而已。白樂晴特別指出朴玄採這一個特定的理論觀點，是因為他想要強調越南的前殖民地延長之狀況，以區別於作為新殖民地，但是事實上朴玄採一貫地把前殖民地和新殖民地，都視為「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且從社會性質來看，都視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朴玄埰：西德的方式是吸收統一，但是南韓至今沒有用那種方式進行統一。南韓雖然存在前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差異，但是從殖民地這個面向來看，沒有大的差別。¹⁶（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這一段對話雖然沒有發展成深度的討論，但卻顯示了朴玄埰和白樂晴對於分斷有關情勢認識的差別。首先，這樣的差異關係到對於「北韓」等具有殖民地經驗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不同判斷，以及對於南韓的歷史和現實的意義之不同評價。此時，我們需要引介朴玄埰如何認識「分斷體制」的歷史性成立：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在民族史中的結局，是南北分斷，以及實現歷史給予的民族課題的挫折。具體地講，南北兩邊成立了具有不同體制的政治權力，而這些政權毫不留情地鎮壓了在不同體制內的反對勢力。因此南北之間，分斷體制的成立，帶著一種傾向：將民族內部圍繞民族生活的定在（*Dasein*）¹⁷之方向和方法上的對立，外在化成體制之間的對立。¹⁸（粗體字

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朴玄埰透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形式獨立、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三年的內戰等歷史過程，認識了分斷體制的形成，因此他將分斷體制的核心效果，視為民族內部矛盾被外化成體制間（國家

間)的矛盾。從此脈絡來看，分斷體制與民族主義的需求互相矛盾。但是，朴玄採沒有忘記提出分斷體制的形式邏輯面向：

從形式邏輯來看，分斷確實是民族需求無法實現的原因，而在今日狀況下，它仍然產生了對於民族統一的各種負面狀況。從這個意義來看，若民族分斷沒有得到解決，任何問題都無法得到解決。這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而且，如果站在此形式邏輯之上，那麼讓所有問題都從屬於統一的邏輯就得以成立。也就是說，在這樣的邏輯上，如果沒有統一——即克服民族分斷狀況——那麼我們歷史中韓國民族主義要解決的任何問題，都無法得到解決，所以所有問題都需要從屬於克服分斷狀況，並受控於此，這才是忠實於民族主義的需求。但是這並不是正當的邏輯。其實此一邏輯，就是在現成秩序上，根據部分階層或階級的需求去貫徹落實民族主義。我們的民族主義並不依據今日狀況所賦予的現成內容。現成內容並不符合解放當時

16 引自【韓】白樂晴等的〈九〇年代民族文學的課題〉(同前引註13)，頁一二六。

17 朴玄採沒有系統地闡述過自己運用的哲學概念的脈絡，不過考慮到他的知識時代和閱讀範圍，在此段落中「定在」(dasein)概念似乎來自黑格爾哲學，而朴玄採也直接援用此概念的過去日文譯詞。「定在」的基本意思則是相對於本質存有的具體且個別存有。

18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首爾：石枕)的〈第三部：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第二章：分斷時代韓國經濟的展開與自立經濟的道路〉，引自頁一八一。

和隨後狀況中的民族主義需求。我認為，包括克服分斷等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正是努力在「背離民族需求的狀況」與「從中萌芽的民族主義需求」之對立中，讓透過兩者的辯證性統一為目的的民族主義需求，變得更堅強。這就是我們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走出形式邏輯所具有的惡性循環之道路。¹⁹（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結果，朴玄採從民族主義的歷史傳承性中，思考了分斷體制，同時從現實矛盾尋找克服分斷體制的動力。因此，南北統一的前提，一方面是統一需要符合「解放當時和隨之狀況中的民族主義需求」，另一方面克服分斷體制的動力，也來自於一個矛盾，即「在背離民族需求的狀況，與從中萌芽的民族主義需求之對立」。所以，在朴玄採看來，被形式邏輯所約束的分斷認識，會忽略一個關於主體方面的事實：當下的民族主義只能是「民眾民族主義」。而那樣的分斷認識，無法說明根據當下社會矛盾的主體性力量的形成，終究無法實現歷史所賦予的民族主義課題。

另外，一九八九年韓國電視台KBS3教育頻道，邀請朴玄採進行了「與作家的對話」節目。當時，朴玄採對主持人有關分斷矛盾的提問，如下回應：

主持人：白樂晴先生說過，重要矛盾不是民眾矛盾，而是分斷矛盾。他又提出了一種批判：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過度地用西歐的理念框架來分析現實，因此對於分斷這麼一個獨特的狀況之理解和取向上，犯了錯誤。那麼代表社會科學家的您如何回應呢？

朴玄埰：我和白樂晴先生的見解之間，沒有很大的差異。若從根本來思考分斷和分斷的克服，那分斷就是帝國主義支配的產物。帝國主義的野心在我們的土地上，製造了我們的分斷。因此解決分斷矛盾，就是解決帝國主義矛盾。如果沒有經由民族解放、

解決反帝民族解放鬥爭的問題，就不能解決分斷。從這個立場來看，比起民族矛盾這麼一個抽象概念，提出更具體的分斷概念，來提示我們的矛盾，在方法上是獨特和有趣的。但是，我認為，這個方法不能局限於分斷本身，包括對於造成分斷的具體因素之認識，也就是說，要把反帝反映在裡面，才能成為正確的理論。²⁰（粗體字

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基本上，朴玄埰沒有否定白樂晴的苦惱和企圖。他只不過是想要提醒並強調作為前提的分斷的「歷史性」。他用「反帝」所提醒的歷史性，其實就是殖民性以及對之的反抗歷史。在朴玄埰看來，分斷現實是民族內部矛盾的外化。而且，矛盾的外化，意味著一個歷史性的民族被置換為兩個現代性國家。所以，朴玄埰雖然把新殖民視為殖民的延長，仍然以反帝為主要課題，但是新殖

19 同前引註，頁二六四。

20 參見【韓】〈KBS「與作家的對話」(一九八九)逐字稿〉，引自《朴玄埰全集·第七卷》(朴玄埰全集發刊委員會編，首爾：Haemil，二〇〇六)，頁六三一。

民下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因為矛盾的外化而擁有與殖民時期不同的內涵。結果，矛盾的外化，具有雙重意義，即群眾主體在意識形態層次的反共主義分斷邏輯，以及知識思想層次的現代性分斷國家邏輯，這兩者成為新殖民的核心內容——而這就是我重新概括的朴玄塚對新殖民性的認識，也就是「新殖民／分斷體制」或「分斷／新殖民體制」。

「新殖民／分斷體制」與去殖民的困境

在新殖民地南韓，造成分斷和新殖民的原因之「帝國主義」，邏輯上仍然是一個反對和克服的核心外因。不過，反對的內容和方向，無法從「帝國主義」本身獲得，因為反帝的主體和帝國主義的主體，各自具有不同的歷史。因此朴玄塚的「反帝」與「反封建」（所謂「新民主主義」）結合起來，構成了「民族主義運動」的核心內容。²¹不過，在新殖民／分斷體制下，反帝反封建的內容更加複雜。尤其是反封建的內容，包含著更多面向，包括從日本到美國的宗主國變換、反共主義自由主義代議制的部分成立、內戰分斷所造成的民眾構成的變化、知識思想的歷史斷裂和扭曲等。

特別是從知識和認識論層次來看，南韓分斷體制所隱含的現代性分斷國家邏輯，在認識論上具有一種原始積累性的意義，亦即，原本具備的縱向矛盾結構，經由分斷而被轉換為橫向結構。因此，矛盾認識斷裂於「歷史」，而呈現出去歷史化的現代主義。也就是說，空間的分斷，伴隨

了歷史的斷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中克服分斷或南北統一的問題，與去殖民課題互相分開來了。實際上，這樣子脫離殖民性認識的分斷體制的概念化和實踐，產生了觀念性的「統一至上主義」，並且在現實中，造成了判斷局勢的混亂。如此「外化」的象徵性事件，便是一九九一年時，「韓國」和「朝鮮」分別加入聯合國。這麼看，一九九〇年代是以一九九一年加入聯合國——即某種「假想」的國民國家成立——為時代標誌而開啟的。而這就完成了以「假想」現代性為特徵的新殖民性在後冷戰的南韓中的表現方式。其中，過去被否定的「市民主體」，在此一假想的國民國家的社會領域中，於一九九〇年代以後重新出現，這也值得注意。

總之，朴玄埰對於朝鮮／南韓歷史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認識，可以被概括為「新殖民／分斷體制」。他認為，我們不能透過外因尋找到一個具有歷史縱向的民族去克服新殖民／分斷體制的展望，正因為去歷史化的認識，無法成為去殖民主體和動力的資源。於是，朴玄埰的新殖民性認識，設定了反帝和反封建的結合，並且提示了作為「民主」主體的民眾。再者，分斷條件要求我們在各方面深化如此新殖民認識。

與分斷條件結合的新殖民性認識，似乎以「後革命認識」為基礎。因此，朴玄埰沒有積極展開「社會性質論」。不過傳承歷史性思想傳統的朴玄埰，與此同時體現了革命時代的主體性實踐

21 從此脈絡看，我們有必要透過其與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所產生的關係下，重新闡釋朴玄埰的「民主」論述，進而對於此期間「民主化運動」的歷史評價也可以得到反思性取向。

模式。所以，他的社會形態論，仍然以傳統的社會性質論為基礎，只不過沒有直接展開而已。這可能是朴玄採在一九八〇年代所遭遇的困境之表現。不過，社會形態論戰呈現出朴玄採的問題意識，即知識的主體性和殖民性問題。同時，關於分斷矛盾的認識，更清楚地提示了制約去殖民主義體形成的具體條件，包括在群眾意識形態上的反共主義分斷邏輯，以及在認識論上的分斷的現代國家邏輯。這些新殖民／分斷體制，似乎指出實踐上的兩個空白：作為政治組織形式的「黨」，和作為認識空白的「北朝鮮」。反共主義導致了民族民眾運動，實際上無能於思考和成立真正的「黨」，而分斷現代國家邏輯則是讓民族民眾運動無法認識北朝鮮（以及南韓）的因素。朴玄採透過關於內戰和分斷的認識，似乎自覺了後革命時期中，這樣子的一個新殖民制約因素。

被忘卻的遺產：《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與新殖民／分斷體制

一九八〇年代社會形態論戰和社會性質論戰，雖然各自從派別的立場出發，選擇性接受或否定了朴玄採所提出的立論，不過實際上都將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視為陳舊而必須被克服的對象。於是，在假想的克服下，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被當成一本不必閱讀的著作。不過，「民族經濟論」以及《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是以朴玄採少年時期反映時代氛圍的原型動機為基礎，經過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的蓄積而成型的思想成果。

朴玄埰：這原本可能是非常小資產階級的思考。小時候，我經過速讀和濫讀的經驗而形成

的思考，就是站在弱者一方。站在弱者的學問可能很多，但是動盪的歷史時期，我想知道在民族的未來能夠走出歷史進步之道路是什麼。因此我透過經濟史，知道了歷史的發展規律。這可能是我關心經濟學的出發點。而且，在我們的土地上，當時（大約五〇年代中後期）最受苦的人，就是農民。當然當時的我也有意識到工人階層，但是當時我們沒有勞動經濟學，是在我大學畢業後過了一段時間，才有了相關課程。因為有史以來農民階層一向存在，而且農業經濟學是最以社會現實為基礎的學問，因此我就主修了農業經濟學。²²

當然，民族經濟論不是朴玄埰一個人的專屬物，但是基本上的共識是，朴玄埰始終扮演著核心角色。與朴玄埰一起參與民族經濟論之論述的經濟學者鄭允炯，肯定了朴玄埰和民族經濟論的特殊關係：

今日民族經濟論就是朴玄埰教授的理論，這件事已經成為共識。（……）我們回頭看，朴

22 參見【韓】朴玄埰和鄭民的對談文章〈民族經濟論——闡明民族民主運動的經濟基礎〉，引自《現階段·第一集》（蔣尚煥等著，首爾：Hanul，一九八七），頁三八一—三八二。

教授在六〇年代，尤其是藉由韓日會談²³前後社會動盪期的經驗和當時發表的論稿，我們就可以確認，在經濟自立化討論廣泛地被提出的六〇年代中期之前，他不只已經擁有了自立經濟這麼一個問題意識，而且已經是提出了民族經濟論的核心論點。（……）因此，六〇年代形成的整體的經濟自立論，可稱為廣泛的民族經濟論。但是，在同名的書出版之後，民族經濟論和朴玄埰教授就成為了一組，也是現實狀況。如果承認如此歷史事實，我們就可以把民族經濟論視為朴玄埰教授的理論體系。²⁴

經由上述歷史過程的「民族經濟論」，其總結性著作就是《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以下我概括該書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核心內容，最後並提出此著作對於新殖民／分斷體制的內涵。

歷史與理論

在以「民族經濟論的提起和民族經濟概念」為題的第一部第一章緒論中，朴玄埰首先討論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問題。

在歷史中，人類為了克服認識能力的有限性，透過運用演繹和歸納這麼一個相互對立的方法，努力彌補既成的理論。但是，雖然如此的努力長久存在著，人類的認識能力仍然是不

完整的，因此人類依然為了更正確的認識，持續付出努力。在歷史中，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基本上來自於認識事物的人類能力之局限，同時也來自於在以人為媒介的歷史現象中，人本身的創造能力和事物運動的多樣性以及創造性變化。在歷史中，作為社會存在的人類，是極具創造性的。而且這些事實來自於相互對立的人們之間，盡量發揮狡智而實現自己利益的對立。不僅如此，在一個社會或歷史中，作為發展動因的矛盾，不僅是相互對立，也存在於相互結合的關係中，因此，矛盾的存在模式，經由不同結合模式的實現，必然得以多樣化。

為了克服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並認識充滿多樣性和創造性變化的現實，人類依靠了形式邏輯。也就是說，人類一方面依靠歸納法，即具體地認識多樣現實而建構規律，另一方面依靠演繹法，即依靠歸納法所建構出的規律之演繹性應用，以深化現象的認識。此過程中，形式邏輯和歸納／演繹這麼一個相互對立的方法之反覆，只不過是認識現象的一種手段而已，因此相互對立的方法需要辯證性統一。形式邏輯只不過是形式，只不過是整合的努力而已。²⁵

23 韓日會談是指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五年間，韓國和日本之間進行的兩國關係正常化會談，尤其一九六一年軍事政變後，朴正熙總統積極推動以經濟援助為中心的正常化。

24 參見【韓】鄭允炯的〈民族經濟論的歷史性展開〉，引自《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鄭允炯、全哲煥、金錦守等著，首爾：創作與批評，一九九五），頁一三一—一四。

25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一部：民族經濟論的概念與構成，第一

朴玄採指出，人類利用作為古典認識方式的歸納法和演繹法，形成對事物特定面向的形式邏輯。而當我們將這兩種對立方法加以辯證性統一，最後就取得了規律性認識。不過，規律性認識本身有其局限。

辯證法的認識，是規律性的認識。它展現兩個或更多的現象之間的必然關係，以及這些現象的本性（本質）本身所產生的關係。但是，持續性在諸多現象中停止的，就是規律。規律是現象的停止性反映。規律，以特殊形態和普遍形態的無限統一，表現出兩個單獨過程或事物間的因果關係。因此，規律性認識，不是一次性獲得的，而是在人類實踐和認識運動與發展的過程中獲得的。因此，從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說，規律的概念只不過是人類對於世界過程的統一和連接、相互依賴性和整體性的認識之一個階段而已。規律認識，只不過是人類認識的連鎖中的一個環節而已。因此，規律不是全面釐清被賦予的個別現實性。而規律又抓住停止性的事物。所以所有規律的範圍是有限的、不完整的和具近似性的。在這樣的意義下，現象比起規律，既豐富又多樣，如同整體比起其部分，還要豐富。如此規律有它的局限。²⁶

朴玄採在上述前提下，論及他之所以提出民族經濟論的歷史根據。首先，朴玄採透過「民眾對於改善生活的需求」尋找歷史進步和發展的基本動因。他從而提出一個立論：因為民眾性生活是具體的生活，所以歷史規定其具體性內容，因此民眾是民族性的存在。

在歷史中，民眾更具有民族性，這有如下的根據：民眾在與其他種族群體的交涉中，不得成為當事人，反而是在與其他種族群體的不平等關係中的最終被轉嫁者，而且民眾不能接受其他種族群體的、畢竟是觀念性和抽象性的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民眾性生活的需求便是具體的民族生活。換句話說，這就是基於民族生活模式的生活之需求。²⁷（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但是，隨著種族群體間相互接觸而轉變為關係對立的狀況，民族性和民族生活模式，以作為歷史發展中的主要動因被提及。因此，在這樣的意義下，我們可以說，民族間或種族群體間的對立，成為一個契機，將民族性設定為歷史發展的次要發展動因。也就是說，面對著異民族或別的種族群體會破壞自身民族生活模式的危險，民族性被視作為今日活著的民眾在生活上的主要需求。²⁸

章：民族經濟論的提起與民族經濟概念，引自頁一五一—一六。

26 同前引註，頁一六。

27 同前引註，頁一七。

28 同前引註，頁一八。

「民眾在與其他種族群體的交涉中，不得成為當事人」，朴玄採其實是提出民眾、階級以及知識階級問題。因此，他將「民族性」視為歷史發展的次要動因的時候，這樣的民族性就與作為歷史發展之基本動因的民眾性（民眾對於生活改善的需求），形成辯證統一的关系。換句話說，若說民眾是現實性範疇，那麼民族是歷史性範疇，而現實性具有實踐性，那麼歷史性就具有理論性。這也反映了朴玄採思想中某種去殖民主義存有論和認識論：朴玄採思想將歷史視為動態（相對於靜態），同時將世界視為多元（相對於普遍／特殊），從中「民眾」和「民族」是辯證性統一的關係，因此「民眾」被置於「民族」——「民眾」——「民族」序列中，而在此作為歷史發展理論根據的「民族」，成為「民眾」的依據和走向，同樣的，「民族」被置放在「民眾」——「民族」——「民眾」序列中，而在此作為現實中實踐主體的「民眾」成為「民族」多元性的基礎和動力。

並且，朴玄採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在世界史中的成立這麼一個時代狀況，使得民族性成為歷史發展的次要動因。

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內部產生了民族結合，而向外產生了其他國家和民族因應全球性和跨國性資本運動的新結合，結果在主體性對此挑戰的應付過程中，勢力的均衡狀態讓具體民族的自我歷史產生差異。²⁹

朴玄採基於如此對於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認識，提出了三種類型論，即「先發先進資本主義型」、

「後發先進資本主義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依賴型」。他進一步認為，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依賴型的資本主義化或現代化，不符合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生活模式，結果就產生了獨特的矛盾。朴玄採以國民經濟和民族經濟的背離，概括這樣子的矛盾，並指出三個特徵：首先，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從外部被移植進來，因此產生民族經濟的扭曲以及封鎖自發性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二，民眾對於民族生活模式的追求，雖然具有民族資本形成的契機，但是同時帝國主義也極其可能壓制了民族資本的形成；第三，帝國主義勢力與舊支配階級妥協，並進行間接統治，因而根據資本需求，保存了挪用舊剝奪機器的舊制度。³⁰ 朴玄採特別提出了因應國民經濟和民族經濟的背離，因此有彌補一般理論的必要性。

國民經濟和民族經濟的背離，意味著作為地區概念的國民經濟中，社會生產力發展和資本主義化造成了殖民地中，被壓迫民族的傳統生活模式被破壞以及貧窮化，因而殖民地中被壓迫民族的利益，與社會或國民經濟的狀況相互不一致。因此，在審視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狀況時，有一個要求：不能簡單地依靠經濟諸量或基於先進資本主義諸國所建構的理論，反而必須對那些理論加以補充，建構理論，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的民族，能夠具有主體性的、民族主義立場的評估。

29 同前引註，頁一八。

30 同前引註，頁一八一—二〇。

具體來講，這些要求來自兩個評估問題：首先，是對於韓國資本主義當中，日據殖民統治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評估；另外，也有對於今日非自立性工業化過程，具有民族主體性的評估。³¹（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朴玄採還概括了過去對此要求的理論性回應：第一是將依賴型資本主義視為缺乏國民經濟本身的經濟；第二是承認工業化的現代化論；第三是折衷主義立場，也就是雖然承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同時也強調跛行性。朴玄採認為，這些立場都無法從民族主體立場出發，並提出他的說明：

因為它們的基本立場，站在基於先進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概念，因此將一般理論應用於特殊具體狀況，就會是失敗的。所以它們在進行主體性評估時，不僅是針對戰後狀況，而且針對戰前舊殖民地支配下的狀況，都需要能夠彌補一般理論的新概念或理論工具。依賴理論是戰後狀況下，從第三世界主體立場建立經濟理論的企圖之一環。許多的國家和人們努力地正確了解戰前和戰後被壓迫的民族的狀況。而在這個過程中，建立新概念和理論的要求也廣泛地被提出來。民族經濟論的問題意識，也是基於努力回應如此要求的企圖。³²（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朴玄埰說明了他提出民族經濟論的歷史根據，同時也提出他的兩個理論性根據，即經濟理論的性質和派性所帶來的局限和民族主義論的局限。首先對於前者，他表明了關於知識殖民性問題的立場。

具有自我發展邏輯且同時反映時代狀況，而又在特定歷史時代反映出特定利益群體的需求的經濟理論，是極具派性的。而且這樣的性質，也被適用於民族間的關係。在經濟理論展開的過程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隨著民族間勢力均衡狀態，先進資本主義民族構成理論壟斷，以及其根據自我體驗的理論展開。而且，這種狀況，同樣必然地會發生在先進民族內被異化民眾的構成中。人類在歷史的體驗中，在自己所被賦予的狀況下，接受了作為一般性的先進民族們所產生的許多理論。而且人類將它加以發展，努力維持這些理論的普遍性。但是，雖然存在著社會實踐的不斷需求，但作為理論的經濟理論所具有的上層建築性質，卻讓理論更帶有保守性。³³（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31 同前引註，頁二〇—二一。

32 同前引註，頁二二。

33 同前引註，頁二三。

朴玄採此一關於知識殖民性的立場，延續著前面所介紹的他對於文學和經濟的思考。朴玄採強調「經濟學」本身具有派性，因此文學和經濟學並不具有學問間的對稱性，反而被視為具有實踐與理論的關係。這就揭示了民族經濟論擁有著與現成經濟理論全然不同的存有論特質。也就是說，民族經濟論原本朝向奠基於去殖民主義的多元主義之實踐，因此不同於現代／殖民學術體制內部的「理論」與「經濟學」，而是擁有著開放性和實踐性的特質。

從此脈絡，朴玄採提出了民族經濟論的第一個理論根據。朴玄採雖然了解殖民地依賴型資本主義化過程中，資本主義式國民經濟得以形成，但同時他也強調，從地區居民的立場來看，此種國民經濟只不過是以破壞民族生活模式和剝奪生存基礎為代價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的擴大而已。朴玄採認為，若要說明「國民經濟」和「民族經濟」的背離，我們必須提出新的理論性工具：

我們在說明殖民地依賴型資本主義展開的時候，遇到了建構國民經濟和民族經濟概念的需
求：相較於作為地區概念的國民經濟，民族經濟則基於民族的生活模式，成為民族生活的基
礎，再進一步成為民族的自主自立所需的經濟基礎這麼一個新概念。透過將先發先進資本
主義型的國民經濟所具有的形式和內容區分開來（在先發先進資本主義中，作為地區概念的
國民經濟，和作為民族生活模式的發展、民族生存基礎和民族得以自主自立的基礎之民族
經濟，互為一致），我們能夠獲得更正確地闡明殖民地依賴型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體之理論工
具。³⁴（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另外，有關於民族主義論的局限，朴玄採提出他的批判：民族主義論從一個「要素」的層次，靜態地肯定被壓迫民族的進步民主主義之論述，而且將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之經濟基礎，排除在闡明對象外面。換句話說，朴玄採試圖超越西方民族主義論所提示的既平面又靜態的「要素」性取向，進而闡明民族主義運動本身所反映出的，不同利益群體的階級性需求，以便對被壓迫民族主義運動提出歷史性的具體評價。

這就反映著朴玄採的歷史多元主義和矛盾論認識。朴玄採指出的問題，就是根據現成市民民族主義的反帝國主義論述，如何外在地規定（半）殖民地民族主義的性質。因此他主張，基於歷史內部矛盾的（半）殖民地民族主義，不是套用市民民族主義理論的對象，而應該是被視為同等於它的分析對象。在此，我們可以發現，朴玄採傳承的矛盾論邏輯，與去殖民主義的歷史多元主義互為相通。

雖然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根據一個社會的階級構成和社會狀況而有所變化，但是因為它具有反帝國主義和反壟斷資本的性質，因而具有民主主義和進步的性質。由於民族主義是民族性經由階級稜鏡的呈現，所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社會狀況以及階級構成的民族主義之諸多變種，

因此應該被視為同等於市民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並且兩者的經濟基礎也需要被闡明。〔……〕

因此，在歷史序列中，若要闡明以被壓迫民族的解放為目的的民族運動中民主主義因素和進步性，不只需要闡明它的經濟基礎，且需要在更長遠的歷史序列中，同時闡明由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所代表且被民族構成中其他階層階級所繼承的民族解放運動。這就是在民族主義的名義底下所擁有的，將民族主義運動的變種或民族主義運動的各種潮流整合起來的標準，而且要發現使它得以存在一個社會內的經濟基礎。

因此，在民族主義論的發展和外延擴張的前提下，建構民族經濟概念的需求被提了出來，因為民族經濟此概念賦予了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一個經濟基礎，並成為認識規定民族主義運動內容的經濟狀況之手段。而且，如此企圖，站在「決定民族主義的不只有民族因素」這個立場，也帶有階級因素，因此一個時代的民族主義，取決於哪一個階級先導民族運動、其目的為何、解決社會問題和民族問題的方法為何。若代表民族主義的社會群體或階級，在民族經濟中愈擁有自己的基礎且具有進步性，那麼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觀念中，民主主義因素必然愈多。³⁵（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如此，朴玄塚認為，個別民族主義反映了具體的階級狀況，所以需要闡明它的經濟基礎，同時以歷史序列中的「標準」來掌握民族主義運動，才能夠獲得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之具體和主體的認識。因此，套用西方市民民族主義的認識方法，是根據一個外部單一標準，並藉由一

種缺乏具體性和主體性的抽象性方法，去認識多元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而且，朴玄埰認為，正因為民族主義運動反映了多元的歷史性和經濟基礎，所以才能確保政治領域的「民主」性質。如此一來，他就克服了平面化和抽象化的「民主」觀念。

朴玄埰在提出上述民族經濟的歷史和理論根據之後，論述了關於民族經濟的概念與構成。他首先區分「應然」和「實然」，並試圖提高概念的嚴密性：

作為實然的民族經濟如下：（1）民族經濟是在全球資本運動過程中，一個民族維持民族純粹性和傳統並根據之生活的民族群體的生活基礎；（2）從純粹經濟的資本運動來看，這是屬於國民經濟形式的下位概念；（3）從民族主義觀點來看，這是高於國民經濟的上位概念；（4）因此，在經濟上，民族經濟是民族主義的根據，亦是在外部勢力的支配下，仍然綿綿地被繼承下來的民族史正統的場域。

相較之下，作為應然的民族經濟如下：（1）民族經濟，應該成為一個民族的政治經濟的統一體；（2）它是創造民族力量和財富的過程以及場域的民族內在生活的統一體；（3）民族經濟，應該具有國內完整的自主再生產結構，並透過完整的經濟內容，能夠實現國民經濟的自主自立（國民經濟的形式和內容成為一體）。³⁶

35 同前引註，頁二七—二八。

36 同前引註，頁二八。

朴玄採認為，一個民族在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中，在民族生活模式遭遇危機的時候，民族經濟就會被重視及強調，進而成為民族主義的經濟基礎。而且，從經濟制度構成來看，殖民地半殖民地依賴型資本主義下的民族經濟，擁有龐大的前現代部分。朴玄採以同心圓圖象，提示了殖民地依賴型資本主義下的民族經濟：

本來的民族經濟和次要的民族經濟，之所以具有同心圓的構成，是因為次要的民族經濟在結構上，對著本來的民族經濟具有強烈的朝向性。換句話說，次要的民族經濟領域，是本來因而成為基本的民族經濟被扭曲的產物。而且，因為次要的民族經濟朝向既本來又基本的民族經濟理想性完成此一目標前進，並走向民族生活模式的恢復，所以這個結構是同心圓的。因此，雖然有時在經濟制度上，民族經濟的兩個領域具有不同矛盾，但是正是藉著民族矛盾成為統一體。尤其是在次要的民族經濟領域，也就是在基本的民族經濟外圍領域，因為民族成員在生活上所遭遇的基本矛盾與民族矛盾得以互相一致，因此它更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這就是說，民族主義的基礎，在於由這兩個部門所組成的同心圓構成之民族經濟。³⁷

不過，我們不能把如此同心圓構成，視為兩個部分的平面性結合。因為作為被扭曲的產物的次要領域，具有對本來基本領域的朝向性，而這一個本來的領域的歷史性，則成為如此朝向性的根

據，因此這兩者統一成一體，並形成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朴玄採尤其認為，在次要領域中，階級利益矛盾和民族主義走向，得以合流一致，使得民眾民族主義興起。

接著，朴玄採概括日據時代民族經濟的歷史展開，分成三個時期：

日本資本在殖民地韓國的運動，根據先進資本在殖民地的典型方式，大約進行了以下三個不同階段：（1）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一九〇五—一九一八）；（2）工業資本階段（一九一九—一九二九）；（3）金融資本階段（一九三〇—一九四五）。日本資本運動在殖民地韓國是具有規範性的。但是，從民族經濟主體的立場來看，這只不過是外部條件而已。日本資本的運動根據自我邏輯，在殖民地韓國得以貫徹，但這只是在日本資本運動與殖民地韓國經濟（民族經濟和民族經濟外部）的關係當中被貫徹而已。而其中，對於日本資本和買辦資本的運動，民族經濟的狀況成了規範性的因素。³⁸（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如此，朴玄採承認了在國民經濟觀點下，日本資本運動的規範性，但同時也認為，從民族主體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觀點來看，民族經濟反過來規範日本資本和買辦資本。他更提出了認識民族經

37 同前引註，頁三〇。

38 同前引註，頁三六。

濟狀況的指標，包括民族經濟的制度構成、擔任社會生產力的主體和民族經濟兩個部門的定量構成。朴玄塚認為，利用這個指標，可以闡明民族成員所依據的社會性質與社會矛盾的關係，以及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相結合的關係。³⁹

他基於如此觀點，概括了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支配的後果。

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支配所帶來的殖民性資本主義化的後果，是工業結構的跛行性、農業部門內舊的前現代制度的深化，以及民族資本的消滅。而且，這些後果是以殖民地超額利潤為目的的日本資本運動，也就是殖民地剝奪過程之反映。如此苛酷的經濟剩餘剝奪，造成了自主民族經濟基礎的瓦解或縮小，以及韓國人民的貧窮化。結果，經濟的主要部門，原本應該創造力量和財富，進而讓作為政治經濟統一體的民族，得以生存，但都被包含在日本壟斷資本的支配之下，民族生存圈因此被縮小，而在殖民地統治下，朝鮮民眾更加貧窮化。朝鮮民眾雖然進行了許多不同形式的抗爭，但實際上走上了每下愈況之路。總之，正是在殖民地統治下的朝鮮，日本資本或協助日本殖民地支配的極少數買辦資本，才成了擔任社會生產力的主體，而民族資本家幾乎被消滅了。因此，擔任民族經濟的主要勢力構成，是受外國資本僱傭於殖民地經濟下的大部分非熟練工人、被淪落為佃農的農民階層，以及藉由前現代手工業和中小企業維持生活的獨立小生產者。結果，民族經濟的制度性根據，被局限在農業的半封建地主佃農關係以及殖民地的薪資勞動關係。⁴⁰

如此狀況，確實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為契機，殖民地獲得了從壓迫到解放的變化。但是隨之而來的冷戰和內戰／分斷，讓變化的可能性無法具體化。但是，朴玄埰強調了光復後和戰爭狀況中，經濟和政治方面曾存在著民族經濟恢復的成果：

隨著日本殖民地支配的告終，我國〔韓國〕各地廣泛形成了基於民眾生活上的需求且立足於地區間分工、以地區性市場為媒介的自發性中小企業。如此狀況，即便是在一九五〇年六·二五的動亂中，仍然重現，表現出根據自然秩序的資本主義展開中所顯示的自發性發展過程，而且還能夠形成民族資本。而後來以援助為基礎，買辦巨大工業的形成以及它支配市場的過程，卻封鎖了基於民眾生活的、民族資本的胎動和蓄積的道路。⁴¹（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另外，朴玄埰認為，當時在政治方面，有恢復民族經濟的企圖，列舉了表現民族自主力量的實例，包括清算殖民地遺制（自主管理日本企業的工人、清算半封建地主佃農制度等等的努力）、

39 同前引註，頁三六。

40 同前引註，頁三九—四〇。

41 同前引註，頁四〇—四一。

重新確立民族經濟和自主統一、克服分斷等政治圈中的努力。⁴²但是，美國等外部勢力的介入，成了強大的制約因素。以下是朴玄採對戰後民族經濟狀況的評價。這也表現出他始終堅持的，對殖民和新殖民間的延續性認識：

從民族經濟的歷史來看，戰後自己民族的政治權力成為一個基礎，指示出狀況的變化。但是政權的買辦性質，讓韓國處於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狀況，因此，民族經濟的狀況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應該藉由與戰前時期同樣的一個趨勢，來理解民族經濟。

民族經濟的歷史性展開，時至今日仍然是處在與戰前同樣的脈絡上被賦予的。對此，我們站在歷史繼承性的立場，重新審視民族經濟中關於歷史邏輯性的展開，以深化我們對於歷史展開的認識。⁴³（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我們在此確認了朴玄採對於「新殖民性」的基本認識立場。換句話說，朴玄採正確地將買辦政權下，假想和扭曲的「現代化」的深化，理解為「半封建性」和「非主體性」的深化。

結構與諸範疇

朴玄採在《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中首先介紹問題意識和概念，而在第

三部，將這樣的問題意識和概念邏輯應用於已設定的十一個主題。其中，第一部第二章和第二部主要說明構成民族經濟論各範疇之間的關係。以下是基於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內容，介紹《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之基本設想。

在進入正式討論前，朴玄採首先提出此企圖本身的根本性局限：

但是，這有著根本的局限性。因為民族經濟論不具有完整的體系，而且是不能涵蓋我們所有問題的理論體系，所以現實上無法被建構成為完整統一的體系。雖然闡明已被賦予的諸範疇間的關係此一企圖具有局限性，但是在理解此局限範圍的前提之下所進行的。⁴⁴

如前所述，民族經濟論從民族主體的立場，試圖說明民族經濟和國民經濟的背離狀況。為此，朴玄採在接受現成經濟理論的前提下，試圖附加彌補性的理論工具，以確保對於現象的民族主體性認識。從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民族經濟論所扮演過的角色來看，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的企圖，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面臨了擴大民族經濟論視野的要求。

42 同前引註，頁四一—四二。

43 同前引註，頁四三。

44 同前引註，頁四四。

不過，現象的多樣性和實踐上的各種需求，不讓民族經濟論僅僅停留在作為一個簡單補充性工具的樸素狀態，民族經濟論並不被允許停滯和固定化。民族經濟論的視野面臨了把它適用於新狀況的要求，即過去沒有涉及過的領域。因此民族經濟論陷入了自我發展的邏輯，並追求精密化和理論的自我完整性。⁴⁵

即便如此，朴玄採不會忘記指出如此理論的精密化在實踐上的局限：

理論的精密化或發展成體系的需求，並不緊密地扣連著理論在社會實踐上的角色。因此，這只不過是理論本身自我發展邏輯的實現而已。民族經濟論試圖將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應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下的殖民地依賴型資本主義發展國家，並摸索適用於這些國家的「一般理論」。因此這並不是那種以新一般理論的莫立取代一般理論的意圖。民族經濟論不企圖打造完整的體系。〔……〕民族經濟論不是完整的理論，而只不過是解決我們的問題的 effort 中的一種企圖。因此，它接受所有的批判，並將在已建立的理論上，從民族主體性的角度，努力獲得解決我們的問題之社會實踐上的正確標準和手段。⁴⁶（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朴玄採在認識如此的局限性下，提出了構成民族經濟論的範疇，包括民族生活模式、民族資本、自

立經濟、民族主義、民眾、經濟計畫與社會形態等。民族經濟論的範疇，即是互相具有邏輯與實踐關係的一個體系。概括地講，首先，民族生活模式是從過去到現在綿綿傳承下來的歷史性；⁴⁷ 民族資本論的內容，相對於買辦資本或外國資本，成為具有歷史性的民族共同體的經濟構成之基礎和動力；自立經濟論是朝向以民族資本為基礎的理想性方向和原則；民族主義論，則能夠掌握走向如此經濟體制的具體局勢和運動；民眾論闡明如此運動的基本和主要主體；作為理論性範疇和內容的社會形態論和發展階段論，則提供掌握歷史和現實的理論性工具。

1. 民族生活模式論

朴玄採將民族生活模式論視為歷史發展的次要動因並討論之。我們首先確認朴玄採所講的「民族生活」之內容。

45 同前引註，頁四五。

46 同前引註，頁四六。

47 朴玄採的「民族生活模式論」思考相當於溝口雄三（一九三二—二〇一〇）所提出的「基體」概念。「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各自的近代到底是如何以各自的前近代為基體的？建立在前近代基礎上的近代和歐洲的近代相比，又在哪些方面具有獨特性？換言之，日本和中國是如何背負著各自固有的過去的？即是否定性繼承，這一繼承又是如何制約著現在的？如果從上述違背或缺乏歷史性的觀點出發，我們不可能客觀的、歷史地來掌握這些問題」，引自溝口雄三的《作為方法的中國》（孫軍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一一），頁九。

所謂民族生活，是指忠實於民族感情和民族情緒的具體的生活。一個民族，擁有著基於自己生活的氣候和風土之整體的生活。而且，對一個民族而言，這就是最適當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只能是如此這般具體的民族生活。因此，強調民族生活意味著，在傳承的生活之積累下所被賦予的熟悉的民族生活，就成為更好的生活的標準。⁴⁸

民族生活模式，於是就被自然條件和蘊藏資源所規定。而此生活的積蓄，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模式，進而決定價值意識。這樣的民族生活模式，不只制約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制約著反映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⁴⁹不過，在民族經濟論中，民族生活模式的意義如下：

歷史發展的動因，是人為了更好的生活之需求，以及社會中的矛盾關係，也就是圍繞著基於如此需求並根據規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來的社會矛盾關係。而且對更好的生活之需求，不是簡單抽象的需求，而是基於具體的民族生活模式之需求。⁵⁰

朴玄採在列舉民族經濟論的諸範疇時，第一個範疇是民族生活模式。朴玄採將「民眾為了更好的生活的需求」一定為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因，而民族生活模式則成為如此需求的歷史性具體根據，因此被視為歷史發展的次要動因。這相當於提出他的核心立論：「民族Ⅱ民眾」。

資本主義存在模式的矛盾，破壞了原本維持著相對自給自足方式的民族生活模式，因而讓

生活模式從屬於資本運動。結果，在殖民地依賴型資本主義發展中，民眾就承擔了維持民族生活模式的角色。一方面，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強迫民眾成為無產階級，不過，還有另外一個原因。⁵¹

原本作為直接生產者的民眾，是扎根於生產的生產者，因此其生活本身具有保守性，並且對自己生活圈外面的人，帶著強烈的仇外情緒 (xenophobia)⁵²。⁵³

這是因為，外在於民眾的階級或階層的生活，在感性或能力方面，對於外來性，是具備適應性的。相反，民眾的生活，在感性或經濟力量方面，是缺少適應性的。⁵⁴

48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一部：民族經濟論的概念與構成，第二章：民族經濟論的構成)，引自頁四六。

49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二部：民族經濟論的諸範疇，第一章：民族生活模式論)，引自頁五八。

50 同前引註，頁五八。

51 同前引註，頁五九—六〇。

52 此處為「xenophobia」的誤植。

53 同前引註49，頁六〇。

54 同前引註，頁六〇。

如此狀況下，民眾矛盾和民族矛盾就取得了一致。朴玄採對於民族生活模式論的概括如下：

我們從我們傳承的居住模式例如茅屋，可以發現民族生活模式的事例。雖然茅屋今日被視為一種過去貧困的象徵，但它不只是以我們周邊所蘊藏的資源建築出來，而且最後也將回歸於自然。茅屋於是就成為我們民族的感情、情緒、心理和意識等感性方面的基礎。整體生活的變化中，感性方面有許多變化，但是從基本概念來看，沒有太大的變化。這些道理，可以直接適用於今日新殖民地的狀況，即便有著程度上的差別。民族解放鬥爭的外表，採取了維持或恢復民族性的形式，但根本的內容是民族生活模式所含納的具體性，而具體內容就成為民眾抗爭的首要需求之基礎。因此，雖然歷史發展的動力，來自於民眾生活的普遍需求以及實現它的實踐上的矛盾，但是民族生活模式，就成了賦予歷史發展以具體內容的次要動因。在如此意義下，作為歷史發展次要動因的民族生活模式，成為民族經濟論的基礎概念。⁵⁵（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作為歷史發展的兩個動因之民族和民眾，分別對應於歷史標準和現實主體。不過，這個民族和民眾的關聯，自然提示了知識在實踐中的角色。這也有助於理解朴玄採透過社會形態論提出的知識之殖民性此一問題。斷裂於歷史因而在實踐中脫離民眾的知識，就背離如此「民族||民眾論」的知識倫理原則。在朴玄採看來，尤其是將「新殖民」視為斷裂於殖民的階段，或者否定「新殖民」

中的「殖民性」，正是「去歷史化」，因而構成了脫離現實的知識之前提。

2. 民族資本論

針對民族資本的範疇，朴玄採認為不能從政治標準來判定民族資本並規定其屬性。

民族資本的基本屬性，是奠基於民族經濟的資本的自我再生產，它的次要屬性則是民族系資本。資本主義下的民族資本，應該成為民族經濟的主體性承擔者，而它不只包含私人資本，也包含國家資本。⁵⁶

讓朴玄採提出民族資本的背景，就是國民經濟和民族經濟的背離。

總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壟斷階段，具有全球性的資本活動，把資本輸出加以具體化，並在

55 同前引註，頁六一。

56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一部：民族經濟論的概念與構成，第二章：民族經濟論的構成），引自頁四七。

後進諸國內實現殖民地化和虛構的現代化，此時就出現了國民經濟和民族經濟的背離。結果，在以實現一個民族的自主自立為目的的民族解放和確立民族經濟的過程中，民族資本作為民族經濟的社會生產力的承擔者，有其重要的意義。在此期間，由不同觀點所提出的民族資本論述，就是在如此背景下提出的。⁵⁷（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這樣子從歷史觀點出發的討論，克服了對於一般性「資本」的抽象批判和否定，同時也不只著重在被壓迫階級主體和隨之的權利話語，更從歷史地形成的人類物質／經濟關係中，尋找克服資本主義的動力。朴玄採認為，立基於民族經濟、自我再生產的民族資本之條件如下：

意思就是說，作為民族成員之自主生存基礎的民族經濟，在內部包容著資本再生產行程的兩個條件，即材料保全和價值保全（原材料關聯和市場關聯）。因此，自立性的民族經濟內部若要具有符合自己利益的民族資本，就需要克服國民經濟的對外依賴和高度化的殖民性經濟結構，並與作為殖民地經濟結構基礎的外國資本和買辦資本，形成利益上的對立關係。⁵⁸

朴玄採說過，民族資本的基本屬性，就是資本的再生產基礎，在於具有國內分工關聯的民族經濟內部，而且將「自己民族出身」視為次要因素。從戰後狀況來看，不只國家資本對外依賴，個別資本也都出現了跨國企業化的現象。而且，如此跨國企業的一般化，也被適用於南韓出身的跨國

企業。也就是說，國內分工關聯薄弱的南韓系跨國企業，也無法滿足朴玄採所闡釋的民族資本的條件。

不過，朴玄採以附帶條件的方式，承認了國家資本轉型成民族資本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他認為，在新殖民主義下，若去除政治權力的買辦性，那麼這一個條件可以讓國家資本被轉型為民族資本。他更認為，壟斷資本或中小資本在與買辦性龐大壟斷資本的矛盾關係下，表現出動搖和雙重性，結果也有可能與民族資本形成同盟關係。因此，他把可能與民族資本形成同盟關係的資本，視為「民族性資本」。⁵⁹所以，他對國家資本抱著開放性的態度。他認為，國家資本能否被視為民族資本的主要存在形式，必須有一個條件，也就是在政治權力的民眾性前提下，民眾民族的需求，是否可以得到貫徹？因此，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過渡期經濟中，國家資本主義成為確立民族經濟的重要手段。作為民族經濟論中主要範疇的經濟計畫論，就成了以作為民族資本的國家資本為主軸去完成民族經濟，也就是說，此一主軸是建設自立經濟的戰略綱領。

接著，朴玄採在「現象認識」的層次，考察了歷史中民族資本的展開，以及歷史認識中民族經濟的展開。尤其，他認為，在現象認識層次的民族資本，雖然經過消滅或衰殘的過程，但是

57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一部：民族經濟論的諸範疇，第二章：民族資本論〉，引自頁六三。

58 同前引註，頁六四。

59 同前引註，頁六五。

「以民族生活模式為依據的民族經濟一旦存在，民族資本在不斷生成消滅的過程這樣的一個對流現象中，以中小資本的形式維持自己」。而且，雖然民族經濟領域縮小和衰殘，但是廣泛意義下的民族資本還是不斷被彌補。不過，此一民族資本的狀況，取決於殖民地權力的政策和民族主義運動的強度。⁶⁰有關於如此民族資本狀況，朴玄塚舉了中國的實例：

雖然在韓國的民族資本是微小的，但是中國的實例告訴我們，民族資本擁有質的標準，雖然這在資本運動領域中不是那麼明顯。半殖民地中國中，帝國主義和買辦官僚資本共存，結果，經濟領域被分成他們掌握的領域和除此之外的經濟領域。民族資本在後者的領域中活動，進而獨自地確保了市場、金融以及其他資本運動所需要的必要條件，得以維持和展開相對自立性，因此即便遭遇壓迫，仍然對帝國主義進行抗爭。這就證明，半殖民地經濟結構下，民族經濟的本來領域是多麼堅強地存在，而民族資本基於民族經濟領域，是得以存在的。⁶¹

由此看來，民族資本和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密切關係。民族資本基本上作為資本，擁有清算舊的遺制之需求，同時有著與買辦資本的矛盾關係。因此邏輯上，它可以與反封建民主主義變革和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結合起來。但是，殖民地依賴下的民族資本，雖然具有如此正面性質，但是它在於一個不斷生成和消滅的對流現象中，具有縮小和衰殘的傾向，因此它的角色被局限在補充此時期

興起的「民眾民族主義」。另外，工人階級尚未成熟也仍占少數，而民族資本家也還是薄弱的狀態，所以此時期的民族主義，是以小市民知識分子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來主導。朴玄採認為，如此狀況持續到新殖民主義的階段，以及「政治權力相對自主性被承認」的「民主化」時期。

因為當下政治權力的基礎仍然依靠外國資本和買辦資本，所以上述的民族資本和民族主義的關係以及民族資本家的民族主義之內容和局限，同樣適用於新殖民主義階段下政治權力的相對自主性某種程度上被承認的當下時期。⁶²

另外，有關於歷史認識，朴玄採認為，「民族經濟領域的縮小和衰殘」的狀況，在新殖民時期變得更嚴重：

今日，韓國資本主義中的龐大壟斷資本，即率領系列企業群的財閥中，任何一個不是沒有與外資有所關聯的。而且它們的經濟利益，按照資本形態，與外國資本都具有緊密的關

60 同前引註，頁六六—六七。

61 同前引註，頁六七。

62 同前引註，頁七〇。

聯，也呈現著未具生產力基礎的低度壟斷。再者，這些財閥的積累基礎是消費資料工業，因此它們不允許民族資本在部分消費資料工業上的成立。而在產業合理化的名義下，壟斷的大財閥獲得了政府的政策支援，結果侵犯了中小企業的領域，並擴大了壟斷支配的範圍，進而將廣泛的中小企業，加以外包化和買辦資本化。這就證明，雖然國民經濟表現出量的膨脹，但是作為民族的自主性生存基礎的民族經濟領域，比起日本殖民地時期，經歷了更大規模的縮小和衰殘。在如此狀況下，戰後韓國資本主義中，民族資本當今存在模式的狀況，與殖民地狀況中韓國民族資本的存在模式，並不具有太大的差別。今日的民族資本只不過以部分的中小企業形式，在龐大資本的力量達不到的領域、在生成和消滅的對流現象中，很勉強地維持著自己而已。⁶³（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當然，朴玄採沒有因為這樣的歷史狀況認識，就得出悲觀的結論。朴玄採透過與民主化運動結合的廣泛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以及其與民族性資本的動搖相結合的可能性，看到了希望。⁶⁴

3. 自立經濟論

朴玄採將自立經濟定為民族經濟的應然完成形態。朴玄採認為的自立經濟結構如下：

自立經濟是指，在企業和產業間緊密的分工關聯下，整合地實現以基礎工業為底層，往上形成作為農村工業的中小企業，以及作為國民性工業的消費資料工業和生產資料工業，這樣的一個金字塔型工業結構。而且，自立經濟通過堅持著民族生活模式，同時實現相對的自給自足體系，需要成為實現民族自主自立的基礎。⁶⁵

奉送

特別是從歷史來看，自立經濟不只是理想，也是歷史根據：

民族經濟從源頭就是以自立經濟為自己存在的模式。因為經濟的存在模式原本是封閉而相對自給自足的體系，從外部的補充只不過是非經濟性的掠奪而已。⁶⁶

與此同時，朴玄採的自立經濟論，基本上批判了「人」不存在的現代經濟學。

63 同前引註，頁七一。

64 同前引註，頁七一。

65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一部：民族經濟論的概念與構成〉，第二章：民族經濟論的構成〉，引自頁四七。

66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二部：民族經濟論的諸範疇〉，第三章：自立經濟論與民族經濟論〉，引自頁七三。

一般來講，現代經濟學論述不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忽略人或民族間的社會關係，因此將重點放在不具有任何具體關聯的經濟諸量之「量的均衡」。相反地，民族經濟論的視角，重視人間、民族間的社會關係，且試圖結構性地認識它們。也就是說，自立經濟滿足了民族的自主自立以及民族生活模式的維持等民族主義需求。⁶⁷（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朴玄埰的經濟觀念，關係到人和人以及民族和民族間的關係，並呈現了他的某種存有論觀點。其實，如此觀點類似於〈戲台〉一章中所提出的立論：以「民族」為媒介，基於個體自由和民族平等，掌握歷史的動力。換句話說，他把民眾論和民族論的取向，反映在他的經濟認識上面。

另外，朴玄埰提示了自立經濟的各項指標，包括掌握再生產條件、自我完整的自主性再生產機制、全國擴散機制、國民經濟與民族經濟的整合等，並認為實現這些指標必將遭遇許多困難和障礙，政治領域因此就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經濟問題被集中地表現在作為人間社會關係的政治狀況。因此，實現自立經濟問題成了基於民眾意志，並根據民主主義政治程序，進而具體地把民眾意志轉換成國家意志的政治問題。⁶⁸

如同前述，摸索著如何實現自立經濟，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因此，在今日狀況下，我

們應該進行更廣泛的討論。我們不只需要闡明圍繞著自立經濟中利害關係的當事人位置、性質和勢力均衡狀態，而且還要分析主動地作用於此的國家權力。而且，我們需要以此為基礎，提示著如何達到自立經濟的技術性過程。⁶⁹

奉送

接著，朴玄採提出，我們必須分析制約著自立經濟的外部因素和內部條件與因素，並概括了世界經濟狀況的變化。

戰後重建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體制，以一九六八年黃金總庫制度的解體為契機，走進了解體過程，而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美元拒絕兌換黃金，象徵性地讓美國拋棄世界經濟的主導權。因此，世界經濟走進了多極化的時代，而且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底層內，潛伏著的「整合」和「極化」此二相互矛盾的傾向中，原本的民族主義傾向——分離和極化現象——更突出。再者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所引起的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讓過去被視為有效政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增長遭遇了危局，導致世界經濟

67 同前引註，頁七四。

68 同前引註，頁八四。

69 同前引註，頁八五。

出現全面性分割現象。目前的世界性不景氣不被視為一種循環性，而被視為結構性的不景氣，所以極化的傾向擴散得更快。而擺脫過去殖民地依賴的新生國，以聯合國貿易開發會議和不結盟會議為基礎，挑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並要求新的經濟秩序。世界資本主義因此就陷入了更昏迷的狀況。⁷⁰

接著，朴玄埰指出了針對此狀況的認識之於南韓的意義。

首先，不景氣的深化、世界經濟的低度成長、各國管制進口和內涵增長(intensive growth)等種種傾向，會給韓國經濟帶來決定性打擊，因為韓國經濟在「出口立國」的名義下，固定化了從屬於國際分工體制並作為其中一個環節的外延性增長結構。出口增長的放慢引起了嚴重的不景氣，因此過去擴大再生產的對外依賴型經濟結構，就遭遇了災難性的清算要求。雖然以後全球性的不景氣在展開過程中，將會有若干起伏，但是我們正經歷的不景氣，畢竟具有結構性，因此我們不能否認，經濟邏輯所行進中的方向，就是其間擴大再生產的對外依賴型經濟結構將面臨的災難性清算。⁷¹（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事實上，朴玄埰的警告預見了一九九七年南韓所遭遇的災難性危機。不過，朴玄埰同時認為世界資本主義的極化，也賦予了追求自立經濟更多的可能性。另外，有關於內部條件和因素這方面，

朴玄採認為，因相對貧困的深化而被異化的民眾之抵抗，以及國民經濟增長所形成的社會生產基礎，可以成為一個潛力和可能性。

不過，朴玄採關於自立經濟論的結語，批判了缺乏反省的狀況，並強調社會實踐。

我們今日的狀況，不管是政治方面還是經濟方面，想要把握經由反省過去歷史過程而來的新轉機，加上國際經濟條件的變化、國民經濟再生產過程的危機，以及隨之的人間的社會關係，凡此種種賦予了一種可能性。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中，實現真正的自我解放，是一個需要長時間的歷史課題。即便如此，我們不能否認，在我們的歷史中，過去的經歷是停滯不前的，而且是沒有反省的。將可能性或潛力加以現實化，只能靠人的社會實踐。這就是在確立自立性民族經濟的道路上，提出實現自立經濟之理論性摸索的意義所在。⁷²（粗體字強調為本書

作者所加）

70 同前引註，頁八六。

71 同前引註，頁八七。

72 同前引註，頁八九—九〇。

4. 民族主義論

朴玄採關於「民族主義」的歷史認識，呈現出歷史辯證法的均衡感：

遭遇外勢的侵略，韓末（大韓帝國末期）的韓國社會激化了內部矛盾，而根據社會構成形成了不同的應付方式。這大約分為二：第一是支配階級自上而下的對付，而這又分成兩種，首先是保守派應付，另一種是現代化傾向的開化派的應付。（……）相對於自上而下的支配階級的應付，民眾的應付則反映了舊韓末時期我們的社會構成，即由農民來主導。（……）但是，這樣的應付將特定的封建國家官僚當成主要打擊目標，因此並沒有產生思想性契機以否定封建制度本身，也沒有跨越地區範圍而形成運動的橫向串連。（……）因此，這時期我國的民族主義，由保守和地主的民族主義為代表，之後在晚期義兵鬥爭中，與自下而上的民眾民族主義相結合而得以強化了。⁷³（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朴玄採對於自十九世紀末到一九四五年前後的歷史認識，尤其不同於南韓進步或左翼的「抽象性」的民眾史觀。而事實上，朴玄採的歷史認識與「北朝鮮」的歷史觀，則具有共同性。這也就間接地證明，朴玄採在傳統認識問題上，沒有採取基於「現代性」的左翼唯物史觀，即便他從未積極地如此主張。有關於此問題，南韓著名進步歷史學者姜萬吉（강만길，一九三三—），也曾經

提出過對於北朝鮮歷史學的類似觀察。

特別是在開化期的問題方面，他們和我們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北韓的歷史學將開化期的所有民族運動，包括甲午農民戰爭，視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在此我看到了他們比南韓的歷史學界，更高度評價開化派的角色，甚至斥邪衛正派的角色。南韓學界的趨勢，則是不管對斥邪衛正派或甚至開化派，都指出他們的反歷史性。我想，因為我們學界要成立唯物史觀的時代區分，結果就出現了這樣的趨勢。⁷⁴

正因為抱著同北韓歷史學的歷史平衡感，朴玄採在面對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歷史轉型期時，他能提出如下不同的民族主義論：

民族主義不只局限於市民民族主義。它是構成一個社會的階級階層在對外關係上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來看，它是經由民族稜鏡所呈現出的階級性，而在殖民地依賴型（……）資本主義成

73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三部：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第三章：韓國民族主義的展開與其課題〉，引自頁二三七—二三八。

74 參見【韓】〈卷首座談：八〇年代民眾史學論的問題為何？〉一文中姜萬吉的發言，引自《歷史批評》（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頁四四。

立以後，民族主義成為經由階級稜鏡所呈現出的民族性。因此，民族主義不以抽象的民族主義存在，而是構成一個社會的階級階層的需求，並經由民族性調整後的對外表現。換句話說，民族主義的源頭是民族生活模式，而其表現是圍繞著民族利益的多樣階級的對應。⁷⁵

在朴玄塚看來，民族性作為歷史性，具有相當的獨自性。這同時也反映出他對世界的多元主義認識。透過民族主義的複雜性和獨自性，朴玄塚找到了認識民族主義之困難的原因。首先，民族主義牽涉到民族間的關係、階級關係、社會變革運動（尤其民族解放運動），而且它並不以純粹形式存在，而與政治、法律、宗教和社會等各領域複雜地糾纏著。接著，他認為，民族性具有如下獨自性：

而且，在歷史中某個特定時代，雖然民族性只能是次要因素，但有時在特定的歷史狀況下，它將基本矛盾加以抽象化而成為主要矛盾，因而讓我們不容易理解問題的狀況，而且又因為民族性具有繼承性，所以在與社會組織各部門的關係中，有其相對獨自性，這也讓我們不容易理解問題的狀況。「……」在如此關係下，民族關係的整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對獨自性，而且在從一個形態過渡到另一個形態的時候，一個社會性的人種共同體以生活各方面的歷史性繼承出現。民族內新關係的整體，多半在內部保存著過去的物質和社會基礎，或者讓它之所以為它的痕跡。被保存下來的前時期形態之民族關係所具有各種

特徵，結合於社會人種共同體的運動和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新因素。反映在日常意識和理論水準的民族關係的整體，也是繼承性所具有的特質。民族關係的許多面向，不只在社會內部得以維持，並具體呈現在物質性的實踐上。這些特徵，在像戰爭般的社會的嚴重危機狀態下更加明顯，因而具體的結果就直接反映在民族間關係、民族對立和民族利害關係上。⁷⁶（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朴玄採從如此這般對於民族主義的認識，跨越了現成的民族主義理論，進而提出「建構具有廣泛意義的民族主義概念」的必要性。

建構廣泛意義的民族主義概念，是為了克服作為歷史現象的過去對民族主義理解的混亂，並且正當地評價在我們和像我們的第三世界中，作為被賦予的社會現象之民族主義。而且，在一個社會的具體條件中，我們想視民族主義為具有相對獨自性，而其被繼承的民族性得以實現的階級性反映。⁷⁷

75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一部：民族經濟論的概念與構成，第二章：民族經濟論的構成），引自頁四七。

76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二部：民族經濟論的諸範疇，第四章：民族主義論），引自頁九二—九三。

77 同前引註，頁九四。

這麼一來，朴玄採將「民族性」視為一個歷史性縱向，且認為它與社會組織各部門的關係以及民族間關係中，具備相對的獨自性。從他的整體思想來看，朴玄採是奠基在如此的民族性和民族主義，並以此為一個向心力，試圖掌握主要矛盾並指出實踐的方向。

5. 民眾論

朴玄採認為，民眾的基本屬性是直接生產者，也是從生產結果被異化的階層，而次要屬性是對應於「主要矛盾」的主體：

從概念來講，民眾是直接生產者，也是從生產結果被異化的階級階層，但是在民眾範疇和與此對立的階級階層之間的現實矛盾中，民眾範疇作為主要矛盾被提及的時候，它不以概念而以社會實體登場。在存有民族經濟和國民經濟的背離的國家中，民眾生活利益矛盾和民族矛盾得以一致，因此民眾就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主體，結果，民眾民主主義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大潮流。⁷⁸

朴玄採將上述「民眾」的基本構成，視為工人、農民和都市貧民這三者相互轉換的循環排列組合，並基於階級性質，把工人階級視為主導性階級。同時他認為，民眾的次要構成具有可變性，

因此民眾構成的外延能包括廣泛的中產階層和中小企業。而且他還強調，主要矛盾和民眾認識都是不被確定的。

不同於階級關係下被設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不是固定的而是可變的。主要矛盾的可變性，因一個社會的處境而異。例如，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下，受殖民支配的國家中，對外性的民族自覺造成了反帝國主義的性質，而民眾的首要自覺是對內的，因此具有反壟斷性質。因此，民眾的內包和外延，都取決於民眾層次被賦予的主要矛盾的變化。⁷⁹

因此，朴玄採警惕了對應於主要矛盾、作為實踐概念之「民眾」的抽象化，亦即，理論主義的民眾認識或對民眾的浪漫主義肯定。

事實上，在建構民眾概念的時候，我們需要避免「抽象化」，因為它將架空民眾的內容。如同前面強調的，對於歷史實體的抽象化是沒有意義的。⁸⁰

78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一部：民族經濟論的概念與構成〉，第二章：民族經濟論的構成〉，引自頁四七—四八。

79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二部：民族經濟論的諸範疇〉，第五章：民眾論〉，引自頁一〇三。

80 同前引註，頁一〇三。

因此，他將當下時期視為「民眾」的時代，但同時也提出了制約民眾的能動性主體化之因素：

首先，許多所謂「中產階層」脫離了民眾能動性的主體構成以及以他們為對象的大眾社會狀況之具體化，這是阻礙民眾成為現實世界主體的因素之一。其次，制約民眾慾望的主體性解放的作為，如大眾媒體等大眾炒作工具，將民眾需求引導至特定方向的努力，也是阻礙民眾成為現實主體的因素。第三，工業社會的高度化所帶來的情況之複雜性，讓今日狀況擁有更多選項，這也是阻礙民眾成為現實世界主人的條件之一。⁸¹

6. 社會形態論與發展階段論

首先，朴玄採闡明了論辯期間成為爭議對象的社會形態和民族經濟論之間的關係。

民族經濟論的另一個重要構成範疇是社會形態論和發展階段論。這是與民族經濟論同樣被適用到一個社會之支配性經濟制度和社會性質的問題，兩者互相糾纏，且同樣關係到發展階段。針對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的批判性立場，以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問題，或規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問題，都與此有關。其中，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問題緊密地關係到政治權力的性質問題、民眾構成以及它的外延等問題。但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成為民族經濟論的構

成範疇，不意味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是民族經濟論的下位範疇。因為，民族經濟論的意義只在於，以實現一個民族的自主自立的問題意識為出發點，在現成的理論體系上，把現成理論適用於我們的狀況，並建構補充性的體系。⁸²

奉送

我們於此再次確認了朴玄採提出「民族經濟論」的基本原則性態度。在理論層次上，他拒絕透過否定或超越現成理論而建構出另一個「普遍／特殊」理論的方式，朴玄採將自己的理論工作當作作為一種實踐的「適用」和「補充」。而朴玄採對於其間社會形態論戰中成為主要論點的，關於日據時代韓國的「殖民性」和「半封建性」，提出了與眾不同的概括。

首先，殖民性範疇，嚴格地講，是以資本—薪資勞動關係為中心而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範疇，而因為殖民地支配是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的產物，所以就等同於殖民地資本主義本身。但是，此時期以資本—薪資勞動關係為中心而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是主流。〔……〕但是因為這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與作為上層建築的總督府權力的關係下，

81 同前引註，頁一〇六。

82 參見【韓】朴玄採（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同前引註18）的《第二部：民族經濟論的諸範疇》，第六章：社會形態論與發展階段論》，引自頁一一六。

具有支配性，而且並沒有成為經濟制度範疇，而是成為社會形態的範疇。⁸³（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半封建範疇不是社會形態範疇。半封建範疇之所以提出來的背景如下：「封建性土地所有」下的小農經營，在封建體制下成為主要經濟制度（**주요 경제제도**），而殖民地化帶來新經濟制度的移植，而且它成為支配性經濟制度，因此小農經營成為次要經濟制度。同時，這也是在殖民地狀況下，宗主國資本努力保存舊的遺制之產物。（……）因此，殖民地半封建性，就是基於半封建性土地所有下農民經營的次要經濟制度範疇。⁸⁴（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從此，我們確認了，朴玄埰對於日據時代朝鮮社會的認識中，清楚地區分了社會形態和社會性質。而且，關鍵核心就在社會形態與經濟制度之間的差異。我們可以說，經濟制度是掌握社會性質的範疇。而他這樣的方法，也被適用在戰後歷史狀況的展開。

今日有關於韓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常常引用社會形態論和發展階段論。社會形態論是關於歷史的基本經濟體制，例如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討論；而發展階段論，是狹義的關於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階段的討論。從這個意義來看，社會性質問題是不同層次的問題。首先，經濟制度構成是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發展階段和狀況的產物，而性質此問題所要表達的是，根據某個

經濟制度的構成，則具有不同表現模式的資本主義的諸種狀況。因此，社會性質問題，與社會形態和發展階段，是屬於不同層次的問題。我們應該透過關於社會形態和發展階段的基本認識和深化，提出進一步針對韓國資本主義性質的規定。而且，此過程中，適用於日據殖民地韓國社會性質規定的程式，同樣適用於今日韓國的社會性質規定。⁸⁵（粗體字強調為本書作者所加）

如同我們在〈灌浴〉中所確認的，朴玄埰是從這樣的脈絡，將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社會性質視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民族經濟論」與新殖民／分斷體制

就像大部分的實踐性理論一樣，〈朴玄埰的理論〉沒有餘裕具備經由長時間的思索和邏輯性檢驗而形成理論體系，因此無法具備精緻的理論體系。但是，每次新的實踐性課題被提出來

83 同前引註，頁一二一。

84 同前引註，頁一二一—一二二。

85 同前引註，頁一二八。

的時候，而且當自己的理論遭遇批判的時候，他（朴玄採）努力補充和修正自己的理論。這是事實。《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是他面臨體系化的要求，自覺地在當下階段，將民族經濟論所包含的理論加以統整的企圖。（……）因著不利於他的知識環境和朴教授的健康狀況，我們無法期待他能夠完成這項工作。但是，不管是否可能，民族經濟論作為六〇年代以來，在韓國工業化過程中形成的具有韓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同時，作為一個對朝向民主主義、民族自主化與統一的變革運動產生重要影響的實踐性經濟理論和思想體系，民族經濟論在韓國的經濟思想史上，會英明永存的。⁸⁶

我們從鄭允炯的說明，確認了朴玄採的思想實踐總是以回應歷史展開所提出的新要求為目的。因此，朴玄採終究沒有任何將自己的思想實踐體系化的企圖，而將自己的知識工作，視為一次又一次的實踐和努力。

朴玄採這般的努力，讓他的人生具有「朴玄採＝無＝多」的存在方式。這樣的存在方式不同於現代強調「所有／私有性」的知識分子，而是擁有經由歷史而傳承下來的實踐型知識分子的倫理面貌。其實，一九八〇年代的朴玄採，與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以後，在美國影響下所養成的現代性知識方式的世代，產生了矛盾。從根本上來說，如此矛盾可能起源於實踐模式的歷史性斷裂。我將此概括為「新殖民主義知識生產機制」和「新殖民主義知識主體形成」問題。

朴玄採的實踐模式，也反映在他對待「文學」的態度。朴玄採把文學視為實踐，因此他批判

了現代文學理論的「保護文學自主性」的立場，將那樣的立場視為站在不符合社會實踐的既成文學理論和作品的立場。換句話說，在朴玄採看來，把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分開來，並將文學理論（評論）和思想分開來——如此所形成的現代主義文學的歷史性本身，是需要被批判的對象。

朴玄採透過如此「非所有」的知識態度，批判了雙向否定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外在性的第三世界之實體化，進而試圖從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殖民地朝鮮的民眾民族主義經驗，主體性地吸收否定和克服第一世界並仍在進行中的「第二世界」的成果。總之，對朴玄採來說，歷史的扭曲和斷裂，正是核心的問題意識。如此一來，若陳映真為了解決思想貧困而關注了作為參照點的第三世界，那麼，朴玄採視「作為外在否定」的第三世界為對於殖民地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歷史繼承性的否定，也就是去歷史化所造成的認識扭曲的表現。再者，對朴玄採來說，克服「分斷」不是簡單的形式性統一，而對此問題的積極思考提供他一個契機，促使他呈現出南韓去殖民主體形成的根本性制約因素。這個問題意識，要求我們提出一個新的邏輯和實踐方案，以便能夠彌補反共主義和分斷意識形態所造成的、作為政治空白的「黨」和作為認識論空白的「北朝鮮」。

最後，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呈現了上述朴玄採思想實踐的部分體系化，但這個產物，基本上是他遭遇歷史展開中的新要求所做出來的努力回應。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當朴玄採一方面拒絕體系化，同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提出體系，他要給後冷戰轉型時期提出什麼樣的

答案？構成民族經濟論的民族生活模式、民族資本、自立經濟、民族主義、民眾和社會形態等核心範疇，結合了歷史基體、人的物質基礎和動力、理想的經濟體制、社會變革運動、主體和理論等各個層次。朴玄採以此為基礎，對於歷史和現實展開了非常廣泛的考察。⁸⁷從表面上看，這似乎「經濟學」的擴張，但從內容來看，經濟學只不過是外表。他的《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簡直就是「思想」本身。我們難以從當下的知識話語掌握他的思想內容。我們首先需要的，是重構「主體」的知識方式，並且形成能夠承擔如此知識工作的知識主體。

回頭來看，在朴玄採被孤立的一九八九年，他撰寫而出版此著作的理由似乎不是直接介入當時當場的論述格局。從實際效果來看，我們發現當時幾乎沒有存在任何對此著作的反應，即便《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是他龐大的著作中幾乎唯一具有系統性的。我認為，此書是為未來而出版的。作為歷史中間物的朴玄採，似乎透過此書的出版，記錄了歷史思想的斷裂之處，並點出斷裂所在。然而，對我們而言，此著作也只不過是讓我們得以進入歷史之中的出發點，確認朴玄採以及他所傳承的歷史縱向的豐富性，以及再歷史化的必要性。

87 《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第三部，由十一個主題所構成，相應於十一個主題並展開了十一篇詳細的論述，包括：〈解放前後民族經濟的性質與其展開〉、〈分斷時代韓國經濟的展開與自立經濟的道路〉、〈韓國民族主義的展開與其課題〉、〈勞動問題的本質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下的工人運動〉、〈韓美日經濟勾結結構在民眾史上的意義〉、〈關於韓國的社會性質與發展階段之提出〉、〈關於民族統一問題的基本認識〉、〈作為統一論的自立民族經濟的確立方向〉、〈韓國社會民主化的性質與課題〉、〈韓國經濟的課題與展望〉。

拆台

重新開啟思想解放空間

朴玄採的困惑：具有開放性的可能性

朴玄採在與鄭民的對談中，被問到民族經濟論的弱點，而朴玄採回答：

朴玄採：首先可以指出，實際上在國民經濟當中，無法以具體樣態抽出民族經濟。今日的現

實中，我們從如此國民經濟當中抽出民族經濟的基礎是非常不容易的。¹

無法明確地提示「本來的民族經濟」此事，讓朴玄採感到困惑。其實，如此困惑也關係著無法打開第三世界相互參照的道路。如同與白樂晴進行的「第三世界」爭議中所顯示的，朴玄採雖然警惕著第三世界的本質化，但他同時批判將南韓／韓半島的分斷體制加以特殊化，同時把越南設定為可以參照的對象。²而本來的民族經濟就是需要透過相互參照始能重新獲得內容。從這點來看，「亞洲作為方法」所代表的去殖民主義反思，可以說是真正繼承朴玄採的困惑之問題意識。³

但是，在第三世界的反共主義現實中，「共產主義」透過「民族解放」獲得它的具體表現，而新殖民地／殖民地之間的相互參照則被壓抑。從社會性質論來看，朴玄採可說是批判了從社會形態論去尋找本質／主要矛盾，因為這樣的方式呈現了去除歷史性的傾向。而後來論戰的發展也顯示，如此這般複雜化社會認識的平面性，是受到「矛盾論的哲學化」的影響。⁴朴玄採認為，我

們無法依靠普遍性複合體的「社會形態」，構成主體的實踐論／矛盾論。但是，他同時警惕了白樂晴的第三世界論或分斷體制論等「特殊化」的路線。唯有超越普遍／特殊認識論參照關係的多元化，才可以保證作為認識對象的主體性。⁵也就是說，朴玄採的民族經濟論隱含著認識論的去殖民課題。

另外，他與白樂晴所進行的民眾文學論戰顯示出，朴玄採的困惑不只留在「經濟」，也擴展到「文學」。這就指出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實踐論」意涵。在南韓的當代歷史中，民族經濟論和民

1 參見【韓】朴玄採和鄭民的對談〈民族經濟論——闡明民族民主運動的經濟基礎〉，引自《現階段·第一集》（蔣尚煥等著，首爾：Hanul，一九八七），頁三九一—三九二。

2 「在雙重否定越南和德國對於韓半島的參照可能性下，分斷體制論呈現了透過『韓半島特殊性』貢獻於『世界變革』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白樂晴並不把『第三世界』或『東亞』當作參照對象，於是就與批判依賴理論和白樂晴第三世界論的朴玄採形成明顯的對比，因為後者將越南的歷史視為與朝鮮半島類似的區域性經驗。朴玄採雖然非常警惕依賴理論和第三世界論，也在反共體制的限制下無法直接展開參照第三世界的論述，不過正因他主張南韓仍然是新殖民地，因此能夠維持第三世界思想實踐的精神」，參見延光錫的〈民族文學的民眾性，還是民眾文學的民族性？——試論一九八〇年代南韓民族民眾文學論戰〉（二〇一八年未刊稿）。

3 東亞區域內此問題意識的系譜包含竹內好（一九一〇—一九七七）、溝口雄三（一九三二—二〇一〇）以及陳光興（一九五七—）等人的思想實踐。

4 從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到一九九〇年代所進行的阿圖塞（Louis Althusser）（以及巴利巴爾〔Étienne Balibar〕）的哲學有關討論呈現如此傾向。

5 參見陳光興（二〇〇六）《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

族文學論基本上是民族主義思想運動的主要話語。而思想運動在民族解放運動（民族主義運動）中，也是群眾和知識相互嫁接的場域。內戰／分斷後的新條件下，如此思想運動的角色，被揭示在多元世界構成下民族主義運動的經濟基礎（認識論基礎）和文化基礎（實踐論基礎），而朴玄塚的思想實踐已經隱含著線索。

東亞去殖民主義：亞洲作為方法

我認為，二十世紀東亞的思想實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思想解放空間的軌跡。區域性思想解放空間基於歷史條件，其中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時期，和隨後對此進行反省的時期，為時間性的構成單位。

具體來講，二十世紀上半期，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運動這麼一個區域性國際主義，代表著東亞（半）殖民地的理論和實踐。毛澤東和魯迅等思想家的實踐就是其中最突出的思想成果。不過，東亞區域經由內戰而進入冷戰體制，漸漸失去了具有區域國際性與民族性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條件。因此在冷戰時期的東亞區域，進入對過去歷史的反思階段而成為思想解放空間的地方，反而是日本。這主要是因為在冷戰秩序下，中國和社會主義體制國家走向封鎖下的「建設」，從而制約了承擔反思性的思想課題，而南韓和台灣等地區，則成為美國的新殖民地而經歷了思想的斷裂和扭曲。恰好在此狀況下，日本形成了戰後反思歷史性思想實踐的空間。由此

脈絡，我們得以關注竹內好和溝口雄三等思想者的〈作為方法的亞洲〉（一九六〇）和〈作為方法的中國〉（一九八九）等思維。

不過，一九八〇年代冷戰動搖的歷史條件，要求南韓和台灣地區的思想界重新思考理論和思想問題。結果，東亞形成了具有區域性國際主義性質的思想連帶網絡。一九九〇年代的南韓出現了東亞論話語，然而，日本知識界和南韓知識界長期的交流，以及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陳映真的思想實踐，早就呈現了東亞區域知識連帶活動悠久的歷史性。而且，台灣知識思想界早就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從保釣運動獲得有關於歷史主體性的啟發，接著也經歷了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進而形成了著重與外部關係性的關於「主體性」的思想論述空間。在此條件下思考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思想問題的陳映真，恰好能成為反思南韓思想史的區域性參照點。

本研究基於區域性相互參照的研究方法，歷史地探討了與台灣和南韓的新殖民性相關的知識思想史矛盾。尤其是藉著陳映真這麼一個台灣的思想性參照點的存在，本研究對於朴玄採思想的探討，能有適當的語言和解釋。我認為，本研究的終究內涵大約如下：

經由割讓／殖民的台灣，國民黨在二戰後接收台灣的半殖民地時期，相當程度地克服了在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下被賦予的非主體性，但是，隨著內戰的停止和分斷／新殖民轉型，台灣的非主體性再度成為問題。對此問題，陳映真從歷史和傳統問題意識出發，提出了殖民性的延續和殖民主義現代性所帶來的扭曲。他從歷史合理性的邏輯，在政治方面認同中國的社會主義統一；不過在文學思想方面，更深刻地思考新殖民地台灣的特定性。從他思想脈絡的歷史來看，台灣呈現

了割讓／分斷脈絡所賦予的「非國家性（地方性＋區域性）」。而這一個「非國家性」制約了台灣的假想國家化，於是與南韓不同，台灣在區域關係性的脈絡下更直接體驗了歷史局勢的變動。在此條件下，一九八〇年代的陳映真更積極地提出「思想的貧困」的問題，以及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性，而且也積極將南韓的論戰（社會性質論、社會形態論以及民族經濟論等）當作參照視野。不過陳映真所追求的相互參照認識格局，在割讓／分斷的歷史性制約之下，無法透過「理論」（政治經濟學），突破歷史的「中國性」和現實的「台灣性」之間的矛盾，於是便回到「實踐」（文學）領域，呈現出了思想課題的複雜性。

另外，朴玄埰作為分享著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主體性（包括思想傳統和實踐姿態）的南韓左翼思想家，將新殖民視為殖民的持續，並以去殖民主義的經濟思想，傳承了思想傳統，呈現出思考和解決問題的主體性面貌。他基於這一個延續性的觀點，試圖闡明內戰／分斷後新殖民南韓的特定性。憑藉著他的主體性，朴玄埰不同於陳映真，並沒有緊迫地自覺到作為參照點的第三世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等到一九八〇年代，在朴玄埰自己沒有認知到的知識體制中龐大的新殖民轉型之中，他的主體性被孤立起來，因此他提出了歷史和思想的斷裂問題。與此同時，朴玄埰認為社會科學方面的「第三世界論」之依賴理論（包括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以及邊陲資本主義論），是否定內在的「第三世界」歷史的「第二世界」思想傳統的某種去歷史化的特殊主義理論。由此可見，他對於新殖民根本性認識的路徑，是以「分斷」為媒介，而認識到的假想國家化以及現代化。這一個他所達致的認識內容，可稱為「分斷／新殖民的現代性」。同時，他開始思考語言／

文學的「貧困」問題，且期待透過「文學」解決思想斷裂的問題。也就是說，雖然他一開始從確切的歷史主體性出發，但是遭遇思想的斷裂狀況，朴玄採的思想於是轉向思考語言／文學貧困的問題。不過，關於語言／文學貧困的歷史原因和解決方法，只能透過區域性相互參照的網絡，以及對於歷史和現實的再認識，才能掌握。而朴玄採對於「文學」的思考，或可視為朝向區域性相互參照的道路之對於社會科學的反省。

從區域性思想史來看，我們可以用「思想的分斷」來概括東亞區域的新殖民狀況。內在於陳映真的「思想的貧困」和朴玄採的「思想的斷裂」的根本層次原因，就在於失去了區域性國際主義思想此一歷史性分斷。如此分斷同時反映出歷史和地理的斷裂所造成的後果。因此，本書以「思想的分斷」為名，希望有助於促進恢復思想的區域性國際主義傳統。

回顧《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採》

最後，我扼要地回顧本書各章節的核心論點。

首先〈戲台〉介紹了作者所採取的區域性參照研究的背景問題意識、操作方法和切入點。基本上本書著眼於人類歷史中，尤其是殖民之後的知識矛盾，採取兩個批判性觀點：拒絕「遺忘」且重新歷史化的「歷史掛帥」此一觀點，以及經由區域性相互參照的主體性知識生產的觀點，由此試圖考察二十世紀後半期在南韓活動的思想家朴玄採的思想實踐所具有的當代意義。尤其在

南韓知識思想界經歷了一九六〇年「四·一九革命」和一九八〇年「五·一八慘案」之後，雖然主動地獲得了作為政治形式的「民主」和作為政治主體的「民眾」範疇，但同時也顯示出脫離作為歷史範疇的「民族」之趨勢。作為親歷殖民和內戰的「倖存者」的朴玄採認為，一九八〇年代對於「民族」的否定，或把「民族」加以外在化的知識思想傾向，會造成知識的脫實踐性和脫民眾性；同時，朴玄採作為一位思想實踐者，也親身體現了在實踐層次認識「新殖民性」的「知識倫理」。

〈奉請〉則是為了在區域性參照體系中，重新闡釋作為「當代歷史中間物」的朴玄採的思想實踐，將二十世紀東亞區域參照點台灣之「當代歷史中間物」陳映真的文學實踐，當作參照視角，並透過參照，試圖從中尋找反思南韓知識思想史的路徑。陳映真是以對於歷史中國的認識為基礎，面對著殖民、冷戰和後冷戰的歷史展開，將文學和思想結合起來的獨特思想家。他早期的文學實踐已經確定了「傳統—殖民—冷戰」的歷史認識格局，接著在他早期和中期的文學實踐中，呈現出以「愛」作為問題意識的歷史和現實矛盾。也就是說，他在早期和中期的文學實踐中，將「歷史斷裂」所造成的「愛的不可能性」加以問題化。接著，在「白色恐怖」系列和「華盛頓大樓」系列中，陳映真著眼於歷史和現實矛盾，並探究了克服「愛」的不可能性的方向。最後，在「忠孝公園」系列中，他試圖實現這兩者的有機結合。本研究從陳映真這樣子的文學實踐，抽出了其對於南韓的相互參照議題：「雙重分斷」、「內戰的外在性」和「民眾構成的複雜性」。

另一方面，朴玄採的「未完成的回憶錄」，則顯示出他作為殖民和內戰當事人時所形成的思

想實踐的原型動機。而他的原型動機，也成為他對於新殖民性的歷史性和主體性認識的基礎和背景。尤其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社會形態論戰過程中，朴玄埰雖然是促發論戰的當事人，但在論戰劇烈化的過程中，卻被邊緣化了。然而，在此過程中，他的表現恰恰呈現出他對待理論的主體性態度。特別是他傳承了作為實踐思想傳統的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且不把理論當作私人「所有」而當作「方法」，因此，當他面對著過度強調具體性而淪落為特殊主義（經驗主義）的傾向，以及將具體性化約為理論的普遍主義（理性主義）傾向，都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其中，他所提出的作為歷史認識方法之「從資料的解放」，以及作為理論展開的出發點之「否定形式邏輯」，皆清楚地表現出他的主體性和實踐性態度。

〈灌浴〉是以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知識思想界既規模龐大又爭議劇烈的「社會形態／社會性質論戰」為線索，考察了朴玄埰思想實踐所遭遇的困惑。一九八〇年代可視為南韓知識思想界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所經歷的特殊時段。當時，在後冷戰轉型所帶來的全球和區域的影響下，南韓知識思想界也經歷了某種「思想解放」的空間。不過，即便如此，歷史斷裂的深化，仍然廣泛地制約了如此解放空間的可能性。因此，此經驗可視為具有「缺陷」的價值，而必須被重新評估。從這個脈絡來看，朴玄埰所提出的批判更值得注意。在「五·一八慘案」所形成的覺醒氛圍中，他針對思想界如何接受依賴理論和第三世界論的方式展開批判，而他的批判就促發了社會形態論戰。在論戰過程中，朴玄埰積極思考「分斷」矛盾，並且加以具體化了對於「新殖民性」的認識。不過，與此同時，在「後冷戰轉型」強大的影響下，當時的主流批判理論和論述都走出了大規模的各種

「轉向」之路。朴玄採的思想實踐於是與他同時期的論述形成極為明顯的對比，但恰恰又因為如此，他的影響力變得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透過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的社會性質論戰，陳映真獲得啟發並努力深化對於台灣社會性質的思考。首先，陳映真藉著積極挪用「民族經濟圈」此一範疇，他更加強調去分斷（統一）而非去殖民，因此，他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在實踐方面具有「具體性」，但在主體層面則具有一定的「被動性」。相較之下，作為內戰當事人的朴玄採之「民族經濟論」，則是透過思考去殖民主義的「經濟」以確保「主體性」，但是實現的具體路徑仍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第二，有關於內戰的外在性，台灣的中小資本在美國的反共主義新殖民策略下，成為積極地被包容的對象。相反地，在直接經歷過內戰以及其中極端暴力的南韓，中小資本一開始就被國民經濟排除在外，因此朴玄採反而承認了中小企業轉型為「民族資本」的可能性。最後，在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中，介於殖民和新殖民之間的「半殖民地」階段，意味著台灣回歸中國的必須實現，但是在南韓，一九四五年「假想」和「非主體」的獨立，經由左右劇烈對立和左翼內部分裂，型塑了作為假想主體性之分斷／新殖民性的原型。

本書以透過這個考察，確認了一九八〇年代朴玄採與陳映真思想實踐中的不同問題意識。概括地講，陳映真苦惱於「思想的貧困」，而朴玄採作為「倖存者」，則苦惱於「思想的斷裂」。然而，我們從這樣的對比中，也可以將台灣的「思想斷裂」和南韓的「思想貧困」加以問題化。尤其是當朴玄採在南韓提出「思想斷裂」問題而進行了各種實踐時，他在這個過程中似乎也經歷了語

言／文學和思想形式的「貧困」。而且此「貧困」加倍了他的困惑，他因此摸索過試圖通過文學求得解決方法的路徑。

〈奉送〉以一九八〇年代在社會形態／社會性質論戰外邊所進行的朴玄採和白樂晴的爭議性對話為線索，考察了朴玄採以「分斷」為媒介，將「新殖民性」認識加以具體化的過程。朴玄採認為，分斷將「民族內部矛盾」外化為「國家間矛盾」，結果，「現代」的「國家」認識論取代了「歷史性民族認識論」，而如此去歷史化的普遍主義認識論，必定會脫離實踐論。再者，他透過對於「文學」的現代性形成之批判，試圖克服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之局限。我認為，與其將其視為文學批判，不如視為提出思想形式之局限的問題。特別是朴玄採對於「文學」的現代性形成之批判，就如同他對於依賴理論等理論思潮的批判，可視為他批評了將「批判理論」看作知識分子的「所有」此一知識思想界的存有根基。而且，〈奉送〉也提出了重讀《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之必要性，因為這是朴玄採生前在已經被邊緣化的狀態下，為了未來留下的唯一具有體系的著作。

最後，〈拆台〉以「新殖民／分斷體制」總結了朴玄採的思想實踐，同時再次強調朴玄採提出的一個思想課題：「內戰／分斷」所形成的反共意識形態和分斷意識形態，造成了對於北朝鮮認識的空白與認識論的普遍主義（現代化），以及在實踐層次上，南韓成立革命「黨」的不可能性。我認為，對南韓思想界來說，此課題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因此首先需要清楚地認知到此一「認識論的空白」和「實踐的障礙」這麼一個歷史性制約，並在區域性國際主義的思想網絡中，跟

著朴玄埰等前輩走出來的路，以民眾和民族的智慧摸索出承擔歷史責任的思想知識方式。我認為，這是重新開啟過去長期以來被封鎖住的思想解放之道路，同時也是繼承了朴玄埰思想實踐隱含著的卻被壓抑的「亞洲作為方法」，這樣的一個東亞區域去殖民主義的思想方式。

後記*

自從大約三年前〔二〇一三年〕我獲得了歷史掛帥和區域性參照的問題意識，本論文可視為自那以來所進行之工作的階段性成果。雖然如此，由於在問題意識還不夠透徹時所寫的部分，混合了具有一定成熟性的部分，所以讀者可能會覺得本論文沒有成功具備整體構成的有機性。並且，由於生活的需求影響論文寫作的步驟與進度，因而論文寫作中途停斷過幾次，這也就影響了論文的一貫性和系統性，不過，也正因我試圖適應論文外部世界的變化，而那樣的轉變又深化了我的問題意識，進而增加了論文的豐富性並提高了思考的高度。

事實上，我於二〇〇九年完成的碩士論文主題是比較南韓和台灣國際移工運動。當時，我的基本理論觀點還被南韓內部的理論狀況所影響，於是我的碩士論文終究依賴了普遍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世界體系論，從普遍到特殊的規範性取向對待南韓和台灣的歷史和現實。此時，我對於南

* 編註：本文原為延光錫（二〇一六）《朴玄採思想的當代意義——以陳映真文學為參照點》（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之後記，於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增末段補述文字改作此書後記。

韓的認識基本上是外在性的，因為視角本身即是普遍主義左翼；不過，在對台灣進行比較研究的時候，如此外在於南韓的視角成為一種相對優越性的根據，結果，在我的研究中，台灣淪落為他者化和本質化的對象。但我在台灣不只是做研究，也在其中生活著，而生活的時間越久，理論性認識與生活間的脫離也越明顯。尤其當我與學術界外的文化藝術場域更加頻繁接觸時，這就更讓我看清楚我原來的理論傾向之局限。回頭來看，我同差事劇團、牯嶺街小劇場以及身體氣象館一起試圖打造南韓和台灣之間媒介的活動，對我而言成為一種特別的思想解放空間。

博士生初期，我的生活空間從台北遷移到新竹，就在此刻我把理論和現實分開來，並為了理論的深化集中閱讀西方政治哲學。不過，入學博士班的同時，我開始上錢理群先生的課。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歷史性地認識「我」本身，也就是把「我」歷史化的必要性，因此我慢慢自覺了，否定「我」的主體性將會導致我的知識工作本身缺乏主體性的問題。但同時，原本我具有的理论傾向仍然外在限制我對於錢理群思想實踐的理解，結果難免將錢理群思想實踐對象化和他者化。

與此同時，我與後來成為我的指導教授的陳光興先生相遇了。這個相遇雖然對我產生了緊張感，但我的反應只不過是對他的知識方式的強烈拒絕。不過，正是這個相遇所帶來的緊張感與我自己各方面的變化互相產生作用，成就了一個反思我的理論傾向以及整體南韓理論狀況的重要契機。但我後來才知道，從「比較」轉換為「參照」，不只意味著方法上的轉型，更意味著對待知識和理論的方式、知識和現實的關係，以及作為知識工作者的生活方式等等本身的轉型。

我進入博士班之後，透過介於南韓和台灣的留學生身分，翻譯了不少文章和書籍。在單行本部分就有四本中韓翻譯和一本韓中翻譯，從內容來看涵蓋了理論、文學和歷史等多樣的領域。翻譯當然會中斷我自己的寫作，不過這同時也是我獲得自己的語言的訓練過程。我目前很難讓別人看懂的文風，就是在雙向翻譯過程中形成的。

我的第一部翻譯著作是錢理群先生的《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上／下）》韓文版。自二〇一一年春季在上海待四個月後，我完成上冊的初稿，而後在回台灣的十二月，完成了下冊的初稿，最後於二〇一二年九月和十月在韓國出版。此著作的中文版得了韓國坡州書聲節第一屆著作獎，而我們為了紀念韓文版的出版，邀請錢理群先生進行座談會。座談會成果便是《與錢理群對話》，此書也經過我的翻譯於二〇一三年四月在韓國出版。我在如此的翻譯工作過程中，尤其確認了「韓國語文」的「現代化」過程是「新殖民性」的典型表現，此問題意識後來又擴張到「知識的新殖民性」這一個更為廣泛的面向。

另外，在上海居留的期間，我完成了汪暉老師在台灣新竹講課的期末報告，從中我稍微理論性地研究朴玄採的「民族民眾論」。我在這堂課所獲得的成果以《朴玄採先生的思想特徵——以「民族民眾論」為主》為題，收錄於《區域——亞洲研究論叢》第二輯。對我來說，這次的經驗成了第一次集中閱讀朴玄採的文章的機會。我之所以關心朴玄採，主要是受到二〇一一年初訪問台灣交通大學的曹喜昞老師和白承旭老師的影響。不過，此時的我還沒有足夠的動機和能力決定進行南韓當代思想研究。因此，雖然我的文章已經開始努力擺脫西方政治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

概念所加諸的約束，但是「現實」和「日常」的範疇仍然模糊，因此論文的内容仍呈現出歷史和政治兩個範疇之間的玄學性遊戲。雖然具有如此局限，但事實上，此時期的我開始比較認真地思考「歷史」範疇。

博士過程初期，在我多次反覆確認了我對於台灣這麼一個他者的理論性認識之局限後，這個反思連帶地擴張到南韓，促使我反思南韓理論思想狀況。從表面上來看，重讀朴玄採的思想實踐幾乎是「偶然」的，但朴玄採思想實踐本身的歷史性成為一種契機，讓我歷史地反思過去強烈影響我的理論傾向的南韓左翼理論狀況。二〇一一年夏天從上海回到台灣後，我把生活空間再度遷移到台北。離開了對我而言是「理論」性空間的新竹，我的生活於是開始擁有某種物質性。雖然從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二年我一直關心錢理群思想並進行閱讀，但是到了二〇一三年，我自覺了我仍然被一個對象化的中國和錢理群所約束，因此我只能重新回頭去看「南韓」。

不過，在我將朴玄採當作論文主題之前，還需要一系列的提前準備工作。此過程主要包含二〇一三年秋天開始正式準備、而直到二〇一四年上半年完成的兩次資格考。

第一科資格考的題目是「反思後殖民／後冷戰知識狀況」。從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提出主題說明後，二〇一四年四月考試結束。在此過程中，我從竹內好和溝口雄三得到啟發，並以此為基礎對南韓當代思想史——尤其《創作與批評》所展開的民族文學論、分斷體制論和東亞論的複雜性——進行了初步的反思性探討。這次的成果，即是本論文緒論的核心問題意識。第二科資格考的題目是「陳映真文學與去殖民實踐」。同樣於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提出主題說明，於二〇一四年六

月考試結束。本論文所探討的陳映真文學和思想的部分，多半是此時期整理出來的。

通過資格考後，我離開生活了七年的台灣回到首爾，在聖公會大學邊工作邊撰寫論文。我一方面蒐集了過去還沒蒐集好的朴玄採相關資料，另一方面重新適應南韓知識思想界的變化。準備了一年後，我於二〇一五年六月回台灣報告論文提案。提案通過後，我再度回到韓國，但因為需要參與與工作相關的一系列活動，幾乎沒辦法確保撰寫論文的時間。結果，直到二〇一六年一月才正式開始論文寫作，花了五個月的時間完成了目前的論文內容。

從二〇一四年八月起，我定居南韓，開始著手延宕許久的翻譯工作，這次是曹征路先生的小說《民主課》的韓文翻譯。此書於二〇一五年八月在首爾出版。此過程中，我稍微深化了對於「文學」的思考。我特別關注了曹征路先生所提出的「業餘作家論」，因為這個提法有助於我思考陳映真和朴玄採的實踐方式的特殊性。

另外，我於二〇一五年二月企劃了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亞洲社會主義工作坊：台灣和香港」此一活動，並思考了將台灣和南韓加以相對化的「香港」視角。我特別集中思考了香港獨特的冷戰經驗。同一時期，我帶著類似的主題在首爾進行兩次的演講，也參加了幾次的學術研討會。這些對外活動成為一種契機，讓我感覺到溝通的可能性和局限。尤其是兩次的學術研討會發表經驗，確認了我的問題意識幾乎無法在當前理論場域被傳達。因著如此的經驗和挫折，我判斷我的博士論文不能直接太快地被放在「韓語」脈絡。因此，我雖然感到孤立感，不過恰好是因為如此的孤立感讓我抱著長期的展望，比較自由地專注了朴玄採的思想實踐。

最後，就我的文風而言，我應該談一下與《人間思想》的緣分。當我自己開始反省原本就有的理論主義問題以及韓文本身的新殖民性問題後，我的寫作本身變得極為困難。也就是說，我需要創造至少能夠說服我自己的一種語言。《人間思想》就提供了我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進行實驗性寫作的空間。尤其是此過程中王墨林先生與我的坦白的討論和對話，鼓勵我繼續摸索我的方向。

以上過程的成果就是目前的博士論文。我沒有信心我的博士論文將成為另一種出發點。比較可能的是，為了落實如此問題意識，還需要等很久。不過我相信，不管在很久以後的未來或近期的未來，現在做出來的整理和總結，應該會有意義的。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新竹

* * *

二〇一八年六月在韓國首爾出版《思想的分斷》韓文版以後，已經過了一年的時間之際，中文版即將在台北出版。我認為，韓文版有介入具體的南韓學術思想界的企圖，也就是說，借助台灣／陳映真這麼一個參照點，並以南韓的朴玄埰為線索，試圖反思南韓的知識思想史。不過，因

為此書所批判的狀況，即經過一九八〇—一九〇年代民間自發性的思想領域被「國家」收編，韓文版仍然無法得到被討論的空間和機會。簡單地講，「普遍」的視角之下，以「韓國學」和「中國學」為專業的學術體制中，反思比較研究的區域性參照研究被視為無法被分類，因此無法找到自己在當前學術體制中的空間。不過，相對來說，不同於韓文版，中文版則並沒有企圖介入台灣的知識思想史。中文版的意義應該在於一種分享和討論，即從以相互參照的方法，介入南韓知識思想界的企圖失敗的經驗出發，一起重新討論如何打開「思想解放空間」，並展開去殖民主義思想運動。

中文版借助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和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的支持而得以問世。尤其，我僅此衷心感謝執行編輯陳筱茵、美術設計黃瑪琍、潤校劉羿宏、校對陳冉涌、義務校對邱士杰以及台社執行編輯鄭巨良的辛苦。最後，自從我與台灣形成思想性關係以來，自身為思想實踐典範，一向鼓勵我堅持方向的陳信行、王墨林和陳光興老師，為這本書寫了寶貴的文字，我向三位前輩們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新竹

「讀後」延光錫的工作意味著什麼？

陳光興

在廣大的中文思想界裡，陳映真先生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極少數將韓半島視為參照的置高點，從一九八〇年算起至二〇〇六年封筆間不斷地在書寫中揭開韓國批判圈豐厚的反帝反殖民經驗所構成的當代思想。簡捷地說，作為第三世界的構成分子，韓國是我們要認真學習的對象。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台灣還處於戒嚴管制時期。陳映真先生獲准出境來到漢城市（今稱首爾市），碰上了催淚瓦斯味所充斥的「六·一〇」事件。他參加了明洞天主教堂的大彌撒後，隨著一萬五千人的遊行隊伍唱著「我們心中最深的願望，是祖國的統一」（第十卷，頁一〇）ⁱ而熱淚盈眶。一週的訪問後，回台寫下了〈肅穆的敬意〉一文。一九八九年四月九至二十三日，陳先生二度訪韓，這次是為了《人間》雜誌韓國民主運動專號而來，長達兩週密集地採訪了批判圈的核心分子，見到了任在慶、李富榮、任鍾哲、金英美、李時載、白樂晴、安炳茂……等人，是在訪問崔淙旭教授有關韓國社會性質論時，接觸了朴玄採的「人民民主革命」立場（第十一卷，頁三一三）ⁱⁱ。六月《人間》雜誌第四十四期出版了「激盪中的韓國民主運動」專題，十三篇文章全為陳

映真先生一人所寫，為韓國當代史留下了一筆重要的訪問資料。ⁱⁱⁱ

陳映真先生顯然不是訪問完就結束的人，憑藉著他的日文能力，他還閱讀了一九八五年御茶の水書房出版朴玄採先生的《韓國資本主義與民族運動》日譯本（第十三卷，頁二〇五）^{iv}，這是一九九〇年代陳先生的主要工作，試圖承繼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論」與「韓國八〇年代的社會構成體性質論」為參照，想要釐清台灣的現代史，才能為反帝為基礎的民族統一運動找到出路。至封筆前，陳先生不斷在寫都不滿意，最具運動性的思辯呈現在從未發表過的手稿《台灣反帝·人民民主變革運動初論》，估計完成於九〇年代中期以後。^v另外一篇沒有發表的文章，是《歷史的啟迪——重溫上世紀二〇至四〇年代、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參與朝鮮人民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歷史上的大同團結》^{vi}，則大約完成於二〇〇〇年前後，這篇文章明顯地將同為日本殖民地時期的朝鮮與台灣流亡上海的團結連帶串連起來，陳先生不但是在挖掘被湮滅的歷史，也是在提出歷史中存在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實踐。

歷史從來不是直線的，很多沒有接上的線總也會接上，八〇年代與朴玄採先生合作編整韓國社會性質論的年輕一代理論家曹喜昞，二〇一〇年來台灣交大訪問一學期，透過研究所的課程與討論延續著台、韓社會性質論的對話。延光錫那時是旁聽的博士生，承擔了部分課堂上溝通障礙的排除。曹喜昞是有名的葛蘭西主義者，以「霸權」的思考不斷在創造分析後的需要，擴大「人民民主鬥爭」的成果，與長期的工作夥伴朴元淳（首爾市長）一起站上了政治舞台，選上首爾市的教

育總監，繼續匯聚著批判圈的能量。

比朴、曹二位先生年輕很多代的延光錫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人民民主主義的思路，但是他有不同的、更為寬廣的軌跡。出身貧苦家庭，受到學生運動的薰陶，他的本科是首爾外大中文系（一九九七—二〇〇四），畢業後為了還債工作三年，二〇〇七年再來台就讀。與其他韓國學生不同的是，他沒有繼續在專業中文學科中深造，去了著名的社會運動集散地——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師承八〇年代後期學運領袖、台灣少有的毛派陳信行，光錫的碩士論文研究主題即是台灣的移工運動。^{vii}

插進來談一點韓國的知識狀況。中文系在韓國是大系，在與大陸建交／復交前（一九九二年），大量的留學生是在台灣深造的，台灣中文系的訓練在韓國留下很深的影響，去政治化是其中的主要特徵，（跟馬來西亞類似）留台生在大學的機構內至今仍盤據重要的位置，配合著戰後親美、反共的政治結構。

從中文系「出走」到跨學科的世新社發所，是光錫位置變化的第一步。論文與社發所的關係位置讓他更向外走，與台灣的運動圈與社會開始發生了更多、更深的情感關係，包括後來的婚姻，也在這個時期起光錫開始扮演著「翻譯」的中介角色，連結了韓文與中文世界中的運動圈與思想界，走到今天。我猜想韓國的批判圈沒有人比他認識更多兩邊的朋友吧。光錫慢慢看到了自己的位置，更為有意識的轉換著兩種語言間的重要思想資源。截至目前，文章不算，延光錫翻譯的書就達七本多，^{viii}他是快筆，每天很大的工作量中依然完成了重要的工作。

從韓國看世界，東亞由中、日、韓三國構成，港、澳、台是中國的一部分。台韓雖然有高度的類似可比性，但是兩者之間戰後除了中文系的單向流動外，沒有太多的交流，對彼此而言都不重要。對韓而言台灣是小地方，對台來說，到「韓流」出現前，韓國從來是不存在，「美國」是兩地共有的資源。在這個意義下，光錫的工作讓兩地圈子相互看見，但是別忘了，光錫的視野寬，錢理群先生的《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一九四九—二〇〇九）——另一種歷史書寫》的韓文版也出自他的譯筆，在台灣交大社文所他與錢先生、王曉明等都建立起互信的友誼。大家對他都有很多的期待，這樣遊走於東亞各地的年輕人實在不多。

二〇〇九年完成了碩論，光錫選擇了交大社文所繼續念博士學位。社文所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二〇〇三年建所以後成為台灣西方批判理論的集散地，同時透過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關係，一方面建立了與清華、中央、陽明的文化研究平台，從這又丟出一塊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後者被體制評價為最成功的國際學程，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巴勒斯坦、阿爾及利亞、印尼、印度、俄羅斯、日、韓、港、澳、義大利、法國、美國……近年又有大量的陸生來此就讀。也就是說，社文所的關係網絡建立起來了一個國際師生的交流中心平台。

亞際文化研究部分有學會與機構聯合會的設置，試圖配合時代突破既有學術體制的限制，讓學生可以更走出去。聯合會的秘書處設在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中心，二〇一〇年第一次的暑期班就在那兒舉辦；學會最近一次二〇一七年的年會也是在這開的。這些活動延光錫都參加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著作是他博論的成果，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出來的，從一個觀點來看，是亞際文

化研究第一代的產物，第一個在思想上進行的跨國比較參照研究，在學術上也是創舉。

二〇一四年光錫完成博士論文前，在白元淡的邀約下，八月回到了首爾聖公會大學亞洲中心幫忙，推進與中文世界及亞際間的合作。二〇一六年，因為光錫在首爾工作之便，我們的工作團隊將「戰後左翼訪談：以陳映真為媒介」計畫推向韓國，試圖在陳先生三十年前的採訪再走一次，探究至今的變動。透過光錫我們訪問了黃皙暎、白基玩、李時載……等人，也是讓光錫與這些前輩們發生了歷史關係吧。這次的訪談裡讓我們發現韓國的思想資源非常豐富，當初陳先生的感嘆不是那樣的主觀主義，可惜的是這些歷史性的訪談在韓國（乃至於其他地區）都沒有展開，如何繼承？如何前進呢？光錫工作的重要性也在這兒罷！

一九八〇年代，年輕的留台生申正浩因緣際會碰到陳映真先生他們，他們建議正浩去北京大學唸書，動用了關係，也找來了資源，這個窮學生去了北京，後來在韓國國立木浦大學任職，這是陳先生那代人的國際主義精神。時代不一樣了，情勢更開了，條件更好了一些。光錫畢業後，我們建議他在東亞既有已經形成的積累下繼續往外走。二〇一六年九月他去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多多少少受到 Partha Chatterjee、Mahmood Mamdani 和 David Scott 等人的影響，產生了更為寬廣的知識興趣。

短暫的博士後研究，二〇一七年三月，光錫在首爾的北韓研究大學找到了他的第一份正式教研究工作。有關北韓的人文社科研究至今非常少，是一塊急需填補的大黑洞。聽說他提出的「北韓在非洲」的研究——「藉由洲際 (inter-continental) 相互參照，尋找認識北韓的去冷戰化 (de-Cold

Warization) 路徑」被接受了，我自己的理解是，北韓在非洲是反帝反殖的象徵，受到廣泛的尊重。相信延光錫的歷史性研究會帶來另一大突破。

一九八〇年代陳映真開啟的台韓之間相互參照的研究，三十年後延光錫的承繼有了更落實的成果，相信陳先生會很開心在光錫手中與朴先生互看。有待展開的橫向、縱向工作還得慢慢到位，至於光錫在未來還會走出什麼新的方向，我們拭目以待，現在先喝一杯再說。

最後說一句，延光錫身上有的能耐／武功是其他人很難有的，他自己知道自己是韓國人，可是不只是。他可以在「民族」之間、之外遊走，在語言、地域之間遊走（錢新祖稱之為「出入異文化」），他與前輩朴玄採、陳映真的關係是複雜的，一方面他承繼了他們民族主義為基盤的國際主義，一方面他在情感知識方法上從民族主義（甚至於國際主義）解放出來，能夠長出更為「客觀」的分析能力與視野，這是我以為他的工作潛在的爆發力之所在。

編註

- i 參見陳映真（一九八七）〈肅穆的敬意〉，初刊《中華雜誌》第二十五卷總二八九期，此處引自《陳映真全集·第十卷》（台北：人間出版社，二〇一七），頁一〇。
- ii 參見陳映真（一九八九）〈因為在民眾中有真理……——韓國社會構成體性質的論戰和韓國社科界的英姿〉，初刊《人間》第四十四期，此處引自《陳映真全集·第十一卷》（台北：人間出版社，二〇一七），頁三一—三三。
- iii 陳映真在《人間》雜誌第四十四期（一九八九年六月）「現地報告：激盪中的韓國民主運動」專題下共寫了十三篇系列文章：〈民族的報紙為民眾發言——《韓民族報》的精神與工作〉、〈我們有韓國民族·民主運動的傳統——「全民聯」：韓國民眾民主化運動的司令部〉、〈年輕又熱烈地無窮花——八〇年代的韓國學生運動〉、〈尊嚴·幸福和希望的權利

- 韓國工人運動與「漢城工聯」、（因為在民眾中有真理……——韓國社會構成體性質的論戰和韓國社科界的英姿）、〈韓國文學的戰後——在「不斷革命」中豐富和發展的韓國現代文學〉、〈耶穌在窮人中興起新教會——訪問韓國民眾神學的創始者安炳茂博士〉、〈我來……乃是要叫人紛爭——新的韓國天主教會的「紛爭」中胎動〉、〈在戰鬥中成長的韓國民族劇場〉、〈為一切人的平等與自由的美術——韓國民族美術運動的理論與實踐〉、〈韓國民族電影運動的起步〉、〈為教育民主挺進〉、〈韓國公害運動的視野〉，收於《陳映真全集·第十一卷》（同前編註 ii），頁二七一—三七五。
- iv 參見陳映真的〈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論」的比較考察〉一文，發表於一九九二年三月「李友邦學術研討會」，後收於《紀念李友邦先生論文集》（嚴秀峰編，世界綜合出版社，二〇〇三），此處引自《陳映真全集·第十三卷》（台北：人間出版社，二〇一七），頁二〇五。
- v 參見陳映真的〈台灣反帝·人民民主主義變革運動初論〉一文，收於《陳映真全集·第二十三卷》（台北：人間出版社，二〇一七），頁八三一—一一一。
- vi 參見陳映真的〈歷史的啟迪——重溫上世紀二〇至四〇年代、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參與朝鮮人民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歷史上的大同團結〉一文，收於《陳映真全集·第二十三卷》（同前編註 v），頁一四〇—一五四。
- vii 參見延光錫（二〇〇九）〈移工運動形成與工運中的民族主義論述——韓國和台灣之比較〉（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viii 中韓譯書四本：曹征路，《民主課》（首爾：Narumbbooks，二〇一五）；錢理群等，《전리군과의 대화》（與錢理群對話）（首爾：Hanul Publishing Company，二〇一四）；錢理群，《모택동 시대와 포스트 모택동 시대 1949-2009——다르게 쓴 역사 (상/하)》（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一九四九—二〇〇九〕——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首爾：Hanul Publishing Company，二〇一四）。中韓合譯兩本：呂途，《중국 신노동자의 미래——변화하기 위한 우리의 문화와 양면》（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首爾：Narumbbooks，二〇一八）；呂途，《중국 신노동자의 형성——도시와 농촌 사이의 길을 찾는 사람들》（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首爾：Narumbbooks，二〇一八）。韓中譯書一本：白承旭（백승욱），《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중국 문화대혁명과 정치의 아포리아——중앙문화연구소 소장 천보다와 조반의 시대）（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

附錄

朴玄採與陳映真年譜

參考書目

朴玄塚（一九三四—一九九五）與陳映真（一九三七—二〇一六）年譜

朴玄塚	年代	陳映真
十一月三日，日據下朝鮮全羅南道和順郡出生。	一九三四	
	一九三七	十一月八日，日據下台灣新竹州竹南郡（今苗栗縣竹南鎮）出生，原名陳映善，二歲時過繼給三伯父，改名陳永善，後以九歲即早逝的學生小哥之名「陳映真」為其筆名。
因父親朴晁模（박경모）就職於谷城稅務所而全家搬遷到谷城郡。	一九三八	
入學谷城中央小學。	一九四一	
父親被調到光州，因而全家搬遷到光州；第二學期轉學到壽昌小學；受到外婆家社會主義運動家的影響，主要包括與共產主義者領袖朴憲永（박헌영）一起活動的姨父和社會主義運動家堂叔。	一九四四	就讀桃園鶯歌小學。
被選為壽昌小學自治委員長；加入讀書會而在崔忠根（최충근，音譯）老師指導下閱讀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等書；以自治委員長身分，主導同盟罷課；父親被調到木浦，因而住在姨父家；因為父親涉入公務員罷工，在警察搜查過程中，朴玄塚的筆記本和《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等書籍被沒收，朴玄塚也被警察帶走。	一九四六	

<p>報考光州工業中學，因色盲而落榜；轉為報考光州西中而被錄取；入學之後組織社團，並被選為朝鮮民主愛國青年同盟一年級組織負責人。</p>	<p>一九四七</p>	
<p>「麗順事件」發生後休學和復學。</p>	<p>一九四八</p>	
<p>六月，朝鮮戰爭發生後，將光州西中的學校委員會加以正常化並擔任校委講師；十月，成為光州地區游擊隊成員；在智異山與光州西中校長朴俊玉(박준옥，音譯)相遇，結為一生的師生關係；被任命為少年突擊中隊文化部中隊長。</p>	<p>一九五〇</p>	<p>桃園鶯歌小學畢業，就讀台北省立成功中學初中部。初中時期，在桃鎮生父書房的隱蔽處，發現不忍為避禍燒毀的、暗紅色封皮的魯迅小說集《吶喊》。</p>
<p>三月，成為朝鮮勞動黨員；所屬的少年突擊中隊解散，並被調到炸彈中隊；八月，在遮日峯戰鬥腹部遭受貫穿傷。</p>	<p>一九五一</p>	
<p>八月，下山過程中被逮捕而關在和順警察局，在父母的努力下得以釋放。</p>	<p>一九五二</p>	
<p>五月，暫時就讀長城農業高中，而後轉學到全州高中(三年級)。</p>	<p>一九五四</p>	<p>省立成功中學初中部畢業，初三畢業前留級一年，接觸舊俄時代小說，後考取成功中學高中部就讀。</p>
<p>畢業於全州高中，入學首爾大學商學院經濟系；一九五〇年代末組織「後進國研究會」社團。</p>	<p>一九五五</p>	
	<p>一九五七</p>	<p>五月，劉自然事件發生，前往美國大使館前抗議陳情；省立成功中學高中部畢業，後一年考取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外文系，並於台北市牯嶺街舊書攤上尋找中國三〇年代文學作品及社會科學書籍，改變了半生命運。</p>
<p>二月，畢業於首爾大學經濟系；就讀首爾大學商學院研究所(理論經濟系)；研究生時期，成為韓國農業問題研究會的研究員。</p>	<p>一九五九</p>	<p>九月，第一篇小說《麵攤》發表於《筆匯》一卷五期。</p>

<p>四·一九革命後，與當時活躍的青年知識分子結識，但沒有積極參與活動。</p>	<p>一九六〇</p>	<p>一月，〈我的弟弟康雄〉發表於《筆匯》一卷九期；三月，〈家〉發表於《筆匯》一卷十一期；八月，〈鄉村的教師〉發表於《筆匯》二卷一期；九月，〈故鄉〉發表於《筆匯》二卷二期；十月，〈死者〉發表於《筆匯》二卷三期；十二月，〈祖父和傘〉發表於《筆匯》二卷五期。</p>
<p>撰寫《資本主義與小農經濟》(자본주의와 소농경제)而取得碩士學位；三月，畢業於首爾大學商學院研究所；四月，與金熙淑(김희숙)女士結婚。</p>	<p>一九六一</p>	<p>大學畢業，入伍服役。一月，〈貓牠們的祖母〉發表於《筆匯》二卷六期；五月，〈那麼衰老的眼淚〉發表於《筆匯》二卷七期；七月，〈加略人猶大的故事〉發表於《筆匯》二卷九期；十一月，〈蘋果樹〉發表於《筆匯》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本。</p>
<p>二月，入隊服兵役；七月，因病退伍；八月，長女出生。</p>	<p>一九六二</p>	<p>入伍期間，深入體會內戰和民族分裂的歷史對於大陸農民出身的老士兵們殘酷的撥弄。</p>
<p>二月，復職農業問題研究會研究員；聘為首爾大學、農協大學、國學大學的兼任講師；介入首爾大學商學院學生社團「後進經濟研究會」。</p>	<p>一九六三</p>	<p>服完兵役，至強恕中學任職英文老師。三月，〈哦！蘇珊娜〉發表於《好望角》(香港)一期；九月，〈文書〉發表於《現代文學》十八期。</p>
<p>七月，涉入「人民革命黨事件」而被捕；二女出生。</p>	<p>一九六四</p>	<p>一月，〈將軍族〉發表於《現代文學》十九期；六月，〈淒慘的無言的嘴〉發表於《現代文學》二十一期；十月，〈一綠色之候鳥〉發表於《現代文學》二十二期。</p>
<p>一月，一審判決無罪；二月，二審判決一年徒刑；出獄後組織「國民經濟研究會」並發行關於韓國經濟的刊物；以從事首爾大學等許多大學的講師工作謀生。</p>	<p>一九六五</p>	<p>任職美商輝瑞藥廠，翻譯《共產黨宣言》、《現代社會之不安》等左翼書籍。二月，〈獵人之死〉發表於《現代文學》二十三期；七月，〈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發表於《現代文學》二十五期。</p>
<p>三女出生。</p>	<p>一九六六</p>	<p>十月，〈最後的夏日〉發表於《文學季刊》一期。</p>

<p>發表「民族經濟論」的基本設想，將「局部市場圈理論」和「民族經濟」連接起來。</p>	<p>一九六七</p>	<p>一月，〈唐倩的喜劇〉發表於《文學季刊》二期；四月，〈第一件差事〉發表於《文學季刊》三期；七月，〈六月裡的玫瑰花〉發表於《文學季刊》四期。</p>
<p>擔任月刊《橋》(월간《다리》)的編輯委員；五月，長子出生。</p>	<p>一九七〇</p>	<p>七月，涉入「民主台灣聯盟案」而被捕，並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後一年移監台東泰源監獄，遇見百數十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思想政治犯。</p> <p>二月，〈永恒的大地〉(一九六六年作)發表於《文學季刊》十期。</p>
<p>主導撰寫當時總統候選人金大中(김대중)的經濟政策手冊《金大中氏的大眾經濟百問百答》(김대중씨의 대중경제 100문 100답)。</p>	<p>一九七一</p>	<p>十一月，〈槩槩〉(一九六六或一九六七年間作)發表於《四季》(香港)一期。</p>
<p>借趙容範(조용범)之名出版《後進國經濟論》(후진국경제론)。</p>	<p>一九七二</p>	<p>八月，〈某一個日午〉(一九六六年作)發表於《文季》一期。</p>
<p>借趙容範(조용범)之名出版《後進國經濟論》(후진국경제론)。</p>	<p>一九七三</p>	<p>因蔣介石去世百日特赦而提早三年出獄，著手收集關於七〇年代保釣和文革的文獻；十月，〈試論陳映真〉發表於《第一件差事》，〈將軍族〉(遠景出版社)。</p>
<p>借趙容範(조용범)之名出版《後進國經濟論》(후진국경제론)。</p>	<p>一九七五</p>	<p>任職美商溫莎藥廠。</p>
<p>借趙容範(조용범)之名出版《後進國經濟論》(후진국경제론)。</p>	<p>一九七六</p>	<p>捲入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十二月，與陳麗娜女士結婚。</p>
<p>借趙容範(조용범)之名出版《後進國經濟論》(후진국경제론)。</p>	<p>一九七七</p>	<p>三月，〈賀大哥〉發表於《雄獅美術》八十五期；同月，華盛頓大樓系列之一〈夜行貨車〉發表於《臺灣文藝》五十八期；九月，華盛頓大樓系列之二〈上班族的一日〉發表於《雄獅美術》九十一期。</p>
<p>借趙容範(조용범)之名出版《後進國經濟論》(후진국경제론)。</p>	<p>一九七八</p>	<p>借趙容範(조용범)之名出版《後進國經濟論》(후진국경제론)。</p>

<p>三月·涉入「林東圭(임동규)間諜案」而被捕。</p>	<p>一九七九</p>	<p>十月·被警備總部軍法處以涉嫌叛亂、拘捕防逃的理由，帶往調查局拘留，在友人奔走下，逾三十六小時後獲釋。</p>
<p>二月·出獄。</p>	<p>一九八〇</p>	<p>八月·華盛頓大樓系列之三〈雲〉發表於《臺灣文藝》六十八期。</p>
<p>《韓國農業設想》(한국농업의 구상)出版。</p>	<p>一九八一</p>	<p>十二月·華盛頓大樓系列之四〈萬商帝君〉發表於《現代文學》復刊十九期。</p>
<p>《韓國經濟的結構和邏輯》(한국경제의 구조와 논리)出版。</p>	<p>一九八二</p>	<p>四月·白色恐怖系列〈鈴璫花〉發表於《文季：文學雙月刊》一卷一期；八月·白色恐怖系列〈山路〉發表於《文季：文學雙月刊》一卷三期；赴美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工作坊。</p>
<p>《韓國經濟和農業》(한국경제와 농업)出版；在《實踐文學》發表〈文學與經濟：對於民眾文學的社會科學認識〉(문학과 경제：민중문학에 대한 사회과학적 인식)一文，介入文學評論界。</p>	<p>一九八三</p>	<p>四月·〈鬼影子知識分子〉和「轉向症候群」——評漁父的發展理論(駁論同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漁父〈憤怒的雲〉)連載於四月八日至十三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p>
<p>《歷史與民眾——對於民族史發展的社會科學視角》(역사와 민중——민족사발전에 대한 사회과학의 시각)、《韓國資本主義與民族運動》(한국 자본주의와 민족운동)、《關於經濟現實的認識與實踐》(경제현실의 인식과 실천)出版；在《實踐文學》發表〈文學與經濟：對更根源的互相關係之認識〉(문학과 경제：보다 근원적인 상호관계에 대한 인식)·與文學評論家白樂晴(백낙청)進行辯論。</p>	<p>一九八四</p>	<p>十一月·創辦《人間》雜誌。</p>
<p>在《創作與批評》發表〈關於現代韓國社會的性質與發展階段的的研究(Ⅰ)——圍繞韓國資本主義性質的依賴理論批判〉(현대 한국사회의 성격과 발전단계에 관한 연구(Ⅰ)——한국 자본주의의 성격을 둘러싼 종속이론 비판)·促發韓國社會形態論戰；父親過世。</p>	<p>一九八五</p>	<p>十一月·創辦《人間》雜誌。</p>
<p>《韓國經濟結構論》(한국경제구조론)出版。</p>	<p>一九八六</p>	<p></p>

<p>《歷史·民族·民眾》(역사·민족·민중)出版；第二屆丹齋獎獲獎；小說家趙廷來(조정래)將朴玄採的朝鮮戰爭中游擊隊經驗重現於小說《太白山脈》(태백산맥)中。</p>	<p>一九八七</p>	<p>六月，白色恐怖系列〈趙南棟〉發表於《人間》二十期；同月十一日，南韓六月抗爭達到高峰時，受邀於韓國學術團體訪問首爾。</p>
<p>《歷史經濟與民眾運動》(민족경제와 민중운동)出版；參與「韓國社會研究所」的創立，並擔任理事。</p>	<p>一九八八</p>	<p>四月，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並擔任首屆主席。同月，《陳映真作品集》十五卷之前十卷(人間雜誌社)出版；五月，《陳映真作品集》十五卷之後五卷(人間雜誌社)出版。</p>
<p>《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민족경제론의 기초이론)出版；與曹喜畎(조희연)合編《韓國社會形態論戰·I-IV》(一九八九—一九九二，共四卷)；被聘為朝鮮大學經濟系教授。</p>	<p>一九八九</p>	<p>四月，以《人間》雜誌記者身分訪問南韓，對於南韓民族社會運動各領域進行採訪；六月至七月，相關報導文章發表於《人間》四十四期、四十五期；七月，創立人間出版社並擔任發行人；九月，《人間》雜誌發行四十七期後停刊。</p>
<p>《變化·不可逆轉》(변화를 막을 수는 없다)出版；母親過世。</p>	<p>一九九〇</p>	
<p>《政治經濟學講座》(정치경제학강의)出版；將韓國社會研究所和韓民族社會研究所合併並擔任共同理事長；訪問日本。</p>	<p>一九九一</p>	
<p>訪問歐洲和中國；八月，中風病倒。</p>	<p>一九九二</p>	<p>開始大量刊行關於台灣社會性質論的自著和他著；三月，〈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論」的比較考察〉，發表於李友邦學術研討會；六月，出版《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一卷(人間出版社)，至一九九三年，共七卷。九月，〈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各階段的民族主義〉，發表於《海峽評論》二十一期；十月，〈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發表於「第二屆中國現代文學國際學術大會」；台灣現代文學研討會(韓國首爾)，刊載於十二月《中華雜誌季刊》三十一卷一期。</p>

			再次病倒。 八月十七日·逝世。
	一九九三	四月，與曾建民共同成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並擔任首屆會長。	
	一九九四		
	一九九五		
	一九九七	二月，由台灣、琉球、韓國、日本四地區合辦「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台北)；十月，〈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在台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發表於〈回顧與再思·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討論會論文集〉。	
	一九九八	三月至六月，組織十二次「帝國主義與台灣」討論會；十二月，〈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創刊。	
	一九九九	三月，〈七〇年代黃春明小說中的新殖民主義批判意識——以〈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和〈我愛瑪莉〉為中心〉，發表於〈文藝理論與批評〉(北京)二期；五月，〈同一個民族·共同的命運·共同的鬥爭——台灣新文學運動和「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聯繫〉發表於〈台聲〉(北京)五期；六月，〈帝國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危機〉刊載於〈勞動前線〉二十八期，發表於七月AWC「跨世紀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運動國際研討會」(台北)；九月至十月，〈歸鄉〉連載於〈聯合報〉副刊。	
二〇〇〇		三月，〈讓歷史整備我們的隊伍〉發表於〈左翼〉五號；七月，〈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發表於〈聯合文學〉一八九期；九月，〈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發表於〈聯合文學〉一九一期；十一月至十二月，〈夜霧〉連載於〈聯合報〉副刊。	

			《朴玄塚全集》(박현채 전집)(Haeunil出版社, 共七卷)出版。	二〇〇一	七月,《忠孝公園》發表於《聯合文學》二〇一期;十月,《陳映真小說集》(洪範書店, 共六卷)出版。
				二〇〇四	九月,《陳映真散文集: 父親》(洪範書店)出版。
				二〇〇六	六月, 應中國人民大學邀請, 擔任客座教授, 並定居於北京; 九月, 中風入院; 十月, 二次中風。
				二〇一〇	六月, 中國作家協會決議給予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之職位。
				二〇一六	十一月二十二日, 病逝於北京。
				二〇一七	《陳映真全集》(人間出版社, 共二十三卷)出版。

參考書目

一、【韓文】朴玄塚相關著作

(1) 專書

朴玄塚(박헌채)(一九七八A)《戰後三十年的世界經濟思潮》(전후 30년의 세계 경제사조), 首爾: 平民社。

——(一九七八B)《民族經濟論——朴玄塚評論選》(민족경제론——박헌채평론선), 首爾: 韓吉社。

——(一九七八C)《民眾與經濟》(민중과 경제), 首爾: 正宇社。

——(一九八一)《韓國農業設想》(한국농업의 구상), 首爾: 韓吉社。

——(一九八二)《韓國經濟的結構與邏輯》(한국경제의 구조와 논리), 首爾: 草色。

——(一九八三)《韓國經濟和農業》(한국경제와 농업), 首爾: 喜鵲。

——(一九八四A)《歷史與民眾——對於民族史發展的社會科學視角》(역사와 민중——민족사 발전에 대한 사회과

학의 시각), 首爾: 韓吉社。

——(一九八四B)《韓國資本主義與民族運動》(한국자본주의와 민족운동), 首爾: 韓吉社。

——(一九八四C)《關於經濟現實的認識與實踐》(경제현실의 인식과 실천), 首爾: 學民社。

——(一九八六)《韓國經濟結構論》(한국경제구조론), 首爾: 日月書閣。

——(一九八七)《歷史·民族·民眾》(역사·민족·민중), 首爾: 詩人社。

——(一九八八)《歷史經濟與民眾運動》(민족경제와 민중운동), 首爾: 創作與批評社。

- (一九八九)《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민족경제론의 기초이론), 首爾:石枕。
 - (一九九〇)《變化, 不可逆轉》(변화를 막을 수는 없다), 首爾:母親。
 - (一九九一)《政治經濟學講座》(정치경제학강의), 首爾:石枕。
- 朴玄塚全集發刊委員會編(박현채 전집발간위원회 엮음)(二〇〇六)《朴玄塚全集(共七卷)》(박현채 전집 [전 7권]), 首爾: Haemil。

(2) 單篇文章

- 朴玄塚(박현채)(一九八三)《文學與經濟: 對於民眾文學的社會科學認識》(문학과 경제: 민중문학에 대한 사회과학적 인식), 《實踐文學》(실천문학)第四號(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頁九九—一三六。
- (一九八四)《文學與經濟: 對於更根源的互相關係之認識》(문학과 경제: 보다 근원적인 상호관계에 대한 인식), 《實踐文學》(실천문학)第五號(一九八四年十月), 頁四二二—四三九。
- (一九八五)《關於現代韓國社會的性質與發展階段的研究(Ⅰ)》——圍繞韓國資本主義性質的依賴理論批判》(현 대한국사회의 성격과 발전단계에 관한 연구(Ⅰ)——한국 자본주의의 성격을 둘러싼 종속이론 비판), 《創作與批評》(창작과 비평)第五十七期(一九八五年十月), 頁三一〇—三四五。
- (一九八八)《分斷時代的國家和民族問題》(분단시대의 국가와 민족문제), 《創作與批評》(창작과 비평)第五十九期(一九八八年春季號), 頁二四一—二六三。
- (一九八九)《變革時代的知識人與歷史意識》(변혁시대의 지식인과 역사인식), 《社會與思想》(사회와 사상)第五集(一九八九年一月號), 首爾:韓吉社。
- 朴玄塚、宋基淑對談(박현채, 송기숙 대담)(一九八七)《八〇年代在民族史上的意義》(80년대의 민족사적 의의), 《實踐文學》(실천문학)第八號(一九八七年一月), 頁二〇—五九。

二、【韓文】朴玄塚合著、主編、共編、編譯

朴玄塚等編譯(박현채 등 엮음)(一九八一)《資本主義發達史研究序說》(자본주의 발달사 연구서설), 首爾: 韓吉社。

朴玄塚主編(박현채 엮음)(一九八二)《現代經濟思想史》(현대경제사상사), 首爾: Jeonyewon。

——(一九八四)《韓國資本主義和薪資勞動》(한국자본주의와 임금노동), 首爾: 禾多。

朴玄塚、金弘明共編(박현채, 김홍명 공편)(一九八八)《統一戰線和民主革命》(통일전선과 민주혁명), 首爾: 四季。

朴玄塚、趙容範共編(박현채, 조용범 공편)(一九八八)《經濟學辭典》(경제학사전), 首爾: 草色。

朴玄塚、曹喜昞共編(박현채, 조희연 공편)(一九八九—一九九二)《韓國社會形態論戰·I—IV》(한국사회구성체

논쟁 I—IV)(共四卷), 首爾: 竹山。

朴玄塚等編(박현채 등 엮음)(一九九一)《退耕趙容範博士花甲紀念論叢》(퇴경조용범박사화갑기념논총), 首爾: 草色。

朴玄塚等著(박현채 등)(一九八八)《韓國近現代史研究入門》(한국근현대사연구입문, 歷史問題研究所編), 首爾:

歷史批評社。

三、【韓文】朴玄塚有關口述和論文集

朴玄塚全集發刊委員會編(박현채전집발간위원회 엮음)(二〇〇六)《啊! 朴玄塚》(아! 박현채), 首爾: Haemil。

鄭允炯、全哲煥、金錦守等(정윤형, 전철환, 김금수 등)(一九九五)《民族經濟論與韓國經濟》(민족경제론과 한국

경제), 首爾: 創作與批評。

四、【韓文】相關專書

- 丁聲鎮等(정성진 등)(一九八七)《韓國社會研究·5》(한국사회연구 5), 首爾:韓吉社。
- 尹邵榮等(윤소영 등)(一九八八)《現實與科學·第二集》(현실과 과학 제 2집), 首爾:新路。
- 申采浩(신채호)(一九九五)《丹齋申采浩全集(下)》(단체 신채호 전집〔하〕), 首爾:螢雪出版社。
- 白樂晴、廉武雄共編(백낙청, 염무웅 공편)(一九八四—一九八五)《韓國文學的現階段·III、IV》(한국문학의 현단계 III、IV), 首爾:創作與批評。
- 竹內好(다케우치 요시미)(二〇一一)《竹內好選集·I、II》(다케우치 요시미 선집 I、II, 丸川哲史、鈴木將久編, 尹汝一譯), 首爾: Humanist。
- 李炳天、尹邵榮等(이병천, 윤소영 등)(一九八八)《八〇年代韓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現階段和展望》(80년대 한국 인문 사회과학의 현단계와 전망, 學術團體聯合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 首爾:歷史批評社。
- 河相一(하상일)(二〇〇八)《一九六〇年代現實主義文學批評與媒體的批評戰略》(1960년대 현실주의 문학비평과 매체의 비평전략), 首爾:召命出版。
- 林永泰編(임영태 엮음)(一九八五)《殖民地時代韓國社會與運動》(식민지시대 한국사회와 운동), 首爾:四季。
- 金晉均(김진균)(一九八六)《第三世界和韓國的社會學——現代韓國社會論》(제 3세계와 한국의 사회학——현대한국사회론), 首爾:石枕。
- 金晉均等(김진균 등)(一九八六)《產業社會研究·第一集》(산업사회연구 제 1집, 韓國產業社會研究會編), 首爾: Hanul。
- 金聖在等(김성재 등)(一九八九)《韓國民眾論的現階段》(한국민중론의 현단계, 韓神大學第三世界文化研究所編), 首爾:石枕。
- 姜珍浩、李相甲、蔡昊錫編(강진호, 이상갑, 채호석 편)(二〇〇三)《作為證言的文學史》(증언으로서의 문학사), 首爾:深泉。
- 徐寬模(서관모)(一九八四)《現代韓國社會的階級構成與階級分化》(현대 한국사회의 계급구성과 계급분화), 首爾:

Hanul。

崔元植(최원식)(一九八二)《民族文學的邏輯——崔元植評論集》(민족문학의 논리——최원식평론집)，波州：創作與批評。

——(二〇〇九)《帝國之後的東亞》(제국이후의 동아시아)，波州：創作與批評。

崔元植、林奎燦主編(최원식·임규찬 엮음)(二〇〇二)《四月革命與韓國文學》(4월혁명과 한국문학)，首爾：創作與批評。

溝口雄三(미조구치 유조)(二〇〇四)《中國的思想》(중국의 사상·崔珍皙譯)，首爾：松樹。

蔣尚煥等(장상환 등)(一九八七)《現階段·第一集》(현단계 제1집)，首爾，Hanul。

瀧澤秀樹(용택수수)(一九八五)《現代韓國民族主義論》(현대한국민족주의론，金容寬譯)，首爾：未來社。

邊衡尹等(변형윤 등)(一九八五)《分斷時代與韓國社會》(분단시대와 한국사회)，首爾：喜鵲。

五、【韓文】相關單篇論文

白樂晴等(백낙청 등)(一九九一)《九〇年代民族文學的課題》(90년대 민족문학의 과제)，《創作與批評》(창작과 비평)第七十一期(一九九一年二月)，頁九六一—一四七。

全瑋準(전봉준)(一九七四)《告示·京軍與營兵而教示民》、《東學亂記錄(下)》(동학란 기록〔하〕，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首爾：探求堂，頁三七九—三八〇。

李大根(이대근)(一九八五)《關於韓國資本主義的性質》(한국 자본주의의 성격에 관하여)，《創作與批評》(창작과 비평)第五十七期(一九八五年十月)，頁三四六—三三七。

吳之湖(오지호)(一九八三)《有志就行》(내 뜻대로 산다)，《語言研究》(어문연구)第十一卷第一期(一九八三年二月)，頁一三一—一五。

- 金廷翰(김정환)(二〇一〇)(五·一八光州抗爭以後, 社會運動意識形態的變化)(5·18 광주항쟁 이후 사회운동의 이데올로기 변화)·《民主主義與人權》(민주주의와 인권)第十卷第二期(二〇一〇年八月), 頁一六一—一九〇。
- 金秀行(김수행)(一九八七)〈韓國經濟學界的新動向〉(한국 경제학계의 새로운 동향들)·《現象與認識》(현상과 인식)第十一卷第一期(一九八七年四月), 頁一一六—一三三。
- 姜萬吉等(강만길 등)(一九八九)〈卷首座談: 八〇年代民眾史學論的問題為何?〉(권두좌담: 80년대 민중사학론, 무엇이 문제인가?)·《歷史批評》(역사비평)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號, 頁二〇—五六。
- 張一宇(장일우)(一九六三)〈農村與文學〉(농촌과 문학)·《漢陽》(한양)第一七七期, 頁一四四—一五一。

六、【中文】陳映真相關著作

- 陳映真(一九八八A)《陳映真作品集 6·思想的貧困(訪談卷: 人訪陳映真)》,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一九八八B)《陳映真作品集 7·石破天驚(訪談卷: 陳映真訪人)》,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一九八八C)《陳映真作品集 8·鳶山(隨筆卷)》,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一九八八D)《陳映真作品集 9·鞭子和提燈(自序和書評卷)》,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一九八八E)《陳映真作品集 10·走出國境內的異國(序文卷)》,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一九八八F)《陳映真作品集 11·中國結(政論及批評卷)》,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一九八八G)《陳映真作品集 12·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政論及批評卷)》,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一九八八H)《陳映真作品集 13·美國統治下的台灣(政論及批評卷)》,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一九八八I)《陳映真作品集 14·愛情的故事(陳映真論卷)》,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一九八八J)《陳映真作品集 15·文學的思考者(陳映真論卷)》,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一九八九A)《人間》第四十四期(一九八九年六月), 頁九八—一五五。

- (一九八九B)《人間》第四十五期(一九八九年七月),頁一三二—一四三。
- (一九九二A)《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各階段的民族主義》,《海峽評論》第二十一期(一九九二年九月),頁三三—四四。
- (一九九二B)《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中華雜誌季刊》第三十一年總一期(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頁二二—二五四。
- (二〇〇一)《陳映真小說集·1—6》,台北:洪範書店。
- (二〇〇四)《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書店。

七、【中文】陳映真企劃、主編之台灣政治經濟叢刊

- 涂照彥(一九九二)《台灣政治經濟叢刊1·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
- 劉進慶(一九九二)《台灣政治經濟叢刊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
- 段承璞(一九九二)《台灣政治經濟叢刊3·台灣戰後經濟》,台北:人間。
- 谷蒲孝雄(一九九二)《台灣政治經濟叢刊4·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台北:人間。
- 陳玉璽(一九九二)《台灣政治經濟叢刊5·台灣的依附型發展》,台北:人間。
- 劉進慶等(一九九三)《台灣政治經濟叢刊6·台灣之經濟——典型NIE S之成就與問題》,台北:人間。
- E. A. Winckler & S. Greenhalgh 合編(一九九四)《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台北:人間。

八、【中文】相關專書

白永瑞、陳光興編(二〇一〇)《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朱玫、李政勳、林家瑄、苑英奕、孫海龍譯,李旭

淵校訂），台北：聯經。

竹內好（二〇〇五）《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陳光興（二〇〇六）《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

陳光興、張頌仁、高士明主編（二〇一二）《後／殖民知識狀況——亞洲當代思想讀本》，上海：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溝口雄三（一九九七）《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索介然、龔穎譯），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九）《做為「方法」的中國》（林右崇譯），台北：國立編譯館。

（二〇〇六）《中國的思維世界》（劉東主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二〇一〇）《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陳光興、孫歌、劉雅芳編），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二〇一一 A）《中國的公與私·公私》（鄭靜譯，孫歌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二〇一一 B）《中國的衝擊》（王瑞根譯，孫歌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二〇一一 C）《作為方法的中國》（孫軍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魯迅（一九八一）《魯迅全集·第一卷、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錢理群（二〇一二）《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一九四九—二〇〇九）——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台北：聯經。

九、【中文】相關單篇論文

延光錫（二〇一三）〈二·二八、五·一八與六·四——冷戰與失語〉，《人間思想》第五期，頁二二四—二三一。

（二〇一八未刊稿）〈民族文學的民眾性，還是民眾文學的民族性？——試論一九八〇年代南韓民族民眾文學論戰〉。

邱士杰(二〇一三)〈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現代中文學刊》第二十七期(二〇一三年六月)，頁四八—六七。

陳光興(二〇一〇)〈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七十八期(二〇一〇年六月)，頁二一五—二六八。

——(二〇一一)〈陳映真的第三世界——五〇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四期(二〇一一年九月)，頁一三七—二四二。

十、【英文】相關專書

Paik, Nak-chung. (2011). *Division System in Crisis*, trans. by Kim Myung-hwan et al., Berkeley: Global, Area and International Arch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十一、相關報章雜誌

《東亞日報》編輯部，〈要求政治自由——絕對反對階級獨裁〉(政治自由를 要求——階級獨裁는 絕對反對)，《東亞日報》(首爾)，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第三頁。

《朝鮮日報》編輯部，〈國號呢？政權形態呢？記者會進行街頭民意調查〉(국호는? 정권형태는? 기자회견서 가두어론조사)，《朝鮮日報》(首爾)，一九四七年七月六日第二頁。

謝晨星、陳春燕，〈我只是個業餘作家——專訪曹征路〉，《深圳商報》(深圳)，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八日，轉載網頁連結：
http://szart.sznews.com/content/2014-01/24/content_9046226_3.htm (最後瀏覽日期：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台灣社會研究
論壇叢書
韓國思潮系列

台社論壇 11

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

East Asia as Intellectual Thought: History and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orean Peninsular

作者：白永瑞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台社論壇 15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Paik Nak-chung: The Division System · National Literatures

編者：白永瑞、陳光興／譯者：朱玫、李政勳、林家瑄、苑英奕、孫海龍

校訂：李旭淵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

台社論壇 26

打造二〇一三年體制

2013년 체제 만들기

作者：白樂晴／譯者：李大可／校訂：白池雲、李政勳

出版日期：2014年11月

台社論壇 32

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採

사상의 분단: 진영진과 박현채

作者：延光錫

出版日期：2019年6月

發行人 周渝

社長 朱偉誠

總編輯 魏玓

執行編輯 鄭亘良

編輯委員 王增勇、林純德、夏曉鵬、陳信行、黃道明

編輯顧問 丸川哲史、王杏慶、王瑾、白永瑞、江士林、汪暉、李永熾、李榮武、邢幼田、林俊義、柯思仁、孫歌、徐正光、高承恕、張復、梁其姿、陳溢茂、許寶強、許達然、蔡明發、蔡建仁、鄭欽仁、濱下武志、Perry Anderson、Chris Berry、Gail Hershatter

社務顧問 丁乃非、于治中、王振寰、丘延亮、何春蕤、呂正惠、李尚仁、李朝津、林津如、夏鑄九、徐進鈺、陳光興、陳忠信、甯應斌、馮建三、黃麗玲、賀照田、廖元豪、趙剛、鄭鴻生、鄭村棋、錢永祥、瞿宛文

網址 <http://www.taishe.com.tw>

電郵 taishe.editor@gmail.com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6395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63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台社論壇32

「亞洲現代性與批判思想」系列

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塚

사상의 분단: 진영진과 박현채

作者 延光錫

執行編輯 陳筱茵

美術設計 黃瑪琍

文字潤校 劉羿宏

文字校對 陳冉涌

出版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電話：(02) 5593-399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朱偉誠教授轉

印刷裝訂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唐山出版社／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B1

電話：(02) 2363-3072 / 傳真：(02) 2363-9735

Email: tonsan@ms37.hinet.net / 網址: <http://blog.yam.com/tsbooks>

ISBN 978-986-90860-7-3

定價 330元

出版日期 2019年6月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唐山出版社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資助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塚／延光錫著。－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雜誌出版：唐山發行，2019.06

332面；14.8×21公分。--(台社論壇32)(亞洲現代性與批判思想系列)

ISBN 978-986-90860-7-3(平裝)

1. 朴玄塚 2. 學術思想 3. 思想史 4. 韓國

509.32

108009158

- 01 戰爭沒有發生？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 | 馮建三編，2003
- 02 反思台灣論：台日批判圈的內部對話 | 陳光興、李朝津編，2005
- 03 四海困窮：戰雲下的證詞 | 趙剛著，2005
- 04 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 | 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2005
- 05 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 | 賀照田著，2006
- 06 批判連帶：2005亞洲華人文化論壇 | 陳光興編，2005
- 07 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 | 鄭鴻生著，2006
- 08 當前知識狀況：2007亞洲華人文化論壇 | 陳光興、蘇淑冠編，2007
- 09 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 | 錢理群著，2008
- 10 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 | 丘延亮著，2008
- 11 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 | 白永瑞著，2009
- 12 魯迅入門讀本(上、下) | 錢理群編，2009
- 13 全球化下的亞洲跨國企業勞工：抗爭的圖像 | 張大業編，2010
- 14 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 | 陳光興、孫歌、劉雅芳編，2010
- 15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 白永瑞、陳光興編，朱玫、李政勳、林家瑄、苑英奕、孫海龍譯，李旭濶校訂，2010
- 16 韓少功隨筆集 | 韓少功著，2011
- 17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上、下) | 陳光興、蘇淑芬編，2011
- 18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 | 錢理群著，2012
- 19 發現成露茜 | 夏曉鵬、廖雲章編，2012
- 20 貼身的損友：有關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 | 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著，丘延亮譯，2012
- 21 民主課 | 曹征路著，2013
- 22 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台灣一九六〇年代 | 趙剛著，2013
- 23 左工二流誌：組織生活的出櫃書寫 | 吳永毅著，2014
- 24 防天災 禦人禍：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 | 陳永龍、丘延亮著，2014
- 25 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泰戈爾與自我的政治 | 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著，戰艷譯，吳曉黎校訂，2014
- 26 打造二〇一三年體制 | 白樂晴著，李大可譯，白池雲、李政勳校訂，2014
- 27 專業通才理想的實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訪談錄(一)(上、下) | 徐進鈺、廖彥豪、凌宗魁編，2015
- 28 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讀本 | 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著，陳光興編，王智明、沈思、陳耀宗、楊雅婷譯，2017
- 29 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 | 李孝智著，丘延亮校編，2017
- 30 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簡體字版) | 賀照田、余鳴、莫艾、何浩、薛毅、倪偉、董麗敏著，2018
- 31 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是否必要？如何可能？(簡體字版) | 賀照田、陳明、符鵬、王東美、楊建強、李靜、李娜、冷霜、倪偉著，2019
- 32 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採 | 延光錫著，2019

作者以南韓的朴玄採與台灣陳映真在相似的冷戰史背景下，從知識、思想與戰後史間的斷裂，指出即走上後殖民對現代性想像的必然路徑，並用他們的思想作為填補與斷裂之間的「歷史中間物」，作者更穿透這樣的填補物辯證出對東亞新殖民主義的再認識，當然也是對亞洲戰後民主化的虛構性提出重重一擊。

——王墨林

延光錫身上有的能耐／武功是其他人很難有的，他自己知道自己是韓國人，可是不只是。他可以在「民族」之間、之外遊走，在語言、地域之間遊走（錢新祖稱之為「出入異文化」），他與前輩朴玄採、陳映真的關係是複雜的，一方面他承繼了他們民族主義為基盤的國際主義，一方面他在情感知識方法上從民族主義（甚至於國際主義）解放出來，能夠長出更為「客觀」的分析能力與視野，這是我以為他的工作潛在的爆發力之所在。

——陳光興

《思想的分斷》是第一本有系統地嘗試分析、比較台韓左翼經驗的著作。光錫的分析以陳映真與朴玄採為切入點，不僅僅理解他們的世代與時代，更能夠進一步思索改造社會的知識與行動之間存在著什麼關係？並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課題拉起了一個十字座標型的連結：橫向比較兩個歷史人物與他們的學思、實踐與時代，縱向地聯繫他們曾經走過、而我們現在繼承下來的歷史。

——陳信行

ISBN 978-986-90860-7-3



9 789869 086073